

云右 三、姓、笑、劣、迹、未



ISBN 0-200-00000-0

0000000000



动乱“精英”劣迹录

中共北京市委研究室 编

北京出版社

动乱“精英”劣迹录

Dongluan “Jingying” Lieji Lu

中共北京市委研究室 编

*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3.125印张 278,000字

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0

ISBN 7-200-00970-9/D·39

定 价：4.15元

序

王 光

由中共北京市委研究室编辑、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动乱“精英”劣迹录》一书，同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一本很能引起人们思考、给人以教益的好书，相信会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今年春夏之交，在首都发生的由学潮到动乱、进而发展为反革命的暴乱，平息已经四个多月了。这场政治风波，使全党和全国人民从反思中认真总结了经验教训，从而更加坚定地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大家从动乱、暴乱的五十天，想到改革开放的十年，想到建国以来的四十年，更加坚信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没有立国之本，也走不好强国之路。这个正确的结论，广大共产党员和全国各族人民在经历了血与火的政治斗争的严峻考验之后，从自身的体验和现实的巨大变化中，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个结论，完全符合客观事实，符合客观规律。

在这本书中“曝光”的方励之、严家其、李洪林、万润南、戈扬、吾尔开希等人从来看不起工农群众，也从来不顾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他们打着爱国、民主的旗号，实际上干着破坏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勾当。他们长期搞资产阶级自由化，

用卑劣的手法制造谣言，蛊惑人心，煽动、策划、组织了这场政治动乱和反革命暴乱，其目的就是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他们绝非知识分子中的“精英”，而是知识分子中的败类；并非爱国、民主的“斗士”，而是国外反动势力的走卒；并非改革的“先锋”，而是被人民唾弃的社会渣滓。

希望这本书能成为帮助人们识破“精英”们的阴谋和反革命真面目的有益的读物。

1989年10月

目 录

序	王 光 (1)
第一编 微观曝光	
动乱“精英”严家其	(3)
一部妄图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纲领	
——评严家其的《首脑论》	(12)
社会主义的共和国是颠覆不了的	
——评严家其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	(26)
方励之的反共卖国行径	(40)
方励之张显扬之流早就提出要搞“动乱”	(44)
方励之们打算怎样“解散中国”？	(48)
方先生不再“独立”	(51)
躲在“洋”伞下的方鼓手	(53)
方先生为美国献的什么计	(55)
李淑娴有一颗什么样的“中国心”	(58)
动乱“记者”戴晴	(63)
老牌的动乱女“精英”戈扬	(75)
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理论家”李洪林	(80)
万润南搬起“石头”要砸谁	(85)
抓住刘晓波的黑手	(97)
刘晓波要的是什么样的“自由”？	(104)

爱钱与舍财——刘晓波侧影一帧	(108)
奴才卖国嘴脸的大暴露	(109)
析刘晓波的《河殇》观	(113)
西化、人化和换“种”	(116)
吾尔开希真面目	(121)
吾尔开希在美国扮演了什么角色?	(127)
“我决心将王丹的情况告诉你们”	(133)

第二编 宏观观澜

“精英”是“民主个人主义者”的新变种	(139)
泛起的沉浮	(143)
“精英”牌“民主政治”一剥	(145)
卖国贼的案从来翻不了	(148)
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迷梦注定要破产	(152)

第三编 纷纭事态

精心策划的一场骗局

——胡耀邦同志追悼会前后纪实	(165)
----------------------	-------

《世界经济导报》事件真相	(172)
--------------------	-------

上海动乱真相	(185)
--------------	-------

接受要求之后的动乱升级

——4月17日至18日记事	(207)
---------------------	-------

炮制出来的“4·20新华门血案”

——4月19日夜至20日凌晨纪实	(211)
------------------------	-------

新华门作证	(215)
-------------	-------

看“谣言政治”是怎样害人的

——“清华人之声”广播台的拙劣表演	(227)
-------------------------	-------

一个蛊惑人心的广播站	
------------------	--

- “警车轧死大学生”的谣言是故意造出来的 …… (235)
- 这算什么“民主” …… (238)
- 一起“最轰动”的谣言制造者自曝内幕 …… (242)
- “华夏狂人”的丑恶表演 …… (244)
- 马“老师”“自焚”记 …… (247)
- 一个佛门的败类
- 被弘福寺开除的和尚怡法在京搞“声援” …… (250)
- 一个制造动乱的“沙龙” …… (251)
- 看“高自联”如何利用绝食学生搞政治讹诈
- 部分医务人员谈绝食现场救护见闻 …… (257)
- 请看“北京高校自治联合会”的真面目 …… (263)
- 天安门广场啊，我为你哭泣 …… (267)
- 一个大学生的沉重反思 …… (275)
- 高自联“教育”了我们 我们会成熟起来 …… (285)
- 平暴“备忘录”
- 兼答“戒严部队不入城是否会发生反革命暴乱”等疑问 …… (290)

第四编 海外浊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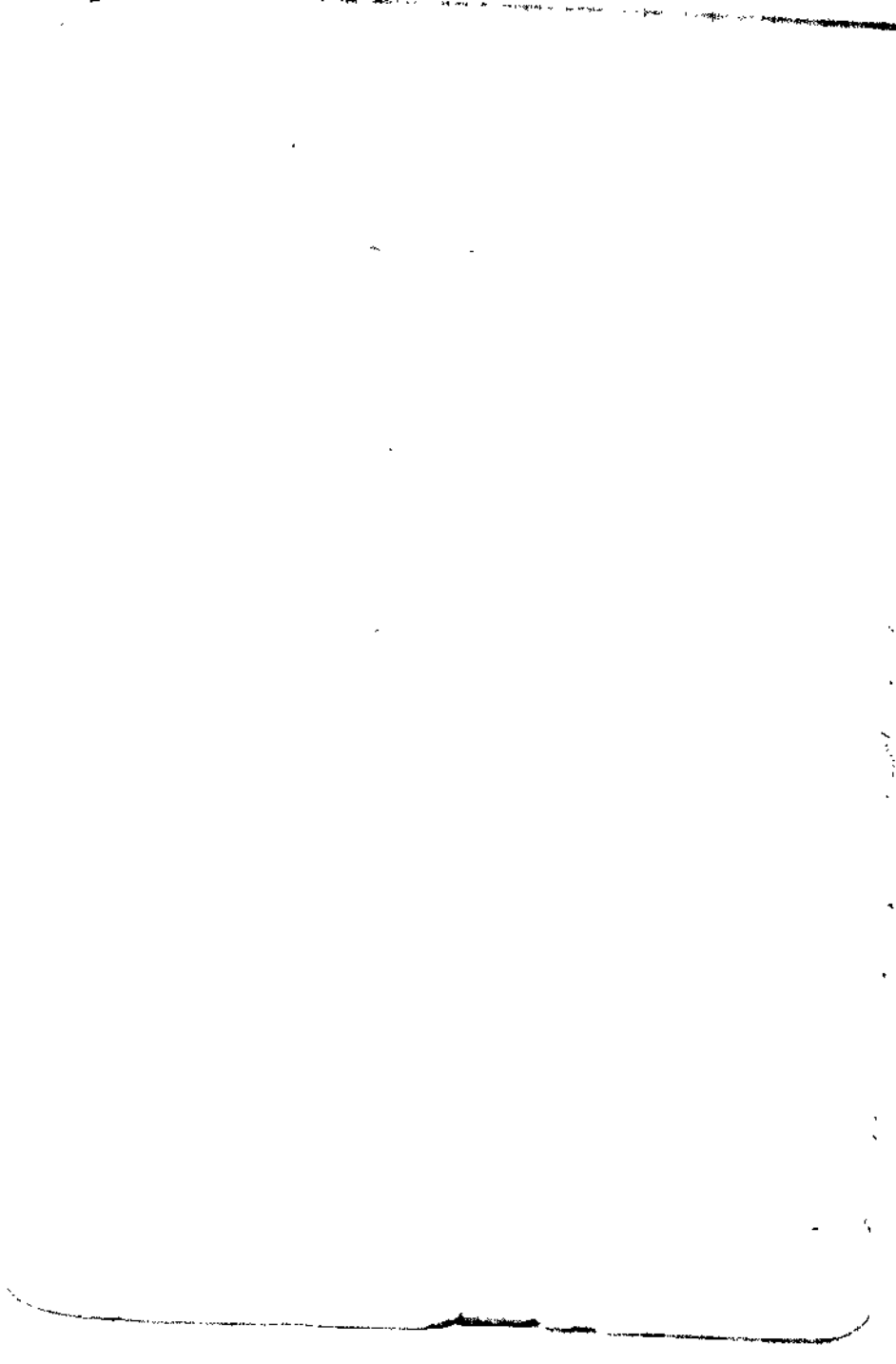
- “美国之音”的真面目 …… (313)
- “美国之音”是什么机构 …… (315)
- “美国之音”宣传手法剖析 …… (317)
- 评“美国之音”的辩解 …… (319)
- 怪哉！美国人不宜听“美国之音” …… (322)
- 美国新闻媒介如此报道北京动乱 …… (324)
- “美国之音”的表演与“和平演变”策略 …… (328)
- 美国的反华浪潮是怎样掀起的？ …… (336)

白宫的青睐	(340)
里根先生的尴尬	(343)
北京、纽约安全说	(345)
第五编 佐证《河殇》	
《河殇》宣扬了什么?	(351)
赵紫阳同志的介入说和《河殇》的“新纪元”	(359)
《河殇》与新闻“中立”	(366)
《河殇》三问	(371)
评《河殇》对史实的歪曲	(378)
反思传统文化必须实事求是	
——评《河殇》对历史的歪曲	(383)
从《河殇》论大陆西化派	(391)
《河殇》唯心主义历史观剖析	(399)

第一编

微观暴光

“精英”们其实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败类，在北京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中，担当了煽动者、组织者和指挥者的角色。



严家其，男，1942年12月25日出生于江苏省武进县的一个工商业者兼地主家庭，1964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毕业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工作。1982年5月，他任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筹备组负责人，1985年6月被任命为政治学所所长，1988年7月被评为研究员。从1986年9月至1987年10月，他参加了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的工作。1989年6月，北京反革命暴乱被平息后，他畏罪叛逃到国外。

动乱“精英”严家其

李建生

一些自命为知识界“精英”其实是中国知识分子败类的人物，在北京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中，担当了策划者、煽动者和组织者、指挥者的角色。严家其是其中一个主要代表人物。

(一)

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看来，严家其是“学术精英”。实际上，十年前他就是一个热衷于街头政治和非法活动的怀有政治野心的人。那个时候，他忙于同北京与外地的一些非法组

织如“启蒙社”、“振兴社”、非法刊物如《四五报》以及它们的头头密切联系，参加会议，出谋划策，解囊相助。他自己还直接参与“西单墙”下的各种活动，成为鼓吹西方“民主”、“自由”的活跃分子。他就是从这里开始他的政治生涯的。

“西单墙”和非法组织被取缔后，严家其着手“研究”政治学。研究的“成果”主要是三本书：一本是由大小字报和各种谣言、传闻拼凑起来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一本是宣扬资产阶级政治观的《首脑论》，还有一本是自我吹嘘、自我标榜的《思想自传》。他的基本政治观点，是主张中国实行不要共产党领导的“三权分立”、“权力制衡”，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封闭的思想体系”，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就是“保卫中国封建文化”。总之，是要取消四项基本原则，在中国推销美国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他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一些人密切配合，互相呼应，成为一个重要的代表人物。正因为如此，他被海内外一些人捧为“新型政治学家”、“政治精英”、“政治体制改革理论权威”和“民主斗士”、“自由派知识分子代表”、“当代世界名人”等等，名噪一时。他还频繁“出访”一些西方大国，颇受某些西方政治首脑的青睐，心甘情愿地充当西方资产阶级在中国的一个代言人。他被赵紫阳同志和鲍彤看中，是不奇怪的。1986年秋，他们将严家其调到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担任要职。鲍彤还打电话通知中国社会科学院，一要保留严家其的政治学所所长职务，二要派车保证他的活动需要。严家其从此成了被称为赵紫阳智囊班子的重要成员。

1987年初，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开始后，严家其受到有关部门的审查。但是，严家其立即向鲍彤求援，向他写信为

自己的错误辩解。3月20日，鲍彤以中央政体改研讨小组办公室名义向赵紫阳写报告，说审查中提出的严家其的错误事实是“误解”、“以讹传讹”，称赞严家其“是守纪律的”，要他继续留在政体改研讨小组“照常工作”。赵紫阳同志立即表示同意，并批示有关负责同志“阅知”。这样，严家其就被包庇了下来。

(三)

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以后，面对党内外强烈批评，赵紫阳同志不仅不检查自己的错误，反而消极对待中央的治理整顿方针。在这之后，那个被称为智囊团里的人物透露，要刮起一阵“倒邓保赵”风，并由海外一些反动报刊透底，鼓噪只有“邓小平完全退休”，由赵紫阳“独裁改革”，“中国才有希望”。

这是一个政治信号。严家其，这个一头连着鲍彤、一头连着海外国外反共反华势力的人物，在“倒邓保赵”风中最引人注目的行动，是和温元凯发表《关于时局的对话》。这篇对话由后来在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中颇为活跃的《经济学周报》一位记者整理，几乎同时在《经济学周报》和一些香港报刊刊出，《世界经济导报》也发表了内容大体相同的消息。对话的要害，仍然可以用“倒邓保赵”概括。用他们的话来说，中央治理整顿的方针是“倒退”，党内外对赵紫阳的错误的批评使“改革成果面临断送”的“危险”，如果赵紫阳下台，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就会出现“停滞”，因此要反对“非程序的权力更迭”。这“非程序”三个字很费了一番心机，值得特别注意。这已经不再有任何学术气味，完全是一种赤裸裸的政治动员。

与此同时，他向人们推荐了一套所谓“程序”。去年11月，

他向人们推荐了一套所谓“程序”。

他在《世界经济导报》发表谈话，要人们放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抵制精神污染的斗争，把腐败的根源归结到公有制上，要求“积极发展私有制”，并从苏共历史谈起，提出“撤销政治局”，建立一种所谓华盛顿式的程序。今年2月，他又在日本提出“必须废除中共中央政治局”。总之，他追求和宣扬的是取消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地位的西方政治体制。他还在今年某青年刊物第2期上发表谈话，鼓吹按他那套“程序”修改我国宪法，规定国家政权如何组成，由谁来掌握国家政权。如果不遵循他的这套“程序”呢？他说“只有通过非程序的方式来表达，比如诉诸暴力或动乱”！请注意，严家其已经由反对“非程序”走到鼓动非程序。他的这些活动，同方励之等人的“新启蒙沙龙”，陈军等人的签名上书，戈扬等人的演说，李淑娟、王丹等人主持的集会，以及北京一些大学里直接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小字报一起，给动乱作了直接的舆论准备和组织准备。

4月15日胡耀邦同志逝世后，极少数人立即乘机利用学潮制造动乱。游行、静坐和冲击新华门的活动中出现了大量政治口号，最核心的两条就是要为胡耀邦同志“平反”和彻底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严家其正是紧紧抓住了这两条出谋划策，进行煽动。

4月21日，在鲍彤的授意下，他和包遵信贴出《致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的公开信》，要中央承认游行、静坐中提出的要求都是“积极”的“民主要求”，向中央施加压力。包遵信后来对香港《百姓》杂志的记者说，这封信“对学生的鼓舞很大”。

4月26日人民日报重要社论发表后，上海市委按中央精

神作出了整顿《世界经济导报》的决定。但是，遭到赵紫阳同志的非难。赵紫阳5月4日发表“亚行讲话”，5月6日指示要进一步加强学潮报道的“公开程度”，5月16日在会见戈尔巴乔夫的谈话中又把矛头引向邓小平同志。在这一阶段，严家其依据赵紫阳讲话的精神，集中攻击4·26社论和上海市委决定，集中攻击邓小平同志，策划动乱的不断升级。

4月27日大游行的当晚，严家其说，这次游行“是我们的一个胜利”。

4月28日，他起草并散发了由他和其他一些人署名的公开信《捍卫新闻自由》，攻击上海市委处理《导报》的决定，煽动新闻界进行声援活动和请愿集会。

“亚行讲话”一发表，严家其说“现在出现了转机”，立即提出要“发动知识界支持赵紫阳”。随后，他与苏绍智等一伙人贴出《我们再也不能沉默了》的大字报，动员知识界人士起来游行。

5月14日，严家其同其他12人发出《我们对今天局势的紧急呼吁》，要中央公开宣布整个学潮是“爱国民主运动”，承认“北高联”为“合法组织”，威胁党和政府不得对学生绝食采取强制措施，否则“将成为历史罪人”。这一“呼吁”由严家其定稿后，先在天安门广场宣读，又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然后在15日的《光明日报》发表。《呼吁》提出的要求，立即变成学生的政治要求，并通过舆论工具造成了以绝食学生为人质要挟党和政府的严重局面。

5月15日，他带领一些人搞所谓“中国知识界”首次游行，并到天安门广场发表演说，支持学生继续绝食。

5月16日，他又带头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些人声援绝

食学生的游行，并与一些人发表《5·16声明》，再次要党和政府承认“学生自治组织的合法性”，承认4·26社论“是错误的”。

5月17日，他又发起和起草《5·17宣言》，对邓小平同志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说“由于独裁者掌握了无限权力，政府丧失了自己的责任，丧失了人性”，“清王朝已经死亡76年了，但是，中国还有一位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一位年迈昏庸的独裁者”，“昨天下午，赵紫阳总书记公开宣布，中国的一切决策，都必须经过这位老朽的独裁者”，叫嚷“老人政治必须结束！独裁者必须辞职！”

严家其的上述活动，上面体现了赵紫阳的意图，下面把黑手伸向学生和知识界，从一个重要侧面反映出这场动乱从酝酿到发动、经过逐步升级达到高潮的基本过程，揭示了动乱的策划者们从舆论准备到组织、煽动和直接出面指挥的基本轨迹。到了《5·17宣言》，他们的反动图谋和动乱的政治实质就和盘托出了。

(三)

5月1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了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问题，19日李鹏、杨尚昆同志在党政军负责干部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20日发布戒严令。赵紫阳同志反对中央的正确决策，公开分裂党，并把同党闹分裂的态度公开暴露在全党全国和全世界面前。与此相配合，动乱的策划组织者更加疯狂地把攻击矛头指向邓小平、李鹏、杨尚昆同志，策动召开人大常委紧急会议，企图废除戒严令，罢免李鹏，组织反对戒严令的大规模游行等活动，使动乱不可避免地走向反革命暴乱。到了这个阶段，严家其不但在煽动方面继续领銜主演，而且跳到前台承担起直接组织者和指挥者的角色，在推

动动乱向暴乱的演变中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反革命狂热。

5月19日后，他多次在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组织并主持有苏绍智、王丹、吾尔开希等参加的“北京知识界联合会”和“北京高自联”联席会议，策划对抗戒严令的统一行动。

5月20日，鲍彤看到败局已定，提出“党内已不能解决问题了，只能靠人大”。这一天，严家其对人说：“李鹏应该打倒，要通过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罢免他。”他还参加了反对戒严的大游行，并与一些人发出《我们知识界的誓言》，声称“绝不出卖自己的良知，绝不向专制屈服，绝不向八十年代中国的末代皇帝称臣”。

5月21日，他和一些人策划组织知识分子联合会，先组织北京的，再走第二步，“总的目标就是李鹏下台”。同一天，他和一伙人致电人大常委会领导人，要求立即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

5月23日，“北京知识界联合会”正式成立，由包遵信负责统筹。有人说，待全国的知识界联合会成立，就该由严家其负责统筹了。同一天，《北京知识界联合会成立宣言》复印件即在台湾《联合报》全文发表。《宣言》攻击中央的决策、国务院的戒严令为“倒行逆施”，呼吁“立即”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罢免李鹏案”。当晚他们号召入会者到天安门广场静坐示威，并在天安门广场散发他们编辑的《新闻快讯》，咒骂李鹏同志，要把他“押上历史的断头台”。

5月24日，“天安门广场总指挥部”和“首都各界联席会议”又宣告成立，通过这一形式，严家其等人组织的“知识界联合会”，同“北京高自联”、“北京市民自治联合会”、“北京工人敢死队”、“北京工人纠察队”、“北京市民敢死队”等正式结成

了反革命行动的“神圣同盟”，所谓“文化精英”和社会渣滓完全结合在一起，他们在共同誓词中叫嚷要“不怕流血牺牲”去推翻我国的政府。

5月26日严家其和包遵信在香港报纸发表《告李鹏书》，再次扬言要废除戒严令，“罢免李鹏”。

5月27日，他参加了组织所谓“5000知识精英大绝食”的会议。后来，演出了一场只有刘晓波等4人参加的48小时至72小时的绝食闹剧。

直至6月3日，反革命暴乱发生后，严家其仍在直接指挥。当天傍晚，他一直在建国门立交桥参与和指挥“堵塞军车进城的活动”，10时半才回到家中。11时多，他又赶到天安门广场，参加所谓“民主大学的开学典礼”，并担任“名誉校长”。他发表了20分钟的煽动性演讲，宣称李鹏必须“主动辞职”，否则“必将受到审判”！他还叫嚷要用鲜血和生命来铸造他们的“民主”。

在戒严令发布之后，严家其们知道他们大势已去。但是同一切反动分子一样，他们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于是把动乱“精英”和各种社会渣滓拼凑为一支反动力量，为颠覆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作拼死一搏。他们是注定要输的。在这输掉老本的一搏中，严家其口口声声标榜的民主、法制、非暴力等堂皇外衣，已被他们肆意践踏宪法和法律、阴谋推翻人民民主政权的凶残暴行所彻底撕碎，他作为反革命暴乱的一个策划者、组织者和指挥者的面目已暴露无遗。

(四)

反革命暴乱平息后，严家其在国外敌对势力的策划下，带着老婆逃跑了。在国外，他还在咬牙切齿地咒骂中国政府

中国人民。这样很好，好就好在不打自招地供认他不仅是一个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而且是一个背叛祖国的民族败类。

7月4日，严家其和吾尔开希在法国巴黎联名发表所谓《国殇周日宣言》，叫嚷要在国外成立“中国学运民运联合委员会”，在中国大陆制造更大的“风暴”。与此同时，在美国的“中国民联”头子王炳章跑到香港，宣布要成立一个“流亡的中国反对党”，提名“严家其担任这个党的第一任领导人”，“另一个人选”是方励之。这番话，很能表明卖国贼们和国际反共反华势力在严家其身上寄予的希望。7月中旬，严家其又召集一些人在巴黎秘密举行会议，策划成立以反对中国政府为宗旨的所谓“民主中国阵线”，鼓吹推翻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看来，得到海外国外敌对势力支持的严家其们，还要和中国人民继续较量下去。我们一定要彻底平息这场反革命暴乱，同时警惕极少数顽固分子的新的阴谋，随时防止他们捣乱。不过，我们要正告他们：凡是倒行逆施，与中国人民为敌的人，是绝不会有好下场的。他们的阴谋既然在国内已经以失败而告终，那么靠海外国外反动势力支撑继续进行捣乱，是成不了什么气候的。他们终究要失败，中国人民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一定要前进、要胜利，这是历史的必然。

（原载1989年8月3日《人民日报》）

一部妄图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纲领

——评严家其的《首脑论》

钟 海

一本挂满花环和桂冠的书

《首脑论》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严家其的代表作，是使他获得晋升、重用和巨大“声誉”的主要著作。严家其说：“1986年9月，这本书刚刚出版，我就把他献给了我们共和国的总理赵紫阳。”1986年10月，严家其被安排到赵紫阳同志直接过问、鲍彤任主任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工作。《首脑论》曾经走红一时。某科研部门评定此书为：“是目前我国政治学界影响最大的一部学术水平较高的理论专著。”严家其把这本书作为自己的“主要代表作及新见解或主要工作成绩”。他自述道：

1986年9月3日，上海人民出版社就《首脑论》的出版发行举行记者招待会，我在会上回答了记者提出的各种问题，接着就中国政治体制的现状和改革趋势作了讲演。《首脑论》出版后，中国掀起了“反自由化”高潮，但正是在这一时期，《首脑论》在中国四处传播，在1987年内连续印刷了六次，发

行量达31万册。1987年初，广州市新华书店评出1986年度十本畅销书，《首脑论》名列其中。安徽省合肥市举行了华东地区首届优秀政治理论图书评选会，《首脑论》荣获一等奖。在北京举行的《博览群书》的评奖中，《首脑论》荣获1987年度“金钥匙奖”。《首脑论》在上海出版后不久，香港中华书局和台湾远流出版公司出版了这本书的“海外版”和“台湾版”。台湾“金石文化广场”举办了评选活动。《首脑论》被评定为“1987年度台湾最具影响力的十本著作”之一。

《首脑论》就是这样挂满了花环和桂冠，被抬到了吓人的高度。既然这本书影响大，那我们就不能不分析它的影响究竟是什么？既然它被称为“优秀政治理论图书”，那我们就不能不研究它的“优秀的政治理论”究竟是什么？

《首脑论》值得我们重视之处还在于严家其始终把这本书看作是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相抗衡的对立物。他不止一次趾高气扬地说：“《首脑论》出版后不久，迎来了惊心动魄的1987年早春，可恰恰在这种气候下，《首脑论》在中国四处传播。”他在这里诅咒的“早春”“气候”，就是1987年初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严家其这时洋洋得意、趾高气扬是有道理的。这场斗争由于赵紫阳同志倒转了斗争的大方向，压制、打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马克思主义者；支持、纵容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使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夭折了，造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进一步泛滥，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的反动言论“四处传播”的严重恶果。这段历史至今人们记忆犹新。但是，历史终究翻开了新的一页，动乱“精英”严家其和其他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已经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严家其

连同他的《首脑论》自然也逃不脱历史和实践的评判。

放肆的假科学

翻开这本号称“在政治学领域影响最大的理论专著”，使人迷惑不解的是书中许多篇章讲述的是下述内容：“首脑的食品”、“首脑的礼品”、“首脑的家庭”、“首脑的出国旅行”、“首脑的警卫措施”、“首脑任职时的自然死亡”、“首脑下台后的生活”、“成为首脑前的婚姻”、“任职期间的婚姻”、“首脑的离婚”、“现代第一夫人的私生活”等。上述这些问题，从凡人的眼光来看恐怕还很难属于政治学理论领域。严家其创立的上述政治学理论专题只不过叙述了一些被神秘化了的首脑人物的逸闻轶事，极其肤浅庸俗，既无理论也无研究。严家其认为“首脑的婚姻形式本身也构成一部历史”。(第254页)他总结的这部“历史”有何重要发现呢？请读他概括的一段高论：“国王的日常生活受到整个宫廷的注视，因而，国王要和他的情妇‘幽会’，都是一件困难的事。”严家其得出如此乏味的理论，当然不会没有乏味的根据。《首脑论》细致入微地描写了关于“路易十四在娶西班牙公主为王后的第二年，爱上了年仅十七岁的路易丝·德·拉瓦利埃”的详细过程；绘声绘色地描写了关于美国总统哈定和约翰逊等人与其情妇的“私通”，还有关于“伊丽莎白一世终身未嫁”，“也有许多情夫”等专门论述，这里就不一一引用了。这些描写胜过黄色小说的地方就在于严家其从他的政治学的高度将此概括为“首脑的婚外爱情”并作了“理论”论述。但是，淫荡就是淫荡，严家其将其称颂为“爱情”实在是政治学界的创举。这样低级下流地美化剥削阶级代表人物淫乱放荡的糜烂生活，恐怕连某些资本主义

国家的公众舆论都不如。众所周知，近期日本内阁前首相宇野、前官房长官山下均为桃色事件被日本公众舆论轰下了台。

在严家其笔下，首脑情妇的更迭，总统的“私通”，国王和他的情妇的“幽会”都成为了政治学理论，这就不能不使人想起被恩格斯痛斥过的杜林的放肆的假科学，而严家其与其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严家其将这些浅薄、庸俗的东西冒充为政治学理论，说明他已经堕落为一个理论骗子，说明了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在理论上的一个相当突出的特色就是惊人的浅薄。熟悉严家其的人都知道他是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著作也没有系统研究过的政治学家。他最初是学数学的，但他认为在数学领域里埋头若干多年也可能出不了名，因此他又转向了自然辩证法研究领域。他到了哲学社会科学部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研究室后，发现又走错了路。搞自然辩证法既要有雄厚的自然科学基础，又要懂马列主义，但他的数学忘得剩不了多少东西，又不愿学马列。他是自然辩证法研究室里唯一的一位拒绝研究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的人。他反复考虑为了出名，必须告别自然辩证法研究。“文革”后期有一位一举成名的“白卷英雄”，给了严家其很大的启发和震动。1976年初他和哲学研究所的同志一起去昔阳县参观，听说这位“白卷英雄”也来了，便千方百计地要与他建立联系，受到了大家的批评。严家其就是这样下决心投身到政治领域。值得人们深刻反思的是严家其这位不研究马列主义的人写得如此浅薄庸俗的《首脑论》，竟能挂上“优秀政治理论读物”的一顶又一顶桂冠，这实在是对我们理论界、出版界的巨大讽刺，说明理论界、出版界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严重的

程度！

资产阶级野心家的世界观

严家其在《首脑论》中处处标榜自己是站在“廿世纪的今天”、“廿一世纪”和“第三千纪”的高度，总结整个人类历史，研究适用于全世界、全人类的理论。他在《序》中说：“科学无禁区”，“对科学来说，我们周围世界的一切”，“都应当是科学研究的对象”。但是，令人奇怪的是这位身在社会主义中国，当时还披着共产党员外衣的政治学家写作《首脑论》，却不把社会主义国家的首脑列为研究对象，只字不写社会主义，只字不写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和领导人。严家其承认，这本涉及近500位首脑的《首脑论》，“完全不涉及社会主义国家的首脑”，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难于自圆其说的巨大矛盾。该书既然定名为《首脑论》，在逻辑上就应当包括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的首脑，否则该书就应易名为“资本主义国家首脑论”或“剥削制度国家首脑论”。

《首脑论》一书的鲜明特色就是完全不讲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完全不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这本大讲资本主义世界各国首脑的书长达廿六万字，竟然几乎没有出现一处资产阶级与资本主义的字样。在《首脑论》中只讲“人群”、“群体”，而讳言阶级。严家其给首脑下了这样的定义：“首脑或首领就是群体这种社会心理过程的人格化”。他用这种似是而非的“群体”概念，掩盖和抹煞资本主义国家首脑的阶级本质，也就掩盖和抹煞了资本主义剥削和统治的本质。他在给“国家权力”下定义时说：“国家权力是掌握在国家机关及官员手中的权力。”他有意用关于国家权力的表面现象掩

盖国家权力掌握在哪一个阶级手里这一问题的实质。他在论述“权力主体”、“权力关系”、“权力的类型”、“政治体系的类型”等一系列重大政治问题时均回避阶级分析，闭口不谈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闭口不谈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阶级斗争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之一。《首脑论》旗帜鲜明地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阶级斗争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相对立，十分清楚地暴露了严家其已经完全离开了无产阶级的立场，公开地背叛了马克思主义。

关于写作《首脑论》的目的，严家其在《序》中说，就是献给“那些希望并将成为首脑的人们”。他本人希望成为首脑已经达到了入迷的程度。他十分欣赏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为了追逐权力，表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生命力”（第125页）；他赞美林肯“一心想成为总统”（第126页）；他敬佩“三木武夫想当首相都着了迷”（第127页）。严家其从中悟到了真谛，十分感慨地总结说：“可以说‘首脑迷’正是成为首脑的重要条件”，“要成为首脑，就必须在内心深处立意成为首脑。”（第127页）严家其就是这样做起了首脑梦。他在《首脑论》中写道：“当世界各国的首脑人物在联合国大会或某一位首脑的葬礼上相遇时，我们可以想见，这些人物是沿着人类社会的多么不同的途径、阶梯而登上职位或权力的顶峰的。”（第78页）严家其与众不同，他对首脑的会见，不是关心其会谈的内容，而是想入非非，“梦见”这些人如何“登上职位和权力的顶峰”。《首脑论》的《序》说：“要彻底了解人民，必须登上权力的顶峰”，公开地表明了他的个人野心。

严家其赞颂的是个人如何登上权力和职位的顶峰，并在《首脑论》中致力于“研究首脑人物取得最高权力的道路和途径。”他的研究成果是什么呢？第一，他认为“在通往首脑职位的权力的阶梯上，一个人必须取得一个又一个愈益接近首脑职位的地位。”他把“攀登权力顶峰过程”概括为三阶段：早期阶段、踏入政界阶段、争取成为首脑阶段；第二，他提出：“一个人要成为首脑”，“有必要学会政治舞台艺术”。他总结了这种“经验”：“在向政权进军的征途中”，“除了既定的目标外，还要使用种种计谋和手腕”（第110页）。严家其将这种计谋和手腕概括为“政治舞台的艺术”和“政治谋略”，其中有“幕后交易”、“利用派系之间的矛盾”、“冒险”、“有屈从他人的能力”、“高知名度”、“高度自信心”等等。严家其总结的这套“计谋”和“艺术”就是不折不扣的搞阴谋诡计，和林立果实施“571”政变计划相比更阴险、更狡诈。这完全是一套搞阴谋的理论，而毫无学术可谈。

严家其脱离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总结出一套“登上权力和职位顶峰”的理论和思想，完全建立在唯心史观的基础之上，是一种赤裸裸的个人野心，与马克思主义关于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的学说毫无共同之处。无产阶级的领袖是在革命实践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他们是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政党推举出来的一批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无产阶级领袖的品格、无产阶级领袖的形成和严家其总结的这套阴谋理论是根本对立的。严家其所以堕落为反革命暴乱的策划者和组织者，堕落为可耻的卖国贼，不是偶然的。在《首脑论》中他的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的世界观已经暴露无遗。他的下场是他的反动的资产阶级野心家的世界观

发展的必然结果。

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反动纲领

《首脑论》从首脑的日常生活讲到了国家的政治体制，东拉西扯，七拼八凑，涉及不少领域，但核心的问题和落脚点是关于社会制度的主张。

《首脑论》从头至尾美化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明目张胆地把当代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作为人类历史迄今为止的政治体系完善化的典范。这本书从社会发展规律的角度，概括了“政治体系完善化”的十项“规范”。严家其害怕过早地暴露仇视、反对社会主义制度，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祸心，在书中作贼心虚地声明：他只概括了“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前”的“政治体系”。但是令人可笑的是，这十项“规范”中每一项“规范”的内容讲的都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制度。例如，“规范”所列举的“弹劾制”，讲的内容是弹劾尼克松总统的经过。稍有常识和记忆的人都不会不知道，弹劾尼克松总统之事决不会发生在70多年以前。诸如此类，书中比比皆是。严家其欲盖弥彰，反而露了马脚。

第一，《首脑论》描绘的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蓝图，首先说明的问题是制定一部什么样的宪法。他懂得宪法规定着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的性质。他写道：“在廿世纪的今天，几乎没有一个国家没有宪法。宪法规定了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的基本原则”。但是，这位“站在廿世纪的今天”的中国的“著名的政治学家”，却闭口不谈社会主义的宪法，不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而是把美国的宪法奉为“政治体系完善化”的典范。《首脑论》概括的“政治体系完善化”的一

项“规范”是：“确立宪法根本原则，在宪法或根本法中明文规定不得修改这些根本原则。”他赞美美国宪法自1787年制定以来，“近二百年来，宪法中的许多原则始终未与修改”。在他看来，美国宪法的根本原则稳定不变标志着美国“政治体系的完善化”。这一主张毫无疑问地意味着美国宪法所规定的维护资产阶级的剥削与统治的根本原则应当万世永存。

严家其在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中极力装出一副捍卫宪法、依据宪法原则行事的模样。5月26日，他在香港某报发表的《在民主与法制轨道上解决当前中国的问题——兼告李鹏书》中叫嚷：“通过宪法规定的途径”，“推倒李鹏政府”。其实，他是从骨子里仇视和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他参与策动的反革命暴乱失败后，逃到香港，马上就露出了赤裸裸地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凶相。6月26日，他在香港发表的“公开信”中说：“我希望，在未来的中国，……中国要制定一部长期稳定的宪法，以从根本消除今天这样的政治灾难，我希望把三权分立、联邦制、军队的非政治化、国家化作为宪法的根本原则”。他在这里所说的宪法的一系列根本原则，都是美国宪法的原则，在《首脑论》中都作为“政治体系完善化”的典范进行了论证。严家其在《首脑论》中为何只字不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不写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这绝不是他的疏忽或遗忘，而是因为他从根本上反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首脑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爱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恨的反动立场是极其鲜明的，在这个根本问题上严家其没有说一句违心的话。

第二，有意地抹煞美国政治体制的阶级实质，把美国的“三权分立”、议会制作为“建立不同机关间的制衡关系”的典

范。他说：“继洛克之后，孟德斯鸠认为国家的权力应划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洛克、孟德斯鸠分权学说的传播，引起了人类史上国家机构设置原则的重大变革”。“拿实行‘三权分立’的美国来说，国家机关间有着一系列明确的制衡关系。”“在议会制下，议会和政府间的关系也可以看作一种广义的‘制衡关系’”。严家其在这里避而不谈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大肆美化美国的“三权分立”和议会制，其目的就像他在香港发表的“6·26公开信”中说的那样，在中国的未来实行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制。

第三，美化美国总统的个人军事集权制。《首脑论》提出的“政治体系完善化”的又一项“规范”是所谓的“保持最高国家行政权的统一”。其主要内容如下：“在美国，作为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总统，同时是全国武装力量总司令，总统不仅握有最高军事指挥权、高级军事首脑的任命权，而且对军事和国防政策的制定负有最高责任，通过国防部掌握着武装部队的领导权。”严家其论述这一“规范”的目的，在他的“6·26公开信”提出的关于我国的宪法应确立“军队非政治化、国家化”的原则中得到了最明确的说明。这一“规范”完全是针对着我国的政治体制，针对着我们党对军队的领导提出的。实行这一“规范”使军队脱离党的领导，也就改变了人民军队的政治性质。严家其所谓的“军队非政治化、国家化”就是资产阶级化，这是他们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反动纲领的重要组成部分，《首脑论》中奉为“政治体系完善化”的典范的美国总统的个人军事集权制，就是“军队非政治化、国家化”的具体模式。

第四，美国的“两党制”、“选举制”、“弹劾制”等均被奉

为“政治体系完善化”的典范。1985年7月7日，严家其在一民主党派举行的座谈会上大放厥词，扬言“不同意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党的说法”，鼓吹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没有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公然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和他他在《首脑论》中美化美国的“两党制”是一脉相承的。严家其最近在国外继续进行反华反共煽动，肆意攻击党的领导是“专制”、“独裁”，彻底暴露了他在《首脑论》中美化资本主义制度的目的，就是为推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制造舆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首脑论》只字不谈社会主义，不谈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性，这本身就是对待社会主义的一种否定的态度。严家其像其他的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一样，慑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强大威力，在通常的情况下，还不敢公开喊出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口号，但反动的阶级本性又决定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宣传和推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反动纲领，因此就使出种种计谋和手腕，有针对性地，即针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各个方面，大肆美化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为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进行舆论准备。《首脑论》出版、发行的时间正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极其猖獗的时期，方励之在这一时期提出了“全盘西化”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反动纲领。但是，由于方励之对社会科学一窍不通，所以他的“全盘西化”的反动主张还没有理论上的论证。《首脑论》则从理论上提出了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蓝图，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纲领披上了一件理论的外衣。

值得重视的反面教材和反面教员

严家其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活动的恶性发展是同赵紫阳同

志对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错误的立场、态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987年3月，在全党开展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中，严家其因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受到审查。在赵紫阳同志的直接支持下，鲍彤伙同严家其炮制了一篇狡辩抵赖的“两点说明”送给了赵紫阳。赵紫阳同志竟以党中央传阅文件形式印发鲍彤与严家其炮制的“两点说明”，公然为严家其打保票，肯定他“没有发表过反对党的领导或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肯定他“是守纪律的，研究问题的态度比较严谨”，并继续重用严家其，让他在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照常工作”。严家其正是在赵紫阳同志的直接支持、纵容下沿着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道路越走越远，越陷越深，在这场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中充当了重要的组织者和策划者。

这场风波一开始，他就跳上了前台，摆出了同党和人民、同社会主义决一死战的架势。他和其他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精英”结成死党，发表了《5·16声明》，声称：“我们已经来到一个历史的关头”，“已经再无机会可以丧失，再无后路可以退却”，“这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伟大的历史契机”，“应当意识到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挺身而出”。严家其的“历史使命”是什么？就是将他《首脑论》中提出的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纲领付诸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行动。他所说的“再无后路可以退却”，不言而喻就是破釜沉舟，决一死战。他所说的“历史契机”和“再无机会可以丧失”，就是说他自以为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机会来到了。的确，他们蓄谋已久、精心策划的动乱已经搞了起来，知识界和青年学生中的许多人被卷了进去。动乱“精英”们得到了赵

紫阳的公开支持，他们和赵紫阳同志上下呼应，和国内外的反动势力紧密配合，一时黑云压城城欲摧，社会主义共和国处于严重危急之中。严家其一伙利令智昏，穷凶极恶地发动了反革命暴乱，向社会主义制度发动了最疯狂的进攻。但是，严家其一伙过高地估计了反革命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力量，他们对形势的发展作了错误的判断。社会主义必将代替资本主义，中国人民沿着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前进是不可逆转的。严家其一伙策动的反革命暴乱的失败也宣告了《首脑论》宣扬的唯心史观和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反动纲领的彻底破产。

严家其妄图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梦想始终寄托在西方资本主义反动势力的支持上。早在1988年初，严家其就把《首脑论》一书献给了里根。他说：“1988年2月4日，在华盛顿希尔顿饭店举行早餐会前，我和日本、斐济、索马里等国的几位来宾受到了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和夫人南希的接见，我把《首脑论》献给了里根总统。”1989年7月，严家其逃到法国，以“北京高自联”和“北京知识界联合会”的名义发表了《致各国首脑书》，此文可以看作是《首脑论》的续篇，文中极尽向西方资本主义反动势力献媚取宠之能事，卖力地诅咒社会主义制度说：“二十世纪以来，世界上出现了两股巨大的反民主势力：一是以希特勒为代表的法西斯主义；二是从斯大林开始的社会专制主义。随着二次大战的结束，法西斯主义已经日趋灭亡。但是，蔓延半个多世纪的社会专制主义，至今仍在一些国家或地区猖獗不已。社会专制主义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推行专制主义。”严家其还奴颜婢膝地向西方资本主义大国首脑献计：“采取各种方式继续对中国现

政府进行谴责和必要的经济制裁，取消与北京当局的首脑级、高级官方交流访问活动。”从严家其献给里根《首脑论》一书的丑态，到《致各国首脑书》中的卖国主义的喧嚣，说明他已经堕落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可耻的卖国贼。严家其一伙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是西方资本主义反动势力对我国实行“和平演变”的走卒和代理人，他们上台就是卖国。严家其一伙要建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必然是完全西方庸俗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严家其一伙策动的反革命暴乱虽然失败了，但是他的贼心未死。在美台港反动势力的支持下，严家其继续猖狂进行颠覆我国政府的活动。他凶相毕露地叫嚣“中国并不是‘共和国’”，“‘共和国’必须重建”。严家其这位反面教员和《首脑论》这份反面教材告诉我们：在中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并没有结束。我们必须充分利用这位反面教员和《首脑论》这份反面教材教育青年和群众捍卫几千万先烈流血牺牲创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捍卫神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捍卫立国之本的四项基本原则，捍卫十年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

（原载1989年9月2日《光明日报》）

社会主义的共和国是颠覆不了的

——评严家其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

吴大英 李廷明

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理论依据”

1989年7月，叛逃到海外的严家其发表了一篇标题十分醒目的文章《中国并不是“共和国”》。他在文章中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不是共和国，而是实行“专制制度”的“帝国”。在此之前，他在《五一七宣言》中还宣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不是共和国的政府”。

其实，严家其这个观点早就形成了。1980年，严家其连续发表两篇文章，一篇是《王朝循环原因论》，另一篇是《潜藏在共和国身上的王朝印记》。他在文章中说，中国历史数千年来一直处于“王朝的循环”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的胜利，使“古老的历史循环在二十世纪有了新的内容”，这也就是说，虽然有新内容，却仍然处在王朝循环的范围之内。那时，出于伪装自己的考虑，严家其对“中国不是共和国”的思想表达得比较隐晦。他说，在我们的“人民共和国身上潜藏着许多封建王朝的印记”，如果清除了王朝印记，中

国就会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尽管使用了这种比较曲折的笔法，“中国不是共和国”的思想表达得仍然是十分清楚明白的。此后，严家其多次表达过类似的意思。他从其它角度提出的课题或思想，如分权制、限任制、程序政治等，也大都与这个观点有着联系。

严家其提出这一论断的“论据”主要有四个。

第一，“胜利了的农民战争建立起来的无一不是新的王朝，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次农民战争都没有背离这一历史规律。”“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农民战争。”因此，“按照中国历史发展的固有传统，这一次胜利了的农民战争应当在中国建立起一个新的强大的王朝。”即使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出现而使历史有了“新的内容”，它也还是不能摆脱“古老的历史循环”。

第二，“国家的最高权力最后集中于一人之手，不容许任何人、任何机构分割”，没有实行三权鼎立。

第三，“集中在个人手中的最高权力不容转让”，即实行事实上的最高职务终身制。

第四，“最高权力的继承是非程序的”，最高权力的继承或者以原来掌握最高权力的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或者以围绕争夺最高权力的政治斗争的结局为转移。无论哪种情况，都无程序可言。

在当前人们对帝制早已深恶痛绝而共和国思想早已深入人心的社会意识背景下，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制度宣布为“帝制”，无异于把它宣布为革命对象。既然是帝制而不是共和制，当然应该推翻。颠覆帝国不但不是反动，不是反革命，反而是进步，是革命。这样，经过严家其的“论证”，颠

覆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成了有理的事情了。

显然，“中国不是共和国而是帝国”是严家其为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制造的一个“理论依据”，也是他为动乱和反革命暴乱提供的一个主要“理论依据”。

“专制政体论”是彻头彻尾的歪曲

严家其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体是专制政体”的论断并不符合事实。

第一，所谓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实质上是农民战争，是毛泽东在特定意义上提出的论断。这种特定意义是：武装斗争的主体主要是农民，其前进基地主要在农村，其所要完成的任务中包括土地革命。即使从这种特定意义上把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看成农民战争，这次农民战争也绝不可能导致新王朝的建立。因为这次农民战争所处的历史环境与以往截然不同。这次农民战争所发生的时代，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使用机器进行社会化大生产的阶段，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商品交换关系正在向包括中国内陆在内的世界各地日益扩展。在这个时代里，农民革命不是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同盟军，就是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军。从而，农民战争不是导致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建立，就是导致无产阶级共和国的建立，而绝不会导致封建专制王朝的建立。在商品交换关系日益发展的条件下，农民的自发倾向主要是资本主义倾向，而不是封建主义倾向。此时，封建关系和思想只能作为残余或影响存在，而不会成为在全国范围内占主导地位的东西，它们没有力量再造出新的封建王朝。由于得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当代这次农民战争能够有力地超越农民自身的局限，成为彻

底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战争，通过土地革命，消灭地主阶级和租佃经济，挖掉封建王朝赖以建立的阶级基础和经济基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又为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扫清了道路，进一步消除了帝制产生的可能。这个事实是任何历史曲折也掩盖不了的。

第二，我们国家的最高权力并不是集中在一个人手里。在执政党内，最高权力由全国代表大会行使，在其闭会期间，由中央委员会行使，日常事务则由中央政治局处理。党的委员会集体决定重大事务，在做出决定时少数服从多数，党委会的召集人即书记只有一票的权利。国家的最高权力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在其闭会期间由其常务委员会行使。

过去，在执政党内，某些领袖人物因其水平、能力、经验和威望显著地高于其他人，对最高决策集团具有极大的影响力甚至控制力，权力在事实上过于集中在他们手里。这种个人集权并没有成为一项制度。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纠正权力在实际运行中过于集中于某些个人的现象，我们党又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了党委的集体领导制度。

第三，我国从来就不存在最高职务的终身制。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国家政权机关，最高职务都是选举产生的。担任最高职务的人由于种种原因变动职务的事也是经常发生的。在我国国家政权机关及执政党内存在过某些最高领导人因众望所归，连选连任，甚至殁于任所的现象，但这并没有形成一种领导职务终身的制度。为了杜绝公民终身担任最高领导职务，1982年，我国在新宪法中明文规定，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在中国共产党内，由邓小平同志带头，年事已高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主动退出第一线

领导岗位，用自己的行动来解决众望所归的领袖在党内终身担任最高职务的问题。

第四，我国最高权力的转移或继承是有程序的。国家最高权力产生、转移和运作的程序明确地记载在宪法和国家机关组织法上。执政党最高权力的产生、转移和运作的程序明确地记载在党章上。当然，在最高权力产生和转移之际，人们对机构设置和人选的酝酿是没有严格程序的。然而，当代各国各党都是如此。如果要求会前会外的酝酿都有严格的程序，那么世界上是不存在这种“程序政治”的。因情势变化而对原有程序变通更是各种程序中通常含有的题中应有之义。借口存在围绕最高权力组成而产生的不同意见之间的争论，断言我国最高权力的行使和更迭没有程序，是毫无道理的。

当然，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的政治体制并不尽善尽美。正因为如此，我们才需要改革它。事实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正在逐步改革政治体制。这种改革属于人民共和制的自我完善，而不是对所谓“专制政体”的根本改造。严家其把中国的政体说成是专制政体，说成是帝制，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体的彻头彻尾的歪曲。

目的是建立资产阶级政治制度

严家其硬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共和国而是帝国，难道仅仅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知名度而故做惊人之语吗？不是。严家其在《国家政体》一书中早已认定，无论是奴隶主国家，还是地主国家、资产者国家，都有君主制与共和制两种不同政体。在君主制与共和制这两种国家形式中可以存在不同的阶级内容。既然如此，那么严家其大谈帝制与共和制问题的目

的，显然就是要避开国家的阶级性质问题，以便为在政体问题掩盖下偷运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大开方便之门。

严家其理想中的政治制度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从他的言论看，大致有以下内容。

一、三权分立，即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互相独立、互相平等和互相制衡。世界上实行三权分立最典型的国家是美国。因此，严家其实际上想在中国建立美国式政治制度。严家其提出三权分立，是直接否定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因为根据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我国立法机关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唯一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权力对立法机关的权力而言既不独立又不平行，不能与立法机关的权力抗衡。在我国当前的历史条件下，国家最高权力一元制有利于保持国家机关的统一和效能，是我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探索出的行之有效的国家机关组织形式。另外，严家其认为，“在中国，在谈三权分立之前首先要解决党政分开问题”。他所谓的“党政分开”是要取消所谓“政府”之上的“政府”，也就是排除共产党对国家机关的领导。因此，他所提出的三权分立，先决条件是取消共产党的领导。

二、政治多元化。据报道，“按照严家其的解释，政治多元化的含义就是人民享有法律所赋予的充分的结社自由，人民有按照结社法独立成立各种组织的自由。”其实际内容是使以制造动乱为宗旨的“高自联”和以推翻中国合法政府为目的的“民主中国阵线”等组织在中国获得合法地位以“和共产党抗衡”。在中国现在的条件下，提出政治多元化，是反对共产党领导的一种策略，是企图使中国向资产阶级一元化统治演

变的一种过渡性口号。

三、有一个确保私有财产权的宪法。1988年11月，严家其提出，“今后中国政治改革的首要问题是在90年代修改宪法”，要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保护私有财产权”。严家其为什么要确保私有产权呢？他说：“只有财产的保证，才有保证言论、出版、结社等自由的存在。重新修订宪法，将确保私有产权的存在。”既然社会主义公有制是无产阶级言论、出版、结社等自由权利得以实现的保证，那么私有制自然也就是资产阶级言论、出版、结社等项自由得以实现的保证了。

确保私有产权的重要作用，实际是在社会主义的中国为“中产阶级”的兴起创造条件。严家其一伙明白，没有这个“中产阶级”（他们心目中的中产阶级实际指的是中等资产阶级），他们所要建立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就没有坚实、可靠、稳定的阶级基础，即使勉强建立起来，也不容易站稳脚跟。严家其的同伙万润南说：“‘中产阶级的兴起’是民主政制的基础。”因此，必须以宪法的形式来确保私有产权。

私有产权的确立还将为“精英政治”提供经济基础。在资本主义世界里，精英指的是受过良好教育，掌握着企业、社团、大众传播手段因而能有力地影响社会生活的人物及政客和学者，通常只有资产者及其知识分子才有可能成为这样的精英。我国这次动乱的策划者们说要在“中国建立‘精英政治’”，就是要在“中国建立由资产者及其知识分子掌权和决策的政治制度。根据他们对‘精英’这个词的用法和实际所指，他们所要实现的‘精英政治’的目的，就是用资产阶级专政代替人民民主专政。”

四、联邦制。严家其主张，台湾、香港、大陆中国都只

是这个联邦中的一个邦，甚至西藏也要算一个邦。人们不难看出，严家其之所以鼓吹联邦制，表面上是为了实现台湾与大陆的统一，实际上却包藏着企图分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祸心。

具有以上内容的政治制度，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政治制度。

既然严家其断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共和国而是帝国，既然严家其要在中国建立以维护私有制为第一要务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那么，怎样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存政权，何时推翻它，对于严家其来说，就只是方式和时间的问题了。

在改革的旗号下“蚕食”和“改造”

十年来，由于严家其受到党内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有力人物的赏识、提携和庇护，所以他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方式是以争民主为名，假改革之手，企图对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以蚕食和偷梁换柱的方式进行改造。

严家其自“踏入政治学王国”以后，特别是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的工作（到1988年7月为止）以后，便有组织有计划地贩卖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他利用我们曾经走过的以马克思主义一般理论代替政治学的弯路，在纠正这一偏差和恢复政治学独立学科地位的过程中，把学科建设引向了另一个方向，即抛开马克思主义，另起炉灶。从他对西方政治学的介绍、引用来看，他实际上认为马克思主义中没有什么政治学，只有西方资产阶级那里才有真正的政治学。他反复宣扬西方政治文化是“超越国界、超越民族界限的全人类的共同文化”的思想，以便使别人对资产阶级政治文化也放心大胆地接受。在他的影响下，一些人成了鼓吹资产阶级

政治制度的积极分子，有些人甚至成了参与动乱的活跃分子。

这几年，严家其利用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之机，一方面向我国的党政决策机关兜售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另一方面则利用舆论工具宣传资产阶级政治学说，为在中国实行西方政治制度进行长期性的思想准备。

同时，严家其还不断去西方取经。因为他对中国现行政治制度持有鲜明的否定态度，崇尚资产阶级民主，极力在中国推销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因为他被赵紫阳同志的秘书鲍彤看中，参加了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的工作，有了透过鲍彤去影响中央决策的可能；所以，他受到了美国等资本主义大国的注意。在双方心照不宣的默契中，他成了美国在社会主义中国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一颗棋子，成为他们在中国思想界的代理人之一。在国内外一些人的吹捧下，严家其成了“政治体制改革理论权威”、“投掷‘炸弹’的学者”、“政治精英”、“民主斗士”和“当代世界名人”，可以说是八面来风，名噪一时。

通过动乱和暴乱夺取政权

严家其鼓吹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和推销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党内马克思主义者的抵制和批评。只是由于受到鲍彤等人的保护，才得以平安过关。1988年下半年，我国经济出现一些困难，赵紫阳同志的失误有所暴露，党内对赵紫阳同志的不满有所增加。严家其感觉到赵紫阳同志地位不稳，他害怕自己推行的所谓改革方案不再得到来自党政领导决策层中有力人物的支持和保护，因此产生了一种危机感。1988年11月，他说，中国有“用非程序化的方式进

行权力变动的苗头”，因而“中国现在处在危机之中”。从此，严家其改变方式，和其他“精英人物”一道，企图孤注一掷，通过策动动乱来达到他们在安定环境中难以达到的目的。

严家其在动乱前夕和动乱中的表现，人们已经大体知道，这里不一一细谈。本文只想指出以下几点。

一、在动乱前和动乱中，严家其的言行是不一致的。动乱前，严家其说不能“把困难或某些失误变为一种权力斗争的借口”，不能“重蹈文革的覆辙”。然而，当动乱分子们利用国家的困难和某些失误逼迫党和国家领导人交出权力，采取贴大字报、游行示威、建立非法组织等方式“重蹈文革的覆辙”时，严家其不但大加赞赏，而且积极参加。动乱前，严家其曾说“民主政治”是“程序政治”和“责任政治”。动乱中，动乱分子们一会儿说要悼念胡耀邦，一会儿又说要和中央领导人对话，一会儿冲击新华门，一会儿又非法游行和占据天安门广场，这些行动及其转换毫无程序可言。动乱分子们制造谣言，阻塞交通，破坏秩序，把不明真相的群众煽动起来以后又扬言控制不了局势，这里没有一件是负责任的行为。即使按严家其对“民主政治”的那两条界定，也绝不是什么“民主政治”。然而，严家其却居心叵测地把这种非程序行动和非责任行动称为“民主”。可以看出，严家其完全不是要争取什么民主，而是以“民主”为招牌，通过动乱颠覆合法政府。

二、严家其利用赵紫阳同志把责任推给邓小平同志的讲话，公开亮出了自己关于中国是独裁专制制度的观点，通过《五一七宣言》，宣布中国政府“不是共和国的政府，而是在一个独裁者权力下的政府。”这个政府“不责任和丧失人性”，因此应该“埋葬独裁、埋葬帝制”。这是明确无误地向

动乱分子们公开发出的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动员令。

三、严家其提出打倒邓小平同志、杨尚昆同志、李鹏同志，并不只是针对他们个人的，而是针对整个中国共产党的。

5月下旬，严家其对一个香港记者说，“执政党是组织政府的党，得不到人民信任就不能成为执政党，现在中国共产党面临很大危机”，也就是得不到“人民”信任，因此不能执政。这就清楚地显示了他的用意。

四、严家其等人明白，在同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拼死搏斗的关键时刻，被他们哄骗来的一般群众是靠不住的，只有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怀有刻骨仇恨的各种犯罪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刑满释放人员、地痞、流氓才真正靠得住。为了维护“政治精英”们自己“理性、和平、非暴力”的假面以欺骗世人，他们非常需要有另外的人去干“精英”们自己不便出面去干的事。这样，“精英”和渣滓在共同利益和共同目标的驱使下就结合起来了，“首都各界联席会议”和“天安门广场总指挥部”就是这样的一个联盟。这个“总指挥部”在高音喇叭中叫嚷：“工人可以动手，市民可以动手，学生决不动手，爱学生就不要再阻拦市民(动手)了”，清楚地显示了他们的策略和分工。尽管有这种分工，“高自联”和“工自联”还是共同分发了匕首、铁棍等武器，教授了制做、使用燃烧瓶和烧军车的方法，并且共同参加了打砸抢烧杀的行动。因此，严家其等人所标榜的“理性、和平、非暴力”完全是骗人的鬼话。

五、严家其认为，出现流血冲突对颠覆中国政府和社会主义制度、实现美国式民主十分有利。5月下旬，他说：“当权者用暴力对付人民群众的要求，他们就会垮台得更彻底，而且中国的民主政治更有希望！”同样的意思在天安门广场

上的动乱分子嘴里说出来，就是“我们不怕当局镇压，就怕当局不镇压。”在这个思想指导下，他们除了在天安门广场树立美国式“女神”像以激怒全中国人民以外，还通过破坏车辆，设置路障，围堵戒严部队等暴乱性行动来挑起流血冲突。可以说，流血冲突是严家其等“精英”和渣滓们蓄意挑起的。

严家其对自己言论和行动的性质很清楚。他之所以仓皇出逃，就是因为知道自己罪孽深重，难逃人民的审判和惩罚。其实，通往资本主义世界的路严家其早就为自己铺好了。当他号召别人用鲜血和生命铸造“民主”，把学生和市民推向流血冲突的第一线时，自己却不准备付出鲜血和生命。不仅如此，他连对自己行为后果的责任都不愿承担。在那些把严家其视为“精英”而信任他、追随他的人为他“火中取栗”而付出惨重代价的时候，他却溜之大吉了。

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颠覆不了的

严家其逃到海外后，气急败坏，仇恨满腔。所以，他疯狂地咒骂中国共产党“专制独裁”，咒骂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帝国”、“专制王朝”，咒骂社会主义是“超法西斯主义”，咒骂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是“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歇斯底里地发泄对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不共戴天的刻骨仇恨。

他大造谣言，把手持石块、钢钎、火枪或燃烧瓶打杀烧军人和警察，用水泥墩和燃烧的车辆阻止戒严部队前进的暴徒说成是“手无寸铁，和平请愿”，“赤手空拳和平阻止军队入城”的人民，把戒严部队在开进中采取的有限强制措施说成是“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无与伦比的血案”、“血洗天安

门广场”，煞有介事地说要“一如既往地坚持‘理性、和平、非暴力’”。与此同时，他绝口不提动乱分子如何违反中国法律，不提暴徒们如何打砸抢烧杀。严家其以为，只要他们喋喋不休地歪曲事实，颠倒黑白，世界人民就会支持他们反中国共产党、反中国政府、反中国人民的行径。殊不知，依靠谣言换取的同情是终究不能持久的。

严家其到处鼓吹中国政府“在国内外都已丧失了任何合法性基础”。他及其同伙乞求各国政府对中国进行谴责和经济制裁，甚至乞求各国停止同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往来。这种行径彻底剥下了自己的“爱国”面具，赤裸裸地暴露了卖国贼的真面目。严家其以为只要有了外国压力，我们就敢把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斗争进行到底，这不过是一种奢望而已。

严家其念念不忘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目标。他说，要掀起“席卷中国的、威力无比的飓风”，来“彻底摧毁”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在他衣锦还乡的那一天，要“公审”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广场“重树民主之神像”。过去，他一受到批评就急忙辩解，说人家歪曲了他的意思，过高估计了他的作用和能量。现在，他得意地说，通过《美国之音》等宣传渠道，国内的人能够听到“我们的声音。我们即使是在毫无组织的情况下，也能在国内引起严重问题。”他还以狂妄的口气宣布，在他的反动事业成功之前，“中国没有国庆节，只有国殇。”

为了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严家其出逃不久，就筹建反动的“民主中国阵线”。他们设想“以后回到国内，一定要是个政党，要能够和共产党抗衡。”这个组织把台湾作为争取资产阶级民主的整个力量的主要组成部分，其筹备组秘书长万

滨南表示，“建设中国民主政治的基地只能在台湾”。与此相应，严家其把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颠覆说成是“自辛亥革命以来第二次埋葬王朝”，暗示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都不是王朝政府，否定自己关于“蒋介石建立的是带有殖民地色彩的、新的专制王朝”的说法，向台湾当局送去秋波。严家其的计划是：第一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存政权；第二步，争取“民阵”等各种反动组织的合法地位和资产阶级新闻自由；第三步，修改或重新制定宪法；第四步，以联邦制来统一中国。

严家其为提高海外反共反华的同党们对反动事业的信心，还对中国形势进行了所谓预测。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困难是无法克服的”，很快（万滨南说是今年年底）就会崩溃；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仇恨“已经超过了战时对日本的仇恨”，因此李鹏总理很快就会下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厦将顷刻瓦解”。这些所谓预测，不过是痴人说梦而已。

严家其在海外，自恃有国外反动势力撑腰，把在国内想说而又没敢说的话说了出来，这样很好。它使我们看清，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发展下去，一旦得到适当的条件，将会干出些什么事来。它提醒我们，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的政治斗争，不但存在，而且是严酷的，有时甚至是你死我活的。严家其现在所从事的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事业，不过是国际帝国主义和海外反动势力进行了40年的老事业。40年来，他们的这一事业没有成功，可以断定，严家其也不可能成功。

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颠覆不了的。

（原载1989年9月21日《人民日报》）

方励之，男，1936年生，195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6年参加工作。他在“文革”后曾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1987年1月12日，因煽动、支持学潮被撤销科大副校长职务，调任中国科学院任研究员。1989年6月初，北京反革命暴乱被平息以后，他偕其妻李淑娴逃进美国驻华大使馆寻求“保护”，成为叛国分子。

方励之的反共卖国行径

中国科技大学 甄 海

北京平息反革命暴乱后，方励之同李淑娴很快躲进了美国驻华大使馆，要求“保护”。这种卖国行径，完全撕下了方励之“民主斗士”的画皮。

过去，不少人感到困惑：方励之是搞自然科学的，为什么不专心于科学研究，却如此起劲地“关心”政治？这也许是因为他爱国的缘故吧。

事实果真是这样吗？否。

其实，方励之根本否认爱国主义的口号，哪里还谈得上有爱国之心。他说：“如果要我彻底说，我不赞成爱国主义的口号”。他还借用爱因斯坦的话说：“你不必太注意你是哪

一国”。方励之所关心的并不是振兴中华，使我们的民族强盛，而是要使中国解体。他认为，现在的情况，“中国不是要解放，而是要解散，要解体”。中国解体了，方励之要向何处去呢？他大言不惭地说：“要到美国去，做世界公民，当中国的爱因斯坦”。瞧，方励之摆出了一副“国际主义”的面孔，呼出了“科学家无国界”的口号；其实，这并不是什么国际主义，而是为垄断资本服务的世界主义。

二十世纪初，国际上曾出现过一种反动的理论，叫做世界主义。这种理论认为，民族文化传统、国家主权等概念，都已成为“过时的概念”，世界是“每一个人的祖国”。持这种理论的人，主张“消除民族界限”，“消除国家界限”，组织所谓“世界政府”。在仍然存在着根本对立的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存在着帝国主义对外扩张侵略的世界上，世界主义这种理论，显然只能是帝国主义争夺世界霸权的反动思想工具，它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根本对立的。因此，一些反动的阶级利用世界主义，投降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反对爱国主义和民族解放的斗争；民族虚无主义者则利用世界主义，否认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贩卖帝国主义文化。爱因斯坦也曾从和平主义的立场出发，反对侵略和战争，赞同“世界政府”的主张。当然，爱因斯坦的政治态度和立场，同上述那些人的立场是根本不同的。但是，他的主张，同样是错误的。当时，苏联的著名学者瓦维洛夫、弗鲁姆金、约飞、谢苗诺夫等人，曾对爱因斯坦的主张提出了善意的批评，认为“爱因斯坦博士已走上一条错误和危险的道路：他在一个存在着不同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的世界里追逐‘世界政府’的幻景。”今天，方励之重弹世界主义的老调，反对爱国主

义，说中国“是微不足道的”，他否认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叫嚷“中国可能有很多文化都要淘汰掉，彻底淹没”，他鼓吹“做世界公民”，主张消除国界，解散中华人民共和国。方励之躲进美国驻华大使馆寻求保护的行径，充分暴露了他所标榜的所谓“做世界公民”，原来是反共卖国的代名词。他的一言一行都在证明，在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根本对立的制度的地球上，根本不存在什么“世界公民”。

方励之为什么否认和反对爱国主义，宣扬世界主义呢？其目的就在于掩盖他反共卖国、推行“全盘西化”的真面目。因为，我们的祖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爱祖国和爱社会主义是一致的。方励之不仅反对爱国主义，同时也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有中国特色。他说：“什么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也只有名词。”“没有必要说一定要保存中国特色或中国传统。”因此，他在北京大学的“民主沙龙”上宣称：“不同意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提法”。他为什么反对这个提法呢？其根据就是“现代化不分国界”。这样，世界主义不仅被用来反对爱国主义，同时也被用来反对社会主义了。既然现代化是不分国界的，那么，也就没有必要去注意“东方”和“西方”的区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所以，方励之既不赞成“中国特色”，也不赞成社会主义。他所赞成的，只能是“全盘西化”。

方励之也深知，在中国实行“全盘西化”，的确是一件难事，他认为主要的障碍是“中国的体制和传统造成的观念，使得上面的作用显得非常大”。因此，方励之极力想利用国外敌对势力来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方向，他提出，同引进西方的技术比较起来，“中国更需要引进一位总理”，以改变“上面的

作用”。方励之的这种主张，从反面告诉了我们一条真理：现在的世界上，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立和斗争，现代化是在一定社会制度下的现代化，不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就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现代化，只能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坚持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保证。方励之也深深地了解这一点，要改变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方向，首先要反对共产党的领导，改变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正是出于这个目的，他大声疾呼：“中国更需要引进一位总理”。

显然，依靠引进西方的总理，是不能如愿以偿的。比较现实的作法，是让西方更多地“关注”中国的问题，造成“以洋人压政府”的局面，促进“全盘西化”的实现。这就说明，反共必然投洋，而投洋必须反共。方励之深深地领悟到，要引起洋人的“关注”，首先要讨得洋人的欢心。怎样才能讨得洋人的欢心呢？办法有二：一是吹捧西方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鼓吹“全盘西化”；二是骂共产党，骂人民政府。方励之的得意弟子王丹为他道破这种反共投洋的天机：你从事骂共产党、骂政府的活动越出名，便越能得到西方某些人的喝彩，你的知名度便越高，你便能获得更多的自由。在这几年中，方励之所以能够成为西方洋人眼中的“世界名人”，也正是得益于这种“捧”和“骂”的伎俩。

为了迫使中国共产党接受他的“全盘西化”的纲领，方励之不仅四处活动，组织国内的“压力集团”，而且还要造成西方对我国政府的压力。二月十七日，方励之在家中举行记者招待会，抱怨美国在人权问题上只公开批评苏联，没有公开批评中国。因此，他“希望美国在人权问题上采取单一标准，

不要采取双重标准”，不仅公开批评苏联，同时也应该批评中国。在美国总统布什访华时，他企图同布什接触，“希望美国对我们表现出更多的同情”。他还说：“如果我有机会同布什交谈，我将提出人权问题，包括中国关押政治犯问题。”在这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他伙同一些人发起了“征集签名”运动，得到了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支持。动乱和反革命暴乱期间，他还要求外国公司抽走在中国的投资，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他叫嚷：如果中国在人权方面没有取得进展，外国公司应当抽走他们的资金，“至少把人权作为投资的条件。”但是，方励之反共卖国的如意算盘打错了。中国人民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我们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上，同一切国家和民族发展友好关系，但决不屈服于任何外来的压力。事实已经证明，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和民族是要同中国人民长期友好下去的。方励之企图把我国变为帝国主义附庸的阴谋，彻底破产了。他的反共卖国的行径，将永远被中国人民所唾弃。

（原载1989年9月9日《光明日报》）

方励之张显扬之流 早就提出要搞“动乱”

赵 前

《人民日报》4月26日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发表以后，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热烈赞同和拥护。然而，动乱

的策划者们却气急败坏，大肆鼓噪，反对这篇社论，尤其拚命反对“动乱”这两个字。策划和制造动乱的人，为什么那样讳言“动乱”，怕说“动乱”，而又采用种种使动乱升级的手段，来反对“动乱”这两个字？

难道社论对于动乱的定性“委屈”了他们吗？那就让我们来看看社论的论据是不是事实。

“极少数人借机制造谣言，指名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蛊惑群众冲击党中央、国务院所在地中南海新华门；甚至还有人喊出了打倒共产党等反动口号”。这些难道不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吗？

“在西安、长沙发生了一些不法分子打、砸、抢、烧的严重事件”。这些事实是能够随意否定的？

“制造种种谣言，蛊惑人心，利用大小字报污蔑、谩骂、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公然违反宪法，鼓动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这一切，言犹在耳，白纸黑字，谁又能说它们不是事实？

至于说到“在一部分高等学校中成立非法组织，向学生会‘夺权’，有的甚至抢占学校广播室；在有的高等学校中鼓动学生罢课、教师罢教，甚至强行阻止同学上课；盗用工人组织的名义，散发反动传单，并且四处串联，企图制造更大的事端”，就更是几乎尽人皆知的事实了。而且应该说，当时的实际情况比这里所列举的，是大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既然这一切都是确凿无疑的事实，那么，有什么理由不许《人民日报》社论依据这些事实，对动乱作出恰如其分的定性呢？

其实，首先提出“动乱”的并非《人民日报》社论。早在

社论依据当时的事态指明问题的性质之前好久，就已经有人在酝酿动乱、并对“动乱”二字直言不讳了。

让我们回顾一下，略举一些事实。

且不说那位大名鼎鼎的方励之，早在1986年就大声疾呼要人们对党和政府“捅一捅”，“动作动作”，在1987、1988连续两年屡屡鼓动要“用一些激烈的方式”“夺取”民主，今年1月份又扬言“必须行动”，让我们听听一位名叫张显扬的“精英”人物，在今年2月15日对后来成为“高自联”头头王丹讲的一番话吧。他说：“马克思主义根本不符合中国国情，现行的政治体制必须废除，中国人还要经历几次教训，诸如社会动乱等。”

很显然，张显扬为了否定马克思主义，“废除”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明白无误地提出是需要“动乱”的了。顺便说说，张显扬其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的研究员。此人在1987年被查明在“文革”十年动乱中犯有“三种人”错误。被定为“三种人”而清除出党，是个搞动乱的老手了。他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在当时就很成系统。而今，他在中国搞动乱之心仍不死，在这次动乱发生之前两个月，他就同北大学生王丹毫不含糊地提出“动乱”来了。

今年2月28日，另一位“精英”人物还同王丹有过一番交谈。交谈中，他们“一致认为，今年恐怕过不去，一定会乱”。乱者，动乱也。为了搞动乱，此人还对王丹说，他“认为现在应该出一些地下小报，宣传反对派思想，并强调应首先以人权为重。”在这里，连搞动乱的具体手段都已筹划出来。

到了今年4月20日前后，也就是这次学潮刚开始不久，

方励之在接受香港某新闻单位记者的电话采访时，就讲得更加直露而肯定了。方励之得意地说：“中共若不与学生坦诚对话，那么形势就不容乐观，甚至会演变成为动乱。”4月21日，北京农业大学贴出一张小字报，文中引用了另一位著名“精英”金观涛的一个“论断”——“任何一个组织都要产生无组织力量，其使命是动荡和摧毁该组织的存在”，声称“中共今日正是一个即将溃灭之组织”，并且呼喊：“中国大乱之至。中共危亡在日。诸位拭目以待之。”4月23日，在北京大学“三角地”出现了另一张小字报，标题本身就是《运动了!!!》，这不就是直接引用电影《芙蓉镇》结束时那位疯人在十年动乱之后呼唤“文革”的语言吗？所有这些煽动动乱的言词，都比《人民日报》“4·26”社论要早好些天。

事实就是这样。策划动乱的人早就提出“动乱”。但是，当《人民日报》社论实事求是地指出当时问题的性质是动乱的时候，揭了他们的底，他们就不答应了，就要鸣鼓而攻之了，就要借题发挥，给他们搞起的动乱火上浇油，使动乱更加升级了。

总之，这场由学潮演化而成的动乱乃至反革命暴乱，正是在这伙策动者组织者的煽动、鼓噪下，一步步愈演愈烈的。比如，学潮开始时，方励之先生的妻子李淑娴就曾给“高自联”头头出主意说：“要到新华门静坐，必要时往里挤，只要警察敢管，就是打人，这样才能唤起同学的同情心，特别是女同学。”于是，果然发生了两次冲击和多日围困党中央和国务院所在地新华门的严重事件。到这场动乱被平息的前夕，被外电捧为“学运领袖”的“高自联”头头柴玲，在天安门广场学生静坐现场还对美国广播公司记者说过这样一番话：

“同学们不断问我，我们下一步是什么。”“我不能告诉他们：下一步是流血。唯有血洗天安门，整个中国人民才能被唤醒。”听了柴玲的这一番话，就不难明白，为什么明明后来没有发生“血洗天安门”的事件，却中外呼应，一起造出了“血洗天安门”的弥天大谎来。原来，这是动乱和暴乱的策划者的需要。他们需要这样的东西，想努力造成这样的事实；造不成也不罢休，还要——也只能乞灵于谣言，而且是互相配合好了来造的大谣言。这就无怪乎柴玲这样的想法“不能告诉”广场上那些准备当牺牲品的同学，而只能事先透露给外国记者。

阴谋见不得阳光。制造动乱者怕人说他们搞动乱，怕的就是暴露了阴谋骗不了群众，搞不成更大的动乱。但是，他们的反革命目的决定了他们必是要采取种种手段，促使动乱不断升级，直至发动反革命暴乱。图穷匕首见。当人们终于看清事情的真相时，这一伙阴谋家就再也没有什么号召力了。代价当然是沉痛的，但是给予人们的教训也是深刻的。

（原载1989年7月17日《人民日报》）

方励之们打算怎样 “解散中国”？

凌 阵

一向以当代中国社会“精英”自诩的方励之先生，1988年9月8日上午在接受香港《九十年代》记者采访时，说过这

样一句话：“中国不是要解放，而是要解散、要解体……”

有些心地善良的同志读了方先生这句话，在惊愕、愤慨之余，总不免认为，那不过是方氏一时口出狂言而已，一个国家哪里就能解散得了？

其实，说它是“狂言”，固然不错，但却并非由于一时冲动的信口胡说，方励之这一伙子“精英”们在这个问题上，不但有成体系的反动思想，而且已经付诸行动了。

众所周知，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构成国家的要素不外是：第一国土，第二人民，第三政府，第四民族意识，等等。方励之等人正是在这些要素上打主意来实现中国的“解散”或者“解体”的。

先说国土。“解散”之法无非是两个：一是分裂，地方割据；一是外国列强瓜分，实行殖民地化。关于第一种“解散法”，刘宾雁于6月间就在香港连续发表谈话，主张“大陆上分权自立”、“地方分权而治”。他说：“假如有三个省能较强硬地面对中央政权，中国的民主斗士就有栖身之地，就有地方避难。”听，他把话说得何等坦率明白！关于第二种“解散法”，即走殖民地化、甘当西方附庸国的卖国之路。君不闻刘晓波早就在为殖民主义大唱赞歌了吗？1988年11月，他在香港时，有记者问他：在什么条件下中国才有可能实现一个真正的历史变革？他毫不含糊地答道：“三百年殖民地。”今年6月4日凌晨，有人在撤离天安门广场前曾经叫嚷道：“让美国、苏联帮助……让他们来出兵，把×××抓起来。美国最够朋友，让他们断绝关系，还有联合国部队赶快打吧。”好家伙，这岂不就是要呼唤“八国联军”进北京吗？

次说人民，方励之早就扬言要当“世界公民”并以爱因

斯坦相标榜。殊不知爱因斯坦的要当“世界公民”，是由于那时犹太人没有自己的国家，必须寄人篱下。他为了让自己的同胞能在各自的“主人国”里日子过得好一些，才说那番话的。如今，方励之要“解散”中国，让中国人民去当“世界公民”，倘若可能，也只能到“主人国”那里去充当处境凄惨的“二等公民”，这与亡国奴何异？

再说政府。在这次动乱、反革命暴乱之前之中，方励之们是始终把矛头指向依法产生出来的代表中国人民利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他们不但在标语、口号里写着喊着“打倒政府”“撤换政府”。而且企图借混乱之机，乱中夺权，攻击国务院是“伪政府”，扬言三天之内要建立“新政府”，同时造谣说已有外交部等十几个部“宣布独立”，“脱离国务院”。如此云云，虽然是造的谣言，却也反映了这伙反革命分子心底里的愿望。

最后说民族意识。方先生在接受香港《九十年代》记者采访时，直言不讳地把民族意识叫做“包袱”，宣称倘若没有这个“包袱”，他“心里认为是好的”。刘晓波则紧随其后，打出所谓“世界化”、“国际化”，即“西化”的旗号，叫嚷道：“我很讨厌‘民族性’这个词”。他们深知，当人们连民族意识都否定了之时，当然也就谈不到什么爱国主义了。“解散”中国，对于这伙卖国贼来说，也就自然是顺理成章之举。

方励之还曾恶狠狠地说过：“恨不得踢中国两脚！”然而，他们太低估了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凝聚力。1840年以来，无数仁人志士一次又一次的抗争，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灭亡中国的罪恶企图，终于建立起今日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的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任凭方先生们“踢两脚”也罢，想

要“解散”也罢，他们的这路卖国货色，在这块土地上并不是那么好推销的。他们的丑恶表演，只能提高我们的警惕，激发我们更加振奋起爱国主义的精神，团结奋斗，把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更加坚强。

（原载1989年7月14日《北京日报》）

方先生不再“独立”

李京

方励之先生素来鼓吹知识分子要“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要有“独立的态度”。他为自己设计的也就是这样一种“独立人士”的形象。

如今，他终于放弃了他的所谓“独立”形象，带着老婆，跑到美国大使馆去求人“保护”了。

我们不知道，美国的新闻机构也没有报道，方先生是怎样进入美国大使馆的。或者是当时中国政府并没有打算逮捕方励之，因而他正常地进入了大使馆。如果是这样，“保护”云云就失去了根据。或者是方先生相当有一点特殊的本领。想当年，孟赏君过关，靠的是鸡鸣狗盗之徒。方先生靠的是什么，未见报道，我们也不好妄加评论。

不过谈到方先生的所谓“独立”，那倒真是“如真包换”的假货。这位先生的倾向从来鲜明得很：凡是中国的一切，

都不好，都谴责；凡是美国的一切，都极好，都赞扬。中国的政府，在他看来，40年没有做过一件好事，当然是精透了。出路呢？只有从外国“引进一个总理”来。中国的文化，让它“彻底湮没”，也“不需要太介意”，反正可以“全盘西化”。他甚至发出过“中国要解散”的狂言。至于美国呢？无论它在国外怎样用杀人的手段侵犯别国的人权，无论它在国内怎样用武力和监禁镇压人民，都一概是好极了，是民主的花花世界。这就是方先生的“独立”性。

如果说方先生没有在中国发现一点儿好的东西，那也有点冤枉他。今年年初，他就发现了中国的一个大大的好人。此人名叫魏京生，因为向外国人提供军事情报被判了刑。方先生为了鼓吹对这个宝贝进行“大赦”，他着实花了相当的力气。同时，他也批评过一次美国。那是在今年的2月26日。这一天，他本来是打算去赴美国总统宴会的，颇为洋洋得意。在当天的《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了他从北京发出的一篇文章，埋怨美国的政治活动家对苏联东欧国家的人权问题公开表示关注，“甚至使这个问题成为对外政策问题中的一个首要条件”，但是对中国，“只是嘴上说几句，几乎没有采取什么行动”。一句话，就是埋怨他的主子对中国的内政干涉得还不够。

方先生的这些表演，早就引起了许多正直的中国人的忧虑。今年2月28日新加坡《联合早报》的一篇文章就说，“挟外人以自重的行动会带来很多后遗症”。“从一个中国人的角度来看，如果美国干预中国（包括海峡两岸）人权沿袭成风，如果海峡两岸的中国政治反对派人士习惯于投靠美国，邀请美国在他们争取政治权力的过程中出拳撑腰，则美国的人权干预不但涉及国家主权的遭遇腐蚀，也蕴含了反对派人士受

到美国或其它国家的外力控制的危险。”

事实不幸为《联合早报》的文章所言中，方先生已经公开走到外力控制之下去了。他还将怎样走呢？

（原载1989年6月12日《北京日报》）

躲在“洋”伞下的方鼓手

陆诗宜

“东风吹！战鼓擂，现在谁也不怕谁。”

这是方励之先生在两年多前那一次学潮开始时用来鼓动学生上街的名言。

对方先生的名言，当时就有些有社会经验的年长学者质疑说：谁也不怕谁，小偷不怕警察，那成什么社会？但是当时方先生还有共产党员的身份，又是一所著名学校的副校长。一些学生在这样的师长教诲下，果然什么也“不怕”了。什么法制，什么纪律，什么民主程序，都不在话下。结果造成的当然只能是无政府的混乱状态。

在今年4月，学潮刚开始时，也有些学校中有人引用方先生的这句名言，以“鼓舞士气”。

方先生自然并没有忘记亲自出马擂战鼓。早在今年2月间，方先生就在一系列集会上不断发表演说，声称这样的会再开三次就可以上街了。4月开始的学生上街行动，对于方

先生可以说真是如愿以偿。还在4月22日以前(更在4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以前)，他就对海外记者高兴地声称，再发展下去，就是动乱了。

事实发展到这一步，虽然如丁方励之先生的愿，但是对于方先生的“擂战鼓”论却提出了一个尖锐的矛盾：既然“谁也不怕谁”，又为什么要“擂战鼓”？向谁“战”？又希望得到什么样的“战”果？为了得到这样的“战”果，需要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党、政府、人民、军队对于方先生所“鼓”起来的力量表示害怕，不得不屈服，俯首投降。可是这样一来，“谁也不怕谁”就不存在了。

这一点，方先生心里是很清楚的。他不是一再鼓吹要成立“压力集团”吗？压谁？当然是压党、压政府、压人民，也就是说，要党、政府、人民怕他们，在他们的压力下屈服。他还担心他们的压力不够大，不断地请求洋人，特别是美国人撑腰打气，帮助他们增加压力。

对于方先生说来，可惜的是他错估了自己的对手。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中国人民并不像他所想象的那样胆小，方先生的鼓声似乎也不那么充分有劲。动乱发展为反革命暴乱，迅速地被粉碎了。“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方鼓手急忙脚底擦油，溜到大“洋”伞底下寻求保护去了。原来他的所谓“不怕”，根据就在有这么一个靠山，所以他才能那么放胆地煽动青年学生去为他做牺牲品。

(原载1989年6月13日《北京日报》)

方先生为美国献的什么计

凌 阵

方励之先生终于跑了，跑到美国驻华使馆“避难”，要求保护他的“安全”去了。

人们不禁纳闷，方先生不是一再标榜他“爱国”，是中国的“主导力量”吗？为什么早不跑晚不跑，偏偏在首都刚刚粉碎一起反革命暴乱、国人称快之际，感到自己的安全没有保障了昵？他的行为告诉了人们一些什么呢？

还是一位中国作家一语破的：他根本不是什么爱国，而是十足的卖国。

这样说是否冤枉了我们这位可爱的学者先生了呢？那就让我们看看他近来的一些言行吧。

还是在一个多月前的四月下旬，在一些别有用心分子鼓吹煽动动乱的时候，这位方先生就跑出来通过《亚洲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向他所向往之的某国总统暗送秋波、出谋划策。他献计要外国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抽出在中国的投资。为了取得最佳效果：既给予刺激又不致激化到使中国干脆实行完全的自力更生，他又主张这个原则应该“逐步”加以采用。而作为实施的前提，在短期内则要鼓励外国投资，如此等等。

这增加投资之举，目的又何在呢？那位记者先生是这样记录的：“的确，在短期内鼓励外国投资，以便使中国对外国投资有更大的依赖性。他说：‘在国际社会和中国的关系上经济因素越来越重要的时候，那就很容易……’他的这句话没说完。”

请注意：方先生这段话分作两截。前半的要旨在“使中国对外国投资有更大的依赖性”上，后半是说产生了这种依赖性之后，就可以这样那样了。这是方先生故弄玄虚，只说了半句话。

人们不禁纳闷，一向讲话爽爽利利的方先生，为什么此刻竟然如此犯踌躇呢？这不打紧。读者也许还记得两年多以前，他在某学院一次座谈会上，扬言要借开放之机，搞个“全盘西化”，“包括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文化、政治、意识形态、道德所有全部的东西”，“包括我们的政治体制、所有制”。也就是说，要从外国引进“足够的力量造成一种不可逆转的局势”。而这种局势，方先生在答学生问时说，就是要“改变党的颜色”，“应当变颜色，就应当，因为党现在是黑的”。

原来如此！方先生没有说完的后半句话，不过是说，要使中国在经济上完全依赖外国之后，在政治上也全面受控于外国，以便方先生随意在党内作怪，“改变党”。

方先生的算盘的确打得够如意的了：一方面要外国向中国投资，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另一方面，倘若你不甘心被人扯了鼻子走，那就要当心人家抽走投资，卡你脖子，让你活不下去。如此这般，不愁你不俯首听命，就范于人：因为局势已经“不可逆转”了。

至此，方先生的用心，可以说是已经明明白白了！

整整四十年前，毛泽东同志在评论美国国务院的白皮书和艾奇逊的信件时曾指出，当时的美国政府是把希望寄托在中国少数“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身上的，因为这些人是在中国的一层薄薄的基础。岂料四十年后，这层基础又沉渣泛起，跑出来向外国献计献策了——献改变共产党使其变色之计，献颠覆人民共和国使其重新沦为殖民地之策。这些人自以为足智多谋，足可稳操胜券，然而眼下暴乱被粉碎，如意算盘落空，便又不得不露出一副十足的奴才相，可怜巴巴地投入洋大人的怀抱。这极富讽刺意味的闹剧，也许是方励之先生所始料未及的吧。

诚然，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决不会由于几个暴乱分子的一通鼓噪，而有所改变；同时，中国人民也决不会被个别缺乏远见不以合作大局为重的抽资行动而吓倒。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聪明反被聪明误”。方励之先生的言行，丝毫无损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实现四化的大业，但却无可掩饰地暴露了方先生自己的卖国行径，这才是真真可悲的哩。

（原载1989年6月15日《北京日报》）

李淑娴，女，1935年4月生，1952年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1954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6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57年她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1978年12月予以改正并恢复党籍，后担任北京大学物理系副教授。1989年6月5日，她与方励之逃进美国驻华大使馆，寻求“保护”，公开叛国。6月10日，经海淀区人大常委许可（李系该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批准，对李淑娴发出逮捕令。6月11日，北京大学党委决定开除其党籍。随后，海淀区人大常委会取消其区人大代表资格。

李淑娴有一颗什么样的“中国心”

周彤文

今年6月5日，李淑娴和她的丈夫方励之畏罪潜逃到美国驻华大使馆，寻求“保护”。这一公开叛国的无耻行径，不啻是为她近年来的丑恶表演添上了画龙点睛的一笔。这一笔把她用来骗人的一件件外衣统统剥得净光，使人们终于看清了她的庐山真面目。

李淑娴曾经不止一次地对人们进行这样的自我表白：“我这颗心是一颗道道地地的中国心。”“真正的、诚实的中国

心。”上述事实已经完全戳穿了她为自己编织的美丽光环，在此之前，她反党反社会主义、煽动学潮、制造动乱的大量言行也同样证明了她说的全是谎言。

自1986年以来，声称要“解散中国”的方励之在国内各种场合狂热地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李淑娴则公开申明她和方励之是“志同道合”的，她完全支持丈夫的事业。不仅如此，她还和方励之一唱一和，进行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蛊惑宣传，甚至不惜把污蔑党和政府的谣言造到远在国外的留学生和访问学者中间。特别是方励之被开除党籍、行动一度受挫之后，李淑娴更加活跃、更加露骨地四处活动，她或在西方记者面前抨击党组织的决定是“错误的”，“不公正的”，声明方励之没有错；或在学生之中传播方励之拒不认错、身体健康、坚持斗争的消息。她还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千方百计地为方励之扩大影响。她不但怂恿学生请方励之到北大讲课，发表演说，举办“民主沙龙”，还“大胆地避开机场当局”，安排西方记者和方励之的会见，以便把舆论造到国外去。

李淑娴和方励之如此沆瀣一气，根本原因在于她和方励之的反动政治立场是完全一致的。1988年9月，香港反动刊物《九十年代》总编辑李怡访问方励之时曾经问：“李淑娴还在党内，而你已肯定不会再加入了。你们夫妇之间有什么不同看法吗？”方励之说：“这倒不会，实际上她比我讲得还利（厉）害，了解我们的人都知道。”1989年1月22日的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了李淑娴的一篇署名文章，道出了她的心声。她在文章中咒骂社会主义制度“压抑个性”，“假共产主义之名，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还说：“假共产党之名可以杀任何人，

作出这种决定的只是一些领导人。”从中不难看出，针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完全采取了敌视和彻底否定的态度。这就是她和方励之一致的政治立场。

二

1987年春夏以后，李淑娟则俨然以“青年导师”、“学生代表”的面目，频繁地出没于北京大学生之中，在骗取学生信任的同时，寻找机会，煽风点火，蓄意把一些富于热情而缺乏理智和政治经验的学生引向同党和政府对立的危险境地，以便火中取栗。后来，她发现了不思努力学习却总想在政治上出人头地而又颇有活动能量的王丹，便和他勾结起来，演出了一出出煽动学潮、制造动乱的双簧戏。

1988年5月4日，正值北大庆祝五四运动69周年和建校90周年之际，李淑娟突然携方励之的粉墨登场，来到北大校园内的塞万提斯像前，“与北大青年会见”。方励之拿着手提式话筒神气活现地大讲“我现在活得很自在，到处受到欢迎。”并大肆攻击“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李淑娟则攻击中国不民主不自由，声言“愿做一粒沙子，为后人铺就一条自由之路。”从此以后，以王丹等人为骨干，以在北大学生中传播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聚集所谓“民主力量”为目的的“民主沙龙”就开场了。

1989年适逢五四运动七十周年。海内外反动势力纷纷登场，互相勾结，积极活动，蓄意要利用这个时机在中国制造大规模的动乱，以实现他们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完全西方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罪恶目的。李淑娟充当了这股反动势力中一个急不可耐而又十分卖力的重要角色。从1989年1月开始，她就又是在西方报刊上发表反

动文章，又是在北大三角地等处张贴鼓动学生闹事的大小字报。

4月5日，她和王丹又一次一唱一和地主持了“民主沙龙”。王丹按捺不生乱动到来之前的喜悦，神情诡秘地说：“今年是一个好时机呀，‘五四’、‘四五’、法国大革命，按理说大批记者涌到大陆来，都希望中国民主化在今年有个开端。现在我希望目前这个时机大家都团结起来”，“我想大家都闹腾得比较欢的话，这个过程就推进了。”老谋深算的李淑娴则从古到今地大谈“民主”、“科学”、“言论自由”、“兼容并包”、“中国的布鲁诺”，并现身说法鼓动学生进行“合法斗争”，还对敢于闹事的学生表示“尊敬”。

三

1989年4月15日以后，海内外蓄意要制造动乱的敌对分子终于利用胡耀邦同志逝世的机会煽起了旨在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学潮。4月17日夜，王丹等人鼓动一些学生到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前，声言要向人大常委会递交一封“请愿书”，信中提出了事先精心策划好了的“彻底否定反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等七条要求。到18日清晨，王丹看学生愈来愈少，就急忙给李淑娴打电话求救。他回来后立刻传达了李淑娴一要坚持，二要递交人大常委的“两点指示”。李淑娴则马上写了题为“天安门前传来的电话”的大字报一式两份，贴在了北大三角地，呼吁“广大同学密切关注”，“希望广大同学声援”。由于作贼心虚，李淑娴没敢署名。

然而，不管李淑娴如何遮掩，阴谋诡计总是要大白于天下的。4月21日，一位经过痛苦的思考，深感自己和同学们上当受骗了的同学揭露了李淑娴等人对“运动早有安排的”真

相。据这位同学揭露，李淑娴等人为运动安排了四步：“第一步，悼念胡耀邦，顺便提出我们的政治要求。李淑娴老师说，要把为胡平反放在第一条，这样他们就不好说什么了。第二条也别提为在反自由化运动中受挫、受批判的知识分子平反，那样太脱离群众，也易引起误会，好像方励之老师参与了，尽量避免给当局以口实。再有，群众最恨腐败，别直接提反四条（四项基本原则），就用这一点攻他们。第二步则到新华门静坐，必要时往里挤，只要警察敢管，就是打人，这样才能唤起同情心，特别是女生，心软，就说警察专打女生，也能引起男生的‘汉子感’。第三步，要求参加追悼会，很多人有这个心理，这样事情就更大，还能推向全国。第四步，五四达到最高潮。李老师还说，要搞臭团委、学生会，这样他们就没帮手了。”

这一学生戳到了李淑娴的痛处，她气急败坏，暴跳如雷，竟当着来访同学的面破口大骂：“他妈的！”

直到北京部分地区宣布戒严以后，5月下旬，李淑娴还对别人说：“天安门绝对不能撤”，“卫星在看，全世界在看。”“北京也可能是个局部，而全国需要一个更尖锐的斗争”。这时候的李淑娴，她的心，就挂在卫星上，挂在她的外国主子的眼色上，哪里还是什么“道道地地的中国心”？她需要的，是在中国发生比当时已经发生的动乱“更尖锐的斗争”。这实在是一颗道道地地的祸国之心，卖国之心。

（原载1989年7月15日《人民日报》）

戴晴，女，1941年8月生，江西人，1966年3月，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曾任原七机部（现航天部）一院十三所技术员、中国作家协会外联部翻译等职，1982年7月，调《光明日报》任记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65年11月，她加入中国共产党；1989年6月，申请退党；同年9月，被开除党籍。

动乱“记者”戴晴

卞 岩

今年春夏之交，发生在首都的由学潮到动乱到反革命暴乱中，有一员活跃于新闻界、知识界和高校学生之中的“能干的女将”。她上窜下跳，牵线搭桥，呐喊助威，煽风加油，扮演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作了充分的表演。她就是光明日报记者戴晴。

（一）

看过电视片《血与火的考验》的人，大约还记得其中这样的镜头吧：5月14日晚，当北京高校的一些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的绝食进入第二天的时候，严家其、包遵信、李洪林、于浩成、苏晓康等一伙知识界“精英”来到学生中间，为

绝食学生助威打气。出面把这些人纠集到一起的就是戴晴。你瞧，她手持电喇叭，绘声绘色地极力鼓噪，说什么“自4月15日到今天，同学们冒着生命危险所取得的成果非常大，我觉得非常大，如果没有你们（从4月）15号到今天的活动，我们决不会有今天的这种局面。”什么局面，当然是动乱的局面。对这种局面，戴晴显然是极力赞赏的。她还说：“一定要让（政府）向同学们让一步！”怎么让步，就是严家其等12人在这天下午炮制的《我们对今天局势的紧急呼吁》中所提出的要承认这次动乱是爱国民主运动，要承认“高自联”等非法的学生组织是合法的。他们提出，如果政府不承认这两条，他们将同绝食学生一起“坚定不移地奋斗下去”。尽管戴晴在此也说了一些希望学生撤离天安门广场之类的话，但有了上面这两条作为前提条件，他们的真正用心不就昭然若揭了么？邓小平同志早在1987年3月3日就明确指出：“少数知识分子煽动学生闹事，他们的主张实际上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中国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戴晴等人煽动动乱，其意亦在此。后来的事实也恰恰证明了他们的《紧急呼吁》确实是在为动乱火上浇油。

如果5月14号戴晴在天安门广场的这番表演算作一个高潮的话，那么，她在这之前的一系列表演就已经为这次出场作好了铺垫。

（二）

早在今年2月16日，反动组织“中国民联”的成员陈军曾举行过一次外国记者招待会，广为散发方励之致邓小平的信，以及陈军等33人致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中共中央的信，要求实

行大赦，释放严重触犯刑律的魏京生等所谓的“政治犯”。2月17日，海外一些人在美国发表《敦促中国 大陆民主改革宣言》，其中包括释放“政治犯”、删除刑法中“反革命罪”的条文。对此，台湾《联合报》大肆鼓劲，该报2月23日发表文章说：“纽约发宣言，北京公开信，神州春雷动，民主浪潮涌！”紧接着，2月26日，张显扬、李洪林、包遵信、戈扬等42人又联名写信给中共中央，也要求释放所谓的“政治犯”。

在这种气候下，一向对此类事情不甘寂寞的戴晴再也按捺不住了。3月14日，她联络苏炜等三人又发起搞了个43人签名的公开信。信中说：“前不久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吁请释放魏京生等人，我们认为他们的请求是符合宪法、表达了民意的。在此，我们再次请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考虑这一要求。”请注意，戴晴搞这43人签名的公开信，恰恰是在党和政府对此事表明了严正态度、袁木同志在一次讲话中作了明确的阐述之后。对此，戴晴今年4月对香港反动杂志《九十年代》的一个人说：“我们是（3月）14日签的，袁木讲话出来的时候，要撤销签名还来得及，但我们都没撤。”从这一段自白中，人们不难看出，她这样做完全是“对着干”的。这也暴露了她平素所宣扬的“以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思想影响社会、干预政治”的根本出发点。

（三）

4月15日以后，极少数人借悼念胡耀邦同志之机，煽动学潮，蓄意掀起一场政治动乱。一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则到处串联，组织集会。此时的戴晴，也异常活跃起来。4月19日，《世界经济导报》（以下简称《导报》）和《新观察》杂志社在北京召开“座谈会”，鼓动为胡耀邦同志“平反”，

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翻案”，明确表示支持学生的游行示威。一向出入于“沙龙”、“座谈会”的戴晴，这样的“座谈会”自然少不了她。她在会上发表了一段“精彩”的演说。她历数了陈独秀、瞿秋白、王明、张闻天、邓小平、胡耀邦的经历和遭际后，说“中国共产党的这些总书记几乎所有的人都是莫名其妙地被拿掉的。”这段话既是暗示要全力“保”赵，又是严家其的“非程序的权力更迭”说的一个形象的注脚。当然，戴晴是不甘于仅仅为别人做做注脚的。她在讲了上面这番话之后，特别指出：“你这个党内民主这么残缺，是不是与生俱来的！”其意在攻击中国共产党内从来就没有民主。那么，哪里才有民主呢？在戴晴的心目中是早有认定的。1989年2月号的香港《明报》上有一篇《戴晴谈心路历程》的文章，文中介绍说：“戴晴有一个新观点，可以说颇具惊人之处。她认为，中国专制的结束和民主的初步奠定，是自林则徐、魏源开始，而至蒋经国完成。遗憾的是，不是大陆，而是台湾，先行实现了这一完成。”哦！原来民主在台湾国民党那里？！无怪乎采访她的那个人也不得不惊叹她的这个“新观点”“颇具惊人之处”了。由此也可看出戴晴的脚根究竟站在什么地方去了。

(四)

戴晴及严家其等人在这次座谈会上的发言，无疑十分符合《导报》总编辑钦本立的口味。钦本立决定在4月24日出版的第439期《导报》上全文发表这次座谈会的发言，上海市委负责同志从维护大局出发，建议《导报》将严家其、戴晴等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发言内容删去，钦本立则顽固坚持发行未经删节的这期导报。4月26日，上海市委果断作出关于钦本立停职和整顿《导报》的决定，并在下午的万人干部

六会上宣布。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导报》事件”。

在这一事件中，戴晴几次三番地登台表演，把她这个动乱记者的丑恶面孔暴露得十分充分。4月26日上午，她在上海市委作出处理《导报》的决定宣布之前，便给钦本立发了一封电报：“正义为本，民主为道，本立则道生，钦老板安康”。这是从北京发出的最早的一份给钦本立打气壮胆的电报。电报发出后，戴晴仍觉得不过瘾，又马上给《经济学周报》的总编辑陈子明和《中国青年报》的一个记者打电话，晚上又给《光明日报》的一个记者打电话，鼓动首都新闻界发电报支持钦本立。此后一封封“声援”的函电就从北京飞向上海，飞向钦本立。4月27日，严家其起草了一封给上海市委的《公开信》，并冠以耸人听闻的标题：“捍卫新闻自由”，信中污蔑上海市委做出了错误的决定。开始，在信上签名的仅严家其等两人。戴晴得悉后嫌人少，声势不够大，便和《导报》编委、北京办事处负责人张伟国一起，把苏绍智、包遵信、于浩成、张显扬等人拉上，凑了30多人的签名，发往上海，并同时在北京散发。戴晴策划和组织的这些函电和《公开信》，与赵紫阳同志对《导报》的支持态度形成上下呼应，与《导报》内部蓄意制造事端的某些人里应外合，把事态进一步扩大到了整个社会动乱中去。

(五)

戴晴在《导报》事件中如此卖力，如果认为只是因这一事件直接牵扯到她的发言，那就把她看得太“小气”了。事实上，戴晴同《导报》有着深深的渊源，同钦本立更是“心有灵犀一点通”，有着很深的默契。戴晴的一些在其他报刊发不出的文章，在《导报》可以“自由”发表。在戴晴的心目中，《导报》

是中国最具“新闻自由”的报纸了。戴晴曾经认为，中国“没有新闻”。她曾对一海外记者发牢骚，说“从82年到88年，中国发生了多少事，有多少新闻呀！但是我不能写，你也不能写，没有一个人能写”。戴晴所要求的新闻自由是什么呢？《导报》今年4月3日刊出的一篇文章为她做了注解。该文说：“西方新闻学并不强调‘积极的’、‘消极的’、‘正面的’、‘反面的’报道，而是强调‘新闻事件’，即新发生的、不寻常的事件。”正是资产阶级的新闻观把戴晴和《导报》紧紧地捆在一起了。

(六)

戴晴在《导报》事件中搅和了一番，仍觉不够劲，又翻出了新花样。4月29日，在一次会议上，当有人提出“新闻界也要和领导人对话”时，戴晴欣喜之至，她马上介绍张伟国与那个人相识。三个人便当场凑在一起“商量新闻界出场名单”。戴晴提出的原则是：报社部主任以下，具体新闻从业人员。在戴晴看来，部主任以上的干部是不能代表新闻界的。这就是新闻界一些人也要求“对话”的起源。经过一番酝酿和征集签名，5月9日新闻界部分人要求对话的公开信出笼并向全国记协送交。签名者中间自然有戴晴。这一事件与5月4日首都部分新闻工作者走上街头参加游行，被海外一些资产阶级报刊说成是中国“新闻界的抗议浪潮”。5月21日出版的香港《亚洲周刊》上登有一篇题为《新闻体制面临重大挑战》的文章。文章说：“光明日报记者戴晴对亚洲周刊说，新闻工作者的行动乃受月来的学生运动触发。……大陆记者过往对重大事件的如实报道都无法见诸报章，情绪积压已久，学运和上海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欲本立遭停职事件遂成了导火线，引发记者上街。”不难看出，戴晴在进一步鼓动记者上街了。

(七)

在动乱中上窜下跳的戴晴，在新闻界跳过一阵、煽动一番之后，又跳向知识界和学生中间。

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指明了这场动乱的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当天，戴晴就对香港《天天日报》记者发表谈话，说她对这个社论表示非常失望。该报记者这样写道：戴晴认为“尽管中共是次态度强硬，学生们还是应该坚持他们的政治理想的。”“此外，她又说，学生如果需要她的时候，她会给予援助的。”

果然，4月27日，她便到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校门口去“看”学生游行，观察动向去了。是时，她遇到美国《时代》杂志的记者，她对那位记者说：“今天政府如果对学生镇压，我就退党”。这大概就是她所说的“援助”吧！

当然，戴晴的“援助”决非只此一种。

5月3日，香港《明报》刊登“本报记者北京专电”：“以于浩成、李洪林、严家其、许良英等为首的一批著名中国知识分子，就‘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发出一联署倡议书，呼吁中共当局坚持改革，并对大陆目前的学运表示坚决支持，称此次学运是极其可贵的爱国行动。”“专电”转发了呼吁书全文，文后签名中，在李洪林、于浩成、严家其、许良英、张显扬之后，赫然写着戴晴的名字。这时的戴晴又变成“著名中国知识分子”了。

5月10日，戴晴到中国人民大学讲演。她说：“我觉得，1989年4月27日一定会象1949年的10月1日、1966年的6月6日、1976年的4月5日一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

重要的日子，大家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事情（鼓掌、欢呼）。也许你们不知道，从1989年4月27日开始，我们国家统治了中国人上千年之久的权威统治，从此就要开始结束了（鼓掌、欢呼）”这里，戴晴犯了一个“错误”，她忘记了1966年6月正是“文革”发难之时，而她把1989年4月27日与1966年6月6日相提并论，正好说明这次学潮是一次动乱。在这次讲演中，她还说：“大概今年年初，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编了一个《青年研究》，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你们今天会有这样英勇的作为，可是，那个时候，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中国的大学生和学生运动》，在这篇文章里的第一句话就是‘大学生们总是对的’（鼓掌）。非常遗憾的是，这篇文章到现在还没有发表出来。”可见，戴晴“援助”学生、支持动乱之心早已有之，这篇讲话可谓不打自招。

5月13日，戴晴在一个会议上，提出能否以开座谈会云的形式，客观披露一批知名人士对形势的见解，得到当时中央主管宣传和思想工作的一位负责同志的首肯。5月14日，戴晴就把她的那些老朋友拉来“座谈”，炮制了一份《紧急呼吁》，随后，又到天安门广场宣读这份呼吁，发表鼓动性演讲。这就是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一幕。

这份呼吁书经《光明日报》和中央电视台报道后，上街游行声援绝食学生的人一天比一天多，声势一天比一天大，造成绝食学生骑虎难下之势。这就是戴晴所谓“援助”学生的结果。

需要指出的是，戴晴在一些场合也曾劝说学生复课，劝学生停止绝食，劝学生撤离天安门广场。她似乎是站在一种公正的立场上，因此很能迷惑一些人。其实，她的本意不在

这里。她在5月14日晚在天安门广场向学生发表演说时，就说过：要“打得出去”、“撤得回来”。其潜台词是“撤”是为了“打”。5月15日，她在接受日本《读卖新闻》记者采访时，更明确地表达了这种意思。她说：“学生们有很好的个人素质，表现在他们的政治敏感性、政治责任心、爱国热情、牺牲精神、组织能力等方面，可是他们却缺乏现代社会进行政治斗争的足够的经验。他们不知道每个人是有自己的角色的。比方说我是个主角，站在舞台上，当我把剧情推向一个高潮后，我就要退下去，由一些配角上来表演，如果需要的话，我再上来。”那么，学生撤出去，谁上来呢？5月18日，戴晴作出了回答。她打电话给一个“朋友”，提议知识分子们绝食，换得学生们进食。她要变擂鼓助阵为亲自出马了。

(八)

为了迅速制止动乱，5月20日国务院发布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命令，戴晴感到很失望，流露出颓丧之情，并声称“从此不再参与运动”。

是“从此不再参与运动”了吗？请看她此后的行踪：

5月22、23两日采访7名在天安门广场绝食、绝水的学生，并到他们的家中采访他们的家长。

5月24日，参加全市大游行，手擎“首都知识界”的横幅，并接受一批记者的拍照。

5月30日，接受香港无线、香港翡翠两电视台采访；接受香港商业电台采访；接受香港无线电台采访。

5月31日，接受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采访。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戴晴在50天的政治风波里，频繁地与英、美、日、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报纸、电台、电视台接触，

接受他们的采访，发表谈话，有些是通过面谈，有些则是通过国际长途电话，对国内的学潮及动乱作了大量歪曲的宣传。一时，戴晴成了外国记者追逐的“明星”，成了他们歪曲报道中国动乱的一个消息源。

6月4日，首都发生的反革命暴乱被平息，戴晴说她“心情极为悲愤”，并策划组织知识界人士“联名抗议政府对学生和平请愿的镇压”，但未能成功。就在这时，她又一次接受香港及东京等地电台的长途电话采访，说自己“决意退出中国共产党”。终于在6月5日，她向所在的党支部递交了退党申请，向共产党示威。

这就是戴晴所谓的“从此不再参与运动”。

(九)

戴晴在北京动乱及反革命暴乱中的种种表演决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思想根源，是她长期以来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必然结果。

1978年以后，戴晴开始写小说，因发表反映知识分子两地分居为主题的小说《盼》而有了点小名气，由此跻身文艺界。后调到《光明日报》当记者，进入新闻界。当记者后，她声称“一不坐班，二不采访官式会议，不做那种只发豆腐块新闻的记者”。她感兴趣的是四处采访那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物。1986年以后，她利用在光明日报办《学者问答录》专栏的方便，转达传播方励之、严家其、金观涛等人的观点，并与这些人过从甚密。在对香港某杂志记者谈采访经验时，她“再三强调”：“我得益于思想和情绪的长期压抑，所以当与他们一碰到我这样的人，有一种悟性，一种感情的沟通、情绪的沟通”。由于有这种沟通，她和那些所谓“精英”们裹到了一

起。1987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受到赵紫阳同志的阻挠，戴晴欣喜异常，按捺不住自己的“感情”、“情绪”，写起翻案文章。她不顾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所写文章的“矛头专门指向我认为她本应维护的东西”（香港明报1989年2月号《戴晴谈心路历程》）。香港某杂志在发表她写的《储安平与党天下》一文时，特别为该文加了一段很长的《编者按》。这个《编者按》说：“戴晴女士再接再厉，继《王实味与〈野百合花〉》之后，为本刊写就另一篇调查报告，详尽记录另一名知识分子——储安平——的崎岖命运，包括他在中共治下步向厄运的悲剧历程。单是他（储安平）右派身份至今未除这一点……伊然是说，即使中国没有发生‘文化大革命’，也从未给万恶不赦的‘四人帮’极左派窜扰捣乱，包括储安平在内的一批民主党派人士，始终是无法躲避被打成右派的命运。”戴晴文章的矛头所向被这篇编者按点得再清楚不过了。正因为如此，她受到所谓“精英”们的喝采和赏识，被一些和她“志同道合”的人捧成了“名记者”、“名作家”，受到国外一些图谋在中国搞“和平演变”的势力的青睐。她自己也就飘飘然起来，经常和“精英”们以及海外“学者”、“记者”们在一起，异常繁忙地出入于一些“政治集会”、“政治沙龙”，实现她的“参与”意识，似乎也是一名“精英”了。

其实，戴晴哪里是中国知识界的精英，她只不过是国内外妄图把中国演变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反动势力的一个走卒罢了。这个戴晴，早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是一个造反派人物。当时名叫傅凝，“文革”之后改名戴晴。然而，名字虽然改了，思想依旧未变，只是从极左跳到极右而已，一遇适当气候，她和她的同伙们便又跳将出来兴风作浪，以求一逞了。

但是，他们的目的是永远不会达到的。中国人民迅速平息了发生在首都的反革命暴乱，使他们的梦想彻底破灭了。

（原载1989年9月13日《光明日报》）

戈扬，女，原籍江苏瑞安，1916年2月生于江苏扬州，1935年开始发表作品，笔名栖栖。1941年她参加新四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敌后从事新闻工作，先后任记者、编辑、新华社华中分社副主任，《大众日报》采访部主任、《潍坊日报》副总编辑等职。1949年，她随军到上海，曾任新华社华东区分社副总编辑，1950年调至北京，任《新观察》杂志主编至1958年。粉碎“四人帮”后《新观察》杂志复刊，她再次担任主编。

老牌的动乱女“精英”戈扬

乔 焯

新闻界、理论界、文艺界的动乱“精英”中，颇有几个中外闻名的大明星，其中，不乏老资历的共产党员。老党员仇视党，咒骂党，以至行动起来推翻党，必有惊人的轰动效应，必有最大的欺骗性和迷惑性。他们老有经验，老谋深算，上可以充当“总书记”的智囊，下可以统帅人马，长于组织指挥。的确，具有翻云覆雨、制造气候的能耐。只可悲，在几千万党员中，就那么一小撮，纵有张口吃天的豹子胆，也免不了一头撞在钢硬的五色石上，露出后脑勺上那块白花花的

反骨。

“精英”中有一员女将，大名戈扬，亦属“老”字号，《新观察》老主编，自夸有几十年党龄。早先，曾有人议论，戈扬已七十好几，为何还牢牢占着一块地盘不放？知情者曰：戈扬是当今政治舞台上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大家”之一，心怀叵测，待价而沽，还有好戏要唱呢！

果不其然，一场由“精英”们长期策划、旨在推翻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的“大戏”开场了。戈扬自然是大角色，技艺绝妙，致使海内海外，华人洋人，各路反动势力，忙不迭地捧场。这位巾幗“精英”，一时名声大噪，真真地是誉满全球了。

戈扬的表演有两大特点，特点之一是“露”，露骨的露。反党反社会主义发之于内心，亮之于外表，入骨十分，绝不隐藏毫厘。那位预知“未来”的“精英”金观涛，虽包藏祸心，却还藏头露尾、雕词琢句地说道：“社会主义的尝试及其失败是二十世纪人类的两大遗产之一”。戈扬则开门见山，单刀直入：“金观涛对社会主义的否定不是太厉害了，而是客气了一点，还不够”。好一个戈扬，直指要害，要立刻行动，掀起一个打倒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的“高潮”。用另一位善于观察世界浪潮的“精英”温元凯的话说，叫做“第二次革命”。温元凯尽管身怀兴风作浪的绝技，却够不上斗胆，他在得出社会主义必然失败的结论之后，又假惺惺地制作了好几个迷人的形容词儿，什么“沉痛地”、“悲壮的”，以显示他还有一点儿侧隐之心。而戈扬却绝不矫饰，恨之极，喜之极，恨喜形之于色。反革命暴乱果然来了，天安门上黑云压顶，英雄碑下浊流滚滚，大有地覆天翻的势头。戈扬自以为他们的“革命”成

功了，“精英”们即刻就要登上资产阶级联合国的宝座，成为开国元勋了，飘飘然，仿佛顷刻之间就要化作“自由女神”，如醉如痴，载歌载舞。且听她的绝唱：

我看到希望了，我看到希望了！
这希望的光辉，是如此鲜明，
如此灿烂，如此光芒万丈，它将照耀中国的历史，
照耀着整个世界。

我欢欣，我雀跃，我感动，我泪流满面，我要告诉你，告诉所有的人，中国有希望，中国有希望啊！

……

这是乱军营中的一面鼙鼓，响声震耳，却不美妙，听起来就象夜深人静时，夜猫子闻到死尸的气味而发出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狞笑。这绝妙之歌，为了永留青史，“老主编”特地发表在动乱中大造舆论的《新观察》第九期的首页上。

露而必狂，戈扬的这场表演，可以说达到疯狂的顶点，酝酿、预谋、发难；幕前、幕后、台上、台下，处处都有她的“戏”。她主持“精英”们的座谈会，她发表演讲，她高举旗子到天安门前示威，她在海外破口大骂……狂之极，也恶之极。魔鬼梅非斯特附在她身上，恶，成了她的本性。

戈扬表演的第二大特点，是“变”，变化多端的变。契诃夫的小说《变色龙》中那个可怜的小人物的变色，比起戈扬，在技法上，是小巫见大巫。戈扬是风一转，色就变，快而不露痕迹，比川剧中那种神奇的“变脸”还要高超。她的变，是先观察风向，测好气候。她不愧为《新观察》的主编，对新的政治动向，有一种特殊的嗅觉。几年之前，她就闻到国际上

的反共大气候，山雨欲来，她当即闻风而动，与她的《新观察》内外呼应，积极制造小气候，不失时机地融入大气候。1987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进行没有多久，她就测好风向，扬言：时间不会长，就要收了。果然，没过几天，那场斗争便偃旗息鼓。去年12月，她又发出预告：半年以后，中国“将出现批判社会主义的高潮”。（这里应当注明，所谓的“批判”，就是“打倒”或“推翻”的代名词。）果然，未出半年，“高潮”就来了。

风向转，色即变。有必要联系一点历史，说明戈扬这一绝招，功底之深。五十年代中期，中国作家协会，在当时“左”的思潮影响下，在党内对老作家丁玲及《文艺报》副主编陈企霞，进行了所谓思想斗争。（后来证明那场斗争及其结论是错误的，党中央明文作了平反。）会议开始的几天，气氛是平缓的，不曾有人上纲上线。不料，果然有个人跳将出来，语惊四座，炸出个大冷门。她就是《新观察》的主编戈扬。她锋芒毕露，振振有词。说道：丁玲、陈企霞不是一般的思想问题，而是属于反党性质，并且已经形成了那么一股“反党暗流”，这暗流“在扩大”，“在蔓延”……显然，“反党暗流”，不仅是置丁陈于死地，还株连一批人。会议的气温，顿时升高。

半年之后，1956年，中宣部党委对被打成“丁陈反党集团”问题，重新进行调查。那时，国际国内的风云，已发生很大变化，当向戈扬进行核查时，她竟转了一百八十度，面不改色，若无其事，回答说：那次会议的发言，“不能作为根据”。轻淡的一句，就把自己的黑脸洗成白脸。待到1957年春“大鸣大放”的高潮到来，戈扬又见风而转，当即变脸，在重新召开的作协党组扩大会上，又站出来发难，厉声质问党组

的领导人：为什么把丁陈打成反党集团？要“揭盖子”！令人目瞪口呆，再以后，她成了右派，从此沉默多年。“文革”初期，动乱之时，她又觉时机难得，有机可投，摇身一变，成了造反派！

戈扬的善变，的确非一日之功，但万变不离其宗。如今，一些理论家研究某些名人时，常用“某某现象”。“戈扬现象”若何，大可研究。不过，熟知她的人，早有定论：她是一个善于政治投机的野心家，一个灵魂丑恶的小丑，如此而已。

孙猴子毕竟跳不出如来佛的掌心，倒霉的“精英”，怎样的能测会算，却总是测不出自己失败的命运，现在只好躲在资产阶级的王国，混口洋饭，以待时机。可叹的是，时机怕是很渺茫了，就说那一大把子年纪，想作“雀跃”之状，也很难了。只好安心地在洋大人的安乐窝里，死心踏地做一条驯服的走狗吧。不过，也有必要在“走狗”之上，加一个形容词：“乏”。

（原载1989年10月14日《光明日报》）

李洪林，男，1925年生于辽宁，1948年参加工作，1950年入党。解放以来，他长期从事理论工作，1979年10月至1984年9月，曾任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后因犯政治错误被免职，1984年9月调到福建省社会科学院任院长、党组书记，后任研究员。

资产阶级自由化的 “理论家”李洪林

严 和

有这么一位“理论家”，曾经是颇有一些名气的，后来犯有严重的政治错误。他就是李洪林。在今年春夏之交的动乱期间，这个“理论家”充当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今年早春，海外有那么一些人和小团体，突然把他们的“呼声”传到了中国国内来，要“中国政府释放魏京生等一切政治犯”。在美国的反动组织“中国民联”成员陈军，也与国内的“精英”密谋，把所谓要求释放政治犯的“签名运动”引向上海。这些“精英”，有方励之、苏绍智、严家其、包遵信、张显扬等人，其中也包括李洪林。

今年5月3日，香港《明报》刊登“北京专电”云：以于浩成、李洪林、严家其、许良英等为首的一批著名中国知识

分子，就‘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发出一联署倡议书，呼吁中共当局坚持改革，并对大陆目前的学运表示坚决支持，称此次学运是极其可贵的爱国运动”。在动乱中拼命使动乱升级的“精英”们中间，又有李洪林。

今年5月14日晚，当北京高校的一些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的绝食进入第二天的时候，严家其、包遵信、李洪林、于浩成、苏晓康等知识界“精英”，积极插手天安门广场的学生绝食请愿活动，暗示撤离天安门广场的三个先决条件：要求政府承认整个学潮到动乱是“爱国民主运动”，承认非法学生组织是合法的，威胁党和政府不得对绝食学生采取强制措施，否则，“将成为历史的罪人”；并且表示如果政府不接受这些要求，他们就要同绝食请愿者一道“奋斗下去”。这些要“奋斗下去”的“精英”中间，还有李洪林。

李洪林在动乱期间的种种表演，是有着深厚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理论根基”的，是他一贯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必然结果。

邓小平同志在1979年3月党的理论务虚会上，代表党中央重申了四项基本原则。他指出：“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每个共产党员，更不必说每个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

就是在这一历史发展的重要关头，长期从事党的理论工作的李洪林，却逆党中央的部署而动，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就连续发表了《我们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我们坚持什么样的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坚持什么样的党的领导》和《“信

仰危机”说明了什么》等四篇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打着批判极左和宣传、解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旗号，对四项基本原则逐一地进行了否定。

1979年6月，李洪林发表了他的系列文章的第二篇：《我们坚持什么样的无产阶级专政》。在此文中，他把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同林彪、“四人帮”的“全面专政”混为一谈。他闭口不谈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却说什么一些人“患了‘左视眼’的毛病”，“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上，他们比较倾向于‘全面专政’，觉得把越来越多的人打成敌人，成绩才越大，专政的面越广，才越显得‘革命’。”在他看来，谁强调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谁似乎就是“极左”。他攻击一些人“对民主感到头痛”；还说什么“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还没有见过资产阶级民主”，“过去只存在过封建专制和法西斯专制”。在他看来，中国似乎应“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了。

1979年9月，李洪林又发表了系列文章的第三篇《我们坚持什么样的党的领导》一文。他通篇闭口不谈阶级敌人对我们党的恶毒攻击，不谈坚持党的领导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却自问自答地说：“所谓坚持党的领导，是不是说，共产党具有‘绝对权威’，不管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条件，都是‘当然领导’呢？”“不，不是这个意思。世界上没有‘绝对权威’，也没有‘当然领导’。”

李洪林在这篇文章中说：“是的，党在领导一切，这是事实。但是，以下四点，也是事实”。这四点就是：第一，党的领导机构中还有林彪、“四人帮”残渣余孽，不能不伤害群众对党的信任。第二，在党内极左路线的流毒还相当严重，有的领导还在坚持极左路线。第三，“文革”中出了两个反革命

集团，党是有责任的，这本身就是党的错误。第四，我们党风还不好。李洪林说：“因此，很自然，有人对党的领导是有怀疑的”。“并不是什么样的领导都要坚持”，“不合乎”“规格”的“领导”，“我们决不坚持”。

李洪林说，“当我们谈到坚持党的领导时，就不能不加以分析”，“有些人的精神状态和领导水平是不能适应四化需要的”。“如果这种作风不改变而要‘坚持领导’，四化还能有希望吗？”李洪林在这里玩弄了偷换概念的把戏，把是否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这一个重大政治概念，变成了一个要不要改进党的工作的问题。不仅如此，他又进一步煽动说：“党不是救世主，不是人民的上司，没有权力向人民发号施令。”把话说到如此直露的程度，李洪林对待是否要坚持党的领导的态度，不是十分鲜明了吗？

李洪林系列文章的第四篇《我们要坚持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是在1988年5月发表出来的。为什么此文距离第一篇文章相隔近十年之久呢？李洪林在他那本错误观点汇集的《理论风云》一书中忿忿不平地说：那是由于前三篇发表后，引起了很大风波——清除精神污染的那时候，被列入“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时候，被列入“资产阶级自由化”。李洪林在我们党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时候，他就敷衍地“检讨”几句，应付过关。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风头一过，他又卷土重来，肆意攻击四项基本原则。1988年5月，李洪林认为时机已到，重新活跃起来。这篇关于坚持什么样的马列主义的文章，更加直露地宣扬马克思主义的“过时论”，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李洪林说：“随着发展的深入，矛盾尖锐了，事情也明朗起来。不要说极左的

观点已被抛弃，就是公认的一些马克思主义传统观点都被新的观点代替了。变化之大，以致国外有的观察家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经被‘一笔勾销’了”。李洪林还发明了一种“剔除法”，说是要“剔除不应该坚持的东西”。于是，就逆着历史的发展过程剔除起来。

他首先剔除了毛泽东思想。他说：“批判极左思想不能不涉及毛泽东的错误思想”。接着又说什么中国人所学的马克思主义，尤其具有浓厚的斯大林色彩。不但在中国的社会体制上，而且在思想方法上，都有斯大林的巨大影响。因此，必须“剔除”。再接下去，他又“剔除”了列宁主义。说：“列宁所思考和解决的，毕竟主要是俄国的问题”，列宁的理论“究竟包含了多少真理的成分，也还有待实践去检验。”最后，他终于“剔除”到马克思主义本身，说什么至于马克思、恩格斯，他们生活在19世纪的欧洲，其理论“未必适用于中国。”至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还有哪一条应当坚持，李洪林却不置一词——这就是这位“理论家”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态度。

李洪林公然还说马克思主义“不应该有（也不需要）超凡入圣的特殊地位。”他攻击我们党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篇文章最后说：“今天，我们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已经远非昔比。传统的东西终将和历史一起留在后面，新的篇章揭开了！”寥寥数语，李洪林反对坚持马克思主义、同马克思主义传统彻底决裂的立场，暴露得再清楚不过了。

1989年10月

万润南，男，1946年10月生，江苏省宜兴县人，1964年考入清华大学，196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文化大革命”期间积极“造反”，当过一派头头。大学毕业后，他先后在河北承德当过两年工人及四年铁路中学教员，1978年调到中国科学院计算中心工作。1984年，他挑头成立四通公司，担任总经理。1989年6月，北京反革命暴乱平息后，他叛国出逃，在国外与严家其、刘宾雁、吾尔开希等人积极筹划成立反动组织“民主中国阵线”。1989年6月初，他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并被取消其公司法人代表资格。

万润南搬起“石头”要砸谁

叶光

发生在首都的这场反革命暴乱中，暴徒们抛起石头、砖块，疯狂地砸军车，砸解放军，那一幅幅血淋淋的场面，那些骇人听闻的暴行，人们或者身临其境，或者通过电视屏幕，早就看到了，见识了。然而，恐怕谁也难于想到，一个西装笔挺、温文尔雅、腰缠万贯的企业家万润南，也举起了“石头”……

作为四通集团公司总裁的万润南多次说：“我们把四通

的英文名字取意为STONE——石头的意思。”“也许，我们是铺路石；也许，我们是新世纪纪念碑的一块奠基石”。5月21日，首都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第二天，万润南借非法组织中国人民大学学生自治会办的“北京之音广播站”煽动说：政府已经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它就不再是人民的政府，各界人民要动员起来，粉碎戒严，打倒政府……同时重申：四通公司是一个战斗堡垒，就像它的英译名STONE(石头)一样坚硬。怎样用这个“石头”(STONE)?万润南的得力助手、公司副总裁崔铭山向闹事的学生头头说：“我们几乎每天都去天安门”，“作为四通公司，我们作出的贡献，可以说在北京市排在第一位的。我们是冒着整个公司被政府整掉的危险！”

这就是说，万润南搬起块大石头——“整个公司”砸过来了！

一

对于自己在这场风波中的表现，万润南7月28日在美国芝加哥的一次集会上做了一番自供，他说：任何国家、地区的企业家都小心翼翼地与政治保持距离，但在这次国内的学潮中，“我们却沾上了，而且涉入很深”。他不无得意地声言：“像‘四通’这样的民办企业和个体户，是最积极支持这个运动的一分子！”

然而，学潮之初，万润南还需要有一个掩人耳目的假象。当时四通公司还有过职工不得占用工作时间参加学潮活动的规定。实际的情况怎样呢？崔铭山就曾对天安门广场上闹事学生的头头说过：“从你们走上天安门广场那一天开始，每一分钟，每一秒钟，我们都监测着全国各阶层的反映，监测着全世界的反映。我们了解的情况比你们要全面一些，我们

所作的判断，比你们要冷静一些。”四通公司综合计划部部长、公共关系部副部长周舵整天不上班，和闹事的学生搞在一起。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万润南直截了当地说：“是我派去的。”

那么，这个期间他们干了些什么呢？

香港《明报》6月28日登了篇专讯，称“四通”为“海外支持北京学运管道”。文章说：“4月下旬大陆学潮风卷云涌，四通公司成为海外与大陆学生沟通的管道之一。”作为海内外反动势力沟通的一条管道，万润南和四通公司极少数人确实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以学潮黑手自居的刘晓波，4月22日在纽约伙同反动组织“中国民联”的头头胡平、陈军等，搞了份10人签名的《致中国大学生的公开信》，为学潮打气加油，出谋划策。事隔4天，4月26日早9时半，这份由刘晓波执笔的“公开信”，就张贴在北京大学的三角地了。这一代表国外反动势力为动乱所作的谋划，就是先从美国传真到四通公司，再从四通公司转递出去的。而担任“信使”的，正是前面提到的受万润南指派插手学潮的周舵。

刘晓波受“中国民联”派遣回北京直接参与动乱，也是这个周舵同“四通”另两名工作人员去首都机场迎接的。刘上飞机后，他在纽约下榻处的“房东”、“中国民联”头头胡平的老婆便打电话到北京，告知刘可能下不了飞机、出不了机场即被拘捕等等。刘到京次日，胡平老婆的查询电话，又打到了“四通”。刘晓波到北京后，便成了“四通”的常客。他多次拜访万润南，进行密谈。6月1日中午，即在刘晓波发起的4人有限绝食闹剧的前一天，他还同吾尔开希一起到四通公司

拜会了万润南，双方晤谈了一个中午。

4月27日，周舵从机场接回刘晓波之后，4月30日，他又以《世界经济导报》和《亚太经济时报》特派记者的身份，参加了《亚太经济时报》两名记者串连召开的“五四精神与时局”座谈会，参与起草了为钦本立鸣不平的请愿书，5月3日他们再次聚会通过了请愿书，并议定5月4日策动新闻界“集体围观”学生游行。5月4日12时，一些新闻单位的200来人在新华社前集合后，到民族宫前“集体围观”近两小时，有人打出了事先准备好的游行横标，队伍便卷进了学生游行的行列，并由此打开了社会参加动乱行动的缺口。这是事先策划好的预谋，香港报纸当天早上便预报了1000名记者赶上队伍，自称“欣然”参加了游行。这以后，他卖力地参与文化界、知识界、新闻界、学生界的一系列活动；他多次参加“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两次代该会起草“告人民书”；他领着海外来“客”去“四通”购买通讯器材支援闹事的学生；他被王军涛（《北京之春》头头、《经济学周报》副主编、民办“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负责人）指定为海外捐款的3位财务监督人之一……作为受命于万润南的“特派员”，应该说，周舵干的相当出色。

万润南的一位得力助手曾经说：现在社会上盛传，我们“四通”是学运的后勤部、参谋部和指挥部。这些评价，万润南是当之无愧的。

7月30日香港《明报》刊登了该报记者芝加哥28日专电，报道了万润南的一次讲话。万说：“争取民主是开销很大的，在广场上每天开支起码要4万元人民币。当然海外筹集了许多资金，但大部分未能进入大陆。”靠什么呢？“美国之音”？

月30日播出的万润南讲话中，万自己作了回答：“广场上的学生主要是靠北京市民、北京的民营经济像‘四通’这样的公司，以及北京的个体户的资助。”公开地亮明了学潮“后勤部长”的身份。

“四通”的一位副总裁曾对学潮头头透露：“四通”支援了20多万元。除了大批直接送到“高自联”等非法组织的食品、饮料、药物，还提供了一批供反革命宣传煽动用的器材，如无线电话、高音喇叭、电讲仪等等。天安门广场“高自联”指挥中心那部为动乱立下了汗马功劳的高效率的造谣机器，就是“四通”供给的！

除了“四通”自己的资金，还有“许多海外金钱的支援通过四通公司源源流入天安门广场”（香港《明报》6月28日）。4月下旬以后，海外反动势力就利用“四通”向非法组织“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筹委会”、“高自联”等，陆续提供了油印机、打字机、复印机、微型收录机以及传真机等多台。充当联络员和提货人的，是王丹的一位挚友、北大民主沙龙的积极参与者。

“援助”是有条件的。“四通”下边有个鹭岛公司，该公司又下辖一个华成托运服务公司。这个公司的头头就曾直接从天安门广场找来一名“工自联”常委和几名闹事的学生头头，当场付给1.8万元现金，一部无线电话，派给一辆解放牌卡车，并应允代印传单等等。条件只有一个：支持党内“改革派”，反对党内“保守派”，倒李（鹏）保赵（紫阳）。他毫不掩饰地说：“我就是想用自己的观点去影响广大学生”。

前边提到的那位从“四通”提取美国“资助”的“高自联”提货人，还借助“四通”的通讯条件，多次向海外汇报北京学潮

情况及下步打算，并接受指令。5月初，高校纷纷复课、学潮面对难题的时候，在美国的一位提供“援助”的神秘人物就曾在电话中指示说，一、要坚持学生组织合法化的要求，这是当务之急。二、除了要求恢复钦本立《世界经济导报》的职务外，还可要求江泽民、李锡铭下台。三、要把学生办的《新闻导报》坚持办下去。

海外的反动势力远隔重洋的指挥，就这样通过万润南主持的“通道”不断下达。

二

5月20日，在首都局势越来越严重，许多地方已陷入一片混乱和白色恐怖的情况下，国务院断然决定，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

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动乱的策划者和组织者们感到极大的恐慌。他们明白，一旦戒严实施，部队进城，动乱被制止，社会秩序恢复正常，他们设想的从北京乱起，搞乱全国，借动乱搞垮国家政权的预谋，就将完全破灭。于是，反对戒严，阻止部队进城，搞垮政府，便成了他们当时行动的总纲领、总目标。他们要“进行决死的斗争”（“体改委”一批人5月19日在天安门广场的演说）了。

面对这种形势，万润南及其得力助手们感到不能再待在后台了。“与其束手待毙，不如拼死一搏！”

——正像他的一位得力助手描述的那样，他跳到前台，赤膊上阵，举起“石头”——STONE，“拼死一搏”了。

5月21日，首都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第二天，他先召集北大等校的4个学生头头商谈，再次派助手去天安门广场“调查”之后，召开了“四通”全体干部大会，郑重其事地宣布他要

亲自介入学潮，并提醒说：“我介入就是四通公司介入了！”面对员工们的疑惑，他交底说：“上边支持我们这样做！”有了“上边”的授意，万润南不顾“四通”广大员工的意愿，决心破釜沉舟地孤注一掷。

万润南的一位得力助手曾描述当时他们的心情：“如果能劝说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撤走，赵紫阳也许还能复出。”于是，一个以学生撤退为筹码，逼迫政府取消戒严、逼迫邓小平、杨尚昆、李鹏下台，保赵紫阳复出的策略形成了。这是万润南下下的第一着棋。

从5月21日至23日短短3天里，万润南不仅两次召开四通公司干部大会，5次与“高自联”的头头王丹等人个别接触谈话，还两次召集天安门广场闹事的学生头头开会、商谈。

5月22日下午4时许，万润南派人派车直接从天安门广场召来了首都和外地近80所高等院校的近百名静坐学生头头。来到国际饭店彩虹中餐厅之后，万润南谢绝饭店服务人员任何服务，关起门来，以大老板身份挥舞起了指挥棒。他首先肯定学生们的行动“已经取得了很大胜利，作出了很大贡献。”接着打气说：“如果把你们的行动比作一部作品，那将会是一部杰作。这部杰作的上篇和中篇已经写完了。如果写好下篇，写好结尾，那就更加杰出伟大了。”

怎样才能“写好下篇”？万润南出主意说：“你们应该不失时机地撤离广场，主动地撤回学校，坚持校园斗争。”他特别强调：“这样，就会受到整个社会的赞扬，更有利于下一步的斗争。”“下一步”是什么？他意味深长地说：“你们知道，军队进京意味着什么吗？如果学生回学校了，就使得外边的部队进京的理由少了一分……那时候你部队进来，要干

什么？”他亮出底牌说：“撤退，我们是有前提的，是有要求的。”“第一条，就是军队回去，你们回校；第二条，取消戒严，秩序正常；第三条，李鹏下台，邓小平、杨尚昆等老人按程序光荣退休；第四条，拥护赵紫阳同志。”他还特别强调这最后一条“很重要”。

在这次国际饭店会议上，万润南俨然以一个“指挥官”的身份，做出了具体安排：“你们首先开新闻发布会，向中外记者表明观点。其次，撤离广场时，可以举行‘凯旋在子夜’的大活动，大进军。”他还着重地说：“是进军，是为了新的目的才回学校。”

5月23日，万润南一边派车去天安门广场接昨天到会的学生头头到“四通”饭店继续开会，协商通过由“四通”副总裁曹务奇代行起草的所谓撤离《倡议书》，一边把首都新闻界近20名记者邀请到四通公司，企图通过他们造成舆论压力，迫使政府按照万润南们的意图行事。

然而，绞尽脑汁策划的《倡议书》，尽管在最后成文时删去了一些露骨的反动内容，终因戒严令已经颁布，报纸未能刊登；他们精心筹办的所谓“凯旋在子夜”的示威活动，自然也成了泡影。

万润南不只有这一着棋，为了推翻合法政府，他还有另一着棋正在同时进行。这就是迫使人大常委召开紧急会议，进而召开人大特别会议，撤销戒严，罢免总理。

5月20日以后，动乱的策划者和组织者深感从党内解决问题已经没有多大可能了，便把希望转寄到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紧急会议上。严家其、包遵信等先是致电人大常委会领导人，攻击国务院按宪法授予的权力在北京部分地区实

施戒严，胡说“目前宪法受到极少数人的粗暴践踏”，因而“紧急建议立即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解决当前面临的严重问题”；随即又在香港《明报》上，抛出《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当前中国的问题——并告李鹏书》一文，叫喊“每一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每一位全国人大代表，投下神圣的一票，废除戒严令，罢免李鹏总理职务”。

与此相策应、相配合，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在万润南的直接支持和指挥下，立即行动起来，策划征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签名的非法活动。

5月20日，宣布戒严的第一天，万润南就找该所所长曹思源商谈，面授机宜。5月21日一早曹思源口授起草了一封《提议立即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的短信，派该所办公室主任中午送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胡绩伟家，胡略作修改后第一个签名。下午，该所所有人员一起出动，有的登门拜访，有的电话征询。有些人大常委委员对四通研究所插手有怀疑，拒绝签名，胡绩伟委员便给加上了个“由我委托你们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进行”的名义。

尽管征集签名信隐去了他们取消戒严、打倒李鹏的真实目的，但是直到23日，签名的人大常委会委员仍然不多。于是，曹思源便把在戒严以前表示过要求召开人大常委会议而没有在征集信上签名的人大常委会委员名单拉进来，还把几位没有同意签名的人大常委会委员也擅自列入，拼凑了个50多人的名单。胡绩伟提议将“征求”的结果交香港《文汇报》发表，曹思源便多次给香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主任刘锐绍通电话联系，商议发稿事宜。

5月25日，香港《文汇报》在头版头条位置以“人大常委57

人上书要求召开常委紧急会议”的通栏大字标题，发表了综合消息，并强调指出：“据悉，紧急会议的重点包括罢免李鹏。”

其后，知悉香港《文汇报》这条消息的一些人大常委会委员，纷纷辟谣，并提出了严正抗议。“四通”内部也议论纷纷，许多员工表示怀疑和不满，插手签名活动的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也乱了阵脚。针对这个情况，5月31日晚，万润南紧急召开了四通公司全体职工大会，会上，万态度强硬地重申：“四通研究所就是四通集团的！”并就5月30日部分人大常委会委员的指责，发表了3点意见：“一是血要热，二是头脑要冷，三是骨头要硬。”公开为他的同伙撑腰打气，要他们站稳反动立场，与党和政府顽固对抗到底。

三

无可奈何花落去。

发生在首都的这场反革命暴乱，在党的领导、人民的支持、戒严部队官兵和武警、公安干警的共同努力下，被平息了。万润南的美梦破灭了，孤注一掷的挣扎失败了。他躲过公安部门的缉拿，和海外反动势力相勾结，6月初私逃出了国境。

到了国外，在洋主人的卵翼下，再也没有必要继续伪装，万润南便赤裸裸地坦露出他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真实面目来了。为了实现他们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既定目标，万润南到了资本主义的“自由世界”，立刻和海外反动势力、新近叛逃国外及先期出国的“政治精英”们勾结起来，沆瀣一气，公开亮出旗帜，开始了他们反革命活动的新阶段。

7月，趁法国大革命200周年纪念活动的契机，万润南和通缉犯吾尔开希、严家其以及苏绍智、刘宾雁等麇集巴黎，又是参加所谓“民主女神”像揭幕式，又是筹建“民主中国阵线”，万润南还被推为这个新的反动组织的秘书长。事实表明，万润南是横下一条心，要和人民作对到底了。

走到这一步，决非偶然。“四通”公司本来是以高科技开发为已任的，万润南也借此换来了巨大荣誉。然而，万润南本人早就声明过，他办“四通”并非着眼科技和经济，他要搞政治。

5月30日，动乱高潮之际，万润南接见香港亚洲电视台记者谈话时就明确地说：“政治民主要有强大的经济基础。社会稳定要有一批中产阶级。”所谓“中产阶级”，正是他们心目中的资产阶级。如何使“中产阶级”大量涌现？万润南叛逃国外后，点得更透了：关键在解决“产权关系问题”，“就是财产所有权的问题，必须要有明确的界定”。说白了，就是要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呼唤资本主义私有制。

而要解决所有制问题，用万润南自己的话讲：“这已经超出经济改革的领域，变成一个政治改革的问题。”同时，“活跃的经济势力必然会有它的政治代表”。万润南除了自己充当这样的“政治代表”以外，还组织了一个专门班子探讨、推行他的政治主张，这就是由曹思源牵头的“四通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该所从开张之日起，就把引进西方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和修改宪法作为自己的重要课题。

今年3月26日，该所和《世界经济导报》、《新观察》等单位联合举办了一次“修改宪法理论研讨会”，曹思源在开幕词中就明确提出要把毛泽东、孙中山等人的名字统统从宪法中勾去，否则他“感到羞愧”。有人则挖苦“无产阶级专政”不过

是“由一个阶级、一党一派、一个人的权力来‘决定一切’”。这次会议严格谢绝外人进入，然而，英国《卫报》记者还是作了报道说：“这次4小时会议的参加者们要求删除宪法中任何提及毛泽东思想和‘四项基本原则’的文字。”

一个实现私有化，让一批所谓“中产阶级”占主导地位；一个取消四项基本原则，实现所谓“议会民主”——这就是万润南所梦寐以求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蓝图。这，当然是一枕黄粱！

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空的阴霾终于被廓清了。万润南带着破碎的梦逃到了国外。四通公司广大员工看清了万润南及其亲信策动、支持和参与动乱，与人民为敌的反动面目，最近四通集团公司、四通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已撤销万润南在公司的一切职务，将其开除出公司。至此，万润南搬起石头终于只能砸在自己的脚上。

（原载1989年8月17日《人民日报》）

刘晓波，男，1955年12月生，吉林省长春市人，1981年毕业于吉林大学中文系，1988年6月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留校任讲师，同年8月赴挪威奥斯陆大学东亚系讲学3个月。其后，他擅自接受美国夏威夷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邀请，前往访问、讲学。北京发生动乱后，他接受“中国民联”派遣，于1989年4月27日回到北京，插手学潮，煽动动乱。反革命暴乱被平息以后，他于6月6日被我公安部门收容审查。

抓住刘晓波的黑手

王 昭

人们都还记得，在首都部分地区宣布戒严12天之后，经过大量的宣传解释工作，戒严日益取得人们的理解和支持，而天安门广场静坐的学生则日渐减少，难以为继的时候，6月2日，天安门广场却又演出了一出4人绝食48—72小时的闹剧。这次绝食的发起人，就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动乱之初特意从美国匆忙赶回来的刘晓波。

6月1日晚，刘晓波其人在北师大校门通过大喇叭做了一通演讲。他直言不讳地说：“我从回国后，就全身心地投入

到了以大学生为主体的全民民主运动，我在天安门广场同大学生度过了十几个非常难忘的日日夜夜。现在政府一再强调极少数、极少数人，所谓的一小撮，它的所指看来就是指类似我这样不是学生身份的人。但我想说……我不怕当黑手，我反而以当黑手为自豪，为骄傲，为荣光！”

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现在，让我们通过刘晓波在这场学潮后以及动乱和暴乱中的所做所为，看看这只黑手是如何在同海内外反动势力相互勾结中，伸向首都学潮，并极力煽动动乱的。

刘晓波向来有“狂人”、“疯狗”、“黑马”之称，1986年以来，他以否定中国的一切很出了些风头。1988年6月25日在北京师范大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后，8月24日去到挪威讲学。3个月期满，转到了美国。还在出国之前，他就想抛出一批反共反人民的所谓“重磅炸弹”，但是考虑到出国在即，害怕因此“泡汤”，暂时隐藏起来。到了国外，他无所顾忌了，便把它们连续地抛了出来。在这些“炸弹”剧烈的爆炸冲击震荡中，赤裸裸地暴露出了他的真实面目。

1988年10月，他在香港《解放月报》上著文宣称：“马列主义在中国，与其说是信仰，不如说是专制权力的组成部分。马列主义不是信仰，而是统治者进行思想独裁的工具。”因而，他始终把攻击的矛头指向马列主义。在1989年4月的《解放月报》上，他著文说：“批判马克思主义将直接转化为对东方专制主义的批判。”1988年11月，他从挪威赴美、途经香港，在接受《解放月报》记者专访时，更加放肆地为殖民主义大唱赞歌。当记者问到在什么条件下中国才有可能实现一个真正的历史变革时，刘晓波恬不知耻地答道：“三百年殖民地，香

港一百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样大，当然需要三百年殖民，才会变成今天香港这样。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对此，连香港《解放月报》的记者都忍不住说：“十足的卖国主义啦。”刘晓波回答说：“我无所谓爱国、叛国，你要说我叛国，我就叛国！就承认自己是挖祖坟的不孝子孙，且以此为荣。”而作为纲领性的主张，则是刊于1988年11月《解放月报》一篇署名文章中提出的四个“代替”。他说：“只能从多党并存的民主制代替一党独裁；用私有制、市场经济代替公有制、计划经济；用多元化的言论、思想的自由来代替思想一元化；用世界的（西方的）现代文化来代替中国的传统文化。”这里，刘晓波提出了以资产阶级共和国来推翻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系统的全面的主张。

1988年底，刘晓波到了美国。同总部设在纽约的以“取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四个坚持’”，“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现行的专制制度”为纲领的反动组织“中国民主团结联盟”（简称“中国民联”），一拍即合。他们勾结起来，沆瀣一气，不断寻找机会，伺机而动。今年以来，从方励之等人的签名上书为魏京生请命，到打着悼念胡耀邦同志旗号煽动的学潮，他们都密切注视，潜心研究，协作行动。首都学潮刚刚发动，刘晓波自以为时机成熟，便急不可耐地披挂上阵了。

这个一向宣称“我最佩服希特勒”的法西斯信徒，现在竟以“民主斗士”的面目出现。1989年3月，他在纽约参加了所谓“维护人权”、支持方励之等人要求释放魏京生的公开信的签名。4月，首都学潮出现之后，香港《明报》在4月20日发表了一则消息，披露刘晓波伙同反动组织“中国民联”的头头胡平、骨干分子陈军联名发出了所谓“改革建言”，“对大陆目

前的学运表示关注”。他们在“建言”中提出，要“重新审查”“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和“1987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有关问题”，鼓吹“修改宪法”，把四项基本原则“从宪法中取消”。4月22日，刘晓波在《世界日报》上抛出了《胡耀邦逝世现象的省思》一文，集中攻击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是“专制政体”，鼓动学潮要“抛弃寻找开明君主的改革模式，而尝试着走一条从制度上改造中国的道路”。这条路怎么走呢？刘晓波公然叫嚣要同国外的反动势力相勾结。他说：“如果大陆的大学生们和那些追求民主的知识分子们，能在公开支持党内开明派的同时，也公开支援魏京生等人和海外的《中国之春》，肯定会加快中国民主化的进程。”这里所说的《中国之春》，就是受台湾国民党豢养的“中国民联”所主办的反动刊物。很显然，刘晓波的目的就是要把学潮纳入内外勾结的轨道，进而将其进攻矛头引向反对所谓国内的“暴政”上。他煽动说：“暴政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暴政的屈服、沉默或赞美”。（见1989年4月号香港《解放月报》）我们看到，首都学潮很快提出了要求为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平反的口号，学生游行队伍中打出了“打倒暴政”的反动标语，这当然不是偶然的。

人们记得，4月26日，在北京学潮面临下一步怎样走的紧急当口，北京大学三角地贴出了一张题为《致中国大学生的公开信》的大字报。信中为学潮打气说，部分大学生的闹事活动，“已经影响了中国的现在，并必将在更大的程度上影响中国的未来”。并给学潮的组织者出了“巩固已经建立起来的组织联系”，“出版自己的通讯或其他出版物”，“加强与其他社会各界的联系（包括工人、农民、市民和知识分子）”，“争取

他们的支持和参与”，以及“努力落实校园内的自由”，包括“建立充分自治的各种社团”，“巩固校园内的表达自由（校内民主墙、大字报、学术讲座上的各种辩论会等）”，“随时准备采取从贴大字报到游行、罢课等方式”等七条主意。这些主意的绝大部分都在其后的学潮乃至动乱中被采纳运用了。这封公开信，就是由刘晓波4月22日在纽约起草并伙同“中国民联”头头胡平、陈军等10人签名，在美国报纸发表后迅速传回北京的。也许刘晓波感到，远隔重洋操纵国内的学潮不够得心应手，于是便接受“中国民联”的派遣。于4月27日匆忙由纽约赶回北京。本来刘晓波向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写信，讲他应哥伦比亚大学邀请去讲学，到1990年才回国。可是5月初信到北师大时，他人早已到了天安门广场了。善良的人们也许会问，他是不是匆匆赶回来参加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活动呢？绝对不是的。这一点他在《世界日报》一篇文章中说得明明白白：“听到胡耀邦逝世的消息，除了淡漠，我没有其他感觉。”他的突然提前回国，完全是为了直接插手学潮。

据悉刘晓波在回国前，曾与胡平等就北京学潮事做过多次商谈。刘在临行前，陈军特地给北京四通公司打电话告知了刘所乘坐的航班，要求“四通”派车去机场接刘。并说，倘若刘在机场被捕（可见其作贼心虚），一定要把消息及时告知“中国民联”。从这里，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民联”对于刘晓波的回国插手学潮何等关心备至并且寄予厚望。

另据有关人士透露，刘晓波回京后，立即与“高自联”的头头、刘的好友吾尔开希以及王丹等人接上头，并向他们和“北京师范大学学生自治会”转交了他与王炳章（原反动组织“中国民联”头头、新组建的中国民主党党魁）等人所“捐赠”的

数千美元和万余元人民币，作为学潮活动经费。其后，刘晓波在天安门广场积极参与了“高自联”指挥部宣传、撰写、讲演、募捐等活动。他除负责“广场之声”的组稿、编辑，多次发表对学潮形势的演讲以外，还负责非法组织“首都各界联合会”的筹建工作。当广场绝食学生中有人表示要退出绝食时，刘晓波还恶狠狠威胁说：“你现在一走就是叛徒，我们现在没有别的后路可走！”

在这段时间里，刘晓波十分忙碌。他起草并散发了《致北师大党委的公开信》、《告海外华人以及一切关心中国问题的外国人士书》等等，继续扰乱视听，极尽蛊惑人心之能事。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以后，刘晓波更加紧了他的罪恶活动。5月23日，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在动乱中心天安门广场，出现了一份题为《我们的建议》的反动传单。这份传单一时甚嚣尘上，被某些人奉为“指导学潮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传单把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合法政府诬蔑为“伪政府”，发出了“伪政府必须辞职，李鹏必须下台”的叫嚣；把北京市部分地区戒严歪曲为“军管”，煽动“全社会的总动员”，以求“瓦解军管”，鼓动“国营企业的工人们”成立“真正代表工人利益的自治会”；煽惑“民办企业”要公开提出“企业的完全私有化”，以使“产权明确为私人所有”；他还肆意挑拨国内“八个民主党派”同中国共产党的多党合作关系，妄图煽动它们脱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计划地公开地明确地向政府提出独立的参政要求，进一步成为真正的具有独立权利的民主党派”。现已查明，这份以非法组织“北京师范大学学生自治会”的名义抛出来的旨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反革命宣言书，根本不是师大学生写的，而是出

自刘晓波的手笔。由此可见刘晓波这只黑手同北京这次学潮及动乱的关系是何等的密切。

随着事情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看清了动乱的实质,许多大学生从天安门广场撤退出来,大量外地学生返回本校,北京市民和解放军戒严部队的关系日益融洽,形势在向好的方面发展,但是一小撮幕后策划和操纵者不甘心就此收兵,社会上的地痞流氓和一切反动势力也不愿事态就此平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制度反人民之心不死,还要进行拼死的较量。在这样的形势下,刘晓波气极败坏地从后面跳到了前台。他在煽动大学生继续绝食和组织1000至5000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绝食之举流产以后,便亲自出马纠合了四通公司的两名职工,找上一位词曲作家,大喊大叫地来到天安门广场,搞所谓48—72小时的有限度绝食。他们不仅用这样的实际行动来煽动一部分学生和市民在天安门广场长期闹下去,扩大事态,为这场动乱打强心针,而且借机发出了暴乱的呼喊。在6月1日的演讲中,刘晓波就别有用心地说什么:“我希望通过我们的这次行动,结束中国知识分子几千年的只动口不动手的软骨症!”要他的信徒们丢掉“软骨症”,放弃“只动口不动手”的积习。他们到底要干什么,刘晓波自己的话说得清清楚楚。在这篇演说的最后,他叫嚷:“……今天在白色恐怖下,我们之所以站出来,是重新唤起全北京市民的信心。我们有能力、有信心主宰中国!”怎样“动手”以“主宰中国”呢?据香港某报发表的、他在6月2日与“一位大陆民运领袖”的会谈中说,我们就“必须在人民之中组织武装部队”。如果善良的好心人对他们要组织反革命暴乱的阴谋还有怀疑的话,那就请听一听刘晓波这段“对谈”吧。

历史是不以反动派的意志为转移的。刘晓波之流“主宰中国”的呼喊，不过是一场空想。人民，只有人民，才是中国这片土地的主人。

（原载1989年6月24日《北京日报》）

刘晓波要的是什么样的“自由”？

穆 强

“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罗兰夫人针对她那个时代的时弊，曾经说过如此愤慨的话。

自由，确是个美好的字眼。但正如许多美好的字眼被心灵并不那么美好的人拿来遮掩、装饰自己一样，自由这个词儿，也历来多遭蹂躏。君不见许多横暴的强徒、政治野心家，也都往往祭起这面旗帜来。在这次反革命暴乱中跳得那么高的刘晓波，就经常侈谈“自由”。

今年4月，刘晓波欣然接受了反动组织“中国民联”的派遣，急不可待地从美国飞到北京，又发挥了他的“黑马”作用，策划密谋，又写又讲，言为称“自由”，最后竟然跑到天安门广场那个“自由女神”像下，煞有介事地搞起“七十二小时”绝食来了。请看，刘晓波是个多么勇敢无畏的“自由”斗士啊！

刘晓波是在争“自由”，可他要的是谁的“自由”，是什么

样的“自由”呢？去年10月，他在王元化（建议授于刘晓波博士学位的领銜人）主编的一个叫作《新启蒙》的丛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用大量的篇幅大讲“自由”，用坦率的语言对他心目中的“自由”作了一番夫子自道。

刘晓波在这篇文章中写道：“尽管自由是最美好最高超的追求”，但是，“真正的”自由，“只属于极少数精英”。他说，“现在，中国人喜欢谈自由，一谈起自由便甜滋滋的”，殊不知，“即便从整个人类的角度看，能够获得自由的人也极少极少。”他认为，“自由的可贵不在于人人都能实现，而在于大多数人都无法实现。正因为只有极少数人能走向自由，自由方显得价值连城。”

这[？]就很清楚了。刘晓波们口口声声所鼓吹的“自由”，原来是“极少极少”的“极少数精英”的“自由”。这种“自由”，“大多数人都无法实现”，而这又正是这种“自由”的“可贵”之处。换言之，他们要争得要实现的这“极少数精英”的“自由”，是建立在“大多数人都无法实现”自由的基础之上的。他们不是要推翻党的领导，颠覆我们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实现“精英治国”吗？当这“极少数”的“精英”真个得到了“治国”的“自由”之后，他们也就真个地让“大多数人都无法实现”自由了，他们就要真个地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了。

那么，刘晓波和他们这“极少数精英”们，又打算怎样去获取只属于他们的“自由”呢？

刘晓波在文章中强调：“自由是一种最危险、最痛苦、需要付出最大代价的追求”，甚至要“以付出生命为代价的”。他认为，“自由”是“冒险”，“是用整个生命做赌注去与完全陌生的人们赌博”，而且是“社会中的全体人都在阻止你的”“力

量悬殊的赌博”。然而，他又强调“自由”“只属于极少数精英”，争“自由”“是天才的事业”。毫无疑问，这“极少数精英”是不会“付出生命”去“冒险”的。他们还要等着获取“自由”的成果——去“治国”呢。他们要去“赌博”，“赌注”是什么呢？是别的“大多数人”。刘晓波直言不讳地说：“社会是什么？人们是什么？是乌合之众。”他们就是要“社会”上的“人们”，用这些他们所认为的“乌合之众”去“做赌注”！回顾一下，他们利用学潮发展到动乱以致制造反革命暴乱，不就是以广大受蒙蔽和蛊惑，在天安门广场静坐绝食的青年学生为人质，用他们的“生命为代价”、“做赌注”吗？刘晓波最后竟亲自跑去“绝食”，无非是为了把学生稳住，把“人质”扣紧，把“赌注”押牢，希望进行并企图赢得一场更大的“赌博”。

刘晓波一伙不是一般的赌徒，而是一伙野心勃勃、天良丧尽的政治赌徒。在上述那篇文章中，刘晓波写道：“象卢梭和尼采”，“这两个人追求自由的代价都是背叛整个人类。”他充满敬意地赞佩卢梭“这个人”，“他不能容忍”“任何人”，“他就是敢去”“触犯社会的道德信念”！“再如尼采，人类在他眼中只是一堆废料、庸才。科学、理性也好，上帝也好，凡是被大众信奉的东西他统统不信，统统加以否定”。这一切，都使刘晓波十分景仰，十分感佩，奉若经典。

事实上，他们利用学潮制造动乱和反革命暴乱，其动机、效果和手段，正是象他所说的，“象卢梭和尼采”那样，为了追求“只属于”他们那帮“极少数精英”的“自由”，他们确实“敢去”“触犯社会的道德信念”，完全“否定”广大的人民“大众信奉的东西”，与社会作对，与大众作对，与人民作对。他们制造了混乱，社会便不得安定，人民群众便不得安居乐业。他

们堵塞了交通，社会便几乎陷于瘫痪，人们便不能上班，不能出门，甚至一度买不到生活日用品，生病难以及时就医，有急事也寸步难行，连粮食、煤气的运输也因交通受阻而供应告急！他们占领了天安门广场，正常的国事外交活动便不能进行，人们便不能到广场去游览，连孩子们一年一度的“六一”儿童节活动也不能在广场进行。他们不断散布谣言，到处挑起事端，甚至制造恶性事件，便使得好端端的首都失去了应有的秩序，失去了安宁，失去了繁荣与活力，使人们一夕数惊，不但不能正常地工作、学习、生活，而且失去了安全感……两个多月里，人们对这些不都是深感之、身受之的吗？是的，他们“追求自由的代价”就是与社会作对，与人民为敌，不惜“背叛整个人类”！为了实现他们这些“精英”的自由和“天才的事业”，他们就是这样公然践踏全社会和人民的利益。如果他们的罪恶目的得逞了，他们得到了统治和奴役人们的自由，那些在他们眼中不过是“乌合之众”，“是一堆废料、庸才”的人民大众，即永远不能获得“自由”的“大多数”人，将在他们“自由”的大旗下如何生活和生存呢？

刘晓波之流的“精英”们要的就是这样的“自由”。如今，他们蓄谋已久的制造血腥的“赌博”的阴谋以失败而告终了。冷静回顾一下，善良的人们会得到许多教益的。

(1989年7月)

爱钱与舍财——刘晓波侧影一帧

凌 阵

报载：刘晓波四月底从美国赶回北京后，立即同反动组织“高自联”的头头吾尔开希、王丹等人接上了头，并向他们和非法组织“北京师范大学学生自治会”转交了数千元美钞和万余元人民币。原来这笔款，是他和原反共组织“中国民联”头头、新组建的“中国民主党”党魁王炳章一起“捐赠”用作支持学潮经费的。

笔者读到这里不觉愕然：刘晓波如此出手大方，慷慨解囊，所为何来？

记得国内有家杂志描绘刘晓波的习惯时说，“他小心眼，从心底里自卑、爱钱、喜欢谈性、满嘴脏话。”

如果说这番形容还嫌抽象的话，那么香港《解放月报》1988年12月号上刊登的访问记《文坛“黑马”刘晓波》：那上面记叙的刘晓波的答记者问，却不啻为刘氏一幅嗜财如命的自画相。他说道：“我讲演时，别人来请教，我就说不向任何人教任何东西……我为甚么演讲，一是自我感觉好，二是为了挣钱，不给够一小时多少钱，我就不去。钱是一种自我评价，有了一定数量的钱，你的生命也就随着开放到一定的广度的。”

这里，在广大读者面前，仿佛站着两个刘晓波——一个爱钱如命，大有“拔一毛而利天下吾不为也”之概；一个则又慷慨“施舍”，一出手即以千百元之计而不惜。两个刘晓波怎能重叠到一起呢？

待到笔者读得关于刘晓波更多的材料之后，这个问题也就不觉得怎么难于理解了。

原来古人早已有言在先，叫作“两利相较取其重”。刘晓波无论是在国外连续摔出反共反人民的“重磅炸弹”也罢，还是风尘仆仆、不辞辛劳从国外赶回北京插手学潮、捐款资助也罢，目的只有一个，都是为了煽动“全社会的总动员”，为了“在人民之中组织武装部队”，推翻人民共和国，建立他们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从而实现他的“主宰中国”的美梦！

刘晓波氏的西洋镜至此可以拆穿了：原来他的暂时“牺牲”一点个人小利，还是为了以此换取今后“主宰中国”为所欲为的大利呀！原来他是两般面孔一副心肝：反动十足的政治“狂人”！“钱是一种自我评价”——刘晓波说得再妙不过了。他在“钱”字上的种种表演，果然赤裸裸地给自己做出了应得的“评价”。

（原载1989年7月4日《北京晚报》，

本书编者更改了原文标题）

奴才卖国嘴脸的大暴露

马润青

历来奴才、卖国者是一帮被人诅咒、唾骂的丑类。然而，

刘晓波真是发了疯了。混蛋！

有人却不以此为耻，反以此为荣。“狂人”刘晓波就是如此。在香港的一次接受记者采访中，此人奴性十足地提出中国“需要三百年殖民地”的奇谈怪论。当记者说他是“十足的卖国主义”的时候，他还恬不知耻地答道：“你要说我叛国，我就叛国！就承认自己是挖坟的不孝子孙，且以此为荣。”一副可耻的卖国主义的嘴脸，表演得多么淋漓尽致啊！

如果说有人在向人们兜售卖国主义货色时，羞于承认自己是在“卖国”，反而把自己装扮成“正人君子”，以售其好的话，那么刘晓波则是赤裸裸地鼓吹卖国主义的反动理论。这既是刘晓波按捺不住的反动思想的自然流露，也是他反党反社会主义带有疯狂性的一大特点。固然，卖国者的不同表演形式，不可不察，但更为重要的是，必须弄清他们共同的反动实质。从我国近代史上看，大凡鼓吹卖国主义的人，无不把洋人捧上天，极尽吹捧、谄媚之能事，死心蹋地地拜倒在洋人的脚下，洋人放个屁也说成是香的；而对本民族则否定一切，大搞民族虚无主义，竭力丑化、诬蔑、诋毁它，把它说得一无是处，以致不惜出卖民族利益。逃到美国驻华使馆去寻求“保护”的方励之，也亲口表白说：“我每次从国外回来，都恨不得踢中国两脚”，叫嚣要“中国解体、解散”。刘晓波更是拜倒在西方人的脚下，鼓吹全盘西化，声称西方的殖民化带来了“亚太经济的奇迹”，推动了“世界的现代化”。他甚至认为自己“最大的悲哀”是不会用英语说话，“如果语言可以过关，中国会和我根本没有关系”，并扬言不要“拒绝西方的同化”，非要改变中国“人种”不可，他为自己生就的黄皮肤、黑头发而感到羞愧、耻辱。他不仅全面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否定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且从根本上去

定中华民族的历史，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他胡说“中国人缺乏创造力”，已经“从肉体到精神统统阳痿”，中国是“一个非常愚昧、非常庸俗的东西”，而中国的传统文化，“没有人性，只有奴性”，完全是“一堆非驴非马的大杂烩”，就连中华民族引以为自豪的“四大发明”，也被他说成是今天只具有“遮羞布”的意义。这种不加分析地对西方肯定一切，对自己的祖国否定一切的做法，也许是一切卖国主义者所惯有的通病。刘晓波的上述怪论，绝不能仅仅归结为由于他的形而上学思想方法所使然，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一屁股坐到国际反动势力一边去了，完全站在中国人民的对立面上去了。

刘晓波赤裸裸地贩卖卖国主义货色，也并不是说他没有一点伪装。他为说明自己“叛国有理”竟引用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一句有名的话：“工人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其目的不外是使自己的私货更具有迷惑人的理论色彩而已。其实，马克思的这句话并不能帮他的忙，反而说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肆意歪曲和篡改。马克思所说的“工人没有祖国”，包含有两层意思：一是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各国工人阶级的经济状况，他们的阶级敌人，他们的解放条件都是国际性的，他们的团结比民族团结更为重要。二是指“祖国”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应该用历史的观点、阶级的观点分析它。一些被压迫被奴役的民族，在为推翻民族压迫，争取民族解放，求得国家独立而斗争的时候，被压迫的工人阶级，应当英勇地保卫祖国；在民族解放运动已经成为过去，资产阶级已变为本国的统治者，国家完全被资本家阶级所控制的情况下，这时的工人阶级，实际上已不再有自己的祖国；只有当工人阶级在本国夺取了革命胜利，上升为本国的统治阶

级的时候，“祖国”才成为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真正的祖国。在新中国成立四十年的今天，在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已经成为国家的主人，并为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美好的未来而奋斗的今天，刘晓波居然歪曲马克思话的原意，无条件地运用“工人没有祖国”这句话，显然是为其险恶的政治阴谋服务的。他当然不是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无知，而是出于对马克思主义别有用心曲解，其目的是为自己的卖国主义哲学涂抹上一层理论色彩，为国内外反动势力效劳。

今天，我们的祖国已经进入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各条战线上的广大人民群众，一方面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为振兴中华，建设祖国，保卫祖国而奋力拼搏；另一方面又积极协助党和政府克服发展中的困难，使改革、开放继续沿着健康的道路发展下去，努力夺取新胜利，把祖国装点得更加美好。港、澳、台的广大爱国者，以及绝大多数的海外侨胞，也都在为祖国的日益繁荣、强大，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而感到自豪，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尽心尽力，为实现祖国的最终统一而奔走呼号，这是一种多么可贵的爱国主义精神啊！

就是在内忧外患的旧中国，无数爱国志士，满怀爱国热情，为了中国人民的独立和解放，前赴后继，奋起斗争，谱写出一首首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诗篇。吉鸿昌将军就是一位充满爱国激情的赤子。有一次，吉将军被国民党政府派往美国进行考察。一天，他和国民党驻美使馆的一位参赞去邮局往国内寄包裹，当邮局的职员知道他是中国人时，便轻蔑地说：“中国？我不知道，哈哈……”随行的参赞埋怨吉将军不该透露自己是中国人，吉将军激愤地说：“你觉得做一个中国人丢

脸吗？我觉得做一个中国人光荣得很！我吉鸿昌誓死不当洋奴！”他回到住处，当即写了一块“我是中国人”的牌子，佩戴在胸前，昂首挺胸地出入于美国人之中。他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充分显示了中华儿女的伟大民族气节，表达了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相比之下，今天大叫以“挖祖坟”为“荣光”、一头栽进外国反动势力怀抱中去的“不肖子孙”们，显得何等的渺小啊！如果把现在的和以往的爱国志士比做喜马拉雅山一样崇高的话，那么，那些以“叛国”为荣光的“不肖子孙”们不过是这座高山脚下的一坯粪土。他们在反党反社会主义、颠覆社会主义祖国的活动中，大骂中国广大知识分子患有“软骨病”，藉以标榜自己那种反党反人民的“反骨”。事实是这些骂别人有“软骨病”的人，在其外国主子面前，摆出的那副令人作呕的洋奴相，才是真正的“软骨病患者”，甚至可以说是“断了脊梁骨”的廉价奴才。

刘晓波等人的本来面目，原来如此！

（原载1989年9月8日《工人日报》）

析刘晓波的《河殇》观

徐 颖

信不信由你，一向以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而蜚声文坛的“黑马”刘晓波，竟对字里行间流淌着自由化毒液的《河殇》颇

有微词。他在1988年11月27日，接受香港《解放月报》记者访问时，给《河殇》下了“也没甚么东西”的断语。

按说在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大合唱中，他们是同一个乐队的。无论方励之、刘晓波，还是苏晓康，都在用各自的乐器卖力地吹奏着。他们或者运用文章、演说，或者运用电视画面，使尽看家本领，不遗余力地鼓噪着资产阶级自由化。他们实实在在是志同道合的。但是，为什么刘晓波偏偏对《河殇》瞧不大上眼，这岂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了吗？稍一琢磨也不难理解。原来，刘晓波所不满意的归结到一点：《河殇》对中国文明否定得不够彻底，还“不是彻底承认中国落伍和失败”。且看刘晓波如下的见解：

尽管《河殇》断言，“(中国)文明毕竟衰落了。历史的富足，文明的悠久，毕竟都是昨天的故事”，“亚细亚的太阳陨落了”，卖劲儿地鼓吹民族虚无主义和悲观主义；刘晓波却认为还不够劲儿。在他看来，中国从来就没有过什么富足的历史，悠久的文明，亚细亚的太阳从来就没有升起过。面对西方民族和西方文明，中国人有什么？“中国人只有一堆非驴非马的大杂烩”。

尽管《河殇》已经把中国文明贬抑得一无是处，说什么“崭新的文明，它不可能再从黄河里流淌出来”，“单靠这片黄土和这条黄河……已经孕育不了新的文化”，“这片土黄色的大地不能教给我们什么是真正的科学精神”，“肆虐的黄河不能教给我们什么是真正的民主意识”，透过黄色文明与蓝色文明的对比，得出了中国必须“走向海洋”，即必定要“全盘西化”的结论。然而你苏晓康把东西方文明放在一起对比，这压根儿就错了，因为东方文明根本就算不上什么文明，根本就

有资格同西方文明对比较量，所以两者“并未构成冲突和对抗。”所谓“冲突、对抗”云云，只不过是“证明了中国民族根深蒂固的虚荣心”罢了。中国出路何在？刘晓波的药方是：“三百年殖民地”！理由嘛，“香港一百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么大，当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哩。

《河殇》用了一些很亢奋的画面，比如一开始的舞龙场面，“拍得激昂，很有力量”。这也惹起了刘晓波的老火不快。他说：“如果我拍的话，我会拍出中国人如何的萎缩，软弱和‘操蛋’，而不加一句解说。那些画面表现的精神状态和中国人99%的萎靡状态差得太远了”。刘晓波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即《河殇》的制作者哪怕出于不得已而为之的理由在画面上稍微涂上一点点亮色，那也是不能容忍的。

在刘晓波看来，《河殇》中的潜意识还是说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姑且不论这个判断是否准确）。这自然也是刘晓波断乎不能接受的。原因嘛，刘晓波早就说过，“中国人从肉体到精神统统阳痿”了！

其实，刘晓波还是心平气和一些为好，大可不必对《河殇》动那么大的肝火。你们之间打法不同罢了，为啥不能体谅一下苏晓康的苦衷呢？《河殇》要上屏幕，不得不将那些赤裸裸的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张稍微掩饰一下，配上几句装饰用的言辞。而你刘晓波的惯伎是破口大骂，一骂到底，脏话连篇，语不骇誓不罢休。如果说，苏晓康所用的是艺术的哲理的语言贬损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的话，刘晓波无非是市井无赖般地辱骂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就是了。然而，《河殇》也罢，对《河殇》颇不满意的刘晓波的高论也罢，都有一个绝好的用

途：用作中国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不可多得的反面教材。

(1989年7月)

西化、人化和换“种”

华多

全盘西化的主张，近几年来，着实很热闹了一阵子。其间，前有方励之，后有刘晓波，是为鼓吹最卖力的一伙人中两个突出代表。他们不仅一脉相承，同声相应，而且，愈演愈烈，越说越玄：从境内游说到海外，从“西化”扯到了“人化”，进而归结为“人种”，大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架势。

方先生的主张，人们已经相互熟悉了。好几年前，他就打着开放的旗子贩卖私货：说什么“应当全方位开放或者叫全盘西化”，“包括我们的政治体制、所有制”，他扬言：“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只能引我国于死胡同”，“必须走资本主义道路”，如此等等。他咬牙切齿地声称“恨不得踢中国两脚”之后，恶狠狠地说：“中国不是要解放，而是要解散、要解体。”愤懑之情，溢于言表。

这副地地道道的卖国嘴脸，这些毫不掩饰的灵魂叫卖，确实够骇人听闻的了。但我们要说，还有甚者！

1988年11月，刘晓波从挪威去美国夏威夷途中，在香港停留时，接受了《解放月报》记者采访。他淋漓尽致地渲泄了一通，刊于该刊1988年12月号上。其中，谈到“西化”的问题，有一段惊世骇俗的“妙语”。记者问：“你是否同意全盘西化？”刘答：“这是无可争议的”，“全盘西化就是人化、现代化，选择西化就是要过人的生活，西化与中国制度的区别就是人与非人的区别，换言之，要过人的生活就要选择全盘西化，没有和稀泥及调和的余地。”

在这里，刘晓波已经明明白白地把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吹捧为人的世界，而把社会主义的祖国糟蹋为非人的世界了。“西化”云云，绝不是就科学技术说的，而是专指与“中国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的对立；“全盘西化”也者，自然是摒弃社会主义制度，而全面实现资本主义制度了。这一点，刘晓波比起他的同道们要坦诚得多、直率得多。作为一个帮助我们弄清什么是“全盘西化”的教员，我们倒要好好谢谢刘晓波先生哩。

然而，所谓西化与中国制度是人与非人的对立，当然是颠倒是非，信口雌黄。不错，中国这块土地曾经是非人的世界，是豺狼当道、野兽横行的世界，但那是四十年前，人民处于被压迫被奴役地位的旧社会，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不需多少学问就能明白。把今天光明的中国看作黑暗的中国，把社会主义制度说成非人的世界，则出自那些丧失了把人民役作非人特权的大人先生们，或者站在他们一边的形形色色的代言人们，这也是人民共和国四十年历史证明了的事实。

至于把西方资本主义颂为人的世界等等，也至少犯了个常识性的错误：西方世界并不是统一的，它起码包含富人的

世界和穷人的世界两大块。那里是不是人人都过“人的生活”（岂止“人”，在刘晓波们眼里，简直是“神仙”般生活），要由那些浪迹于寒风里、蹒跚在地铁站的失业者来回答，要由住在美国纽约哈莱姆区的黑人们来回答，要由1968年饮弹身亡的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荣德·金及其后继者们来回答！依据常理推断，他们恐怕不曾委托刘晓波们来代作判断、代行回答的。

“要过人的生活就要选择全盘西化”。刘晓波把它作为绝对真理喊了出来。我们姑且不说“全盘西化”就只能全面西方附庸化，只能是国家民族的被奴役化。退一万步说，“全盘西化”就是“人化”和“现代化”，是不是刘晓波就果真在为中华民族着想，为生他养他的父母之邦着想呢？我看不大像。据知情者反映，刘晓波在多次演说中，公开提出中国的“人种不行”。在这次接受《解放月报》记者的采访中，他对此也直言不讳。比如：当记者谈到探索中国落伍的原因，有人对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提出批评时，刘晓波直截了当地答道：“我说过可能与‘人种’有关。我绝不认为中国的落伍是几个昏君造成的，而是每个人造成的，因为制度是人创造的，中国的所有悲剧，都是中国人自编自导自演和自我欣赏的……”当问及中国人“在人种方面，同西方民族有甚么差异”时，刘晓波在大大地称颂了一番西方民族之后，鄙夷地说：“中国有什么？中国只有一堆非驴非马的大杂烩。”

这就是说，中国的人种就不行！人化的生活等等，不是留给你们的！人家刘晓波先生脑袋里想着换“种”哩！

善良的人们也许原本以为“全盘西化”论者是为了中国的发展和进步，药方虽然不对头，但救治的愿望总是好的。现

在该明白了，不，满不是这么回事！无论方励之，还是刘晓波以及严家其之流的“精英”，他们骨子里都是蔑视这块古老的土地，鄙视自己黄皮肤的同胞，才匍匐在洋大人面前，阿谀献媚，自轻自贱，以至于想要毁祖灭宗、改“种”换类的！

人种不行怎么办？自然是更换。如何换？没说，但这里至少遇到两个问题：一是现存的劣种、蠢种如何处置；二是优良的新种由何产生。刘晓波一向标榜“我最佩服希特勒”。我们不禁联想起这位刘先生崇拜的法西斯头子在“人种”问题上的创造发明来了。希特勒宣称日尔曼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犹太人则是劣等民族。为了“人类的利益”（刘晓波先生用的是“人类的选择”），对于犹太劣种，采取的是抓进集中营，用枪扫、火烧、毒气熏的办法，斩尽杀绝。新种呢？据说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日尔曼（也许还包括一些非犹太人的二等民族）姑娘要24小时敞开大门，随时接纳士兵，让这些日尔曼民族的优秀子弟来“播种”，果真受孕了还有奖赏呢。

不知刘晓波氏作何打算。既然人种不行，现有的劣种、蠢种通通在清除之列是无疑的了。新种呢？是现有的劣种无论男女老幼一扫而光，然后腾出他来恭迎西方优秀民族移民（应读作殖民），还是网开一面，姑且留下黄皮肤姑娘，让移民（殖民）者“播种”，来点“杂交优势”，庶几使半拉子的炎黄子孙也过过人的生活？——但必须提醒刘晓波先生一句：无论哪种方案，刘先生作为黄皮肤的劣种、蠢种的一员，都在清除之列的。

《资治通鉴》载：唐武则天时代出了两位有名的酷吏，周兴和来俊臣。周兴犯了事，武后令来俊臣审讯。来故意请教周兴：“犯罪不招供，当用何法？”周兴说：“这事容易，取大

瓮，四周用火烤，让囚犯坐进去，没有不招的！”来俊臣令下人准备大瓮、炭火，然后说：“有人告下你了，招是不招，请入瓮！”周兴吓得立即叩头认罪。如今，面对刘晓波先生“人种不行”的喊叫，实在没法子，只好按刘先生自己的逻辑来个“请君入瓮”。阁下，您也屈居劣种行列，您就聽着办吧！

（原载1989年7月26日《北京日报》）

吾尔开希，男，1968年2月生，维吾尔族，新疆伊宁县人。1988年9月，他进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读书，品学兼劣。在这次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中，他充任“北京高自联”头头。1989年6月3日晚，他在海外特务组织掩护下偷渡出境，叛离祖国。

吾尔开希真面目

石 青

北京发生学潮和动乱以后，吾尔开希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了新闻人物，西方一些记者追踪采访，有的还吹捧他为“学运领袖”“民主英雄”。一个一年级大学生何以受到海外资产阶级传播媒介的如此垂青？主要是因为他在今年四月中旬以后的这场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中，作为组织者与策划者进行了拙劣的表演，如今吾尔开希已叛逃国外，充分暴露了他的可耻面目。现在让我们看看这个所谓“民主英雄”“学运领袖”究竟是个什么货色。

吾尔开希最初煽动学潮，并非像他自己标榜的什么“反腐败”或“忧患中国教育的危机”，相反，他自己倒真正面临

两种危机：一是入学不到一年，他就有三门功课不及格（生理学42分，数学52分，外语57分）面临被勒令退学的危险；二是他倒卖皮毛亏了7000元，债台高筑。这两个危机搅得他惶惶不可终日。当老师问他下一步怎么办时，他闪烁其词，一会儿说“学不下去就退学”，一会又说不能这么回去还要“挺一下”。直到他与同伙挑起动乱，本人也登上“高自联”主席的“宝座”，他似乎还余悸未消，在宿舍里说：“这次干好了就好了，就是回去也荣耀。”

接触过吾尔开希的人也不难了解，此人虽专业知识、历史知识、理论水平极差，但他那种强烈的权力欲和自我表现欲却非他人所能比。进入北师大后，他曾两次争当系、校学生会干部，均因他平时经常旷课、私自倒卖引起斗殴、学习成绩太差等被否决，为此，他曾找到系领导质问“我怎么就不能当干部”。他自封为“自治会主席”，无疑是这种权力欲的一种满足。有一次，一高年级学生进入他的宿舍，他很得意地对这个同学说：“你信不信，我叫他们（指宿舍里的同学）干什么他们就干什么。”随即他叫一个正躺在床上的同学“×××站起来”，那个同学“腾”地站起来，他又说“坐下”，那个同学又坐下。

当然，吾尔开希是不满足这些“小打小闹”的，随着动乱事态的发展，他头脑中极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恶性膨胀起来，一出出拙劣的表演使他逐步走向反动，并因此而成为名噪一时的“乱世英雄”。

二

吾尔开希第一次在北京大学生面前亮相是4月19日，他率领一些人冲击新华门。为把事情弄大，他在静坐的学生前

面不停地演讲，煽动大家“不要离开”，“要静坐到天亮，天一亮就有北大学生来支援我们了”。他面对阻拦他们的非法行为的武警破口大骂：“你们是狗，政府的狗！”在新华门前被驱散返校之后，他开始大造“4.20血案”的谣言，说自己身上挨了打，鼓动同学上街游行。但当同学问他哪儿挨打时，他却说不清，也不肯脱掉上衣让大家看。

之后，他便更加兴风作浪，组织和策划这场动乱与暴乱，请看下面事实：4月21日，由他挑头成立了非法的“北师大学生自治会”，自任主席后第一件事便是宣布废除合法的学生会和研究生会，要求各系学生会“交权”。

接着他又当了以悼念胡耀邦同志为名义的4月21日晚开始的大游行及在天安门广场静坐的直接指挥者。这次静坐他再次使用了造谣的看家本领，他拿着手提扩音器向在场同学们宣布：“（人民大会堂）里边传过话来，李鹏总理12点出来与我们见面对话，请大家耐心等待。”结果，引得几万学生翘首盼望。到了12点45分，他又鼓动说：李鹏欺骗了我们！随即领着学生们向人民大会堂冲击。

4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的发表着实使吾尔开希乱了一阵手脚，然而等到4月27日“黑手”刘晓波由美国返京，在他的引导下，吾尔开希直接与动乱的幕后策划者严家其、万润南等接上线以后，他便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又被充足气，重新蹦跶起来。

刘晓波回京立即向他转交了反动组织“中国民联”头头王炳章等人所“捐赠”的数千美元和万余元人民币。刘晓波等人不断向吾尔开希面授机宜，介绍动乱策划者们的理论观点和政治纲领，使得吾尔开希“大开眼界”。他曾私下对人说：

“现在我的理论水平大有长进。”

让我们看看吾尔开希的“长进”吧：5月14日，在与法国《费加罗报》记者谈话时说：“政府是一个由坏蛋和腐败分子组成的帮……党和政府是一回事，要反对政府就必定要反对党。”坚持党的领导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目前不团结的最大政治因素”。他还明确表示，一定要逼迫党和政府承认“高自联”的合法性，在中国建立起政治上的反对派。

在回答西方记者提问时，他称“民主就是大多数人能按自己的选择去行动”。可在5月18日，在与李鹏总理对话时，他又说：天安门广场绝食的学生不是1%服从99%，而是99%服从1%，应该说这一阶段吾尔开希确有“长进”，他的反动手腕越要越滑，制造动乱的胆子也越来越大。5月13日，吾尔开希和动乱的制造者们煽动学生进行“绝食”，妄图逼迫党和政府让步。5月18日，在与李鹏总理的对话会上，吾尔开希提出两点要求：承认动乱是爱国民主运动，承认“高自联”为合法组织。并要挟：满足了上面两条要求，才可以尽量说服同学将绝食改为静坐。也就是说即使政府在原则问题上让了步，他们也没有打算撤出天安门广场，而且还要继续搞下去。在回答法国记者问时，吾尔开希毫不掩饰地说：我们的要求远远多于现在提出的三、四个条件，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要求，我们必须逐步前进。

5月20日，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后，吾尔开希多次到社会科学院政治所去参加严家其、苏绍智和王丹等人组织的“北京知识界联合会”和“北京高自联”的联席会，策划对抗戒严令的统一行动。他们派出人四出堵截军车，破坏戒严令的实行。他还通过一些渠道与掌握党和国家机密的人取得联

系，为反革命夺权和反革命暴乱制造舆论。5月21日，他在北师大的一次演说中鼓动：“再坚持三天，一个光明的、从未有过的政府就会诞生。”

在24日以后的几天中，由于党和政府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北京局势趋于缓和，戒严部队与北京市民关系日益融洽，天安门广场静坐的学生越来越少。这使吾尔开希和他的同伙们深感不安，于是他们便下定决心作最后的挣扎。6月1日，吾尔开希对市民广播说，“天安门广场旗帜依然飘扬，有400多所学校（在那里），我们没有理由中途退出”。同日，他与刘晓波、万润南晤谈一中午，对下一步行动作了策划，导演了一场4人绝食的闹剧。

6月3日，面临灭顶之灾的动乱头头酝酿着最后的顽抗。这天晚上9点30分，吾尔开希在北师大自治会广播合作了他在叛逃前最后一次“表演”。他在演讲中煽动说，现在是考验每个共和国公民的时候，每个人在今天晚上都必须做出郑重选择。我呼吁大家今天晚上到天安门广场去！他大言不惭地说：“我今天下午在天安门广场向全国颁发了紧急动员令。”一些同学在他的煽动下到西单路口去参与堵截军车，其中少数人付出了血与生命的代价。他们当然不会知道，他们遵照“领袖”的号召去“冲锋陷阵”，可“领袖”却早已溜之大吉。

三

溜出中国大陆，吾尔开希等人便一头扎进了国际反共和反华势力的怀抱。为迎合国际反华势力的需要，吾尔开希在国外各种场合继续编造谎言。在接受“美国之音”一次采访中，他又重弹“血洗天安门”的老调，说什么天安门广场死了三千多人，整个北京死了几万人，还说什么“天安门广场上‘高

自联’的纠察队员几乎全部都被打死了”。在此之前接受法新社记者的采访中，他煞有介事地说，亲眼目睹了解放军屠杀一批又一批大学生。

吾尔开希等人继续做着有朝一日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推翻社会主义政府的美梦。7月，他与其他反革命暴乱的在逃通缉犯一起，参加了所谓“民主女神”揭幕仪式，他在法国、美国，宣称“有一天要将自由女神像竖立在天安门广场”。在美国他明目张胆地叫嚣，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推翻中国的坚持社会主义的政府，建立起资产阶级的“自由”的社会制度。

既要反共和反社会主义，就不能不向国际反动势力摇尾乞怜。7月底，吾尔开希在台湾人吴英毅的搓合下，与台湾反动势力头目、中国国民党海外工作委员会主任郑心雄握手言欢，合影留念，以求“可靠又独立的经济来源”。在拜见几位反华的美国国会议员时，他竟无耻地建议美国和其他反华势力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和外交孤立。8月1日，他又跑到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前进行挑衅，拿着手提式扩音器跳着脚地进行谩骂。吾尔开希预言，他们的“民主运动”要在“三年内取得胜利”……

然而，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历史绝不会按照反动势力的意愿去发展。吾尔开希及其同伙们错误地估计了形势，错误地估计了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力量。随着这场反革命动乱和暴乱的真相日益大白于天下，不仅广大中国人民和广大青年学生看穿了他们的丑恶嘴脸，国际社会也越来越对他们采取鄙弃和疏远的作法。一些法国知名人士早在七月份就提出，法国政府接纳吾尔开希等人是“上了美国

人的当”，7月18日，吾尔开希、严家其等人在巴黎召开记者招待会时竟然无人充当其翻译，使招待会不欢而散。在美国，吾尔开希等虽受到一些国会议员们的支持，在白宫前却吃了闭门羹。不仅布什总统不予理睬，就连原来应见的奎尔副总统的接见也化为泡影。

眼下，吾尔开希在西方反华反共情报机构的庇护下，正在国外阴暗的角落里做着妄图推翻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黄粱美梦，但同所有历史上的跳梁小丑一样，他们终究逃脱不了可耻的下场！

（原载1989年8月29日《中国教育报》）

吾尔开希在美国 扮演了什么角色？

魏 谷

自己招认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协助下叛逃到国外的“高自联”头头吾尔开希，于7月下旬从巴黎飞到美国后，顿时间成了那里的“风云人物”，不是“应邀”出席丰盛宴会，就是被抬到大小会场“讲演”，一会儿从芝加哥奔赴华盛顿国会山“朝拜”，一会儿又从东海岸飞到西海岸。美国国会中少数政客、台湾在美形形色色御用组织以及美国和台湾的新闻媒体把他吹捧为“民主斗士”、“民族英雄”等等、等等。

吾尔开希对这一切甚感得意，变得更加目空一切，狂妄

自大。为了报恩，他决心在这个“自由世界”里大大表演一番，其特点是造谣、骂人和空喊口号，大概他认为这样更可“骂龙成名”。然而，动机与效果并非总是成正比，正是他的一系列低劣表演使越来越多的留学生、华侨和美国公众看清了这个政治暴发户既非“斗士”，亦非“英雄”，有些一度“崇拜”他的人也渐渐感到失望。不少正直的美国朋友，爱国华侨，甚至台湾留学生和学者私下里说：“吾尔开希只不过一个爱出风头的跳梁小丑而已。”

政客手中的玩物

吾尔开希从踏上美国国土的那天起，就身不由己地任人摆布。美国政府专门派了安全人员作他的“保镖”，24小时形影不离。甚至他到历来安全措施十分严密的国会给人权特别小组听证会“讲演”时，竟然也有一位安全人员坐在他背后。若不是别有用意，岂非对这个超级大国安全保卫能力的嘲弄吗？

美国少数反动势力、台湾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的一些人以及披着联合报系美加新闻中心记者外衣活动的台湾大陆留学生工作组成员和台湾控制的各种侨社组织，加上反动组织“中国民联”等一伙人，对吾尔开希的活动进行了精心策划。吾尔开希到达美国后头两天，他们故意不让他露面，制造一点神秘气氛，接着就安排他先在美国电视台接受专访，随后由台湾在纽约的喉舌《世界日报》发表文章鼓励他公开活动后，他们就组织了一个又一个“欢迎会”、“讲演会”和“记者招待会”，千方百计钻进白宫和国会去游说美国高级官员出来“接见”，呼吁他们支持吾尔开希等几个叛逃分子反对中国政府的

活动，以达到离间和破坏中美关系的目的。

美国国会中少数政客对吾尔开希的到来也如获至宝，认为又可以利用他投机一番，有的赶忙出来接见，有的颁发“奖章”，有的设家宴陪乘游艇，……吾尔开希这个乳臭未干的跳梁小丑欣喜若狂，咧着嘴笑个不停。一位暂时不希望披露姓名的美国资深记者看到这种情况后一针见血地指出：“吾尔开希这个中国青年只不过是议员们手中的玩物而已。”他说：“这些议员，他们向来是为了捞取选票，既可无视国际关系准则，也可不顾自己的人格和身份，不管什么样的‘风流人物’都可拥抱接吻，只要能保证会后继续登上名利双收的议员宝座就行。”

会见国民党头目决非偶然

7月25日傍晚，吾尔开希自巴黎抵达芝加哥，是为了参加所谓的“全美中国学生学者代表大会”的。可是，他一下飞机，哪里也不去，而是撇下到机场“欢迎”他的大陆留学生，乘车直奔一位所谓的“医生”家里去会见国民党海外工作会主任郑心雄。

据负有“特殊使命”的联合报系记者傅依杰报道，这位自称与当地大陆留学生“较熟”的医生“自愿”驾车送吾尔开希等4人（其他3位是叛逃分子刘燕、苏玮和辛苦）到他家去吃饭。“由于车子只能容纳4人，其他留学生均未随从。在医生家里，吾尔开希见到了郑心雄，并合影留念。”这位“消息灵通”的记者同日在另一则消息中透露，原来这位“医生”并非别人，而是芝加哥台湾同乡联谊会会长吴英毅，他是所谓“美中支援大陆民主委员会”的发起者和组织者，这位外科医生

出身的旅美台湾“商人”最近还表示有意竞选台湾在海外的立法委员。

吾尔开希会见郑心雄的消息很快在大陆留学生团体和广大中国留学生中传开，立即引起强烈反应。国民党特务一看情况不妙，赶忙叫吴英毅出来为吾尔开希摆脱困境献计，说：“最好由吾尔开希自己出来解释，以澄清不必要的误解。”吾尔开希也慌了手脚，害怕这个不可告人的秘密行动一曝光将损害他的“英雄”形象，也慌慌张张地连夜分别打电话给在美国各地中国留学生团体负责人进行解释，诡称他“事前不知情”。

然而，任何遁辞都掩盖不了“会见”的事实。人们不禁要问：既然吾尔开希是应所谓的大陆留学生团体的“邀请”而来，为何不到中国学生团体的接待处去，而心甘情愿地让明知是国民党的侨团头目接走呢？为什么不见中国留学生团体的“负责人”，而偏偏要去见国民党要员呢？

众所周知，郑心雄选在中国留学生芝加哥大会召开前夕专程从台湾赶到美国，就象台湾在纽约出版的《时报周刊》所透露的那样，目的就是来做大陆留学生工作，“支持”他们的所谓“民主运动”。他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还宣布台湾方面已捐助了600万元给大陆留学生，并毫不隐讳地说：天安门事件之后，“国民党做了很多事，只是不懂得自我宣传罢了。”看来这次“会见”原也想只做不说的，只是没有料到很快给透露了出来，弄得十分尴尬。

无知而又狂妄

吾尔开希在一片吹捧声中当上了“政治明星”，到哪里都

把自己装扮成象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处处以学生“领袖”自居，屡次在公开场合自嘲为“1989年最佳布景”。纽约华文报纸《世界日报》报道说，吾尔开希“自信地说自己理论水平高，民运经验够，组织能力强，足以担当领导大任。”

且不说有不少中国学生特别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知道吾尔开希是三门功课不及格的蹩脚学生的底细，就是外国人和华侨看到他这副狂妄的样子也开始感到厌恶。洛杉矶出版的华文报纸《国际日报》在一篇社论中说：“一位台湾的留学生表示对吾尔开希自视过高，开口闭口代表大陆留学生，认为极其反感。”该报在另一篇特写报道中还透露，“许许多多的中国留学生们都不服气吾尔开希”。

尤其令人嗤笑的是他对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那种蛮不讲理的攻击，更暴露了他的狂妄无知。基辛格最近在美国报刊上发表文章，从国际战略格局和美国的长远利益考虑，只是劝导美国政府勿再对中国采取进一步的制裁措施，并讲了几句别人不敢说的话，例如他在谈到天安门事件时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政府会容忍在其首都的主要广场，被几万名游行示威者占领达8个星期之久。”吾尔开希知道这些话对他在国会和其他场所散布的谣言不利，就破口大骂基辛格博士“无耻”、“胡说八道”、“狗屁不通”、“人老了”，等等。基辛格的这些话到底错在哪里，吾尔开希并未说出半点反驳的道理来，却还扬言要和他展开辩论，真是不知天高地厚，自不量力。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访问学者说：“想不到吾尔开希的水平这么差，他除了唱高调、喊口号和谩骂之外，肚子里真没有什么货。象这样的‘学运领袖’，在基辛格眼里只不过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娃娃而已，怎么还有资格参加辩论呢？！”也有人

把他比作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在美国的一些亲台华文报纸在对吾尔开希大肆吹捧的同时，也不得不指出他讲话“前后矛盾”、“观点不很清楚”，在回答问题时，对美国关心的问题“并没有具体思考过”，“以致游说的目标并不是很明确”，等等。《世界日报》对他如此低劣的水平甚为着急，也流露出一点不满，用批评的口气说：要在美国进行有效的游说，“不能靠尖锐的措词和口号”，而“需要仔细拟出投合西方价值观念，具体、诚实的说词”。最近，吾尔开希已表示要到台湾“访问”，也许到那里受训一番可能达到《世界日报》所期望的那种水平。

（原载1989年第35期《瞭望》）

王丹，男，1969年2月生，祖籍山东鄆城，北京市人，1987年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学习，因考试成绩不及格，于1988年转入历史系。1989年春，他因在北大新华书店偷书行窃，受到记过处分。1988年“五四”以后，他组织“民主沙龙”，在大学生中积极传播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这次动乱中，他成为“高自联”的头头。1989年6月3日凌晨，他从天安门广场悄然溜走；暴乱平息后，畏罪藏匿。6月13日，公安部对他发出通缉令；7月中旬他被抓获归案。

“我决心将王丹的情况告诉你们”

《北京日报》编辑部：

我是一名大学生，昨天在电视中看了在崇文门被害烈士崔国政情况的报道，内心受到强烈震撼。回想近两个月来的事情，内心无限的愧疚。中国的群众太善良，中国的军人太善良，中国的绝大多数学生也太善良。为了不让善良的人们再做无谓的牺牲，经过痛苦的抉择，我决心将王丹的情况告诉你们，让大家别再“善良”下去了。

我原本不认识王丹，只听说他学习成绩很差，从国政系蹲班一年到了历史系。但他很有来头，每周三下午在校内“塞

万提斯”像下办民主沙龙，⁷已经坚持一年有余了，每期由方励之、李淑娴出题目，主要是介绍方励之等的观点，还请过美国大使洛德夫妇来演讲。小有名气。因此，很想结识他。可惜一直没有机会。4月18日凌晨，我在人民大会堂前静坐请愿时，才第一次和他直接接触。当时，我们从北大走到天安门，已经很累了，又在大会堂前坐了很长时间，队伍只有一百多人了，很想回校。他出面和另一个人劝大家坚持并两次出去打电话，回来后向大家传达李淑娴的意见。记得一次他说，传达李淑娴老师两点指示：一要坚持，现在李老师已在北大三角地贴出大字报号召声援，北大队伍马上就到。二是要求人大负责人接请愿书，通过合法手段实现目的。当时对他的印象挺好，挺勇敢。随后，我就跟他接近起来。

随着和王丹的接近，逐步发现他并不像有些人传说的那样好。如：4月20日凌晨，我们冲击新华门时，他鼓励我们应该勇敢，可是警察一来他就跑了。当时，新华门前并没有人被打，可他偏让说是“血案”。说北师大郭向东是被警车轧死的。我告诉他，我亲眼所见没有血案，再说连郭向东的男朋友都证明是105路电车轧的，为什么还说谎呢？他说，这是动员群众的需要。他还说“你太傻冒了。”“为什么我们提为在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中受迫害的知识分子平反时，李淑娴老师让把知识分子改为公民呢？这是斗争艺术。”4月26日，我们都被人民日报社论惊呆了，王丹又急急忙忙从李淑娴老师那儿回来说，我们要改变斗争策略，动员群众和他们干。他急急忙忙参加会，会上订下了改变口号的决定。5月4日游行回校后，很多同学想复课了，王丹坚决不同意。他提出要于5月13日绝食。我问他为什么？他说：

这时候正好可以借戈尔巴乔夫访华压他们。我心里对此很不满意。为什么要用洋人压国人呢？这样做是爱国吗？5月13日绝食开始后，社会各界都很同情学生。但我发现5月15日下午王丹陪一个领导来到广场时仍然十分精神。大声讲话，一点不疲倦。后来才听说他虽然在绝食声明上签了字，但因斗争需要还不断进餐，晚上也另有地方住宿。王丹的保镖说是在蓟门饭店包了单间。经我后来打听，此事确实。

随着事态的发展，王丹的地位逐步提高。我要见他十分不易。只有一次，难得的机会深谈了一阵。我问他怎么收场。他说不怕，只要闹到像方励之老师那样大的名气，他们就不敢动了。我问他最终目的是什么？他说最低目标让他们承认“高自联”合法，给方励之平反，民间办报。最高目标是建立“多元政体”，实现“精英政治”。我问官倒还反不反？他说那是小事。随后就坐着包租的小汽车走了。

6月3日凌晨，部队还没来，王丹见势不好与另外三个人先从天安门广场溜了。他给了保镖每人一千元，然后乘一辆黑色牌照的轿车跑了。有同学看见他随身带了一个提包，装着数万元钱。

当然，虽然王丹算是个风云人物，但我还是觉得他只是个小角色。每次发言都是事先准备的。没准备时就显得语无伦次了。虽然他在香格里拉饭店专门举行过一次记者招待会，声明与方励之、李淑娴没关系，但我看还是关系很密切。也许是有人利用他，也许是他利用了别人，都很难说。但在近两个月的事件中绝不是像人们想的那么简单。不幸的是，善良的人们总是把十分复杂的事情看得过于简单了。但愿善良的人们能从王丹的真面目中得到点启示。

请原谅由于环境的不允许，我暂不署名。

89.6.14

(原载1989年6月16日《北京日报》，
本书编者更改了原文标题)

第二编

宏观戳谬

“精英”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要以西方资本主义为模式来改变我们国家，并且有纲领，有旗号，有策略。



“精英”是“民主个人主义者” 的新变种

邹 武

有人形象地概括说，这次闹事是“精英”和痞子的结合。我看很有道理。闹事者的行列中，一端是那些所谓的“政治精英”和“民主斗士”，如方励之、刘晓波、严家其、包遵信等等等等之流；一端是各色各类的社会渣滓：刑满释放分子，解除劳改劳教分子，流氓、地痞等等。“精英”们扮演的是阴谋策划、煽动、组织、推进动乱到暴乱的角色，痞子们则充任打、砸、抢、烧、杀的赤裸裸的暴徒、打手。参加学潮的大多数学生，实际上是夹在这两股势力中间，被蛊惑着，被裹挟着，被导引着，被推拥着，欲休不止，欲罢不能，就某种意义上说，是上了这条“精英”掌舵、痞子使桨、驶向资本主义深渊的贼船。当然，大学生们也不是铁板一块，其中的少数人从一开始就自觉参与了策划、组织动乱的阴谋；而随着事态的发展，也有少数人裹进了打、砸、抢、烧的犯罪行列。“夹馅饼干”之说，是就参加学潮的大多数学生而言的。

有些好心人问，从学潮到暴乱，历时一个多月，党和政府多做做工作，多疏导疏导，不就不至于发展到最后的严重程度了吗？我看不然。须知，学生是夹在前边说的两股势力

中间的，是被操纵被耍弄被支配的，只要掌舵的“精英”、划桨的痞子不停息，贼船也就不可能停息。而上、下两股势力的本性看，“船”不开到推翻党的领导、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的彼岸，他们是不甘心中途停桨、半道儿收兵的。他们节外生枝、得寸进尺，借端纠缠，企盼着事态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然后迫使党和政府就范，以实现他们的政治目的。事实也是，每当党和政府做了工作，学生闹闹没劲的时候，就有人来添油加柴、拱火升温了。五月四日，学生宣布复课，“精英”们就策划了个绝食，赶在戈尔巴乔夫访华前匆匆出台；六月二日，天安门广场的静坐难以为继的当口，又演出了刘晓波、侯德健、周舵等四人有限绝食的一出闹剧。邓小平同志说，这场风暴迟早要来，正是根据事物的本质和根源作出的正确判断。一些人之所以会有那种退让求安的想法，主要还是对这场风波的性质未能认识清楚。

“精英”和痞子有一致性，但也各有不同的特性。痞子是社会渣滓，只要有人搅动，他们就会顺势骤然泛起，喧嚣一时，且有很大的破坏性。“精英”则是动乱和暴乱的核心，他们有纲领，有旗号，有预谋，有策略，专司搅动的功能。这次的整个事件就是他们搅起来的。所以要弄清这场风波的实质，很有必要对这些“精英”做点剖析。

“精英”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向往资本主义制度，要以西方资本主义为模式来改变我们的国家。正像邓小平同志在讲话里指出的，他们不喜欢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喜欢我们这个党领导的人民当家做主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他们想要建立一个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说穿了，这是一些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敌视社会主义的人。邓小平同志

说这次动乱的实质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个坚持的对立，正是点透了这次事件的根本性质。

这些日子以来，看着“精英”们的精彩表演，我不由地联想到他们的老前辈、就是杜鲁门、艾奇逊当年寄予厚望的“民主个人主义者”们来了。我又翻出了毛选四卷，重读了毛泽东同志评美国白皮书的一组文章。读了之后，很受启发。四十年前，是两个中国之命运决战的关头，蒋介石的八百万大军，尽管有美国出钱、出枪炮、出顾问，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还是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打得落花流水，一败涂地。蒋政权眼看完蛋，美帝国主义一则哀叹他们的如意算盘落空，再也无法控制中国的局势；一则确立了扶植倾向西方的反共势力，搞“和平演变”，最终推翻人民政权的目标。这一切，美国国务院1949年8月发表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以及艾奇逊国务卿致杜鲁门总统的信，说得清清楚楚。艾奇逊说：“……中国悠久的文明和她的民主个人主义终于会再显身手，中国终于会摆脱外国的羁绊。对于中国目前和将来一切朝着这个目标的势力，我认为都应当得到我们的鼓励。”摆脱“外国的羁绊”云云，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是“要推翻马克思列宁主义，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因为，“这个主义和这个制度是‘外国的’，在中国没有根”。这就是说，新中国还没有诞生，美国政府就想着如何扼杀她了。而推翻人民政权的希望，则寄托在中国内部的“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身上。

这里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就是向往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追求资产阶级共和国理想的自由主义分子，或者叫旧民主主义分子。这些人——照毛泽东同志分析——不属于国

民党反动派，属于人民的阵营内部，却又“残留着许多反动的即反人民的思想”。党的方针是教育他们，争取他们，让他们对帝国主义“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应当说，他们中的许许多多的人接受了党的教育，站到了党和人民的一边。

然而，四十年过去，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年的“民主个人主义”，演化成今天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披上了八十年代新潮流的外装。当年的“民主个人主义者”，演化成了今日的“精英”。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扶植、影响之下，在我们党内某些领导人的放任、纵容、亲信之下，借改革开放之机，膨胀、壮大了。他们打着要民主、反腐败的幌子，煽惑群众，搅动沉渣，汹汹然不可一世，终至酿成日前首都这场骇人听闻的反革命暴乱。如果说，四十年前的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决战，本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能否前进到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对垒的双方是国共两党及其武装力量的话；那么，今天同样面临着两个中国之命运的交战，其实质则是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是否倒退到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对垒的双方，一边是党和人民群众，一边是美国帝国主义卵翼、庇护下的“民主个人主义者”的新变种——即顽固地坚持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与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社会渣滓，亦即“精英”和痞子的联盟。从这里，我们看到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四十年前的“民主个人主义者”还是无足轻重的，而今天的“精英”却已经发展到妄图和党和人民抗衡的地步了。

“民主个人主义”繁衍到今天，添加了三大特点：一是大多进到了党内，有了一块迷人的党牌，要用他们的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党。二是大多打着改革的旗号，多了一层骗人

的外衣。他们可以堂而皇之地以改革为名把中国引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三是西方附庸的洋奴气和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性，都较他们的前辈更为鲜明、强烈、突出。这三个特点的结合，加上赵紫阳同志在党的领导岗位上的明抚暗纵，这就难怪他们作起乱来，能量甚大、危害甚烈、后患甚远了。

(1989年6月)

泛起的沉滓

童化

50多年前，鲁迅先生写过一篇题为《沉滓的泛起》的短文。文章形象地把那些借东三省沦陷、喊着“爱国”口号营私的种种丑态恶行，讥讽为“用棍子搅了一下停滞多年的池塘，各种古的沉滓，新的沉滓，就都翻着筋斗漂上来，在水面上转一个身，来趁势显示自己的存在了。”今年春夏之交，在由学潮进而动乱最终演变为反革命暴乱的社会动荡中，我们仿佛又看到50多年前的情景：各色各样的“沉滓”趁着动乱之风的势头、翻着筋斗漂浮了上来，呈现出让人眼花缭乱的斑驳和杂沓。只不过，这次沉滓的泛起，似乎不是用棍子搅起来的，而是如万润南之流举起一块又一块“石头”砸在中国这个充满生机的碧潭中，一时间搅得中国大地颇不安宁。

说他们是沉滓，决不冤枉，且看如下事实：

那位很是风云了一些时候，却终究背弃祖国、投奔了外国主子的吾尔开希，除了学业成绩很差之外，还是个倒术并不见佳的“小倒”。一位对吾尔开希相当了解的学生就曾在报上撰文说：“吾尔开希因从新疆倒卖皮货和匕首赔款七千余元，有关部门正在追查。”他说：“当问到吾的秘书时，她流秘地告诉我，事情是有的，但要警惕‘官方’做文章。”另一位赫赫有名的“高自联”头头王丹，原本是个留级生，因政系念不下去了，转到历史系的。而“高自联”常委熊炜，更是因累计八门功课不及格被取消了本科生资格。无怪乎有人说“这是低素质的人闹最高层次的政治问题”。

学生头头如此，支持动乱的社会“精英”呢？那位自诩为动乱黑手、满嘴脏话的刘晓波，不仅喜欢谈性，还视钱如命。他公开说：“钱是个好东西……性，当然不是坏东西。”“我为什么演讲，一是自我感觉好，二是为了挣钱，不给够一小时多少钱，我就不去。”就是这么个角色，偏偏要装出副民主斗士的模样。另一位名叫张显扬的“精英”人物，1987年被查明在十年动乱中犯有“三种人”错误，定为“三种人”而清除出党，是个地地道道的“沉滓”。

至于“飞虎队”、“敢死队”、“义勇军”等等反革命的恐怖组织，包含有一批流氓地痞、流窜犯、未改造好的刑满释放分子，更是人所共知的事实。特别有趣的是，电视上出现过的那个混杂在天安门广场围观，声援群众中“慷慨陈词”、自称是“代表佛教界”的僧人，原来是一个早就被佛门开除的败类。这位法名悟法的和尚，在贵阳弘福寺当住庙小和尚时，就有过贪污的丑行，还“常脱下僧服，穿上便装下山找他的

旧情人(有夫之妇)”。此人来北京，则是为了躲避公安部门因其违反“治安管理条例”对他进行的拘审。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从“小倒儿爷”，到留级生，到“三种人”，到地痞流氓到，“花和尚”……我们看到了一幅社会沉滓的百丑图。他们小到谋私营利，大到乱国卖国，其出发点和他们的前辈——50年前鲁迅先生揭露的“沉滓”们一样，为的是“将利益更多的榨到自己的手里”。然而，沉滓们演出的这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丑剧注定是要失败的。在正义和真理面前，这出闹剧的丑角们害怕了。他们有的已受到法纪制裁和人民的批判；有的匆匆投奔他们的外国主子，做了一条专骂祖国的狗。这些人最终应了鲁迅先生的话：“因为泛起来的是沉滓，沉滓又究竟不过是沉滓，所以因此一泛，他们的本相倒越加分明，而最后的命运，也还是仍旧沉下去”。

(1989年8月)

“精英”牌“民主政治”一剥

华 多

6月2日，在上千学生绝食收场几天之后，天安门广场又演出了一出4人有限绝食(48—72小时)的收盘闹剧。出场的全不是学生，而是几个知识文化界“精英”，诸如以学潮黑手自诩的刘晓波、词曲作者侯德健、“四通”公司的一个部

长，等等。他们煞有介事地联名发了个《“六·二”绝食宣言》。

这是一份绝好的反面教材，内蕴相当丰富。这里，只摘取有关“民主政治”的主张，端出来曝光。

《宣言》说：“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充满了以暴易暴和相互仇恨。为此，我们绝食，呼吁中国人从现在开始逐渐废弃和消除敌人意识和仇恨心理，彻底放弃‘阶级斗争’式的政治文化，因为仇恨只能产生暴力和专制。”“我们必须以一种民主式的宽容精神和协作意识来开始中国的民主建设。民主政治是没有敌人和仇恨的政治。”

请注意，“精英”们精心炮制和叫卖的“精英”牌“民主政治”，精髓就在这儿：它“是没有敌人和仇恨的政治”。

这，当然是骗人的鬼话。

政治是什么？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它产生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又反过来为经济基础服务。在阶级社会，经济利益是各阶级的基本的利益，阶级、阶级关系、阶级斗争便成为政治的重要内容。资产阶级政治，代表着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无产阶级政治，代表着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这些，原是极普通的常识。在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情况下，侈谈“没有敌人和仇恨”，不是无知，就是存心蒙人。此其一。

其二，在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的社会里，任何民主（“精英”牌“民主政治”的“民主”也在内），总是和专政共生共存、相辅相成的。对这些人、这些阶级民主，对反对这些人、这些阶级的敌人就必然专政。因此，民主，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全社会一切成员均等。从最一般意义上讲，对遵纪守法的人民主，对杀人犯、强奸犯、盗窃犯及一切刑事犯就得专政。而对付颠覆罪、通敌罪、间谍罪、破坏罪……等等，任何主权

国家也通通是要施行专政的。这里，完全无法排除“敌人和仇恨”，它们是货真价实的客观存在，和主观臆测的“有没有”“要不要”毫不相干。这些，也都是常识。

“精英”们果真无知到痴人说梦吗？不！他们是别有所图，是有意为之的。

且不说就在他们高呼“没有敌人和仇恨”，“不要让仇恨和暴力毒化了我们的智慧和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的时候，动乱的策划者、组织者们正以一天天增长的仇恨，蒙蔽群众，煽动歹徒，反对戒严，扩大动乱，阴谋挑起反革命暴乱。君不见，5月20日首都部分地区戒严前夕，自称来自“体改委”的一些人，抢先窜到天安门广场，高呼“立即行动起来，进行决死的斗争”，而咒骂邓小平、攻击李鹏等领导人的标语口号早已铺天盖地，聒噪不已。与此同时，一批流氓地痞、流窜犯等等对党和社会主义怀有刻骨仇恨的家伙，早已组成“敢死队”、“飞虎队”、“义勇军”等恐怖组织，公开叫嚷“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旗帜鲜明地反对共产党和它的政府”，而且，筹划着用“攻打巴士底狱”的方式夺取政权。可谓磨刀霍霍，杀气腾腾！

就是不说这些，单就《宣言》制造者们自身的言行，也足可把这层“没有敌人和仇恨”的伪装撕得干干净净。比如《宣言》开宗明义就说，“中国知识分子必须结束几千年遗传下来的只动口而不动手的软骨症”，呼喊“行动”起来。而对“行动”二字的注解，又莫过于《宣言》起草人刘晓波自己的话：“期望赵紫阳复出，我们必须在人民之中组织武装部队。”这是6月2日刘氏同一个所谓“大陆民运领袖”的谈话。呼吁“废弃和消除敌人意识和仇恨心理”的人，原来正在呼喊拼凑反社会

主义的反革命武装！

奇怪吗？一点儿也不。“精英”们兜售“没有敌人和仇恨”的假货，其目的无非是一则蒙骗老百姓，麻痹他们的阶级警觉；再则捆住政府和人民的手脚，解除从思想到军事上的武装，以便策划、组织动乱、暴乱的“精英”们和仇恨党、仇恨人民的痞子们不受任何干扰放肆地使用反革命暴力。

说穿了，这是一堆骗人、害人的黑话！

（原载1989年9期《学习与研究》）

卖国贼的案从来翻不了

李 朔

历史上许多著名的人物，即使是长期早有定评定论，也常常有人出来重新评价，予以“翻案”，如曹操，如武则天，如布哈林等。唯有一种人，是谁想翻案也翻不了的，是从来翻不了案，永远翻不了案的。这种人就是卖国贼。

卖国贼的案从来翻不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大卖国贼秦桧，死了八百多年了。他的案翻得了吗？翻不了。他生前通敌卖国，杀害民族英雄岳飞。死后终被谥为“谬丑”。人们在西湖岳飞墓前，用铁铸了一个秦桧跪在那里。“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不管怎样改朝换代，秦桧这个卖国贼始终是个卖国贼，铁案如山！

袁世凯倒是本世纪初才死掉的，他这个卖国贼的案同样翻不了。鲁迅就说过：“袁世凯签订过二十一条，卖国贼是有真凭实据的”。

再近点，就要说到卖国贼汪精卫了。汪原为国民党的副总裁，1938年底竟从重庆逃到河内，公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后来当了南京伪国民政府的主席。这个汉奸卖国贼于1944年可耻地死于日本。提起他来，国人无不切齿。这个卖国贼的案有谁敢翻？

与汪逆同案的卖国贼，还有周佛海、陈公博，他们都是随同汪逆一起投敌卖国的。周佛海在日本投降后死于狱中。陈公博在抗战胜利后窜逃到日本，后来还是被解回国内处死了。他们死有余辜，只能落得个遗臭万年的下场。

说到当代，还有一个林彪。他窃国的阴谋不逞，于是叛国，带着老婆叶群、儿子林立果等叛国出逃，结果一起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折戟沉沙，被钉牢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永远也不会得到解脱！

法国有个大卖国贼叫贝当的，二次大战中作为内阁总理居然屈膝投降希特勒，成为维希傀儡政府首脑。战后，这个法兰西民族的败类，受到了人民的审判和严惩。人民和历史的判决，使这个无耻卖国贼同一切卖国贼一样，永远不得翻案。

凡卖国贼的案都是永远翻不了的。中外皆然，万古如斯。

然而，世事纷纭，却也真有越出常轨，逆历史、反人民而行者。今年春天，在中国，就跳出方励之等人，发动签名，写公开信，大肆张罗，为在押的囚犯魏京生鸣不平。方

励之早就说过：“下令逮捕魏京生”，“是历史上的大污点”。在要求“人道主义”的口号下，做的是翻案文章。魏京生何许人，竟值得方励之之流应和着国外反动势力的喧嚷，如此卖力地去为他翻案？这个魏京生，十年前曾窃取我国重要军事机密情报，出卖给外国人，被依法判刑入狱，是个为人不齿的卖国贼。对此，方励之是了然于心的。那么，他们为什么又要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韪，闹闹嚷嚷地为这个卖国贼翻案呢？

鲁迅先生曾经针对袁世凯对汉奸恩宠有加、企图翻案的行为，尖锐地指出：“那是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袁世凯是‘物伤其类’，他自己也是卖国贼”。

方励之为卖国贼魏京生翻案，与袁世凯为卖国贼翻案，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物伤其类”。他们的“伤”不仅是同情，而是要通过对自己同类的打扮，为自己的卖国行为开路。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有其不得已的苦衷的。

方励之和那些顽固坚持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精英”们在中国实在只是极少数、极少数。他们要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搞动乱和反革命暴乱，实现梦寐以求的“精英统治”，和绝大多数中国人为敌，没有外国主子即外国反动势力的支持、资助是干不成的。但卖身投靠外国主子，又决然在中国人民中间通不过。如何是好呢？这个问题着实困扰着他们。但他们又毕竟不愧为“精英”，可以借舆论欺世，从而为自己帮忙的。于是就煞费苦心地制造舆论，什么西方资本主义如何如何好呀，应该在中国搞全盘西化啦，不赞成爱国主义啦，要当“世界公民”啦，要引进外国总理啦，说他们卖国、叛国也不怕啦……总之要说中国不如外国，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

义；总之要说投靠外国主子是很必要、很正经的；总之要说卖国主义不是要不得，而是很需要的；总之，是要造出一个“卖国有理”的理儿来！

但是，古今中外，从来都是卖国无理，从来都是卖国有罪的。方励之们硬要造出个“卖国有理”论来，未免低估了人民的判断力，看轻了人民的爱国心，没有想到爱国主义在中国人民心目中是世代相传，根深蒂固，不可动摇的。外国人想通过中国的卖国贼把中国变成殖民地，几个臭钱只能收买三五败类，却永远买不动全体中国人民。卖国贼主奴们的花言巧语，或可欺骗一些人特别是不谙世事的青年于一时，但一旦这些人识破了他们的罪恶用心，就会觉悟起来，而给他们以十倍的鄙夷和百倍的痛恨。而且他们越是费力制造这种“卖国有理”的遮羞布，就愈是把他们的卖国嘴脸暴露得更清楚。

这次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破产，使那些顽固坚持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极少数人吃了大亏。他们败得最惨的一着，就是他们的许多头面人物彻底暴露了卖国贼的真面目。方励之夫妇不用说，严家其、苏绍智、万润南、吾尔开希之流，都已叛逃出国了。这帮丧家之犬，如今直接靠外国主子豢养着。为了邀功，为了讨赏，为了死乞白赖地苟活下去，他们都要大骂中国，更殷勤地向其洋主子献与中国为敌之计。他们正在这样做，还要这样做。这也是无可奈何，非如此不可的。可是，这帮卖国贼越是起劲，他们的案就愈是翻不了，也就愈使盼着给他们翻案的人失望。他们还有什么别的前途呢？——没有了。

（原载1989年9月8日《北京日报》）

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迷梦注定要破产

钟 灿

平息北京反革命暴乱后的第五天，邓小平同志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中指出：

“事情一爆发出来，就很明确。他们的根本口号主要是两个，一是要打倒共产党，一是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这就一针见血地指明了这场斗争的实质。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这就是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和搞政治阴谋的人的口号，是他们的行动纲领。

一、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口号和纲领剖析

“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不是孤零零的抽象口号，而是有其实实在在的内容，是具体的行动纲领。

几年来，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和搞政治阴谋的人，从来没有停止过攻击四项基本原则，甚至要求把四项基本原则从宪法上删去。因为，正是四项基本原则，构成了人民共和国的立国之本，从根本上体现了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思想文化制度。与此同时，他们又一直鼓吹“全盘西化”，直白地说：“全盘西化”就是“全方位西

化”，包括“西方的科学、技术、文化、政治、意识形态、道德所有全部的东西”，“包括我们的政治制度、所有制”，就是“全面引进西方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教科文体制”。动乱的策划者和组织者之一的刘晓波抛出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完整纲领：“以多党并存的民主制代替一党独裁；用私有制、市场经济代替公有制、计划经济；用多元化的言论、思想的自由来代替思想一元化；用世界的（西方的）现代文化来代替中国的传统文化。”这使人们看清，他们要建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就是要实行政治上的多元化，经济上的私有化，思想文化上的自由化。这就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纲领、经济纲领和思想文化纲领。

这个纲领的抛出决不是偶然的。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和搞政治阴谋的人，在西方一些国家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的支持下，为在中国制造动乱，进行所谓“第二次革命”，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和颠覆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建立庸俗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进行了长达数年的思想、舆论准备。这个反动纲领的基本思想和观点，多年来充斥于一些“论坛”、“沙龙”、“研究会”、“座谈会”及各种传单、大小字报，散见于各种非法组织的宗旨和宣言、非法刊物的文章、非法集会的口号。

1. 经济纲领：搞私有化，用私有制代替公有制。

一纸《私有制宣言》，把这个纲领和盘托出。它声称，公有制“超前了历史的发展规律”、“约束着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了惊人的浪费”，公有制是“产生官僚主义的土壤”、“贪污腐化的温床”、“集权制的摇篮”，叫嚣“早日敲响公有制的丧钟”，“清除公有制这一祸根”。他们企图在中国实现全面的

私有化，在经济上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铺平道路、奠定基础。为了实现私有化，他们开出了一帖又一帖“药方”。有的叫嚷，“应当让私营企业家成为中国举足轻重的力量”，私营企业家“应该有他们政治上的代言人”。一些在改革开放中利用各种非法手段膨胀起来的暴发户，更是急于希望早日成为所谓的“中产阶级”，即资产阶级。资产阶级自由化在经济思想领域的严重泛滥，这同赵紫阳同志支持纵容私有化思潮是分不开的。

按私有化的“药方”改造社会主义公有制，给人民共和国带来的只能是灾难。首先，私有化将使中国社会由稳定走向长期的动乱。在中国实现全面的私有化，几十年积累起来的公有制财产，就会被少数人借助各种手段加以侵吞。瓜分公有财产的过程一旦真的开始，必然是一场灾难深重的动乱，随之而来的就是两极分化。少数人占有越来越多的生产资料，广大劳动人民沦为雇佣劳动者，人们之间平等的关系就会变为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在中国的大地上将出现新的剥削阶级、剥削制度和尖锐的阶级斗争。其次，私有化将使中国由温饱退回到贫困状态。经过40年的努力，特别是最近10年的奋斗，中国人民才解决了温饱问题，踏上了为小康生活水平而奋斗的征程。搞私有化，实行按资分配，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这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生产力水平落后的大国里，决不可能出现共同富裕的天堂，只能是大多数劳动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下降。再次，私有化将使中国的经济发展由“有序”变为“无序”，四个现代化只能成为泡影。私有化使社会生产目的由满足劳动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变为全社会都追求剩余价值。与这一

目的相伴而来的是唯利是图，尔虞我诈，巧取豪夺，偷税漏税，行贿受贿，贪污盗窃，走私诈骗，适应资本主义腐朽生活方式需要的产品和行业片面发展，造成整个社会生产的混乱和资源的巨大浪费。近年来，“一切向钱看”不是已经产生着这样的恶果吗？私有化从本质上排斥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而失去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所产生的竞争优势，根本不足以同处于高度垄断地位的国际资本相抗衡，只能成为它们经济上的附庸，整个社会生产过程将随着国际市场的起伏和垄断利润的多少而动荡。总之，私有化根本不能解决，而只会恶化我们现实经济生活中所出现的各种矛盾。

邓小平同志早就告诫过：“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占主体，一是共同富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第121页）私有化方案从根本上违背了这两条原则，给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的只能是深重的灾难。

2. 政治纲领：搞多元化，实行多党制、议会制和三权分立制，推翻共产党的领导，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

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津津乐道的多党制、议会制和三权分立制，究竟是什么灵丹妙药呢？

资本主义国家的两党或多党制，是资产阶级互相倾轧的竞争状态所决定的，代表的是资产阶级利益，维护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任何一党都不代表劳动人民。我们国家是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中国的其他民主党派，是在承认共产党领导这个前提下，都是服务于社会主义事业的。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优点，同资本主义国

家两党或多党间争权夺利、互相倾轧形成鲜明的对照。方励之诬蔑我们党已经完全腐败了，而腐败的原因是因为共产党实行“一党专制”，失去监督。其实，我们实行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就包含了互相监督。此外，我们还将进一步健全人大系统的监督制度，完善社会团体的监督制度（包括发挥工、青、妇等各社会团体、群众组织的监督作用），完善舆论监督制度、人民群众的直接监督制度，等等。方励之等提倡多党制的目的，就是妄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而没有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失去了中流砥柱和领导核心；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11亿人民就失去了凝聚力和向心力，中国只能成为一盘散沙，重新陷入分裂和混乱，将重演任人欺诈和宰割的历史悲剧。

应该看到，在我国，虽然剥削阶级已经消灭，但是，一小撮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搞政治阴谋的人，可能纠合敌视人民共和国的敌对势力、敌对分子和各种刑事犯罪分子，组织这样那样的反动组织和非法组织，并时刻妄想使这些组织发展成所谓的“反对党”，企图借助国际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的支持，以“多党轮流执政”为舆论前导，通过“和平演变”和暴力的手段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对此，我们决不可掉以轻心。

资产阶级的议会制是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制度，被资产阶级及其学者长期推崇为“代表全体人民意志”、“真正代表整个社会利益”的机关。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也大加鼓噪，主张把西方的议会制搬到中国来。但实际上，西方的议会制只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无论从议会的组成来看，还是从议会的作用来看，都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按照

资产阶级意志行使各种权力，从而维护整个资产阶级利益，巩固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阶级统治，是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作为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的人民代表大会制，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与资产阶级议会具有根本性质的区别。它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人民通过它行使当家作主、管理国家的最高权力。尽管它还不够完善，但可以通过改革，使其更加健全和完善，更好地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而决不能照搬资产阶级的议会制。

三权分立，是资产阶级国家一般采用的政治组织形式的重要原则，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一般政治制度。立法、行政、司法三项权力，分别由议会、内阁或总统、法院独立行使，既分立又制约。这在防止封建专制主义复辟的斗争中起过进步积极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也能起到限制权力过分集中、防止滥用权力的作用。但是，资产阶级“三权分立”有它明显的局限性、虚伪性和欺骗性，作为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一种形式，始终是资产阶级利益的反映。不管它是三权还是几权，哪一权都不属于人民，不管它怎样分权，哪一权都不可能分到人民手里。从表面上看来，有“全民”的形式，似乎很平等，实际上是掩盖资本主义国家阶级统治的本质，又能使资产阶级内部有一定的制约和平衡，以维护整个资产阶级的统治。

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一个不可分割的最高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分别行使行政权、审判权和监督权，但其权力都由国家权力机关赋予，其工作都在国家权

力机关统一领导和监督下进行，这与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三权平行在本质上和形式上都是不同的。而且，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力制衡，必然大大超出资本主义“三权分立”仅仅作为国家各机构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充分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3. 思想文化纲领：搞自由化，以西方的种种政治社会思潮代替马克思主义，动摇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指导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坚持党的领导的基础，是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核心内容，对包括理想建设、道德建设、文化建设、民主法制观念建设在内的整个精神文明建设，起着重大的指导作用。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为了达到釜底抽薪的目的，喋喋不休地散布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甚至公然叫嚣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赶出中国思想舞台”。同时，他们又热衷于传播西方种种政治哲学思潮，妄想以此取代马克思主义。他们还提出“限界论”，散布马克思主义不能指导自然科学研究和学术研究。这也是徒劳的。马克思主义不能代替自然科学研究，但它作为一种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确为科学研究提供了有力的认识工具。实际上，科学家在研究中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其世界观的支配。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的：“即使是有勇敢精神和敏锐本能的学者，也可以因为哲学上的偏见而妨碍他们对事实作出正确的解释。”（《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第480页）他们提出“限界论”，正是妄图通过否定马克思主义在学术研究领域中的指导地位，来否定马克思主义对整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普遍指导意义。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结果，势必造成形形色色非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猖獗，导致资产阶级损人利

己、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的腐朽思想、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泛滥，甚至解放初期已经绝迹了的丑行死灰复燃。

二、资产阶级共和国迷梦破产的必然性

通过对资产阶级共和国纲领的粗略剖析，不难发现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不是保护而是剥夺了人民的经济和政治权利；不能消除而只能加剧贫富差距和腐败现象；不能维护而只会丧失国家的主权独立；不是加速而只能破坏四个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在社会主义的共和国已经有40年历史的今天，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妄图开历史的倒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无疑是一种历史的反动和倒退。

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必然使人民的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丧失殆尽。企图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人，俨然以“民主斗士”自居，似乎他们正在为中国人民建立“民主乐园”。中国人民深深懂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年，人民享有了从未有过的权利。社会主义的改革必将进一步实现人民对国家事务、经济、文化和其他事务的管理权。当然，人民共和国的民主建设，目前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在民主建设上有过失误，走过弯路，人民还不能充分有效地行使管理国家和其他各项事务的权力，民主形式和制度也有待进一步完善。但是，这都没有改变人民共和国属于人民的本质。这里的问题是人民能够行使的权力怎样从少到多，更有保证，更加有效。这是一个量的问题。如果极少数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阴谋得逞，用资本的权力取代人民民主的权力，那末，人民现有的民主权利就会根本丧失，重新遭受奴役。

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必然使中华民族重新仰人鼻息，丧失民族独立。主张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人宣称，“改革的目标是走向如美国、西欧、日本这些公认的发达社会。”国际资产阶级也总是企图迫使中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他们的轨道。但他们的目的决不在于使中国建成一个与他们平起平坐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而是要把中国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范围；成为他们的附庸国。

主张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人声称，“社会主义的尝试和失败是20世纪的一大遗产”，“社会主义只能导致缓慢和停滞，只有资本主义那一套才能使中国起飞”，但事实决非如此。当代世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地球上的共处已经成为基本事实。就是在西方，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也从未放弃对社会主义的追求，社会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的吸引力始终存在。正是由于社会主义发展为一种巨大的力量，使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态度，逐渐由否认、封锁到交往、竞争、共处。这些基本的事实再一次向人们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序列中，与资本主义相比，社会主义是更具有生命力的一种制度，她虽然仅有短短的70多年的历史，并且有过这样那样的失误，却真正代表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潮流和主要趋势。竭力在中国推销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极少数人，要逆这种历史潮流而动，到头来，只能落得个失败覆灭的下场。

三、“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巩固和建设人民共和国的必由之路

人民共和国走过了40年的历程，社会主义事业得到了发

展，人民的权利得到了保障，在各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经历过曲折，有过失误，现在某些方面还存在着腐败现象。怎样避免失误？怎样克服腐败？若问路在何方？就在我们脚下，就是我们已经找到而且正在行进着的路，即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巩固和建设人民共和国，更好地充分地显示人民共和国的优越性和生命力。

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进行了长期探索，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这是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虽然，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以致在实际工作中出现了某些偏差和失误。比如，我们注重了物质文明建设，但对精神文明建设有所忽视；虽然在民主建设上有长足的进步，但有不少薄弱环节，特别是如何通过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克服腐败的问题上缺乏有效的措施和制度。赵紫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以来，消极对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严重忽视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致使党风和社会风气继续恶化；严重忽视党的建设，提倡“淡化党风”，甚至为产生腐败的所谓“必然性”寻找理论根据，助长了腐败之风。这不仅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影响了人民共和国的威望，而且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提供了可乘之机，也为一小撮阴谋分子制造动乱和反革命暴乱提供了口实。

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要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人民共和国，首要和核心的问题是加强经济建设，因为这是其他建设和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但是，光靠经济孤立突进不

行，必须与政治和思想文化建设配套进行，因为政治思想文化建设为经济建设提供政治保证、思想条件和智力支持。因此，既要加强物质文明建设，又要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三项建设之间既互为条件，又互为目的；既互相渗透，又各自相对独立而互不能代替；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合理制约。要建设，必须依靠改革，只有改革才能真正促进建设。如同建设是全面的，改革也是全面的，在改革经济体制的同时，必须进行上层建筑的改革，包括政治体制和思想文化体制的全面改革。而所有这些改革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可以说，只有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才能使社会主义社会得到协调稳定的发展，才能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人民共和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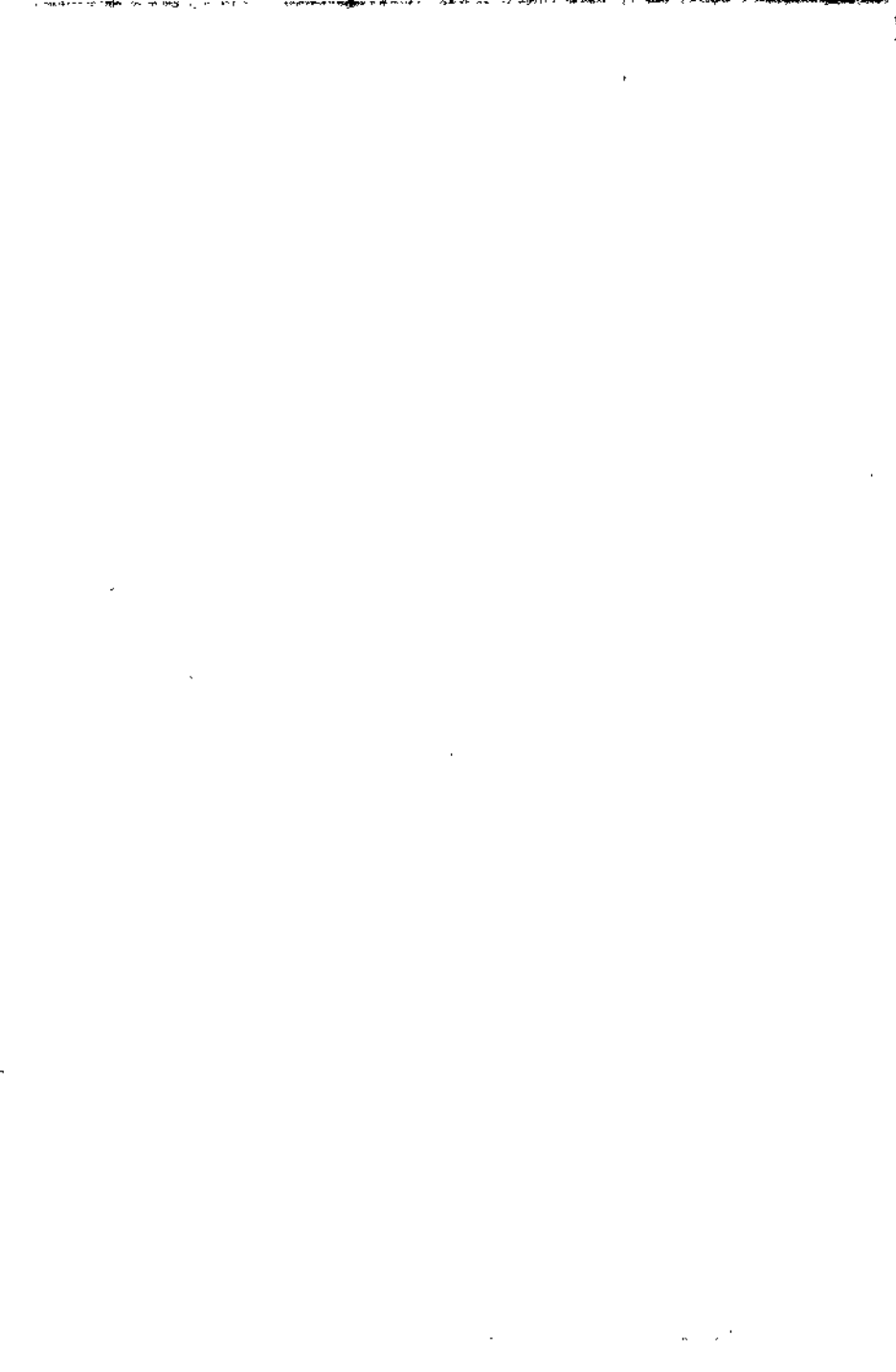
人民共和国稳定发展、繁荣昌盛之日，正是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和搞政治阴谋的人妄图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迷梦彻底破产之时。

（原载1989年8月31日《文汇报》）

第三编

纷纭事态

这惊心动魄的两个月，事态的发展起伏跌宕。许许多多的人经历了感情上的春夏秋冬和灵魂上血与火的洗礼。



精心策划的一场骗局

——胡耀邦同志追悼会前后纪实

今年春夏之交发生的这场动乱，是借胡耀邦同志逝世而提前爆发的。

中央关于召开胡耀邦同志追悼会的公告是4月19日晚才公布的。然而在16日，受控于鲍形的国家体改所成员、《经济学周报》编辑高瑜便找到北大学生王丹，明确地告诉他：“这次咱们要掀起十里长街……因为中国的老百姓都成了华老栓了，成了阿Q了。”“星期六(22日)我们希望学生都到人民大会堂外。”18日，李淑娴又向王丹授意：“要求参加追悼会，很多人都有这个心理，这样事情就闹大了。”

在22日之前，无论是18日向人大常委会递交请愿书，还是20日凌晨冲击新华门，都是动乱的策划者和组织者们为这一天所作的准备。

一

许多大学生是怀着对胡耀邦同志的悼念之情来参加一些活动的，但是，那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完全不是这样，他们从一开始就要掀起一场反对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斗争。

4月15日下午，耀邦同志去世才几个小时，清华大学就

贴出了“李鹏辞职”的标语。晚上，北京大学出现了大字报“我们要求撤换无能政府，推翻专制君主，建立民主政治。”16日，中国人民大学的标语提出：倬胡公骂李公不如倒了邓公；说千条道万条不如砍掉四条。”17日，中国政法大学的大字报更加明确地说：“现在的任务是要保护活着的改革派，保护赵紫阳。”至22日前，首都高校的大字报已有上千份。

这些大字报的内容也在天安门广场上散播着。香港《九十年代》月刊登出一位港人的目击日记说，4月18日晚，他在天安门广场听大学生们演讲，一学生说：“中国只有一党专制，就是官僚。打倒共产党一党专制！”众人大笑，有喊“不现实的”，有鼓掌的，还有起哄的。

一些文化“精英”们也积极地做着舆论准备。15日，《世界经济导报》与《新观察》杂志主编戈扬以及苏绍智等人联系，准备召开座谈会。在19日的座谈会上，严家其、戴晴等人提出要为胡耀邦同志平反、彻底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并暗示要“倒邓保赵”。《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钦本立决定，将刊有这个座谈会内容的报纸提前印刷，赶在22日之前发往北京，以“影响学运”。

21日这天，严家其、包遵信等人给中央、人大常委会的请愿书不失时机地出现在各重点大学的校园，其内容与王丹等人18日所呈请愿书如出一辙。在请愿书的旁边，已贴上了所谓“澄清4·20血案真相”的大小字报及“到天安门去参加追悼会”的通知。

一股狂躁的情绪就这样在大学生中点燃起来了。21日下午，北大清华甚至传出了“耀邦是被最高统帅警卫打死的”谣

言，有的学生竟商议要“截灵车”。晚上，北师大则一片混乱，外校学生撞开了校门，上万人出出进进要开什么“誓师会”。吾尔开希拿着电喇叭在操场上煽动大家“讨还4·20血债”。还有人用自行车驮着一大袋白灰进到人群中分发，被一些高年级学生制止了。

山雨未来风满楼。借胡耀邦同志的追悼会大闹一场的风波似弦上之箭，一触即发。海外的一些新闻媒介也已按捺不住地发出了信息。21日这天，台湾《中央日报》印出了大标题：“大陆势将爆发更大动乱”；香港《东方日报》刊出醒目标题：“明天悼胡纪念会，学生可能冲会场。”美国《华盛顿邮报》则干脆引用北京某大学生的话：“悼念胡耀邦只是示威者的借口”。

三

22日凌晨，数万大学生进入天安门广场后便席地而坐或倒头大睡，还有的在纪念碑附近的草坪上嬉戏谈笑着。大多数学校推出的学生代表也都不清楚天亮之后干什么好。

午夜两点多钟，在临时召开的20多所高校代表会议上，郭海峰提出，首先要搞和平请愿。在追悼会前，要求政治局常委甚至邓小平接见，进行谈判。如果不行，就冲人大大会堂。各校学生代表一听，马上都表示不同意。在人家办丧事时去闯灵堂闹事，太不得人心；再说，学生们谁也没有思想准备搞什么“谈判”，大家是来开追悼会的。经过这样一番争辩，大约6时左右，代表们才决定向治丧办提出3条要求：绝对保证学生安全，瞻仰胡耀邦遗容，灵车绕广场一周。

7时15分，治丧办的同志转告熊焱、熊焯等5名学生代表：只要学生队伍不乱，将保证学生安全，临时安排那么多

人进大会堂瞻仰遗容不可能，灵车能否从广场过正在商议中。对此，熊焯等人表示理解。但他们很快又提出3条新要求：澄清“新华门血案”，增加教育经费，新闻要说真话。治丧办的同志又很快答复他们：第一条现在无法答复详细情节，第二条与今天治丧活动无关，第三条已向有关部门反映。几名学生代表听后便不再提什么。

但是，自称“有后台”的吾尔开希等人却打定主意要大闹一场。吾尔开希进广场后对记者说：“我们是来斗争的，有权选择多种多样的斗争方式。如在开追悼会的时候高喊口号。如果不答应我们的条件，我们就有可能这么做。其次，我们也许会使政府官员难堪。”吾尔开希一再说：“我们现在不动，但不是永远不动。”“如果条件不被落实，我们回去就要行动。”

实际上，一些人一进广场就行动起来了。他们有意识地在大会堂前的马路上鼓噪着。凌晨3时30分，当一队执勤的警卫卫来到这里时，这些人立即上前围挤、推搡、谩骂。“打倒暴政”、“当兵的滚蛋”等口号也响了起来。为了不发生冲突，这队警卫战士撤了回去。4时30分，身着警服的北京市公安局的一位负责同志来到大会堂东侧路，准备疏导交通时，马上又被围攻踢打。

天亮前，大学生的队伍已拥到大会堂前的马路上，广场上聚满了人，根本无法清场。8时整，执行警戒任务的警卫人员只能准备在大会堂前的停车场边站岗警戒。一些学生即刻站起来，有组织地一排排地向尚未列出警戒线的警卫们冲击。在现场的香港《百姓》月刊记者写道：“社科院新闻系标语‘新闻要说真话’往前涌进。传闻风起，背景是嗷嗷的叫

声，人们的精神快要疯了。”

为了避免冲突，警卫战士们克制地站在了大会堂东门外，学生们的队伍离他们只有数米远。极少数人期望的、眼看就要发生的流血事件被控制住了。

追悼会期间，广场播放现场实况。放哀乐瞻仰遗容后，广场上的许多学生和群众便向北跑去，准备看灵车。已经出来了十几个小时的大学生们大都觉得该结束了，部分学生已经准备要走了。

三

广场上的大学生们并不知道，极少数人在搅乱追悼会不成后，还有着第二手计划。在21日这天，王丹、郭海峰、封从德、熊焱等“北大团结学生筹委会”的核心成员秘密召开了会议，决定由封从德把18日已递交过的请愿书重抄一遍，“利用这个许多学生都在场的机会，在追悼会后进行请愿。”

这个一直只有几个人知道的阴谋是在李鹏总理等领导同志的车队已离开大会堂的西门后才突然公开的。大约10时50分，广场西部猛然响起了“对话！对话！”的叫声，继而又喊起了：“李鹏出来”、“李鹏对话”等口号。吾尔开希、郭海峰等人则站到了离大会堂最近的学生队伍前面。

随着喊声越来越大，封从德从北大队伍里将一大卷纸传给郭海峰，示意他：“交给李鹏”。11点20分左右，郭海峰双手举起请愿书，向人群示意，吾尔开希拿着电喇叭在他身边喊叫着与另外两名大学生一起向大会堂走去。

在大会堂台阶下，郭海峰对闻讯赶来的治丧办的同志说：“我们要交请愿书。”吾尔开希接着说：“我们要交给李鹏，非面交不可。”治丧办的同志提出让他们派代表进入大

会堂，吾尔开希拒不同意，他坚持道：“李鹏出来是第一要求，除此之外，放弃一切要求。”并下了通牒：“12点45分是最后期限。”

12点整，一位负责同志匆匆从大会堂出来，问治丧办的同志：“能不能让学生让开通道，灵车绕广场一周？”治丧办的同志又反复劝说吾尔开希等4人：“你们既然是来开追悼会的，就应先送耀邦英灵。”但他们就是一句话：“让李鹏出来。”

此时的天安门广场和周围的道路上已挤满了人，学生队伍还在不断往大会堂涌。赵紫阳同志曾登上大会堂顶，用望远镜看了看这一情景，但没做任何指示，便驱车离去，准备打高尔夫球去了。

与吾尔开希、郭海峰等人接触的治丧办和人大会议的工作人员谁也没说过李鹏同志要来广场，但吾尔开希却用电喇叭向广场的学生们宣布：“（人民大会堂）里边传出话来，李鹏12点出来与我们见面对话，请大家耐心等待。”这个弥天大谎迅速传遍广场，有些感到意外的大学生们议论起来：“李鹏来了我们鼓不鼓掌？”有的挺纳闷：“为什么要李鹏出来？除了增加教育经费外，请愿的内容都不归国务院管呀。”有的还不明白：“请愿书不是已经递给人大常委会了吗？办丧事时提条件搞请愿，合适吗？”

12时45分，吾尔开希一下子冲上大会堂台阶，举着电喇叭高声叫道：“我抗议！”郭海峰等三人也走上台阶，忽然跪了下来。郭海峰高高举着请愿书，放声大哭，边哭边喊：“李鹏，你为什么不出来！”吾尔开希则鼓动道，李鹏欺骗了我们！

尽管有些头脑清醒的大学生、研究生已感到事先无任何招呼，即要求李鹏在不能出来的时候，不可能交谈对话的地点，接受本不属于他职责范畴，并已经递交过的请愿书是很荒谬的，更不赞成其下跪的方式，但是，他们已无法表达自己的疑问了。整个广场哭声一片，群情激愤的大学生向大会堂冲过来。一个女学生喊着“打死我吧”，拼命向警察撞去。

郭海峰等人跪了十几分钟后方坐了下来，学生们的对立情绪已达到顶点。回到广场的吾尔开希即和一些学校的代表开了个小会，不到两点，学生队伍开始撤离广场，向新华门方向游行，并喊出了统一的口号：“和平请愿，政府不理。通电全国，统一罢课。”

四

22日这天，令人奇怪的事还发生了一些。下午，参加追悼会的大学生刚刚回校，北师大的传单就撒到了他们手中。传单写道：“12：30，师大的代表告诉同学，李鹏将于12：45接见学生。下午2：00，李鹏还未出来。同学们愤怒地向前涌去，武警冲上去用皮带等殴打学生……”

这天上午11时，严家其、苏晓康等人“要求政府对话”、“绝不许对学生施暴”的请愿书贴在了北师大等高校的墙上。

方励之在当天对外国记者发表了谈话，他得意地说道：“中共若不与学生坦诚对话，那么形势发展就不乐观。”王丹也高兴地告诉外国记者：“相信行动已发挥了一定的影响。”

这一天，由台湾反动组织“中国民联”成员胡平、陈军、刘晓波等联名从美国纽约发出了《致中国大学生公开信》，要求“巩固在这次活动中建立起来的组织联系”。

《新观察》杂志则明目张胆地歪曲事实，先是造谣北京市

公安局“戒严”，然后称赞学生强占天安门广场，使“追悼会的主会场在大会堂外。中午，3名大学生‘扑通’跪倒在大会堂台阶上，要求向国家领导人面交请愿书。国家领导人工作繁忙，没有时间接见十数万大学生代表。”并煽动道：“他们往地下一跪，就把官僚主义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在这样一个政治气氛下，北京6万大学生罢课了。一些人开始南下北上，东来西走，串联募捐。外地许多大学生也相继效仿。

同一天，西安和长沙发生了严重的打、砸、抢事件。

王丹早在4月16日就说，大字报的“锋芒所指开始转向”，“如果发展下去，有可能与‘五四’相联。”“不少人寄希望于我引导方向。”从4月16日至4月22日这一个星期，他和他的同伙以及背后的极少数人紧锣密鼓，到4月22日这一天又精心策划了这样一个大骗局，目的就在于把更多不明真相的大学生进一步“引导”向动乱的泥潭。

（原载1989年9月6日《人民日报》）

《世界经济导报》事件真相

忻华实

《世界经济导报》（以下称《导报》）积极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这场由学潮到动乱，进而发展成为北京反革命暴乱的

政治风波造了一番舆论。在学潮之初，《导报》利用报纸的舆论导向作用，首先公开向党中央发难。在中共上海市委决定对它进行整顿后，报社极少数人不仅不幡然悔悟，相反，蓄意扩大事态，与敌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势力南北呼应，内外勾结，使《导报》成为上海动乱的一个重要策源地，成为海内外反动势力在中国煽动和支持动乱的大合唱中一个刺耳的喇叭。

《导报》是打着所谓“新闻自由”、“敢说真话”的幌子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又以被整顿的“受害者”的面目四处招摇，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因此，有必要把《导报》事件的真相公之于众，让大家看一看《导报》事件的实质到底是什么，《导报》中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搞政治阴谋的人在本次动乱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

原439期《导报》的要害是公开提出动乱政治纲领

4月15日，胡耀邦同志逝世，极少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分子利用广大学生和人民群众对胡耀邦同志的悼念之情，阴谋策划、组织和发动政治动乱。《导报》的极少数人凭他们特殊的政治敏感，也立即行动起来。《导报》编委、北京办事处负责人张伟国在他的工作日志中写道：“胡耀邦逝世，是一个很好的转机，是可以改变当前情况的转机”。当日，张伟国即与《新观察》杂志主编戈扬，以及苏绍智等人联系，“打听有关人士反应”。戈扬当时就造谣说：“耀邦是被气死的！改革者竟如此下场！”4月19日，《导报》与《新观察》联合召开“追悼胡耀邦同志座谈会”。《导报》总编辑钦本立在此之前从上海“指示”：“内容要有份量，不是一般表态性的”。参加者名单当然是经过精心选择的。

座谈会上，几个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发言。他们不顾事实真相，煽动说耀邦“受到不公正待遇”，他的辞职是党的历史上一大“悲剧”，甚至死了连“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称号也没有。他们要求重新“对耀邦作出公正评价”。他们公开翻“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案，说什么“反自由化运动”甚至在最基层的人民当中也“不得人心”。有人还提出“要对1986年的某些运动作出公正的评价”，等等。李鹏同志在分析动乱初期的形势时指出：“这个时期，动乱制造者们通过学潮提出了一系列带纲领性的政治要求，其中最主要的是两条：一是重新评价胡耀邦同志的功过，彻底否定1987年初中央对胡耀邦同志辞职的处理；二是彻底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在反自由化中所谓‘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平反昭雪。”正是《导报》召开的这个座谈会，首先鲜明地集中地提出了这两个政治纲领。

围绕上述政治要求，这些人在发言中公开地把矛头指向邓小平同志和党中央。他们诬蔑邓小平同志已经忘了人民、脱离人民了。严家其更向党中央要挟道：“要无私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如果不承认错误，重蹈覆辙就在眼前”。戴晴则大谈中国共产党七十年的历史，大谈几位总书记的命运，说什么党的总书记都没有好下场，都是“非程序权力更迭”，暗示现在要全力“保”赵紫阳同志。一句话，“倒邓保赵”。

当时，学潮已起。座谈会上有些人竭力鼓动学生和群众进一步走向街头，说什么“中国的凝聚力”在天安门广场，“中国的前途和希望”在天安门广场。他们以学者、名人的身份给学潮火上加油。

由上可见，这个座谈会既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和

搞政治阴谋的人提供了一个向党中央发难的讲坛，又为制造这场动乱进行舆论导向。

对这次座谈会，钦本立等人采取了一系列异乎寻常的做法：指示张伟国详细整理所有发言人的讲话，准备以几版篇幅全文发表；决定《导报》提前一天印刷，赶在胡耀邦同志追悼会举行那天把报纸发往北京；把报道方案预先捅到海外。于是，海外一家报纸在座谈会前两天，即4月17日就透露，《导报》将用专栏报道这次座谈会的重要内容。

上海市委宣传部从海外报刊上获悉这个信息后，由市委主管宣传工作的负责同志于4月21日下午约见钦本立，要求看清样。第二天市委负责同志看了清样后立即再约钦本立谈话，诚恳而又严肃地指出，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与中央正式决定相悖的意见是宣传纪律所不允许的。尤其在当前学生已经上街的情况下，这个座谈会的部分发言内容如发表出去，会起到错误的舆论导向作用，对稳定当前局势不利。因此，市委负责同志从维护大局出发，也是为了爱护《导报》，建议删节数百字，主要是严家其、戴晴等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发言内容。但钦本立坚持不肯删节这些反对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的语句。当领导同志追问他为什么要坚持发表这些内容时，他一语道破天机：“我就是要邓小平检讨。邓小平早检讨，早主动，早得人心。他要检讨，我们就拥护他。”

在这种情况下，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亲自找钦本立谈话，严肃批评了钦本立的错误观点和无视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和宣传纪律的行为，指出这些内容非删节不可，同时请担任《导报》名誉理事长的一位老同志一起做工作。在这种情况下，钦本立最后总算同意删节了。可是事情

并非这么简单，实际上他在将清样送市委审阅的同时，就已下令开机印刷刊登这次座谈会内容的439期报纸了。所以，当钦本立在与市委领导拖延时间时，16万多一份报纸已经全部印好，并有几百份提前抢送和抢发出去，有的已送往北京了。

市委宣传部得知后，于4月23日下午与钦本立商定：这期刊有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的《导报》（称做A版）停发，另编B版。按理，这种有限篇幅的改版半天就可以了，仍可保证《导报》如期正常出版。但是此后整整三天过去，439期B版仍未付印。在此期间，市委宣传部多次打电话催促，但始终找不到钦本立及有关编辑人员。现在真相大白：原来4月23日晚钦本立在家中召开编委会，一些编委反对出B版，坚持继续发行A版，最后钦本立总结发言说：“我本来就认为没有什么错。这些删去的内容正是我们报纸要说的。”于是，他们又电告在北京的张伟国把这个消息捅到海外新闻单位去。果然，4月24日香港《南华早报》首先发出《导报》被“查封没收”的歪曲报道。24日晚，钦本立在家中再次召开编委会，决定给上海市委写一份《紧急报告》，接着，钦本立就躲到樱花渡假村“养病”去了。正如他们私下向香港《明报》透露的：“能多拖一天，就是《导报》的胜利”，“《导报》事件已形成国际影响了”。就这样拖到了4月25日晚上，《导报》编辑部竟又写了一份《紧急报告》送到了市委。报告说鉴于439期A版问题已引起国际上强烈反响，同时造谣说：“据北京消息，中央有可能对耀邦同志重新作结论”，因此坚持要发行439期“A版”，企图用国际的和“北京”的压力，迫使上海市委屈服。这份紧急报告是“专此奉告”，这就是说他们要一意孤行了。

从以上大量事实可见，《导报》组织这个座谈会，并顽固

坚持发行439期A版，完全是一个有计划、有预谋的行动。

上海市委根据4月23日人民日报《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精神，果断地作出关于钦本立停职和整顿《导报》的决定。4月26日下午，上海市委召开“旗帜鲜明反对动乱”的万人干部大会，江泽民同志在会上宣布了市委的决定，并义正词严地指出：“当前，有人企图利用海外舆论，对我们施加压力，这是绝对办不到的，也决不能动摇我们维护安定团结的决心。”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表示拥护与支持。

上海动乱的一个重要策源地

上海市委的正确决定，打乱了动乱制造者的阵脚，但是他们并不因此而止步，相反，蓄意扩大事端。一场扩大动乱与反对动乱的严重较量就此展开。斗争首先表现在对《导报》的整顿与反整顿上。

早在上海市委作出整顿《导报》决定的前一天，即4月25日，《导报》北京办事处就给钦本立等人写去一封信，以恫吓的口吻警告“非法干预者”说：“如一意孤行，我们也将走上街头，争取人民和读者的支持”，声称“面临严峻考验，导报全体同人只能前进，不能后退”。这是新闻界第一份提出“走上街头”的自白书。

4月27日，上海市委整顿领导小组进驻《导报》。当时整顿领导小组的首要任务是组织报社职工尽快出版坚决维护国家安定的报纸，用事实打破国内外某些别有用心者制造的《导报》被查封的谎言。但是这种努力一开始就受到《导报》极少数人的百般抵制。一名被称为《导报》“智多星”的编委说：“我们不是要‘世界经济导报’这6个字，而是要象以往一样独

立内容独立风格的《世界经济导报》，如果内容风格变了，《导报》就死亡了，《导报》同人只能冲一个鱼死网破”。“解决《导报》的唯一办法就是市委承认错误，老板（按：《导报》职工对饮本立的称呼）复职，撤出整顿小组”。因此，从副总编辑到编委均拒绝签发清样付印。在整顿领导小组主持下，439期B版终于在4月27日付印发行。以后，整顿领导小组尽管对440期一些内容有异议，但考虑到在当时出报是大局，还是签发了。但报纸出来一看，原来定的第一版的通栏大标题“纪念五四”却被篡改成“我们需要一个自由地讲真话的环境”。这是《导报》极少数人在整顿领导小组签发后做的手脚。这个大标题，第二天就成为上海学生游行队伍中显眼的横幅和口号。以后在编发441、442期报纸过程中，《导报》极少数人又制造种种事端，越来越明显地企图对动乱进行舆论导向，整顿领导小组理所当然地拒绝签发，并一再努力耐心说服他们修改，但一再遭到拒绝。《导报》从442期起就无法出版了。

现在已经查明，《导报》极少数人这样干的背景来自北京。张伟国从鲍彤控制的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得到指令说：“《导报》没有停掉，北京感觉不到压力。如果停办了，北京就会感到压力，就可能出来讲话了”。张伟国立即将此指令传到上海。这样，《导报》自442期起停出就不难理解了。“北京就可能出来讲话了”中的“北京”指的是谁？现在已真相大白：原来，访朝回京的赵紫阳同志得悉上海市委对《导报》的处理决定后，不仅不予支持，反而感到“震惊”，指责上海市委把事情“搞糟”了，“搞被动”了。

有了这种“北京”的支持，《导报》极少数人自然有恃无恐地把事态扩大到整个社会动乱中去。

在上海市关于整顿《导报》的决定作出后，为了把事态扩大，钦本立立即打电话给张伟国，要他了解参加座谈会的人对《导报》被整顿的看法。张伟国马上与严家其、戴晴等人联系。4月27日，严家其在电话中声称“上海市委的决定是错误的，对此必须旗帜鲜明地进行斗争。《导报》应按原来的宗旨风格（按：实际上是按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照样出版，而且应在报上鲜明地揭露江泽民的错误决定”。严家其立即起草了一封给上海市委的《公开信》，并冠以耸人听闻的标题：“捍卫新闻自由”，一开始，在信上签名者仅严家其等两人。后来，经过张伟国和戴晴在北京一个知识分子座谈会上鼓动，才又有30多人签名，其中就有包遵信、苏绍智、于浩成、张显扬、苏晓康等人。这就是第一份声援《导报》的函电，也是《导报》极少数人自编自导的一出闹剧。

已被停职的钦本立根本没有“停职”，他不时在家中或借宾馆召开编委会，讨论如何扩大事态。他们于5月初炮制出一份《对中共上海市委整顿〈世界经济导报〉“决定”的陈述（事实真相，我们的态度和要求）》，这份通篇歪曲事实的《陈述》经钦本立审阅同意后，大量印发，并派专人送数百份到北京，向社会各界散发，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声援《导报》的浪潮。

《导报》极少数人从4月29日开始在编辑部办公室沿墙披上黑纱，在黑纱上张贴国内外各方面“声援”的函电。这实际上是一种示威，也是一种展览，以图动员社会各界前来参观和声援。钦本立亲自打电话动员海外报刊记者前往参观。他说：“你会感到新闻界开始觉醒了，独立了，团结了。”一时，到《导报》编辑部参观的人川流不息，欺骗了不少不明真相和受其影响的人，起到了鼓动动乱的社会作用。

《导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张伟国更是活跃。他在北京新闻界和大学生中，在各种知识界集会上发表演说，介绍所谓《导报》事件真相，提醒新闻界“要对自己的主体意识彻底觉醒”。什么觉醒？张伟国接受香港《镜报》月刊记者采访时的谈话，作了最好的注解：“《导报》事件使得中国新闻界觉醒，这就是胜利。要推倒重来，中国大众传播媒介必定掀开历史的新一页”。5月4日，首都新闻界少数人打出了“新闻自由”、“声援《导报》”的旗帜走上街头。

随着整个形势的发展，《导报》极少数人变本加厉，积极参加和支持动乱。5月13日，钦本立等人在锦江饭店开会，研究形势与策略。他们认为形势“十分有利”，是大“转换”的时刻到来了。用他们的话来说：“我们面临的形势，很可能是一个重要的转换时期，其深刻程度，后果如何很难估计，可能有我们尚未认识到的巨大意义。”于是他们干脆拒绝出报，而是集中全力，南北呼应，制造扩大上海的动乱。

5月11日，《导报》极少数人纠集一些人，起草了《上海知识界呼吁书》，提出了五项要求，撤销对《导报》的处理，撤出派驻《导报》的整顿领导小组，恢复钦本立同志的职务，恢复发行被禁的4月24日《导报》有关版面，确保新闻自由，肯定和保护学生的爱国民主行动。《呼吁书》的内容很快见之于海外报纸。

5月16日、18日，《导报》极少数人先后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外记者招待会，并且特邀了美国等外国领事馆官员，以及近二十所大学的学生非法组织成员参加，蓄意把《导报》事件扩大到国内外。他们发表声明说：“我们不把《导报》发生的事，仅仅看成是一个人、一张报纸的事。我们希望和同学们

一起推进中国的民主建设，推进中国的政治改革。”

《导报》极少数人一贯自我标榜“敢讲真话”，且看他们在动乱中为了把水搅混，又是如何“敢”造谣言的？5月18日，有人打电话问《导报》：“听说北京绝食学生死了三个，是否属实？”《导报》人员回答：“我们北京办事处核实过，是死了三个。”这个经过《导报》“证实”的谣言很快传出，更加激化了学生和市民的情绪，一时游行队伍中抬花圈、举挽联、带黑纱……闹得乌烟瘴气。

为了扩大动乱，《导报》极少数人还频繁出没于大学校园，串联，演讲，与非法组织上海“高自联”等建立起经常联系。为此，复旦大学非法学生组织头头还写信感谢“《导报》老师的宝贵指导”。《导报》极少数人购买大量面包、饮料慰问游行学生，给学生们打气。他们在群众游行队伍中发表演说，煽风点火。《导报》的四部电话（包括国际直拨电话）日夜24小时值班，接受北京和国内外信息，传递给上海一些大学和有关部门，又把上海信息传递出海内外。无怪乎当时学生中流传着一句话：“最新消息听《导报》，理论指导找《导报》。”

彻底失败前的顽抗

但是，《导报》极少数人和所有其他搞动乱的人一样，都错误估计了形势，低估了党和人民的力量，5月19日，李鹏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发表了义正辞严而又鼓舞人心的讲话。5月20日，国务院发出了对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命令。钦本立等人意识到自己的末日来临而又不甘心失败，还要进行最后的猖狂一跳。

在戒严令下达前，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国务院农业研

究中心发展研究所、中信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和北京青年经济学会抛出了关于当前形势的《六点意见》，公开暴露了党中央高层内部对学潮、动乱的意见分歧，并且用“人民日报号外”名义向社会散发，《导报》极少数人立即呼应，也编出“号外”，内容除《六点意见》外，还有曹思源的文章《让非暴力主义深入人心》，矛头直指党中央、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只是由于印刷厂上级领导及时发现，采取措施，这份“号外”才未能出笼。

5月21日，《导报》的极少数人在报社外面的“导报阅报栏”里，以“5·20天安门广场”为标题，贴出了30幅照片，宣扬动乱分子阻拦解放军进城、反对戒严，以及占据天安门广场，高举“打倒李鹏”反动标语等情况，一时观者如潮，道路为之堵塞。这一反动的舆论宣传，实际上为后来上海发生设置交通路障等严重动乱，进行了思想发动。

北京曹思源、胡绩伟等人组织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签名，要求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妄图“罢免李鹏”。《导报》极少数人得悉后，立即闻风而动。5月21日下午，钦本立等人躲在一家宾馆密谋起草了“上海市中共党员致中共中央的公开信”。信中公开要求否定4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反对国务院关于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命令，要求“收回”李鹏同志的“5·19”讲话，对党中央施加压力。他们四出拉党员签名，在遭到广大党员的抵制后，只得拉非党员充数，然后匆匆电传北京，捅到海外，制造“上海共产党员也行动起来”的假象。

5月22日，《导报》极少数人又积极串联，组织所谓上海知识界声援北京，反对戒严的大游行，根据来自北京的“信息”，《导报》某些人书写了“打倒李杨反党集团”、“彻底粉碎李

鹏反党反人民的政变阴谋”等反动横幅。他们在游行中，又公然打出“罢免李鹏”等横幅，高呼“打倒李鹏”等反动口号。钦本立以“白发苍苍、步履细慢”之态，参加了游行，成为这次游行最引人注目的镜头之一。

《导报》极少数人还不惜与反动分子为伍，公然与臭名昭著的反动组织“中国民联”头目经常电话往来，保持密切联系。

钦本立等人还乞灵于用海外反动舆论工具向党和政府施加压力。《导报》极少数人频繁接受海外新闻记者的采访，港台和西方的舆论工具连篇累牍发表有关《导报》的文章，为《导报》极少数人张目。据不完全统计，关于这方面的报道有300多篇，仅香港某报从4月25日到6月17日有关《导报》的新闻就达40篇以上。

北京平息反革命暴乱以后，《导报》极少数人仍负隅顽抗。6月4日以后，港台及西方一些新闻机构造出什么“血洗天安门”、“黑色六月四日”之类的谣言。《导报》极少数人竟将这些反动材料复印、散发、张贴，他们还要《导报》工作人员佩黑纱，两次企图组织游行，均遭到《导报》群众抵制。一直到6月9日，《导报》仍约有20人参加上海“高自联”等非法组织在人民广场搞的“追悼会”，并拟在广场举行记者招待会。但是，上海人民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坚决制止动乱，这个记者招待会遂成为泡影。

留下深刻的教训

《导报》在这次动乱中的恶劣表演是偶然的吗？否。

《导报》于1980年6月经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批准创刊，由上海社会科学院主管。《导报》创刊以来，在宣传改革开放

方面，曾发表过一些比较好的文章。但是，与此同时，在总编辑钦本立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导报》也发表过许多错误文章，受到过中央与上海市委的多次批评。上海市委有关部门曾于1985年和1987年两次派员进行整顿。钦本立也曾多次检讨。但是，赵紫阳同志对《导报》总是予以支持和庇护。例如，1987年整顿《导报》的关键时刻，他的秘书到《导报》慰问，使整顿工作无法进行下去，因而，《导报》问题一直没有彻底解决。上海市委曾派一些同志加强《导报》领导力量，也先后被钦本立有恃无恐地排挤出去。特别近两年来，《导报》迎合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越来越多地发表违反和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文章，沿着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道路迅速滑了下去。

《导报》事件的性质是严重的，留下的教训是深刻的，有待于认真地全面地总结和反思。它告诉我们，与《导报》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搞政治阴谋的人的斗争，决不是要不要新闻改革之争，而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尖锐斗争，是动乱与反动乱的政治斗争。它还告诉人们，在我们国家，任何舆论工具如果摆脱党的领导，背离社会主义方向，必然会滑到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泥坑中去。新闻改革，如果离开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前提，必然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大泛滥。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原载1989年8月19日《北京日报》）

上海动乱真相

施 岩

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在首都北京的学潮、动乱和反革命暴乱，报纸上已作了详尽的介绍，其真相已大白于天下，而同一时期，发生在上海的严重的学潮、动乱和局部骚乱，还没有作过系统的披露，人们还不太了解它的来龙去脉。这里，我们以写实的手法，记录了上海动乱的前前后后，意在帮助人们了解上海这场动乱发生、发展的全过程，以进一步认清这场动乱的性质、根源和危害，从中引出有益的经验教训来。

这场动乱是早有预谋的

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这场风波是在国际大气候的影响下，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长期泛滥的结果。由于赵紫阳同志的纵容和支持，近年来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愈演愈烈，一些人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到处鼓吹经济私有化、政治多元化、文化西方化。去年九月，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针对过去几年经济工作中出现的某些严重失误，提出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一些热衷于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尤其是赵紫阳身边的一些智囊人

物，凭借他们敏锐的嗅觉，预感形势不妙，便利用国内外、境内外的传播工具，竭力反对治理整顿方针，透露出“倒邓保赵”的政治信息，为这次动乱作了一系列思想、舆论和组织准备。与赵紫阳的智囊团关系极为密切的《世界经济导报》，在十三届三中全会以后，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散布治理整顿必然导致经济“停滞”、改革“逆转”，并攻击李鹏同志在七届二次人代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耸人听闻地提出所谓要防止改革“走回头路”，把治理、整顿与改革开放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港台一些报纸也别有用心地称改革已走上绝路。今年年初，《世界经济导报》又异乎寻常地全文转载了北京《经济学周报》发表的严家其与温元凯《关于时局的对话》。严家其在这篇《对话》中毫不掩饰地说：“我觉得应当直截了当地把对中国前途的这种担忧说出来”，“就是不能重蹈赫鲁晓夫、刘少奇那样非程序权力更迭的覆辙”，并说“这种苗头许多人已经感到了”。这篇重头文章显然是为了掩盖赵紫阳的错误，保住他的权力地位，以便可以肆无忌惮地推行资产阶级自由化。在这期间，上海与北京的所谓“精英”人物频繁往返，南北奔走，又是召开研讨会，又是发表文章，明里暗里进行了大量极不正常的活动。

象1986年底、1987年初一样，极少数人把挑动动乱的主要目标放在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青年学生身上。今年年初以来，他们利用高校这块阵地，打着“理论研究”、“学术探讨”的幌子，散布了一系列明目张胆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观点。一些人在上海高校内偷偷地张贴“海报”，蛊惑人心地说什么“危机！危机！危机！信仰危机！体制危机！前途危机！历史责任感逼迫我们大学生站在时代之前”，公开号召要“搞组织”、

“结成社团”，“共研现时社会”。一些人以诗歌、话剧、小说、大字报等形式，“纪念八六年学潮”，煽动“走上街头，为民主、自由、人权而呐喊”。一些人则暗中串连，别有用心地在学生中传说“北京五四要上街”、“上海今年肯定要动”，“要用血来纪念五四”、“要大干一场”。当时上海高校有人曾洋洋得意地说：“现在全国好比一堆干柴，只要方励之等人出来领头，这堆干柴一点就燃。”

动乱的征兆果然在境内外的相互策应、紧密配合下悄悄地引发起来了。今年1月，海外和国外一些组织不断鼓噪要求“中国政府释放魏京生等一切政治犯”。“中国民联”成员陈军（复旦大学82级毕业生）与方励之、苏绍智、严家其、包遵信、张显扬、李洪林等人密谋把所谓要求释放政治犯的“签名运动”引向上海。王若望闻风响应，声称“上海不能沉默，要奋起直追！”并伙同一批臭味相投者，企图在上海发起签名运动，“南北呼应”，向政府施加压力。王若望还亲自修改了征集签名稿，圈定了30多位知名人士的名单，研究了“先易后难、先分后合”的策略。并派人上门征集签名，准备发往香港登报。

“中国民联”也把黑手伸向上海。这个以“取消四个坚持，释放一切被捕的持不同政见者”为近期目标，并将“推进中国大陆民主运动”作为“现阶段的工作重点”的反动组织，把上海作为他们今年工作的主要目标，早在年初就派遣汤光中等三人从美国潜入上海，携带胡平、王炳章等人给杨巍的亲笔信、祝贺卡，准备在杨巍刑满释放时去监狱门口迎接，以此扩大中国民联影响，实现其所谓“政治登陆”。后被我公安机关及时发现，使他们的阴谋未能得逞。

今年3月，上海不少高校陆续收到大量来自境外的“心

战品”，有的攻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提出“要迫使邓小平第四次不光荣地下台”；有的煽动大学生在五四期间搞全国性统一行动，“要以鲜血来纪念五四”。

鉴于上述种种迹象，上海高教系统很多同志预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并采取了一系列预防的措施。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就在胡耀邦同志逝世前两天，上海有一所高校的学生会收到署名“广西大学学生会”的《告全国大学生书》，鼓吹“没有小乱，就会出现‘文革’那样的大乱；没有短乱，就会出现十年长乱。乱一点并没有什么可怕”，还蛊惑人心地提出：“全国大学生们，‘五四’即将来临，届时让我们高举胡耀邦的画像和民主、自由、尊严、法制的大旗”。出人意料的是，胡耀邦同志恰在这个时候突然病逝，极少数人认为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们打着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旗号迫不及待地借题发挥，煽动学潮，制造动乱。因此，这场动乱在这个时候发生表面看来似乎是偶然的，其实是蓄之既久，早有预谋的。

学潮一开始就被极少数人所操纵和利用

上海的这场学潮和动乱，大致可分四个阶段：从4月15日—4月26日，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借悼念胡耀邦同志逝世为名，掀起一股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平反的浪头；从4月26日—5月20日，学潮由学校向社会扩散，出现以“声援北京高自联”，“声援《导报》”，反对4·26社论，要求承认非法组织，要求所谓“新闻自由”为主要内容的大规模的游行、静坐、绝食、请愿；从5月20日—6月4日，国务院发布戒严令

后，继续出现矛头直指中央领导同志、明目张胆地反对戒严的连续不断的大规模游行，继而发动“空校罢课”；从6月4日至6月8日，在“高自联”策划下，几千学生和一批社会渣滓沆瀣一气，上街破坏车辆、堵塞交通，造成全市交通瘫痪。

这场学潮从一开始就被极少数人所操纵和利用。首先表现在学潮初期的大小字报、标语口号就具有鲜明的政治目的和动乱性质。其中一类是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4月15日，在胡耀邦同志逝世的当夜，华东政法学院就有人贴出一条标语：“耀邦你死得太惨了，中国太惨了。”4月18日，复旦大学贴出一张题为《警世钟》的大字报，公然喊出：“本死不死，除奸更待何时”；“让上帝把完成历史使命的人收留去吧，别只召去了耀邦”。4月18日张贴于华东师大内的一张大字报煽动说：“民主必须化，自由必须大，政府可以骂。”另一类是煽动学生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平反。如“追查胡耀邦辞职、去世真相”；“重新评价耀邦”；“重新评价1986年的学潮，为刘宾雁、方励之、王若望恢复名誉，还我方、刘、王！”等等。还有一类是反对治理、整顿方针，煽动“倒邓保赵”的。4月22日，张贴在复旦大学的一张大字报，称李鹏同志今年3月在七届人大二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是向改革派发出猛烈反击的檄文”；还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中央领导同志称为“保守派”，而把消极对待四项基本原则，怂恿支持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赵紫阳同志封为“改革派”，把四个坚持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对立歪曲为保守派与改革派的斗争。4月19日张贴于华东化工学院的一张题为“我们行动的檄文”的大字报说：“改革正处在危难之中，我们可以想象一旦保守派全面掌权，中国将导致何种局面”；“我们应该拿出实际行动支援

改革派，象莫斯科市民支持叶利钦那样支持我们的改革家。”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这个时候，《世界经济导报》抢在4月23日提前出版了第439期，单刀直入地提出了这次动乱的两条政治纲领：一是重新评价胡耀邦同志的功过，彻底否定1987年初中央对胡耀邦同志辞职的处理；二是彻底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在反对自由化中所谓“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平反昭雪。《导报》提出这两个动乱的政治纲领，其目的正如钦本立自己所说的那样“就是要邓小平检讨”。这期报纸理所当然地受到中共上海市委的严肃批评，并责令它停止发行。在这以后，《导报》某些人就不断出入于上海各主要高校，利用学潮制造动乱。许多高校的大小字报也都紧紧围绕这两个政治纲领大做文章。

学潮从一开始就被极少数人所操纵和利用，还突出地表现在学生以及某些非法学生组织的背后，都有那么一些出谋划策的“智囊”，他们活跃于幕前幕后，诱引大批无知的学生，从成立非法组织、进行秘密集会、采取恐怖行动，直到大规模破坏交通、制造骚乱，一步步登上动乱的战车。

复旦大学有一个以“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教师叶茂强为首的七名教师组成的“智囊团”。他们公然对复旦各派学生组织宣布：“智囊团是最高决策机构，决定的事一定要执行”。在这次动乱中，复旦大学学生搞静坐、闹绝食、堵交通、设路障等活动，几乎都有这个“智囊团”在参与策划指挥。甚至复旦“自治会”和上海“高自联”在后期炮制的各种宣传品，不少也是他们起草或修改定稿的。5月26日，叶茂强还跑到上海“高自联”秘密召开的21所高校代表会议上，为学生头头们分析形势，指点下一步“行动方向”。他说，昨天下午，我们理

论界开了一次会，认为：“一是万一上面采取高压政策，学生要进行自我保护，‘高自联’和各校‘自治会’的财产应隐蔽起来，以备后用；二是要准备打持久战，不仅要进行游行、示威、绝食、静坐，还要深入群众”，“要把启蒙运动的种子埋下去，让他生根发芽”，并声称“这就是我们对形势的总体指导”。

华东师大经济系副主任陈琦伟，在这次动乱中，一方面为学生出谋划策，充当“导师”，一方面多次向学生发表反政府演讲，公开煽动学生“打倒政府”，他说：“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使李鹏戒严，现在，这个目标已经达到了；第二个目标，我们是要把与全世界人民为敌的李鹏官僚独裁政府拉下台”。他还“指点”学生说：“我们不应提打倒官倒的口号，因为官倒不是一种现象，它是一种体制，这种体制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一个人发疯，全国跟着遭殃”；“这个政体造成当前经济困难、社会危机、信仰危机”。他的这些煽动性演讲被印成传单，广为散发，毒害了很多青年学生。

《世界经济导报》国内经济部主任陈乐波，也是上海动乱中直接操纵和利用学生的“智囊”人物。北京部分地区戒严后，他“建议”上海“高自联”和“中自联”（中等学校自治联合会）的学生代表“聚会研究下一步行动方向”。他向学生提出了三条“行动纲领”：（1）争取公民的基本权利。这次取得了游行权，我们还应有其它的权。（2）争取高校学生自治会合法化。我们的做法是一个一个把阵地夺下来，报社，工会，党支部，民主党派，夺一个是一个，能改造一个就是一个。（3）要抓住一切机会，进行新的启蒙。这次学潮是一次耕耘，我们应该多撒下一些民主权力的种子，还要有点剧烈的行动，让后人

有所收获。

与此同时，国外和港澳地区的敌对势力也有许多专线同上海“高自联”保持联络。“中国民联”频频插手上海的学潮。“民联”成员徐邦泰（原复旦大学学生）鼓动学生“建立独立的学生会”。“中国民联”总部还指派杨巍与上海“高自联”头头接触，对学潮予以“政策指导”。“中国民联”成员陈军，为了随时“与国内关系互通信息”，专门在其美国家中设立了一个指挥中心和专用电话，由陈军24小时值班，对上海的学潮、动乱遥控指挥。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在动乱中，更是频频向上海投寄各种煽动性的“心战品”，指挥上海潜伏特务“把握现状，参加学运，汇报成果”，并伺机发展组织。总之，各种敌对势力和社会不满分子都千方百计伸手操纵和利用学生，策划和加剧动乱，这已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动乱自始至终呈现“南北呼应”的特点

这次动乱的中心和主战场在北京，上海是与之遥相呼应的分战场。京沪两地极少数动乱的策划者、组织者、指挥者通过北京“三所一会”（即赵紫阳的“智囊团”）、《世界经济导报》驻北京办事处以及两地“高自联”组织和学生南下北上的频繁串连等多种渠道，策动上海“与北京联合行动”。在整个学潮和动乱过程中，“北京刮什么风，上海就下什么雨”。

学潮初期，北京高校出现许多“打倒官僚政府”、“打倒独裁统治”等颠覆性口号，上海高校也如法炮制，亦步亦趋。各校贴出的大字报有的咒骂我们的政府“是最腐朽的政府”，咒骂我们的党“是集权的党，是欺诈人民、靠不住的党”，有的要“打倒封建专制！打倒独夫民贼！”“推翻共产党，解散政府，改

组政府”。《人民日报》4月26日社论发表后，在方励之等人授意下，北京“高自联”立即发出改变策略的“新学联一号令”，把“打倒官僚政府”、“打倒腐败政府”、“打倒独裁统治”等颠覆性口号改成为“反官僚、反腐败、反特权”。上海在同一时间，也以“上海高校学生联合会”名义，在复旦大学贴出一张“通告”，统一规定游行时多提物价、官倒，“绝对不提打倒官僚政府之类的口号”。

当这次“学潮”和动乱“风起于青萍之末”时，由于上海市委、市政府于4月17日就旗帜鲜明地发出“通告”，提出“要严防坏人借题发挥，挑起事端，进行破坏活动”；又由于全市50多所高校的干部、教师以及社会力量，全力以赴地做好稳定工作，赢得了时间，争得了主动。在5月4日以前，全市51所高校、13万大学生中，仅三所高校、四五千人在街，教学秩序基本正常。但是，5月4日以后，风云突变，赵紫阳同志在亚行年会上的讲话，使形势急剧恶化。“学潮”和动乱以来，坚持上课的大多数学生和积极向学生做工作的大多数干部、教师感到泄气。如5月4日以前局面一直比较平静的交通大学，许多学生在收听了亚行讲话的当夜就议论纷纷：既然上街游行是“爱国运动”，那我们不上街的是不是就不爱国了？而那些搞动乱的人则从中看到了中央有人公开支持他们，摸到了气候，从而更加有恃无恐、肆无忌惮，使动乱以更大的规模、更为嚣张的气焰越演越烈。

这一时期，上海的学潮出现了两大特点，一是紧跟北京、声援北京，二是学生与《导报》互相声援，共壮声势。市“高自联”的头头们在5月10日下午策划组建上海高校学生“赴京请愿团”，并为此于11日在复旦大学召开记者招待会，声

称请愿团主要任务是“质问国务院：《世界经济导报》错在哪里，什么叫总编负责制等等”。行前，同济大学的“高自联”头头打电话给“北大自治会”，要求派人迎候。请愿团到达北京后，立即同“北高联”头头王育才等接上了头。为了加强同“北高联”的联系，上海“高自联”向北京派出了联络员，每天把北京的情况传到上海，把上海的情况传到北京。从那以后，北大“三角地”广场就经常可以看到上海学生行动的海报。

5月15日，上海学生从赴京请愿的代表那里获悉北京学生于13日开始静坐绝食，立即采取了两项“策应”行动：一是请愿团派其中5个人立即参加天安门广场的绝食，余下的人继续去北京各高校联络、演讲、递交请愿书。二是复旦、华师大、同济等校马上贴出倡议书，号召上海学生也进行绝食行动。赴京请愿学生还打电话给同济“学生自治会”头头，通报戈尔巴乔夫访沪的日程，要上海学生届时“有所动作”。5月16日下午，复旦、同济、上海工大等高校的数千名学生、研究生以及青年教师上街游行，声援北京学生的绝食请愿。当晚，成立了“上海高校绝食团”，50余名学生在市政府门前宣布绝食。5月17、18、19日连续3天，参加绝食的学生最多时达300多人。

与此同时，上海高校又陆续有大批学生到北京去串连并参加天安门广场绝食。仅上海工大，这一时期进京串连学生就达102人。5月19日下午，上海高校有人在与北京“高自联”头目王育才电话联系中，获悉当天晚上李鹏要发表讲话，北京要实行戒严，“消息来自上面，绝对可靠”后，立即随着北京“高自联”这根指挥棒，开始有绝食“降温”的准备。中央召开的党政军干部大会，使上海“高自联”极少数人感到靠绝食来加

剧动乱的阴谋已彻底破产，于是一面通知绝食学生撤回，一面采取了一系列更为激烈的对抗行动，在上海掀起了一股反对北京戒严和妄图推翻合法政府的反动浪潮，促使动乱进一步升级。

一是连续不断地组织大规模示威活动。5月21、22日，上海高校的少数人连续在复兴公园聚会，密谋近期“要不断地、持续地交叉游行”，即组织各校轮流上街，学生也分批上街，保持声势，保存实力；提出“近期目标，要李鹏下台，远期目标，实行多党执政”，并决定正式成立“上海高校自治联合会”。

5月23日，华师大“学生自治会”头头在该校共青广场的千人集会上说：“北京的学生现在心力不济，我们上海学生要多分担一些，要把学运的重点转移到上海来。”就在这时，“北高联南下宣传团”、“特别行动队”等纷纷窜到上海。“南下宣传团”头头赵文利（女，西北政治学院法律系83级学生）于5月24日持“北高联”常委柴玲签发的联系证明信，携带北京各高校印刷的大字传单、照片、演讲稿等宣传材料，与其他10多人潜来上海，先后与上海“高自联”常委张才（即姚勇战，复旦大学学生）等有接触，并在张才等人安排下，先后在上海工大、铁道学院、复旦、交大作了多次煽动性演讲，谩骂中央领导同志，说“‘李鹏不下台，我们天天来’，希望上海的学生坚持到底，复课无疑是对北京同学最大的背叛！”此后，这种说法便成为上海学生的“统一口号”，并连续组织了长达9天的游行示威。

二是配合北京极少数人策划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妄图“废除戒严令、罢免李鹏总理职务”的阴谋，由复旦、

华师大、同济、交大四所高校的“自治会”头头决定，5月25日下午在人民广场召开了所谓声讨大会。会议策划者供认，召开这次大会，是“要趁万里在上海之际，让万里知道上海学生不满，要求尽快召开全国人大和中央紧急会议，罢免李鹏，为学生运动正名、定性”。当天晚上，交通大学“自治会”召开有2500人参加的大会，上海教育学院的一个教师（原非法组织成员）作了题为《万里回国后的形势和对策》的演讲，煽动学生“要围绕人大的召开，进行呼吁，形成广泛的政治力量”；“这次人大应有市民和学生等各阶层代表参加，这是他们应该争得的权利”；“学生要向人大常委作思想工作，让常委会了解学生运动真相”等等。同一时间，复旦有人向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写信，鼓动各地“人大代表马上进京”，迫使“改组政府”。

三是配合北京极少数人阻拦戒严部队进城的阴谋活动，在上海堵塞交通、破坏经济。上海动乱的制造者们在北京部分地区戒严后多次秘密召开会议，商定“万一上海军管就上街堵交通，造成事实上的罢工”，并按“以就近学校为主”上街堵路的原则作了分工。在此期间，他们还派出大量人员，先后到铁路、码头、机场和驻军营房附近打听消息，察看有没有军队调动迹象。5月22日凌晨，华师大“自治会”头头以“今晨5时部队将进入上海实行军管”为由，紧急集合六七千名学生，于清晨4时分别占领了苏州河上的5个桥头，使市区5条南北主要干道被堵塞两个多小时。5月24日凌晨4时，复旦大学1500名学生也前往五角场地区的四平路、邯郸路、翔殷路、黄兴路、淞沪路等路段，以静坐方式堵塞交通，前后长达4个多小时。与此同时，“高自联”还组织了一批又一批

的学生，分头到全市各主要工厂企业进行煽动性宣传，企图挑动工人举行罢工。但全市各企业的干部、职工，坚定地响应市委、市府关于“稳定大局，稳定上海，坚持生产，保障生活”的号召，对这些煽动和挑唆进行了坚决的抵制，使他们的阴谋未能得逞。

四是组织“空校罢课”，对抗李鹏同志提出的“无条件复课”的要求。由于上海各高校坚决贯彻中央党政军干部大会的精神，对学生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各校大多数学生陆续返校上课，少数人感到形势对他们不利。5月28日下午，上海“高自联”按照天安门学生游行指挥部的指令，又挑动数万名学生配合所谓“全球华人大游行”，在人民广场举行大规模集会和游行。北京“南下宣传队”成员在集会上分头发表演讲。上海“高自联”头头在会上宣布：上海高校学生从现在起“空校回家”，造成“事实上的罢课”。5月29日，“高自联”向全市51所高校发出“空校公告”，鼓吹“空校是最彻底的罢课”，“是对李鹏所说的‘无条件复课’的最强烈抗议和无声的否定”，“是爱国民主运动的一个精彩插曲”；空校“将发扬播种机的作用，扩大这次民主运动的影响”。

短短几天内，市“高自联”发起的“空校罢课”活动迅即波及到大部分高校，给已经基本恢复正常教学秩序和上海高校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和干扰。不少高校除毕业班外，其它年级的学生成群结队，匆匆离校。“高自联”的极少数人并不因此罢休，他们策划撕毁各校张贴的恢复和维护正常教学秩序的通告；抢夺校广播台或私设广播台；冲印刷厂，强行印刷传播反革命谣言的传单；冲变电所，威胁学校安全；殴打公安保卫人员，抢劫报话设备；一些学生还到教工家属区哄闹，

千方百计鼓动教师“罢教”；对一些立场坚定、态度鲜明的高校领导进行围攻、谩骂，甚至到领导干部宿舍进行威胁，扬言要抄领导同志的家。一些不愿“空校罢课”的学生被谩骂，不让进教室，甚至把他们的衣被用具扔出宿舍；他们还冲击考场，破坏正常教学秩序。他们这样做，实质上是把一代青年的命运和广大同学的自身前途推到了危险的境地。

各种人物纷纷介入动乱迅速向全社会扩散

上海的这场动乱源于学潮，很快演变成为动乱，同社会上各种人物的纷纷介入是分不开的。上海作为旧中国的“十里洋场”，作为“四人帮”的老窝，那些“静观待变”、唯恐天下不乱的人，那些长期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而又搞政治阴谋的人，他们从学潮一开始就按捺不住心中的狂喜，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转机，是可以改变当前情况的转机”，而迫不及待地介入进来。以4月23日《世界经济导报》的介入为标志，动乱便迅速向全社会扩散，演变成为一场社会动乱。

《世界经济导报》是上海这场社会动乱的“策源地”。他们声称“在学潮中，导报应作为运动的主角身份发挥作用，要将自己的旗帜打出来，研究怎么改变中国的制度”。为此，他们一方面利用439期导报事件，多次召开所谓“新闻发布会”，煽动学生和新闻界声援导报，以“保持长期的压力、推进的势头”；一方面利用该报驻京办事处，随时把北京动乱情况传回上海，如本阶段北京动乱者的目标是什么，有些什么主要动向，严家其、方励之等发表了什么意见，中央领导对动乱以及对《导报》的看法有什么不同等。然后，《导报》的一些

人就通过翻印散发有关材料、到高校去演讲、与动乱的组织者个别串连等方式，把有关消息迅速传播开来。《导报》卷入上海这场社会动乱的程度，从复旦大学非法学生组织头头写信“感谢”《导报》老师的“宝贵指导”和上海“高自联”的“最新消息找《导报》，理论指导找《导报》”的白白中可见一斑。

上海理论、新闻、出版、文化、教育等战线，有那么极少数人长期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同国外的政治势力有着密切的联系，同北京参与策划、组织、指挥暴乱的幕前幕后人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在这次动乱中也上窜下跳，极为活跃。

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头面人物王若望，在这次上海动乱中，几次三番上街游行，多次接受境外记者采访，还频频向境外报刊投寄支持动乱、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章。学潮初期，他得意洋洋地对人说：“你们看，可有好戏看了，我盼望的一天终于来到了”；“5月份尚未到，在4月份就掀起了这样的浪潮，比八六年的学生运动更成熟了，这次事件肯定是全国性的，肯定会产生出一个新的转机”。4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后，王若望急忙为香港一家杂志撰文，攻击社论是“中共领导层迈向自取灭亡的病危通知书”。5月中旬，北京和上海部分学生绝食，王若望煽动说，“我不仅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老祖宗，而且是绝食的老祖宗，一生绝食四次”。他参加游行时身披条幅，胸前写着“铁石心肠，可悲可叹”，背后写着“救国救民，救救学生”。王若望还说，“有人担心，这一来共产党被打倒了，中国没有干部了，今后怎么办？其实这是多此一举。严家其、方励之等都是政治家，现在又涌现多少象王丹这样年轻有为的接班人，还有赵紫阳这样的人

嘛！”他还暗中排列组阁名单，提出“学生运动胜利后，要同知识分子组成集团，召开国家会议，修改宪法，组织联合政府”，真是利令智昏到了极点！

以王若望为代表的极少数长期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还挑动和裹胁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多次走上街头，为学潮和动乱火上添油，推波助澜。一些新闻单位、理论研究部门、群众团体以至个别党政机关的少数人，也打着横幅上街。各种“呼吁书”、“公开信”也频频出台。上海作协也有那么几个人，在王若望的蛊惑和策动下，着手起草《向世界各国笔会的呼吁书》、《给全国作协及人民的通电》，企图用国外舆论向党和政府施加压力。一时间，种种极端反动的观点公开散布，形形色色蛊惑人心的政治谣言广为传播，各种各样践踏民主、破坏法制的无政府主义行为到处蔓延。城市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遭到严重破坏。

在这次动乱中，上海还有几个身居党政机关要职的共产党员，公开同中央对抗。在5月19日中央党政军负责干部大会之后，他们策划起草了所谓上海市的共产党员《致中共中央公开信》，提出要求中央召开紧急会议，“收回李鹏5·19讲话”、“否定4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立即解除新闻封锁”，同北京“三所一会”的活动遥相呼应。这份《公开信》复印数百份散发至本市新闻、理论、文化、高校、企业广泛征集签名。它一出笼就受到上海广大共产党员的抵制，指责这种行径是唯恐天下不乱。但策划者们还是急不可待地通过香港报纸发表了消息，并公布了部分签名名单，在海内外造成恶劣的影响。

在这次社会动乱中，上海社科院研究生部的部分博士

生、硕士生也是一支极为活跃的队伍，其头头是“高自联”常委之一。这批人几乎参与了上海“高自联”中后期的所有的破坏活动。就在动乱期间，他们还举办了所谓“当前中国政治和思想热点”系列讲座，企图把动乱扩散到更广的范围。从6月4日开始，他们还在淮海中路闹市区社科院门口梧桐树上安上高音喇叭，连续不断地播放“美国之音”等海外电台的反动叫嚣。直到6月10日上午，他们还纠集了四五十人，到康平路市委机关外面游行示威，喊叫一些非常反动、恶毒的口号。

动乱期间，一些“四人帮”残余分子得意忘形。他们私下里议论说：看到“现在这种形势，我们‘造’字头心里不晓得有多高兴！”“这次搞的就是‘文化大革命’。”他们相互庆贺“要改朝换代了”，“出头的日子不会太远了”；还采取各种方式支持和煽动闹事，妄图“出来撑一下局面”。据现在初步掌握的情况，本市“四人帮”残余分子在动乱期间乘机公开活动的就有35名，其中，公然跳出来煽动工潮的就有11名。

上海的一些社会渣滓在动乱中先后拼凑了14个非法组织，后来凑合成所谓“上海工人自治联合会”（“工自联”），提出了所谓“组织工人罢工，建立自己的武装，打倒李鹏政府，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组织纲领”，并与上海“高自联”勾结在一起，纠集社会上的一些乌合之众，游行、演讲、发传单、造谣言，进一步煽动和制造动乱。

北京“平暴”铲除动乱根源 上海人民一举稳定大局

6月3日晚，北京发生反革命暴乱，党中央、国务院采

取果断措施，一劳永逸反革命暴乱。消息传来，上海动乱的组织者、策划者、指挥者们乱了阵脚，躲的躲，逃的逃，也有的象输光了的赌徒那样孤注一掷，疯狂进行各种破坏，将上海这场动乱推向极端。

他们首先利用平暴初期北京有几天信息不畅的机会，大造反革命舆论，歪曲北京平暴事件的真相，搞乱人们的思想。从6月4日凌晨起，各种传单、小字报充斥街头，特别是通过港报复印件传播所谓“北京镇压真相”。交通大学图书馆的复印设备，竟被一些人用来大量复印歪曲北京平暴真相的香港报纸，并四处散发。《世界经济导报》在社科院门前的宣传栏里也连篇累牍地张贴、复印港台及西方一些新闻机构编造的“血洗天安门”、“军队内部火并”、“38军倒戈”等谣言的报刊及图片。在极少数人策动下，上海高校一些学生组织了所谓的宣传队走上街头，用自制广播台和手提喇叭传送各种谣言。复旦大学“自治会”还组织一批学生到市政府和一些新闻单位门口用高音喇叭放哀乐。有个自称是刚从北京回来的人向围观者歪曲地介绍北京情况，呼吁市民进行“三罢”，呼吁其他国家立即与中国断交，撤回驻华大使，进行经济制裁；并叫喊“党员要退党，团员要退团”，“军人家属要挂白色挽联进行抗议”等等。同济等高校甚至在马路上拉出广播喇叭公开播送“美国之音”和台湾“自由之声”等电台的反华反共广播。

上海动乱的极少数策划者、组织者和指挥者在绝望中加紧了反革命破坏活动，策动堵塞大小交通，造成事实上的停工、停市，搞瘫经济，搞乱上海。6月4日下午和晚上，“高自联”两次召开紧急会议，决定6月5日凌晨4时统一行动。

驱使成批学生在一些社会渣滓配合下，上街拦截车辆，设置路障。据不完全统计，在6月4日至3日的5天内，全市共有234个马路道口被反复堵塞979次，有六千多辆机动车被强行拦停用作路障，其中有16辆被掀翻、砸毁、烧坏，有1223辆（内公交车1017辆）被戳破轮胎或砸坏。与此同时，他们还在市内许多铁路道口卧轨，拦截火车，破坏铁路运输。光新路等十一个铁路道口被反复占据、堵塞，沪宁、沪杭线铁路运输中断近50个小时，共有281列客货列车无法到发。6月6日晚，在铁路光新路道口还发生了焚烧列车、殴打司机和公安干警的严重骚乱事件。在这次骚乱中，共烧毁了9节列车车厢，殴打170多位民警和铁路职工，直接经济损失达570万元，骇人听闻，影响极坏。

极少数人策划的堵塞全市交通的卑劣行径激起全市人民的强烈不满。他们原先的如意算盘是，经过3天的强制性的停工、停市，加上他们的反动宣传，就可以引发上海工人自觉的罢工、罢市，谁知结果适得其反。上海人民，特别是工人阶级，在北京平暴真相的教育和感召下，日益坚定地站到党和政府的一边，对动乱制造者的怨愤越来越强烈。极少数动乱策划者担心再这样搞下去“会激起民愤”，经开会研究，决定改变策略，组织多路小分队冲击工厂，迫使工人罢工。因为他们认为“工人一天罢工的压力，等于学生十天静坐的压力”。从6月7日起，成批学生小分队便来到了江南造船厂、上钢五厂、大中华橡胶厂、宝钢等一批大厂以及上海柴油机厂等“文革”中的“重灾区”煽动工人罢工，遭到这些工厂党政组织和广大工人的坚决抵制。

这段时间里，极少数动乱的策划者、组织者和指挥者，

还铤而走险，大搞恐怖活动。他们煽动大学生“制造、购买武器”，同党和政府进行“武装斗争”。6月5日至6日，在复旦大学、上海科大、华东化工学院分别贴出鼓动恐怖活动的大字报，煽动学生“抛去一切幻想，拿起各种武器同伪政府战斗到底”；“自制各种化学、机械武器，自发组织各种行动小组，破坏官僚豪华汽车，打伤甚至杀掉伪军、伪警和各级高级官员，破坏军方设施”；还扬言“不是敌人踩着我们的尸体前进，就是我们踩着敌人的尸体前进”。复旦、同济、交大、华师大、外贸学院的一些人甚至公然煽动学生自制燃烧瓶、手榴弹，“搞化学武器”、“爆炸加油站、化工厂”，企图制造大乱。在他们的挑唆下，同济一些学生购置了一批水果刀和西瓜刀。一些学生头脑发热，干出了一系列打、砸、抢、烧活动；6月5日，工大部分学生将公交六场一辆抢修车拦住，砸碎玻璃，砸坏发动机，抢走工具，最后将车身掀翻。6月7日，在江湾五角场，一些学生和社会不法分子将一辆公交75路公共汽车放火燃烧。6月10日，复旦、同济约100多名学生还在“高自联”头头张才等人策划下，组织了所谓“英雄敢死队”，到市公安局门口静坐、示威，“抗议”公安局逮捕上海“工自联”成员。

6月初在上海出现的连续几天强烈的动乱，虽然其势汹汹，但毕竟已是强弩之末，起不了多大作用。6月4日、5日，“高自联”还能先后动员3500到7000学生上街，到7日、8日，要动员几百人都已困难。6月9日，“高自联”在人民广场召开的所谓“悼念北京死难同胞追悼会”，事前他们在各校作了七八个小时连续动员，才勉强拼凑到4000人。会后，一群人窜到《解放日报》社门口呼口号、烧报纸，并冲击黄浦

区政府，用油漆肆意涂抹区党政机构的招牌，群众称这些人的暴行是最后的蹦跳。

这里还要指出的是，北京平暴以后，上海与北京的极少数动乱的策划者曾经企图搞动乱“中心南移”，在上海成立所谓“全国高自联”，继续负隅顽抗。6月3日，上海“高自联”头头张才曾到北京找到了北京“高自联”秘书长王有才，密谋“成立全国高校自治联合会”。王有才说：现在“北京‘高自联’一部分人撤了，一部分人失踪了，一部分人躲了，‘北高联’已没有力量搞‘全国高自联’了，还是把‘全国高自联’设 在上海。”6月9日，张才返回上海，原来还想大干一番，当他看到形势剧变，发现上海“高自联”也不行了，便想一溜了之，跑到香港去成立所谓“全国高自联”筹委会。6月11日下午，他公然抗拒市政府6月10日发出的关于取缔非法组织上海“高自联”的通告，拒不向公安机关登记，并在某国驻华使、领馆官员的“陪同”下前往虹桥机场，企图逃往香港，被我公安机关当场扣押。6月10日晚上海“高自联”召开常委会，哀叹“鉴于目前时局”，“我们要作好长期斗争的准备”，“不要再作无谓的牺牲”。华师大“学生自治会”当晚贴出题为“别了，师大人”的大字报，宣布即日起“自行解散”。6月11日，复旦、同济、华东化工等高校“自治会”也纷纷以布告或广播形式，自行宣布“解散”。在这以后几天，上海“高自联”的头头或自首，或转移，或逃窜，至此，上海持续近两个月的学潮至动乱才逐渐平息。

在平息上海这场动乱中，工人阶级起了决定性的作用。6月8日，朱镕基市长发表关于“稳定大局、稳定上海”的电视讲话以后，当天晚上，10万工人和上海干部、市民一起走

上街头，清理路障，6月9日清晨，被阻断了几天的市内交通一举恢复，浦江两岸重又展现出一派和平劳动的景象。上海的动乱之所以能依靠工人阶级而一举得到平息，其决定性因素是北京果断地平息了反革命暴乱，从根本上铲除了制造全国动乱的策源地，端掉了他们的“老窝”，也给上海极少数制造动乱的分子以极大的威慑。北京暴乱的真相，特别是一小撮暴徒疯狂残害人民子弟兵的惨象，给了全市干部、职工以极大的教育。上海在处理学潮和稳定社会的整个过程中，自始至终得到党中央、国务院及时的指示和支持。没有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没有北京的果断行动，上海的动乱是平息不了的，要求得上海局势的稳定也是很难想象的。

上海动乱已经平息了。这次动乱留给我们的经验教训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恐怕是“五个不能低估”，即：第一，对上海动乱的严重性决不能低估；第二，对上海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的严重程度决不能低估；第三，对上海动乱的社会基础决不能低估；第四，对境内外敌对势力在动乱中对上海的种种渗透破坏决不能低估；第五，对赵紫阳淡化党的领导给上海党组织造成的严重思想混乱决不能低估。我们要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和市委第五届八次全会精神指引下，深入开展清查清理工作，除恶务尽，不留后患；同时要认真地总结过去，开拓未来，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稳定上海、稳定大局、保证我们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而继续努力奋斗。

（原载1989年9月21日《文汇报》）

接受要求之后的动乱升级

——4月17日至18日记事

任玉清

一些善良的人至今还认为，政府如果早点接受学生的请愿，早点与学生对话，早点对学生让步，就不至于发生动乱和暴乱。

但是，事实告诉我们，无论政府怎样克制和容忍，极少数人总要把动乱升级。

4月18日，王丹等人首次要求同全国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对话，继而煽动学生首次冲击中南海的行动就说明了这一点。

4月15日，胡耀邦同志逝世。广大群众和学生沉痛悼念胡耀邦同志。但是悼念活动也出现了明显的异常现象。4月16日香港《明报》的一篇报道说：“挽联和大学报的性质已经渐渐从个人哀悼转为政治化，要求民主、批评当权者的政治改革。口号越来越多，哀悼之思，一夜之间转化为气愤之情。”

4月17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刊登一幅群众在纪念碑前

围着花圈的照片。日本共同社记者称,《人民日报》这一行动“表示党承认这种做法。”许多学生也正是这样认为。

这天,第一支进入天安门广场的是中国政法大学近500人的队伍,学生们说,他们是看了《人民日报》的照片以后来的。

北大王丹等人也将花圈送到了天安门广场。到了夜里,王丹又在北大三角地鼓动了近千名学生去天安门广场。

18日凌晨,王丹在纪念碑前演讲,提出了事先与李淑娴等人商议过的7条要求,其中最主要的是两条:一是,重新评价胡耀邦同志的是非功过;二是,彻底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反自由化中所谓“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平反昭雪。这两条的实质,就是要在中取得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实现资本主义化的绝对自由。

清晨,学生们被鼓动到人民大会堂前,提出向人大常委会递交请愿书。出来接待的工作人员答应负责转达他们的要求。

7时30分,王丹让同学们坐下,自己去给李淑娴打电话。王丹回来后说,李老师让我们继续坚持,她将动员6千多学生来声援我们。

8时,中央办公厅、国务院信访局负责同志邀请学生代表进入人民大会堂,听取他们的意见和要求。王丹、郭海峰(后来担任“高自联”秘书长),将请愿书交给信访局负责同志。

本来事情已经可以结束。但王丹等又称这次对话不能令人满意,又要求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出来对话。

9时30分,李淑娴在北大三角地贴出三张小字报,号召

人们前去声援天安门广场的学生。

10时30分，坚持在广场静坐的只剩下二三百人。王丹将让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出来对话的要求，降为让副委员长出面。接待人员向他们解释，请委员长们出面要有一定程序。

中午，广场上的学生只剩下一百多人。王丹等人又降低了要求，说让人大常委会委员出来也可以。

下午3时，部分高校的几百名学生陆续到达广场，王丹开始煽动学生冲击人民大会堂。

下午5时，接待人员答复学生，人大常委会委员刘延东等三人将与学生座谈。

这时，广场上的学生陆续增多，王丹等人突然提出不对话了，要求人大代表在晚7时50分在人大大会堂东门外第一层台阶上当众接他们的请愿书。并说，只要接了请愿书就什么事也没有了。

有关领导又同意了学生的这一要求。

晚7时50分，人大常委委员刘延东，人大代表陶西平、宋世雄在人大大会堂东门外从郭海峰、李京津(后来担任“工自联”法律顾问)二人手里接过了“十点示威要求”和“七点要求”的请愿书。十多位外国记者早已对准了摄像机镜头。

接下请愿书，果真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吗？

不，3个小时之后，马上就发生了2千多人冲击新华门的事件。他们围聚新华门前，堵塞了长安街的交通。他们打伤了维持秩序的警卫战士，呼喊着重：“李鹏出来”，每隔半小时冲一次新华门。值得注意的是，人群中有人(自称是北大学生)竟打着写有“绝食”二字的横幅。而此时，王丹却嘻笑着与两个女同学站在一边看热闹。

19日凌晨4时20分，市政府在现场广播了通告，指出冲击党政机关是违法的，是法制不能允许的，这已不是正常的悼念活动。要求在场的人群离开现场。

当工作人员和值勤武警一出现，王丹第一个溜掉了。

清晨5时许，在工作人员和值勤武警的劝说和疏导下，围聚在新华门前的人逐渐散去。

为什么王丹等人递交了请愿书后，又提出对话？有关方面答应对话后，他们又要求当众接请愿书？这一要求满足了，他们为什么又去冲中南海？

请看北大一学生事后揭发的材料：

“4月19日，当我怀着兴奋的心情与另外几个同学聊我们在天安门和新华门前的行动时，一位不是我们班，但是行动的中坚人物（王丹）说，新华门前最来情绪的就是拱起警察的火，只要警察无奈，一动手，我们就有借口把事情扩大。我问，那你们是有志让警察打我们了？他说：话不能这么说，但这样才能号召同学。

原来如此，我心一抽。我是怀着为民主献身愿望参加这一伟大运动的，没想到有人竟利用我。经验告诉我，阴谋家制造冲突都是这一套，而坐收渔人之利，而今我身边也有！”

这位同学和更多善良的人们当时也许没有想到，这还仅仅是开始。以后，类似的，或者说是更恶劣的阴谋、欺骗，在这场风波中还将一再出现，极少数策划者非使动乱不断升级不可，他们早已下了决心。

（原载1989年7月18日《北京日报》）

炮制出来的“4·20新华门血案”

——4月19日夜至20日凌晨纪实

任玉清

4月18日夜至19日凌晨，王丹等人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请愿书后，又冲击了党中央国务院所在地新华门。虽然事先李淑娴曾向王丹授意过：“到新华门静坐，必要时往里挤，只要警察敢管，就是打人。这样能唤起同学的同情心。”但是公安人员一出现，人群很快就驱散了。动乱的策划者和组织者蓄意要制造流血冲突的阴谋没有得逞。

但是，他们绝不愿意就此罢休。虽然他们当时还想不出用大学生们的名义提出任何新的请愿要求，也找不到什么需要找国务院交涉的事由，然而，19日夜至20日凌晨，他们又煽动和指挥北京的一些大学生和社会上的人再次冲击新华门，以制造一个根本没有血案的所谓“4·20新华门血案”，再次将动乱引向升级。

19日晚，王丹等人在北大三角地主持的第16次“民主沙龙”上，暴露了他们誓与党和政府斗到底的用心。他们提出，新成立的“北大团结学生会筹委会”要接受上次行动“没有组

织、没有纲领、没有口号”等教训，领导“五四”以前的一切学生运动。一个学生还当场传达了金观涛的意见：“当前形势对我们非常有利。清华、北大要联合起来。”一些人还提出要用行动来实施严家其的观点：“流血可以推进民主化的进程。”

与此同时，一些“行动者”则在新华门又掀起了一股狂潮。

这天晚上21时许，数以千计的学生又一次向新华门聚集。尽管有的大学生竭力要求人们坐下，但大约半小时后，一些人便开始有组织地向新华门冲击。执勤官兵组成几道人墙，顽强地阻拦着洪水般涌来的人群。

零点左右，疯狂的冲击达到高潮。黑压压的人群狂飙般地一次接一次地向新华门大门口逼进，门前的警戒线一次次地被撞成“S”型，警卫战士的军衣早已被汗水湿透。这时，一个谣言在人群中飞传：“中央的头儿就在新华门的二楼上，实在闹急了，就下来和学生们对话。”冲击者更加狂暴了，瓶子、鞋子、石块、还有花圈一齐抛向警卫战士。有人挥舞着拳头，不断高喊着：“李鹏出来！”有人辱骂警卫战士：“奴才滚开。”还有人无端地怪叫着：“不许打人！”此时，一些外国记者则爬到新华门前国旗旗杆的底座上，不断地拍照、录音。一个又高又瘦的外国记者还连声大喊“OK！”

大约冲闹了40分钟后，冲击的人群疲惫了，一些学生坐了下来。吾尔开希等人便站出来进行煽动，打气，什么“××滚蛋”等语言不断地从他们嘴里进出，恶毒咒骂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顺口溜也不断流传。

这种野蛮冲击党中央、国务院所在地的情形即使在“文

化大革命”中也没有发生过。为了制止事态进一步扩大，20日凌晨2时30分，市公安局的宣传车，开始在新华门东侧的长安街上广播北京市人民政府的通告，要求新华门前的人立即撤离，警察也开始对长安街进行清场。

到凌晨4时，在新华门前静坐的一百多名大学生仍坚持不走。在市公安局和一些学校领导的一再劝说下，有一些同学站起来想走，但马上有人威胁道：“谁走谁就是叛徒！”想离去的学生又怯生生地坐下了。

4时50分，市内一些公共汽车即将按时发车，而这百余名大学生还是不肯离去，眼看交通就有阻塞的危险。于是，不带任何警械的公安干警们制止了有些大学生推搡拉扯的抵抗，强行架着他们上了公共汽车。

学生们上车后仍在狂呼乱叫，还打碎了车窗玻璃，有的学生因此刮破了手臂。吾尔开希从车窗探出脑袋对着警察又叫又骂，一名女学生高喊：“打倒共产党”。这时，在现场的一名工作人员立刻蹬上汽车，严厉地说道：“我听见这个女生喊‘打倒共产党’。你们说，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听到这义正辞严的声音，又见有4名警察也上了车，学生们才安静下来。随后，司机将车驶出新华门地段。

20日凌晨，新华门前除了个别学生打破车窗时手臂被划破外，根本没有发生什么流血事件。

事后，外电在报道此事时都说，警方采取了极其克制的态度。有的报道还说，看到这种在美国白宫前都绝对不会发生的事情在新华门出现，“感到十分震惊”。就连最能造谣的“美国之音”也只能说：“学生宣称，200多人挨了警察的打。然而记者只看见几十人推打。学生说40多人被拘留，记者没

有得到官方证实。”

然而，在首都一些高校的校园里，却立即传出了耸人听闻的所谓“4·20新华门血案”的谣言。

20日凌晨5时许，将学生们强行带离新华门的汽车开到北大南门后，冲击新华门的学生马上涌到了北大三角地，有人演讲“新华门前血流成河”，有人居然展示什么“血衣”，有人竟然呼喊着“讨还血债”的口号。北大当天就贴出十几张大字报，“谴责政府暴行”，其中一张题为《法西斯的镇压》大字报竟把谎言编得绘声绘色：“大批公安警察突然出现，冲开手无寸铁的群众，大喊‘打死他们，往死里打’。警察专打后脑、腰、肾、胸和其他要害。”

清晨7时，在北师大校门口，几名学生商议完22日游行事宜后，一个学生便向行人演讲：“昨晚警察在新华门打人了，不光打学生，还打了老人、女人和孩子。从西单一直打到王府井，是上头让他们干的。”

在人大、清华等数十所高校还出现了“一千名科技工作者倒在血泊中”，“4名学生代表被扣留”等弥天大谎。别有用心的人还嫌不够，又抓住4月19日晚北师大女生郭向东看演出归来，与无轨电车相撞致死一事，无中生有地造出了“共产党的军车轧死了学生”的谣言。

有人说：这场动乱的策划者搞的是“谣言政治”。一点也不惜，正是这一个个谣言的蛊惑和挑唆，大大激化了青年学生同政府的对立情绪。4月20日北京高校大字报的一个突出内容就是号召学生们罢课，游行，参加“4·22”胡耀邦同志追悼会。北大“团结学生会筹委会”贴出了《告北京高校书》，提出“近期请愿活动的目的是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其形式是

游行、罢课、静坐、绝食。”吾尔开希则在北师大学生集会上公开叫嚣“偿还4·20血债”，鼓励学生21日晚“到天安门广场去，继续斗争。”李淑娴则早就指示：“下一步要求参加追悼会，很多人都有这种心理。这样事情就更大了，还能推向全国。”

动乱的策划者们制造一个实际上没有发生过的“4·20血案”，就是利用大学生自视“特殊公民”的心理弱点，为这个“下一步”作舆论准备。他们平日吹捧大学生能够作出“理智的抉择”，但是这时，他们需要的却是大学生失去理智的狂热。这是动乱升级的需要。两天之后，“下一步”——一个新的圈套正在等着北京的大学生呢。

（原载1989年3月22日《北京日报》）

新华门作证

郑岩

新华门是中南海的正门，又称河府门。她坐落在西长安街上，东接天安门，西邻六部口，庄严肃穆、崇高神圣，门前有国旗迎风飘展，有雄狮巍然耸立，有长青树茂密地生长，有和平鸽安然地飞翔……

每一位有良知和自尊心的中国人走过这里，心底都会泛起一种沉甸甸的自豪。

然而，公元1989年初夏的几十个日夜里，却有人置法律、国格于不顾，在这里上演了一幕令人愤慨的闹剧。他们在这里掀起标语，竖起旗帜，扎起帐篷，绝食、静坐，闹得乌烟瘴气。国家的尊严受到了空前的践踏和蹂躏。新华门，成了全国全世界瞩目的地方。

令人欣慰的是，闹剧很快结束，以人民胜利的结局降下帷幕。这里发生的事情的真相如何？作为这幕闹剧的见证人，作为处在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第一线的卫士，新华门警卫战士们愿意站出来，向历史作证！向每一位后来者作证！

无血的“血案”

4月20日，天安门广场上细雨霏霏，有两所高校的学生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手持血衣，声泪俱下地向人们诉说着当日凌晨，警察在新华门前毒打学生的“悲惨景象”。

4月20日晚，一位住在北太平庄的青年作家给笔者打来电话，说见到附近高校的学生正在集会，声讨政府的“暴行”。

北京的一家杂志在报道中说：19日那天，上千名学生和群众，曾经在这里和警察发生过冲突。还说某新闻机构的一名记者声称，“领导在审编稿件时，给千位数去了个零（指当时在场的学生）。”

一时间，众说纷纭，流言横溢，莫衷一是。

但是，既然是事实，它的真相终究能大白于天下。

4月19日晚9时许，一支由部分在京高校学生组成的游行队伍渐渐聚集到新华门前。警卫战士为了防止有人冲门，迅速在人行横道一线布置警戒。20分钟后，一些学生便开始有

组织地向警戒线冲击，35名执勤官兵如磐石般站立在那里，顽强地阻挡着洪水般泛滥的人流。

新华门前的人越聚越多，黑压压地向门口逼进，一些卷在里边却又不愿冲门的学生，自愿地组织起来，高呼口号：“一二——坐下！”“一二——坐下！”有一部分人应和着坐下来，但来自后面的冲击力却犹如大海的波涛，一浪接一浪汹涌地撞来，所以，他们一次次坐下去，又很快一次次被逼迫站立起来，向前挪动着。

门前的警戒线渐渐吃紧，很快被挤成弯曲的“S”形。他们毕竟只有35个人呵！他们耐心地向学生、群众讲解、劝导，讲得口唇都干裂了。他们坚守警戒线4个多小时，尽管初夏的夜晚还颇含凉意，但汗水却一次又一次地浸透了他们的军衣。

深夜零时5分，门前马路南侧有人造出谣言，说中央领导人就在新华门的二楼上，实在闲急了，就下来同学生对话。很多人信以为真，就拼命向前挤，从而发动了一次更大的冲击。这时，一位高大粗壮、杀气腾腾的黑脸大汉冲出人群。敞开着怀，一边高叫着，一边挥动着拳头向门前冲来。在他的煽动下，许多人怪声怪气地跟着起哄，向前猛冲。担任一线警戒的35名官兵被迫撤到新华门口，重新布起一道新的警戒线。他们手臂相挽，以一道坚不可摧的人墙再次阻住了这股洪流。

这时，人群里有学生和群众对外国记者大献殷勤，将他们高高簇拥起来，让苍白的扑朔迷离的闪光灯一次又一次照亮他们在这一瞬间已完全扭曲的表情与心灵！其中一名又瘦又高、满脸病态的“老外”，被这部分人簇拥着，不断地大

喊“OK”、“OK”……人们呵，难道你们忘记了历史上那些耻辱的条约了吗？难道你们忘记了那些被奴役和压迫的岁月了吗？难道你们忘记了在这座城市里还有一座圆明园的废墟了吗？难道你们没有看出有些人的眼睛里已放射出了毒蛇一样贪婪的渴求了吗？

这时有人爬到新华门西侧的石狮子上去，一副得意忘形的样子。

涌到新华门前的学生、群众此时已同执勤的警卫战士面对面地挤到一起。细心的郭队长为了防止在混乱拥挤中误伤群众，将两名礼兵打开刺刀的步枪撤下来，我们共和国国府门的礼兵第一次开始空手上岗。

凌晨2点30分，围观的群众陆续散去，学生也疲惫地退坐到门前的走廊下。这时，一辆宣传车出现在新华门东侧的长安街上，反复广播《北京市人民政府通告》，同时，警察开始对东西长安街清场。

到凌晨4点，只剩下100多名学生围坐在门前，坚持不走，要国家领导人出来对话。之后不久，北方交大和北航的校领导坐着大轿车，来新华门前做学生的工作，劝学生同他们一道回校，但学生执意不肯，并开始唱《国际歌》，演讲，编顺口溜，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谩骂党和国家领导人。有一个男子公开喊叫：“取消四项基本原则！”

半个小时后，一辆17路公共汽车(两节)停在新华门前，北京市公安局的一位领导走到学生跟前，耐心地对大家说：“同学们，昨天晚上你们在这里不走，我们陪着你们，你们骂我们，我们不还口；你们推我们，我们不还手。但现在天要亮了，长安街的交通和新华门前的秩序马上要恢复，因此劝大

家回去。你们不管哪个学校的，都请上车，我们将逐个学校送你们回去。”这时有一些学生站起来想走，一个戴眼镜的学生威胁说：“不能走，谁走谁就是叛徒！”外围的少数学生站起来走了，其他的学生又怯怯地坐了下去。学生们又开始喊口号，唱《国际歌》。

4时50分，围坐在这里的学生仍没有要离去的迹象，执行公务的公安干警和武警战士只好上前强行架他们上车。学生非但不从，反而踢打警察。在双方的推搡、拉扯中，学生终于被送上车。

执勤的公安干警没有扎武装带，没有带任何警械，也没有穿后来某些人所说的那种大头皮鞋。

学生被架上车后依然狂喊乱叫，长安街宁静的黎明被打破了，到处回荡着他们的叫骂：“机器！”“走狗！”“打倒法西斯！”并有人打碎了公共汽车的后窗玻璃。这时，一位靠近中门的女学生高喊道：“打倒共产党！”4名警察迅速跑过来，要将她拉下车。车上的学生一轰而上，将她拉到车里头庇护起来。另一些学生则挤到门口，又推又打，阻击警察上车。车门很小，警察又站在地势不利的车下，上车非常困难，只好放弃。

一位当时在现场录像的同志讲，他无意中拍到了吾尔开希的镜头，当时吾尔开希正从车窗内探出脑袋来对警察又叫又骂。

几分钟后，这辆公共汽车开走了。

新华门又恢复了平静。没有一个人看到有人流血，也没有在门前发现一滴血痕。

这就是所谓的“4·20”血案。

国旗，依然晨升暮降

4月20日凌晨，新华门前清场完毕后，一位细心的礼兵在记事的小黑板上这样写道：“门前国旗杆上的铁环被人偷走一个，务请在升旗仪式前换上。”

早晨，三名士兵身着礼服，护卫着国旗，表情庄严肃穆，步伐威武雄健，从新华门口走向国旗杆下。鲜红的国旗开始冉冉上升。礼兵们举起手臂，以军队特有的礼节向国旗致以崇高的军礼！

在以后许许多多动荡不安的日子里，新华门前这面鲜红的国旗依然按照原定的时间和礼仪，晨升暮降。可又有谁能知道，护旗兵们为此付出了多少艰苦的努力呢？

5月17日下午，中国政法大学的9名学生来新华门前绝食请愿，到下午降旗时，门前围观者多达上万人，挤得水泄不通。部队长犯了难，这时候降国旗，会不会有人出来捣乱，制造事件，造成不良的政治影响呢？可不降又怎么办？能让这凝聚着无数革命先驱热血，寄托着亿万华夏儿女希望的国旗被黑暗笼罩，被夜色包围吗？

不能！决不能！

一个周密的降旗计划很快制定出来。他们首先派人同学生对话，希望他们遵守纪律，协助执勤人员维护门前秩序。随后派出执勤部队从人群中开出一条3米宽的小道，硬是架住拥挤的人群，掩护护旗兵们通过。护旗兵降旗时，有的人在狂喊乱叫，有的人在稀稀拉拉地唱《国歌》、《国际歌》，但更多的人对从容不迫的礼兵报以雷鸣般的掌声。

5月22日，国旗在礼兵们的护卫下，徐徐降下来。突然，

一阵大风刮过，国旗飘向东侧，一些围观的学生和群众跑上来死死拽住，阻止降旗。其中一个黑脸男子大叫：“你们还不滚回去，还替腐败政府降什么旗！”还有两名围观群众一边死拽住国旗，一边将另一只手举成“V”形，让外国记者给他们照相。执勤人员迅速上前，在群众的帮助下，将这几名闹事者推开，护旗兵立即熟练地收回旗子，抢在很多围观者没挤过来时，完成了降旗仪式。

5月14日，绝食团中一名又黑又瘦的女学生，在门前吵闹，要求进来谈判，被执勤哨兵带了进来，门外的人便借机闹事，涌向门前，举行示威，又一次阻塞了降旗的通道。执勤人员立即出去，耐心地进行疏导、劝阻，后面的人群逐渐让出一条小路，而坐在门前的四五个人却怎么也不离开，气得一位中年知识分子痛心疾首地说：“你们受没受过教育？你们还是不是中国人？这可是咱们的国旗呵！你们学美国那一套，美国人那么叫喊民主自由，可在升降星条旗时，所有在场的国民还肃然敬礼呢。”在群众的谴责声中，在执勤人员的再三动员下，这四五个闹事者被迫灰溜溜地闪开了。

军人的忍耐

为了防止发生意外，确保党和国家领导人及中央首脑机关的安全，一进入非常时期，部队便在新华门前构筑了警戒线。

5月26日，一位外地来京出差的中年妇女见警卫战士一动不动地在烈日下上岗，非常辛苦，觉得过意不去，就从提包里抓出一把糖块，往战士手里塞，战士执意不收。一些在场围观的学生、群众却大喊：“不能给他吃，喂狗也不能给他。”并

气急败坏地将这位妇女推了出去。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这两句话曾被人们重复过无数次。然而，新华门前的战士们却想不通：军人执行正常勤务，捍卫祖国的尊严，何罪之有？一些学生、群众却毫无节制地把怨愤发泄到他们身上。有人指着战士们的鼻尖，破口大骂，“走狗！”“白痴！”“低级动物！”……粗话脏话不绝于耳。甚至一些戴着眼镜，看上去文质彬彬，气度不凡的研究生也以泼妇般的形象出现在这里。还有的不三不四的女人将鞋脱掉，然后笑嘻嘻地把脚伸到战士的脚面上搔痒，进行挑逗。这难道就是少数人所标榜的“民主”和“自由”吗？面对这般流氓无赖的可耻行径，执勤战士一忍再忍，目不斜视，挺直腰板坐在那里，实在逼急了，就抬起脚来，踩她一脚，然后又肃然不动了。就连一些围观的群众见此情景也不得不由衷地赞叹。

来门前静坐的学生，时不时拿执勤战士寻开心。一位女学生故作亲热地将糖块硬往战士嘴里塞，引来一阵喝倒彩声。在坏人挑唆下，有人一时性起，就指着战士的鼻尖叫骂，有时甚至拿传单往战士的脸上贴。还有的人，拿着电喇叭凑到战士的耳边，震耳欲聋地怪叫……一些本来对学生抱有同情心的群众，看到这种情景后，愤然离去。他们说：“这样对待人民的子弟兵，哪还是什么请愿，简直是胡闹！”

为了防止事态扩大，避免发生冲突，广大执勤官兵以大局为重，对个别学生、群众的谩骂、讽刺、人格污辱都默默地忍受了。他们也正值青春年华，也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为了履行公民保卫祖国的义务，他们才走进军人的行列。历史把他们推到了制止动乱的最前沿。他们凭什么要受到如此的

凌辱？

鲜红的血，洒在门前

6月3日下午2点，情况万分紧急。警卫战士不得不迅速出击，将在这里盘踞达一月之久的几十名学生和群众清走，并在石狮子前的白色警戒线上，用他们年轻的血肉之躯筑起一道生命之墙，誓死捍卫新华门。

半个小时后，广场上向西涌来的人流和六部口向东涌来的人流又很快汇集到新华门前。他们逼近警卫防线，对执勤的警卫战士先是指着鼻尖叫骂连天，继之推推搡搡，冲击人墙，最后发展到大打出手。一名在这里执勤的少校军官告诉笔者，这些人员的成分非常复杂，有学生、市民、外地进京人员，也有流氓、地痞、社会渣滓、上访人员。刚开始时砖头还不很多，主要是向战士们吐痰，扔冰棍等，3点钟以后，砖头、汽水瓶、石块等越扔越多。战士们躲闪不及，开始不断有人受伤被送下去。在门前东侧的石狮子下，一名少尉军官最先负伤，人群中飞来的碎玻璃片，扎中了他的肩部。他感到一阵剧烈的疼痛，但为了防止暴徒趁机向里面冲击，他顽强地忍着没有吭声，也没有动手去拔，鲜血很快就从军衣里面渗了出来。一位带队的干部发现后，马上赶过来拔掉玻璃片，然后用手为他按住伤口，不断向外涌的血很快又将这位干部的手染红了。这时，人群里一位留长发的中年男人却在阴阳怪气地大叫：“快看，这个法西斯强盗的手上，沾满了人民的鲜血！”面对肆无忌惮的暴徒，面对狂热的学生，面对深受蒙骗、却不愿醒悟的群众，这位干部又气又急，差点流出泪来。砖头、石块、汽水瓶等东西越来越密集地往下落，

不时地打到战士们的钢盔上和身上。他们以顽强的意志和忘我的牺牲精神固守防线，默默地承受着这种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的袭击。这时，一些挤在前面的好心群众和学生，既看不惯暴徒的这种做法，又怕伤了自己，便拚命地朝后面喊话：“不要打了！”“不要打了！”但这一切都是徒劳，不再有人理会。

3点35分，一位18岁的战士被砖块击中面部，鼻梁骨骨折，顿时血流如注。

3点50分，一位战士被石块击中下巴，打破一道三厘米的血口子。

4点10分，另一位执勤战士被砖块击中右膝关节，腿肿得不能弯曲。

4点30分，一名班长右腮部被汽水瓶击中，划破一道4厘米的血口子。

4点35分，一名少校军官被汽水瓶击中口唇部，顿时嘴肿得张不开口。

4点40分，国旗下有一伙青年不断向警戒线冲击，一位执勤的中尉军官上前劝说了一句，立刻被一个暴徒狠踹一脚，一屁股摔到地板上。这伙人接着向前冲击，一名赶过来阻挡的战士被他们裹了进去，并往后拉扯，企图抓走。两名军官及时发现，冲过来，一个人拽胳膊，一个人拽腰带，硬是把这位小战士抢了回去，其中一名军官胸前被人狠捅了一棍子，造成软组织严重挫伤。

……

新华门前这道生命之墙，在超乎寻常的非难和打击中，艰难地送走了这个洒满鲜血的白昼。

晚上10点多钟，门前的观察哨传来紧急报告，发现一伙暴徒正架着一名被打昏的战士向广场方向走去。部队立即命令组成一支17人的突击队，冲出去抢救这位兄弟部队的战友。原来这位战士是戒严部队某坦克旅的，在六部口西侧失散后，被暴徒打得身上多处负伤。暴徒们企图拖他到广场做人质。突击队员赶过来时，他们已经跑到石碑胡同口了。突击队员们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奋力冲上前去，将手持棍棒的暴徒驱散，抢回这位战士。然后马上变换队形，前面三个人开道，后面两个人掩护，将这位战友紧紧地护卫在中间向后撤去。这时有很多暴徒边投掷石块边向这边跑来，一名姓徐的突击队员额头被打破，血流满面，另一名突击队员的下颌被石块打伤。

4日凌晨2点多，戒严部队终于冲破暴徒们的重重阻拦，进驻天安门。这时又有四位重伤员被救护到新华门前，一位左腿骨折，一位右上臂骨折，还有一位神志不清的战士，不停地大口大口地吐血。医生急诊为胃大出血，送他来的战友泣不成声地说：“暴徒把他打昏后，又在他的腹部狠狠地踏了三脚。”最后被架进来的是一位中尉副连长，他的下颌、腹部和左大腿三处遭受枪击，是小口径子弹打的，左大腿处的伤口血流不止。急救医生为他扎上两个急救包都止不住，疼得他满头冷汗，下嘴唇都咬破了。当时笔者见他身上背有一长一短两支枪，问他为什么不开枪时，他痛苦地呻吟着说：“周围挤满了群众，我怎么下得了手啊！”

胜利时，他们才流泪

6月4日凌晨1点50分，执行戒严任务的先头部队终于

在新华门西侧出现了！

防暴警察手持盾牌、警棍，冒着暴徒的袭击开过来了！

先头部队躲闪着雨点般的石头和瓦块一溜小跑，开过来了！

轰轰隆隆的装甲车、坦克开过来了！

满载着戒严官兵的一辆辆军车开过来了！

当新华门前的执勤官兵振臂高呼“我们胜利啦！”的时候，当这一双双颤抖的大手同兄弟部队战士的手紧紧握在一起的时候，一串串晶莹的泪珠夺眶而出！

两天后，当这支部队的老首长，几位曾经跟随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多年的老警卫战士，将自己家舍不得吃的食油、猪肉、蔬菜、水果等东西送到执勤战士手中时，他们互相望着彼此消瘦的面庞，充满血丝的眼睛，伤痕累累的军装，许多人流下了热泪。

当敬爱的邓颖超大姐派人把自己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一千元人民币送来，慰问戒严部队官兵，勉励大家再接再厉，争取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最后胜利时，许多同志又一次流下了热泪。

当中直工委、中办机关党委、北京清洁四厂、青岛驻京办事处的慰问团来到这里，向大家表示亲切的慰问并致以崇高的敬意时，许多人的眼里潮湿了。

这些血性男儿在极度疲惫、困乏、饥渴的时候，在被群众误解、谩骂、讽刺的时候，在被暴徒殴打流血甚至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坚强地没有流一滴泪！可在胜利到来的时候，在老一辈革命家及首长的关怀面前，在人民群众的信任和理解面前，他们却忍不住泪流如注！

或许这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去了。新华门又在沉默中显示出往日的威严与肃穆，警卫战士又在沉默中执行着正常勤务，以确保中央首长及国家机关的安全。

然而，历史不会沉默，它将永远记住这些非同寻常的日日夜夜和这些曾经为共和国的生死存亡慷慨付出的警卫战士和戒严部队的广大官兵！

（原载1989年7月23日《解放军报》）

看“谣言政治”是怎样害人的 ——“清华人之声”广播台的拙劣表演

时 录

一场以学潮开始的动乱，仅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就发展成为反革命暴乱，如此快的速度，是与谣言政治有着密切关系的。在此期间，那些非法组织设立在一些高校的非法定广播台不断地传播各种谣言，宣扬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种种谬论，甚至直接发号施令，指挥青年学生参与非法活动，为动乱和暴乱推波助澜。非法组织设立在清华大学第十饭厅前的所谓“清华人之声”广播台所起的作用就是如此。

“清华人之声”广播台从4月24日设立起，就呼喊着重民

主”、“要自由”、“要重新评价反精神污染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等口号，并不断地用所谓“4·20新华门血案”、“4·22天安门广场的欺骗”、“××下台”等谎言和鼓噪来煽动青年学生对党和政府的不满情绪。5月13日，广播台的负责人之一、“高自联”常委周峰锁得到了某些公司的资助，为“清华人之声”安装了成套的广播器材，并将两个高音大喇叭架在了大饭厅屋顶之上，每天不分昼夜，有稿即播，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5月20日以后，“清华人之声”更加露骨地挑唆群众与政府的对立情绪。当时，在天安门广场的清华学生大都意识到事情的性质已发生了变化，纷纷返回了学校。“清华人之声”却喋喋不休地传播各种谣言，什么“××政府不惜以20万学生的生命来巩固其权力”、“北京监狱已经腾空”、“各大医院外科病房已空出”；什么“徐帅、聂帅写信给中央，反对戒严”、“邓颖超写信给中央，反对戒严”；还有什么“采访赵紫阳子女，赵的儿子说：‘我可能被捕，有生命危险。’”等等。在他们的蛊惑下，清华园里顿时出现了新的紧张空气，一些刚刚冷静下来的学生又被“激怒”了，人们围在广播站附近议论纷纷。

继而，“清华人之声”开始调兵遣将，煽动学生们去堵截部队、拦阻军车了。大喇叭一会儿叫喊：“部队已开到××地”，一会儿又惊呼：“运兵的火车已到了五道口”。在这样一种气氛下，一些学生蜂拥而出，扯起了“反对戒严”的大旗。

一支学生纠察队赶到了五道口铁道口，不由分说，就把守道口的老工人一把推开，强行拉开了红灯，一辆正在正常行驶的客车见状马上紧急刹车。这些“纠察队员”们又无理地

要求查车，遭到列车长的严厉拒绝。他们不顾司机和列车长的一再反对，就是堵在铁道上不让列车行驶。十几个“纠察队员”还不顾一切地强行爬上火车，一个车厢一个车厢地非法搜查，结果不仅没看到一个军人，还受到了旅客们的责骂。由于这辆列车意外被截，停驶近半个小时，造成了北京沿线一连串的火车误点、改点。

拦截火车的学生们刚刚回校，“清华人之声”又故技重演，将谣言从地下造到了天上，胡说什么：“解放军已乘飞机抵达沙河机场。”

在“清华人之声”的煽动下，另一批同学又被欺骗，赶到沙河机场，结果又扑了空。

二

随着戒严令发布后北京局势日趋平稳，清华大学毕业班的学生90%都恢复了毕业设计，一些低年级学生也开始准备复课。天安门广场上，清华大学的旗下只剩下了十几个人。

眼看人心思定，极少数动乱的策划者便跳到了前台，公开煽动、指挥动乱升级。“清华人之声”也随之发起了一个新的“宣传攻势”，连篇累牍地广播起《首都知识界告全国同胞书》、《高自联常委会决议》、《工自联告全国工人书》等，公然诬蔑现政府是“伪政府”，煽动人们要“千方百计地破坏李鹏政府的军管阴谋”。“清华人之声”还选中了两篇内容极其反动、恶毒的大字报反复播放。这两篇大字报明确提出：“资本主义不是永恒的贬义词，社会主义这个词不能永远性地把它当作褒义词来看待了。”并公开宣布：“我们曾指望党内斗争分化，以赵为首的改革派占上风。但事与愿违，反动势力暂时领先了。”于是他们干脆大喊：“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共产党及

其政府”，“废除一党专政”、“打倒军阀政府”。甚至鼓动“学生、知识分子、工人、农民以及社会各界其他爱国力量”，“组成人民军的武装”，还可以“去团结包括台湾国民党力量在内的各种力量”来进行斗争。“一点一滴地破坏，加速政府的垮台”。

“清华人之声”就这样成了极少数阴谋推翻共产党的领导的策划者的舆论工具，它不仅搅乱了青年学生的思想，还将他们推上了违法之途。5月25日，“清华人之声”广播了一个“招聘书”：招聘“有志者、有勇者、有能者”组成宣传队，到全国十几个大城市去宣传、大串联，并许诺给予“津贴”。6月1日，北京市公安局收审了反动组织“工自联”的头头以及流氓团伙“飞虎队”的一些成员。“清华人之声”居然播出了“十万火急”的通知，鼓动学生“紧急行动起来”，“到公安局去抗议静坐”，致使一批不明真相的学生跑去冲击了市公安局。

三

6月3日，这场风波的性质已转为反革命暴乱，在此前后，“清华人之声”的煽动更加疯狂，指挥更加频繁具体，完全成了敌对势力向党和政府进攻的一个黑据点。

6月2日午夜，“清华人之声”的广播打破了校园的沉静，大喇叭一遍遍地高声造谣：“一辆开路的武警吉普在木樨地要闯入市区，压死了4人。”整个校园沸腾了，学生们仨一群俩一伙地往校外奔。3日中午，“清华人之声”又突然发出了“紧急报告”，说是“在西单劫持了一辆军车”，又造谣说“解放军化装成了地痞流氓”，“带着菜刀、钢丝绳等”，“是为了制造事端，嫁祸于学生”。在这些谣言的蛊惑下，从中午开始，许多学生纷纷奔向了通往城区的各个路口去拦阻进城的戒严部

队。

3日晚，“清华人之声”的反革命煽动到了顶点，从11时开始，声嘶力竭的呼号彻夜不断：“他们（政府）动手了”，“向人民开枪了”，“大学生流血了”……不明真相的学生再也呆不住了，数千人一下子涌出了校门，有的拆下铁床栏杆上的铁棍，有的抄起带铁齿的木杈，还有的举着玻璃瓶，冲动地向木樨地、西单、天安门等地奔去。在这次暴乱中死去的4名清华学生，可以说都与这些广播有直接关系。事后，不少学生气愤地说，现在真正知道了什么叫舆论杀人。

四

“清华人之声”能影响一批听众，原因之一是它打着“新闻自由”的幌子，自称代表民众之声，并定时转播“美国之音”。事实上，“清华人之声”并没有反映广大清华师生的意愿，更不允许任何自由。

“清华人之声”只允许有一种声音，那就是鼓动动乱。它对天安门广场“高自联”的稿件，对各种非法组织的消息，对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所谓“精英”人物的讲话等有闻必录；而对党和政府的声音却恨之入骨，学校广播台播放人民的呼声，他们就数十次地剪断学校广播系统的线路，并几次冲砸了学校广播台。他们任意造谣，随便乱说，却不允许任何人批评，有的教师前来劝导学生复课，他们破口即骂“说的不是人话”。有一名学生堵军车回来后想谈谈想法，他们立刻请他坐在喇叭前直播，但当听到这个学生说“希望大家不要去堵军车了”时，便暴怒起来，将这个同学连拉带推赶了出去。

一场惊心动魄的学潮——动乱——暴乱结束了。经过这

场斗争的首都大学生们对一些人宣扬的所谓“新闻自由”有了切身的感受。一些人在不知不觉中成了类似“清华人之声”广播的俘虏，难道这不应该深刻地进行反思吗？

（原载1989年8月31日《北京日报》）

一个蛊惑人心的广播站

姜琳琳

5月4日大游行后，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自治会广播站”改称为“北京之音广播站”，就设在学校东门口南侧的学3楼6层612室里。

这个广播站是4月20日以后办起来的，当时设备很差，只用一台录音机外接两个音箱，放在2层平台上，隔了马路就什么也听不见了。“五四”之后，广播站的设备突然好起来，我曾经进过它的播音室，全套都是崭新的设备，有新式组合落地式扩音器、全自动录唱机、桌式遥感麦克风等等。楼的四个角一角一只高音喇叭，在方圆一平方公里范围内都可听清它的广播内容。我曾经问过他们自治会的头头，哪来这许多钱？他说是由“高自联”统一出钱购买的。他还透露，“高自联”“五四”后决定，要扩大对民众的宣传，最大限度地争取群众，因此规定9个常委所在的学校都要成立或扩大自己的广播台、站，资金由“高自联”出。并且还规定了广播的时间和

内容范围，分早、中、晚3次，晚上的播音时间最长，内容范围是：海外消息、天安门快讯、知名人士包括群众来信等。宗旨就是“揭批”运动，向政府在群众心目中威信扫地。广播站的头头还对我说，他们把播音室由自治会所在的3层搬到6层，一是出于隐秘，二是五层六层是女生宿舍，天气渐热，女生在宿舍穿着单薄，如果有警察来“捣乱”，他们可大喊抓流氓，或把警察轰走，或乘乱逃脱。后来“自治会”也搬到6层，在623室。

“五四”之后，人大“北京之音广播站”按“高自联”的要求每天播音3次：早上6:30至8:00、中午12:00至1:00、晚上6:00至11:00。“5·13”绝食开始后，广播进入高潮，特别是每天晚饭后，校园内的绿地草坪和楼台周围坐满了学生和老师，有些显然是教授一级的；校外大门口、街心花园、树荫下站着坐着的群众有万人左右，南北两条马路全被堵死，人最多时连公共汽车都被迫改线。各色小贩也乘机大做生意，烟摊、水果摊、馄饨摊、煎饼果子摊、烤羊肉串的等等，广播声声，人群躁动、青烟缭绕，远远一看，真象一个大集市，这样一直到深夜。

广播的内容大体也是照“高自联”的要求做的。广播站每天晚上都要传播海外的有关消息，转登最多的是“美国之音”“RBC”，以及香港的亚洲电视台、无线电视台、《明报》、《镜报》、《快报》等等的內容。记得是5月25日晚，广播站播出了一条消息，称应美国和英、法等国政府的联合要求，瑞士银行已经宣布冻结邓小平、杨尚昆、李鹏等人的27亿美元的私人存款。明白人一听就是假的，但当时的万人听众却发出了震耳的吼声，随后便是一片大骂政府腐败，末日将至的喊声。

5月28日晚，又转播了香港《快报》的一条消息。说李鹏已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赵紫阳等3人已安全离京南下广州，广州的军队已做好了北上推翻反动政府的准备等等。当时的听众信的人似乎还真不少。另外，还全文转发了《明报》登的方励之写的《告邓小平书》，听内容确实很有蛊惑性。

“5·13”天安门绝食后，广播站时时都在插播广场的情况，5月15日、5月16日达到高潮，许多听众都急切地想知道绝食的学生怎么样了。广播站一会儿播广场上有多少学生晕倒，一会儿播有的学生已双目失明，并发症导致终身瘫痪，一会儿又播政府看着学生等死，连起码的人道都不讲等等。此时听众的情绪被一次次煽起，许多人一边骂政府一边自发的组织，找水、找药、找衣服被褥，用三轮车往天安门送。一些老头、老太太一边抹泪一边嘱咐送东西的人一定把问候带到。身在其境，听其谣言，看其场景，的确容易使人涌起政府太不“仁义”的愤懑之情。

广播站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广播知名人士、各界群众的来信来稿，尤其在“5·13”绝食后，每天都有。什么新闻界的签名信、知识界的签名信、人大委员的签名等等我都是从广播里得知的。特别叫我吃惊的是，5月21日宣布戒严后的第二天晚上，我从广播里听到了赫赫有名的四通公司总经理万润南的书面讲话，大意是：政府已经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它就不再是人民的政府，各界人民动员起来粉碎戒严，打倒政府等等。他还说四通公司是一个战斗的堡垒，就象它的英译名stone(石头)一样坚硬。他的讲话煽起了不少人的情绪，我当时深感迷惑，因为不久前，也就是今年2月28日我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了全市优秀共产党员事迹报告会，聆听了他作

为改革家、劳动模范、优秀共产党员而做的报告。我当时就想，他作为一个优秀的布尔什维克此时应当和政府是一条心的啊，作为一个改革家他在改革中获益最大，此时也应当与政府一个嗓子发音啊，怎么他也“反戈一击”了呢？我当时就觉得心中有一个什么美好的东西被突然击碎了。

6月4日下午，人民大学门口挂起了挽联、花圈和一串串的白花，校内还下了半旗。许多人围在校门口。此时的“北京之音”广播声泪俱下，说天安门广场死了二千多学生和一些所谓“事实真相”，听得老百姓也都跟着哭。广播还播了他们最后的告别辞，大意是向政府讨还血债，转入地下斗争等等。

学潮、动乱、反革命暴乱，这一个多月间人本的“北京之音”广播站所起的造谣、传谣、煽动的坏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今天看来，值得深思的，是它为什么每天都能吸引那么多群众？

（原载1989年7月25日《北京青年报》）

“警车轧死大学生”的谣言 是故意造出来的

石 漠

4月20日，首都一些高等院校流传北京师范大学一女学生在游行时，被警车横冲直撞轧死的谣言。我是在下午陆续听说的。说实话，当时，我很怀疑这个说法，原因有

二：一是作为一个公民，我对于我们的党和政府有基本的认识 and 信任，我凭着建国四十年来自己的经历、经验，坚信我们的党和政府、我们的公安干警决不会干这种事。无论是过去的学潮，还是这次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以悼念胡耀邦同志逝世为借口而挑动的大学生游行示威，党和政府始终采取极为克制、忍让、劝说的态度，这是我亲眼看到、亲身经历了的。二是我看到这次学潮情况极为复杂，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到处寻找借口，企图挑起更大的事端，引导政府犯错误。在这样的形势下，怎么可能让警车到学生队伍中去横冲直撞？如果这样，岂不引火烧身、授人以柄吗？这是常识范围的事，天底下哪有这么愚蠢的政府和警察呢？所以，我不相信这个谣言。“文化大革命”给予我们最大的教训之一，就是轻信谣言。

不过，事出有因，到底出了什么事？我当时心里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这天的下午或者是21日的下午，我记得是胡耀邦同志追悼大会之前。傍晚六时多，我下班回到家里不久，听到有人敲门。我立即去开门，原来是北师大一个男同学来家。在平常的日子里，时不时有些同学来找我。

我请他进来，热情地招呼他坐下。他好像是赶了路来，风风火火，上气不接下气。

“你从哪儿来？学校来吗？”我审视了他一下，问。

“不，从广场来。”他似乎平静了点儿，嗓子有些沙哑。神情严肃地望着我，“我们同学都到天安门广场去了，我刚从那儿来。”

“你每天都去吗？”

“我基本都在那儿。好几天没睡觉了。现在去的各校学生很多。政府不理解我们，不理我们。”说到这里，他激动起来。

“你们要闹到什么时候为止？”我看着他激动的样子，忧心忡忡地问。

“那要看政府的态度。”他口气很硬。他望了一下我，探寻地问：“你知道我们学校死了人了吗？”

“听说了一些，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关切地看着他。

“传说很多。同你讲真话，本来这是一起交通事故。真的，是交通事故。”他盯着我，好像我还有什么怀疑似的，接着说：“前天吧！是晚上，我们校外语系的一个女同学和她的朋友去民族宫看话剧。回来时，两人骑车，到西四时被一辆电车撞伤了，听说当时没死，送到医院后才死的。可大家商量都说是政府的军警的车轧死的，往政府身上赖，说政府镇压学生。”

听了，我十分惊讶，原来是这样的啊！我很生气，问他：“这怎么可以说谎话呢？”

“他们商量，都这么说，往政府身上赖，推到政府身上。”

说句心里话，对于当代大学生的优点和弱点，他们的幼稚和自负，这么多年，我甚多少了解了一些。不过，在当前这种极为复杂的情况下，采取这样的手法来欺骗舆论，而且又是年轻的大学生，我是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当时，我沉默了好久，我想，谣言也许不是他制造的，他不过是被情绪煽动而卷了进去，但这件事的本身是严重的。

我说：“你们这样做不好。因为事实总归是事实。大学生

现在在社会上的形象不太好。如果再造这个谣，一旦真相大白于天下，这到底是有益于大学生还是有损于大学生？！”

他听完我的话，呆呆望着我，说：“反正他们这么商量的，都这样说。”说完，他就告辞走了。

4月27日，北京日报以《北师大一学生被车撞死谣言四起 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查明真相如此》为题，报道了北师大外语系85级学生郭向东(女)在西四因交通事故而死亡的消息，北京电视台也如实作了报道，彻底揭穿了这一起蛊惑人心的谣言。

事情已经过去了两个多月，但是，它给予我们的教训是极为深刻的。这件事告诉我们，这次学潮从一开始就有人在利用和煽动。许多谣言的产生，不是由于误传，而是有意识制造的！“往政府身上赖”，“推到政府身上”。而且，他们这样做，这样说，是事先“商量”好了的。这种行为用“热情”、“良好的愿望”解释得了吗？

(原载1989年7月8日《北京日报》)

这算什么“民主”

北京大学 施义武

事情发生在今年5月底和6月初。鉴于从4月中旬以来，学校学生因罢课、游行和绝食等活动，严重影响了学业，

教学基本不能正常进行，校园秩序亦无法维持，5月29日，北京大学8位教授、副教授，联名写信给校领导，发出“同学们，恢复课吧！”的呼吁。信中指出：“一个多月的事实，清楚地表明，采用罢课、游行和绝食等手段，能充分表现群情激愤和希望的殷切，不能切切实实地解决问题，并且容易形成僵持不下的局面，旷日持久，于事无补。”信中诚恳地劝告尚未复课的同学，“对待严肃的政治问题，必须慎之又慎，在当前异常复杂的形势下，尤其需要高度的冷静和理智。”“不要把爱国与为祖国而刻苦学习对立起来，请珍惜自己的青春年华。”

8位教师的呼吁5月31日电视播出并公诸报端以后，得到了许多教员和同学的支持，认为表达了广大师生员工共同的心声。但与此同时，也激起了一些人的不满，他们很快在北大三角地贴出一些反对、嘲骂的大字报、大标语、小字报。一时间，8位教授、副教授成了北大街谈巷议的中心人物，围绕着“呼吁书”的评价掀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

应该说，8位教授、副教授的心是真诚的、善意的，他们不希望学潮和动乱给广大学生本人造成巨大的、难以弥补的损失。8位教授、副教授的口气也是亲切的、平和的，他们没有一丝教训人的态度，而是企盼学生目光长远，一面复课，一面谋求问题的妥善解决。任何一位多少有些良知的人都会赞同他们的意见。

可是，这8位教授、副教授却遭到一小撮人无端的污辱和攻击。大标语把他们称作“八大师贼”、“××帮凶”。大字报向他们提出“强烈抗议”，并发起什么“签名”，号召“永远罢上他们的课”。有的人还在大字报上写着：“请知情人写下他

们的住址，我们将用各种不同的方式表达我们的愤怒。”其中有位副教授，曾多次劝告同学们不要参加非法游行，某大字报竟公开造谣，说这位教师就是游行队伍中的一员，现在又跳出来与一小撮人说三道四，分明是投机行为，大字报还蛮横地建议校方不再聘任这位教师的教学工作，并取消他的副教授资格。有张大字报还恶作剧式地写出：通知8位“师贼”到××楼××号(厕所)去领××伪政府的×××元奖金。

这样，他们还觉得不够味儿，于6月1日下午又贴出一张题为《北大“模范教师”素描》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没有反驳呼吁书中的任何论点，没有提出任何一点建设性的意见，而是通篇以粗野和下流的语言，对8位教师逐个进行诬陷和人身攻击。例如有位教师会吸烟，这竟然成了一条罪状，被斥为“烟棍”、“幽灵”；有位教师身患严重肾病，但坚持工作，大字报竟说“你肾功能丧失，靠体外循环，每周换血”，“我们国家更需要换血”，你最好去加入残疾人协会，根本不当站出来呼吁复课；大字报污蔑这个人“在家只会和老婆打离婚”，诬蔑那个人“眼泡老是鼓鼓的”，污蔑这个人“几年内一篇文章没写过”，污蔑那个人“只配进入迷糊协会”，甚至连“婊子”、“三条腿”、“神经病患者”这样不堪入目的字样也出现了。

有位离了休的老教师，见到这张大字报，站在那里，气得浑身发抖。有位女同学，看到教师们在社会主义大学、堂堂的最高学府受到这般凌辱，不禁痛哭失声，法律系一位女教师将她劝回宿舍。有位过路的教师，见到“师贼”的提法，稍稍表示异议，当即遭到一些人的围攻，被轰走；有位教师，当着同学的面指出，听到一点不同的声音就这样恐吓、谩骂，

“太不民主”、“太不道德”，结果一伙人围上来跟他争吵。这位老师据理和他们辩论，这时，有的人胡搅蛮缠，有的人推推搡搡，有的人摆出要打人的架势，有的人提出要“盘查此人的证件”，这位老师坦然地从兜里掏出《北京大学工作证》，有人自觉理屈辞穷，便气急败坏地指着这位教员鼻子骂道：那你就是出来的“第九个师贼”。这位老师足足被围攻了20多分钟。

更令人奇怪的是，北大这些攻击教员的大字报，6月2日就以“本报记者北京专电”的形式出现在香港《明报》第八版头条位置上。“专电”以“北大部分师生内哄”为大标题，用十分肯定的语气，把大字报中的谣言说成是事实，并且一一开列8位教师的姓名（其中最知名的冯教授的名字还被故意拉掉一个字），斥责他们是一小撮“投机分子”，声称这些人“严重损害了北大和北大教师在全国人民心中的形象”、令北大蒙受“莫大的耻辱”。“专电”还假借转述大字报的方式，反复地向同学们发出号召，要求同学“永远抵制”8位教师所开的课程。

人们读过这些大标语、大字报，尤其是6月1日所谓的《素描》、6月2日《明报》的“专电”，了解了所谓“第九个师贼”遭围攻的情景，不难看到，学潮和动乱中一小撮人搞的是什么样的“民主”。不难看出，到底是谁维护了学校的尊严，谁在希望动乱，给学校带来了耻辱。

有些人口口声声喊“爱国”、“民主”、“自由”、“人权”，仿佛这些是他们的专利，可是一到实际中就变了样，足见他们的口号是多么虚伪！难道无限期罢课，上街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能算作“爱国”吗？难道“只许州官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在校园内不许说半点不同意见，能说是“民主”吗？难道随意对教师进行造谣中伤，人身攻击，甚至想大打出手，就是所谓的“自由”和尊重“人权”吗？这些人言行本身就拆穿了他们的谎话。

鲁迅说：“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有些大学生（还有个别教师），在严肃的政治斗争中，使用如此龌龊的语言，干出如此下作的勾当，既专横跋扈，又灵魂肮脏，难道不是给社会主义的大学丢脸，又丧失了国格、人格吗？我们的国家将来若是这样素质的人掌了权，那还有什么民主、法制、道德和文明可言呢？

北京大学8位呼吁复课教师的遭遇，反映了许多问题，很值得人们深思。每个有良知的学生和教师，都会从中悟出一些道理。

（原载1989年7月6日《中国教育报》）

一起“最轰动”的谣言制造者 自曝内幕

请 炎

在北京发生动乱和反革命暴乱期间，每天谣言蜂起。人们当还记得，当时最有“轰动效应”的一起政治谣言，就是所谓“邓死、李伤”。这股恶浊之风究竟起穴何处呢？

香港的《百姓》杂志，在7月1日刊出一篇报道，透露了造谣者的部分真情。

这篇报道说，“6月8日，刚由北京归来的哈佛大学博士生黄靖，在华盛顿接受美国公共电视台新闻节目访问时，突然‘自曝内幕’，透露了他和他的朋友是制造李鹏被刺及邓小平死的谣言的‘始作俑者’。”

“据此间（按：指美国）中文报章报道，当时节目主持人一脸惊异，插嘴追问黄靖：‘你制造的这个谣言？’”

“黄靖答说：‘一点不错，在两天后，便有李鹏的消息。现在李鹏已露面。同时，我们和另外一些人也制造了邓小平生病或死亡的谣言……’”

“节目主持人又追问：‘我们都把这两项消息当成新情势的发展来报道，结果这都是你们造的谣言？’”

“黄靖说：‘不错……’”

《百姓》杂志的这位作者找到了黄靖，听“黄靖叙述事件始末”。原来，黄靖于5月23日在美国与北京“高自联”建立了“热线电话”。5月29日，黄靖飞到北京，“即和朋友取得联系”。“有人征求黄靖的意见，是不是造一个谣，就说李鹏被他的卫士打伤了。黄靖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因为这样可以迫使李鹏再次亮相。所以他表示赞同。当时是5月30日。”黄靖又对作者说：“至6月1日，这个谣言已迅速传遍北京城，而且越传越走样。有的传闻甚至说李鹏死了或已遭邓小平扣留。由此可见造谣者不止一人。”黄靖又说：“从客观效果来说，这条谣言的确已达到目的。”

看得出，黄靖在讲述他们的这段造谣“胜绩”时，是颇为坦率而又自鸣得意的。可是，当他们“自曝内幕”的新闻刊布

出来后，他又感到“无限的懊悔”了。他懊悔什么呢？

黄靖对《百姓》的那位作者说：“从大处着想，此举使今后从学生内部传出的消息，其可靠性将受到传播媒介的怀疑，这是一个最致命伤。”

黄靖认为“自曝”造谣内幕是“犯了个错误”。他说：“我认为我的错误是没有很好地控制场合。当他（美国电视记者）谈到北京的情况很复杂，各种谣言都有时，问及我对此有何看法？我就举例说：我的朋友和我曾经制造过一个谣言……后来他又问了一句：你想承担这个责任吗？我就答了一句‘YES’。这是非常致命的。”

YES，这的确是“非常致命”的。他们袭用戈培尔的老谱，以造谣为能事，把谣言当石头，漫天乱飞。如今内幕一经曝光，人们便一切恍然了。谣言他们还要造的，可是——还灵吗？

（原载1989年3月16日《北京晚报》）

“华夏狂人”的丑恶表演

胡筠忠 兰白谦

时间：5月23日。

地点：火车站六站台。

大学生、别有用心的人、不明真相的群众共数百人，将

戒严部队围堵在火车车厢里。大学生隔着车厢，不时给戒严部队上“政治课”，劝其“撤退”；站台上人流拥挤，人声嘈杂，加上暑气蒸腾，使人喘不过气来，燥热难忍。

这时，突然来了一个身背喇叭筒，手拿六弦琴，头扎“华夏狂人杨连志”白布条的中年男子。他一下子吸引了许多围观的人。他开始说话了：“我们的国家没有自由，没有民主，现在我要为自由、民主而歌唱！”随着唾沫星子的飞溅，从他嘴里吐出了下面的歌词：

“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棵任人摆布的小草……”这一串调的演唱，说明他不是什么“小草”，而是一棵毒草。这引起了部分人的共鸣，并且有人喊出了“我要自由”、“民主万岁”的口号。

看到自己的“演唱”受到部分人的“欢迎”，他就更加得意忘形、肆无忌惮了。接着又来一段：

“共产党好，共产党好，共产党领导人民吃不饱！说得到，做不到……”赤裸裸地把矛头指向我们党，对我们的党进行恶毒攻击。

狂人的串调唱得差不多了，又换个口味，唱起了顺口溜：“同志们，听我言，如今世道变了天……”一曲未了，应唱声，喝彩声淹没了整个站台，真是大有“变天”之势。然而这只是某些人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共产党的天，谁也“变”不了，谁也“翻”不了！

曲尽词穷了，狂人觉得还不过瘾，还不解恨，他又开始了演说，丑化、谩骂我们的党以及中央的领导同志。他声嘶力竭地喊道：“现在中国没人了，我要改组党中央，承包国务院！”这一语道破了天机！原来他要推翻共产党，不愿做那

“任人摆布的小草”了，要到中央去坐第一把交椅。他要为自由、民主而歌唱的目的一目了然。

但是，时隔一个月后，狂人便不狂了。

下面再录下一个镜头：

时间：6月26日六时。

地点：北京火车站广场。

威武雄壮的人民武装巡逻队，在广场地铁出口处发现了靠墙根处睡着一个人。这人身旁放着一个喇叭筒和一把六弦琴，巡逻队觉得这人很眼熟，便警觉地上前唤醒他，并进行严肃的盘问。

“我姓杨，杨……从张家口来，是来……来慰问戒严部队的……”但在他的身份证和营业执照上都明明写着“天水市人”、“自演自唱个体户杨连志”。一直在追查的那个杨连志，终于被发现了。

“你以前唱过反动歌曲没有？”“进行过反动宣传没有？”

“没有……”

“你上次在六站台，不是要打倒中央领导同志吗？”

“我没有讲。我听说大学生游行是爱国运动，我也想爱一次国。我只讲打倒赵紫阳。”

“你不要诡辩了，你的情况我们全掌握，你必须老实交待！”

经过百般抵赖，他感到不坦白不行了。这时他脸色刷白，两手颤抖，往日那嚣张的气焰不知哪里去了。他终于不得不结结巴巴地复述他所演过的闹剧，“我自称‘华夏狂人’，一直在全国各地流动演唱。这次北京发生动乱，我本来对社会主义制度就有看法，对共产党也有怀疑，这样我就来到北

京，在西单、天安门广场、北京站等热闹地方，进行煽动性演唱，希望更多的人起来搞动乱……”

杨连志的企图落空了，他本人也落入了法网。狂人不狂了。

（原载1989年8月23日《北京晚报》）

马“老师”“自焚”记

张永刚

6月10日晚，在崇文门派出所里，一些暴徒正在交代自己的罪行。然而，只有那位被暴徒们称为“马老师”的男子，却在用他那三寸不烂之舌做着最后的狡辩。

这位看上去文绉绉的人，竟是在这次反革命暴乱中在崇文门路口教唆、煽动暴徒打、砸、抢、烧、杀的反革命罪犯。在他的煽动下，军车被焚烧，战士被石块、棍棒打得头破血流，他是那幕惨不忍睹的暴行的罪魁。

他叫马振有，是崇文门某台球厅的服务员。

他喜欢说相声，也很有这方面的才气，就是有懒散、不求上进这个恶习。少年时，父母将他送到了东北专修相声，可他却偏不珍惜，三年后被老师辞掉了。好在他的运气不错，1979年燕京曲艺团招收相声演员，他被幸运地录取了。起初，他确是抱着要在舞台上施展才华，日后当个明星的念头，打

算也苦练了一番。演出几场博得了一些赞叹声，为他在团中赢得了地位。有人尊称他“马老师”，他沾沾自喜。渐渐地他觉得团里的人谁也比不上他，有些飘飘然了。二年后，由于他对业务的松懈，慢慢地和团里同行的业务水平拉开了距离。不久在调整中，他被筛选了下来，到台球厅当了服务员。他的演员梦破碎了。此时他没有反思自己，他心灵深处却将这一切都归结为领导挤兑他。他很，可又无处发泄。

然而让他有所安慰的是，前来打台球的人为了能多玩会儿对他很尊敬，仍称他“马老师”，每到这时他心里总是美滋滋的。同时，他也看出了，这帮来打台球的人哪个没受到过公安机关处理？他们胆子贼大，打起架来是把好手。一来惹不得，二来日后说不定能派上用场。为了套“磁”，他不惜让他们分文不花白白地玩上半天。没多久，他们真以师徒相称了。

4月中下旬北京发生了动乱，他很兴奋，认为发泄私愤的时机来了。5月20日，戒严令发布后，他看到部队进城被阻很高兴，心想，如果军队一进来，事态一平息，他就没戏唱了。于是，马上去找他的“学生”，见到一个煽动一下：“大敌当前你们要象个崇文区的战士……”。马振有清楚，自己这帮“学生”，平时就象一群野马爱惹事生非，此时此刻稍一煽火就会着起来。果然，当即有人参加了“飞虎队”，有人开始设置路障并找来砖头昼夜守在路口，准备玩命了。

当马振有看到部队进城已迫在眉睫，便叫来这帮“学生”教他们如何设火障。当有人问天上飞机怎么打时，只见他一边做着示范动作，一边传授着：“打飞机要用枪，要躺在地上，一只脚踩着枪带，枪托顶在肩上，三点成一线……”。没想到，

他的这番传授一传十，十传百，当天便有人在房顶用汽枪朝直升飞机连连射击。

5月3日晚，正在家里一边喝酒一边盘算下一步怎么走的马振有，听到街上有喊声，知道洋队进城了。他放下酒杯，从屋里拿出一把匕首就要出去，爱人拦住了他，他却一拍胸膛说道：“要劲的时候到了。”说着，他把匕首往腰里一别夺路而去。

当他在崇文门三条地草坪上找到他的“学生”时，抽出匕首对围拢过来的学生们说道：“今晚我要组织游击队，我是司令，看看你们哪个象战士，如果哪个不听指挥，看见没有！”只见他用匕首毅然将树皮刮掉一块，那意思不言而喻。这着果然奏效，不是这个跑来报告“司令，军车又来了！”就是那个打立正敬个礼后，请示该怎么打。不一会儿，十几号人派出去了。当他看到这帮人一轰而上一轰而撤时，又召集他们辅导了一番：“这那儿象打仗，你们要进攻，也要掩护”。于是，这帮痞子便来劲了，疯子似地围阻军车，用砖头雨点般地朝部队猛砍。被阻的部队顾得了这头，顾不了那头，战士身上血流如注，紧接着，军车燃起了一片大火。

就在暴徒们企图用隔离墩上的铁棍插进装甲车履带未逞的时候，在一旁的马振有又指点着：“应该用木头、棉被往里弄。”片刻，他手下的“战士”，抬来两根三米长的木方子，准备做恶。值得庆幸的是，以后装甲车再也没从此处经过，不然后果可想而知。

反革命暴乱平息后，马振有被依法逮捕了。他对解放军、对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必然逃脱不了人民的审判。他不应忘记那句老话：玩火者，必自焚。

（原载1989年15期《宣传手册》）

一个佛门的败类

——被弘福寺开除的和尚怡法 在京搞“声援”

鲁荣晖 曹蒙军

7月26日晚，在中央电视台播放的《血与火的考验》第三集中，有一个镜头十分引人注目：一个混杂在天安门广场围观、声援群众中的僧人，自称“代表佛教界”，“慷慨陈词”，说什么出家人慈悲为怀，声援学生，并大呼反动口号。近一分钟的画面，把这个僧人的面目暴露殆尽。据了解，他是一个违反佛门清规戒律，屡教不改，被弘福寺逐出山门的败类。

此和尚法名怡法，俗名肖世华，原在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当勤杂工，后来到山西五台山出家，在杭州般若寺受戒，曾在北京广济寺给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正果大师（已故）当过两年侍者，由于在广济寺表现不好，1987年夏天，中国佛协介绍他到贵阳弘福寺当住庙小和尚，他负责寺庙出纳工作，经济手续不清，贪污四百多元。退赔后，被免去出纳职务。他平时不守教规，常脱下僧服，穿上便装下山找他的旧情人（有夫之妇）。弘福寺住持多次对他进行教育，但他毫无悔改之意，于1988年4月被弘福寺开除。之后，他窜到北京、上海等地，专门向外国游人化缘，并从上海贩来佛珠、佛像等宗教用

品，穿着和尚衣，在贵阳火车站、黔灵公园等处摆地摊兜售，影响市容及治安。经公安部门与贵阳市佛协商量，同时也给他一个悔改机会，决定让他到贵阳市黔明寺“挂单”（暂住）。住庙期间，他仍不思悔改，不守清规，引起了庙内外佛教徒的极大不满。1988年底，该庙住持忍无可忍，叫他走，他就大发脾气，大吵大闹，砸坏住房中许多物品。经市佛协、黔明寺管理小组和市公安局联系，认为他违反了“治安管理条例”，并准备拘留他，他知道后溜之大吉。

怡法离开寺庙后，更是无法无天，无所顾忌了。他在安顺、普定等地流窜，最后竟出现在动乱的天安门广场。不了解底细的人，当时或许认为已感动了佛门弟子。其实他根本没有资格代表佛教界，根本不是一名爱国爱教的和尚。当贵阳市佛协和弘福寺、黔明寺的僧人、教徒们看到（听到）电视上播出怡法的镜头后，无不气愤，都说这个佛门败类竟然混到北京去了，应该撕掉他的假面具，不要玷污了广大爱国爱教的佛门弟子。

（原载1989年8月1日《贵阳晚报》）

一个制造动乱的“沙龙”

郑彦

1988年5月4日，正当北京大学师生欢度校庆90周年之际，方励之、李淑娴跳将出来，作了一番淋漓尽致的表演。

就在这天下午，由方、李和刘刚（被通缉的“高自联”头目之一）一手策划的“民主沙龙”乱哄哄地开了场。方励之、李淑娴首先登台。方胡说什么“不同意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提法”，因为“现代化不分国界”；李淑娴则尽其煽风点火之能事，大谈“中国的布鲁诺”，叫嚣“甘愿作一粒沙子，为后人铺就一条自由之路”。还有人认为方励之提出的“知识分子要入党，要改变党的颜色”这个反对中国共产党的策略不够劲，索性提出“要重铺一条铁路，重造一列火车”。“民主沙龙”一开场，就充满了政治色彩，火药味十足。

从这天起到1989年5月12日，一共举办了17次“民主沙龙”，主要由王丹等人主持，方、李充当军师。从已掌握的材料可以清楚地看出，方励之、李淑娴、王丹等人如此卖力地举办“民主沙龙”，就是要为日后制造动乱，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制造舆论，网罗人马，进行思想和组织的准备。

（一）

名为“民主沙龙”，其实并非真是为了民主。这从他们邀请参加者的标准可见端倪。

王丹公开要求学校给他们“邀请著名学者参加的自由”，“保证除被剥夺政治权利者外一律准许被邀请”。李淑娴也与王丹一唱一和，说什么“一个学者，一个人，只要没有被剥夺政治权利，他就有演讲的自由。他是中国公民，就应该有权利被邀请。”可是“沙龙”的另一名组织者却说：“有人提出请曲啸那种人来这里，我们认为没必要。”

那末，他们究竟要请哪些先生呢？王丹直言不讳地说：“我们讨论的本来就是政治问题，当然要找一些有思想、有创

见的先生来。”一年来，他们请的主讲人，除了臭名昭著的方励之、李淑娴夫妇外，还有包遵信、任晓明、戴晴、吴祖光、许良英等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头面人物，甚至未经正式外交程序，就邀请了某国驻华大使和夫人。

这些人在“沙龙”里肆无忌惮地兜售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货色，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角度，全面攻击四项基本原则。

谈到共产党领导时，王丹狂妄地叫嚷：“大概要摸摸老虎屁股了。”更有人公然喊出：“应该成立反对党”。他们肆意攻击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反现代化的理论”。狂叫：“要实现民主，关键问题在于改变中国的环境。”他们诬蔑“中国的领导人不讲人权”，公然为反革命分子魏京生鸣冤叫屈，说他“是有为的年青人，是人才，应当爱护。”他们极力鼓吹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声言要“办自己的报纸、杂志，传播民主思想。”他们攻击党的新闻政策，胡说什么“今天报纸的审查制度超过国民党统治的时候。”提到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些人更是咬牙切齿。参加这个沙龙的一个头面人物恶狠狠地说：“这两件事，一望而知，荒谬绝伦。”这些人还喋喋不休地叫嚷：“知识分子应该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是领导阶级，起主导作用”。

鲁迅说过：既捣鬼，就有术。这伙道貌岸然的文化人，经过几年来紧锣密鼓地筹划，终于嗅出了一点异常的政治空气，迫不及待地赤膊上阵了。他们撕去仅有的一点遮盖面纱，猖狂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们宣扬的“学术讨论”是假，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是真；他们高喊的“民主”是假，妄图推翻共

产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颠覆人民共和国是真。他们哪里是什么“文化人”、“精英”，分明是一伙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急先锋。而“民主沙龙”则成为他们向党向社会主义发起进攻的阵地。

(二)

“民主沙龙”的组织者深知，要达到某种目的，仅仅满足于“制造舆论”、进行“思想发动”是不够的，于是，他们又频繁进行了筹建组织的活动。

今年4月5日，王丹在“沙龙”蛊惑说：“所有知识界，都感到今年要有事情发生。我希望在目前这个时机，大家都团结起来。”还说：“如果大家都窜腾得比较欢，这个进程就推进了。”李淑娴进一步说明：“大家都是这个态度，也就没关系了。”

其实，他们的组织活动是伴随着“沙龙”的出笼而开始的。“沙龙”一开张，王丹就成为方励之、李淑娴的座上客。方、李对王十分赞赏，甚至在香港接受记者采访时也不忘吹捧王丹几句。而王丹则言必称“方老师”、“李老师”如何如何。

当然，他们的组织活动绝不仅限于少数头头之间的来往。为了建立更广泛的组织，他们处心积虑，耍了不少花招儿。

去年下半年，王丹等人筹备成立“当代中国国情研究会”，要求学校给予他们“独立活动的自由”，理所当然地未被批准。年底，王丹又打出某一学生社团的旗号，要成立这个社团的“当代社会问题部”，聘请张显扬、于浩成、许良英、吴祖光、戴晴等25人为顾问，拉大旗，作虎皮，又遭学校拒

绝。学校还多次派人找王丹谈话，指出他的活动违反校规。但他对学校的帮助教育置若罔闻，更加猖狂地活动。

今年4月初，为争取“民主沙龙”成为合法组织，王丹在学生中掀起一场签名运动。4月3日，王丹在北大三角地贴出有56个学生签名的给学校领导和有关部门的一封信，要求学校支持“民主沙龙”，开辟“沙龙”活动地点，并且事先通知一些港澳记者，企图借海外传媒给学校施加压力。

对此，学校仍未同意。王丹等人恼羞成怒，专门为此举办了一次“沙龙”。王丹气势汹汹地鼓动更多的师生用签名的方式支持他们。李淑娴也再次跳到前台，明确表示她“很支持这件事”。对签名的学生表示“非常地尊敬”，并要亲自出马，“登门拜访校领导”使“民主沙龙”合法化。

4月19日，学潮已经发生。这天晚上，他们又举行了一次“民主沙龙”，重点讨论成立组织的事情，当场推选出由王丹、封从德、熊焱等7人组成的“北大自治学生会筹委会”，企图取代合法产生的校学生会和研究生会。

经过这样一番紧张的活动，他们确也拉起一支队伍。“民主沙龙”的组织者和积极参加者，如王丹、刘刚、封从德、杨涛、熊焱、郭海峰等在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中都成为非法组织“高自联”的头目和骨干分子。

(三)

“民主沙龙”的组织者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头面人物沆瀣一气，无时无刻不在伺机发难。4月15日，胡耀邦同志逝世。他们以为时机已到，便加紧煽动、策划，终于制造了一场触目惊心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

事发后，他们互相打气，互相呼应，接触愈加频繁。方

励之、李淑娴不断给王丹等人耳提面命，包遵信、陈明远、任晓昕等更是多次到北大讲演。

5月12日，所谓“学运低潮”时期，他们又举行了第17次“民主沙龙”。包遵信在“沙龙”大放厥词，说什么“4·27这个日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将会大书特书”，“它的规模和深远影响都超过了五四”，明确提出“4·26社论应该推翻”。他还煽动说，一听到学生上天安门游行，“当时就特别兴奋起来”。为了给学生打气，他还胡说：“4·27”在中国历史上“值得纪念”，说“4·27”的意义在于“标志长期以来封建家长制的专制统治在中国应该结束了。”

当时不少青年学生对动乱开始失去兴趣，感到迷惑、疲惫，包遵信的这一派胡言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当天下午，王丹等3人在北大贴出“绝食声明”。次日，北京几百名学生开始绝食。严家其、包遵信、苏绍智等人又导演一出首都知识界大游行的闹剧，声援绝食学生。可以看出，“民主沙龙”的组织者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头面人物配合得是何等默契！

善良的人们是很难预料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阴谋的。但事实却使我们清醒：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否则将国无宁日。同时，须臾不能放松对反革命分子的警惕，因为他们一刻都没有睡觉，还会利用各种形式，伺机向我们进攻。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倒是应该感谢“民主沙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反面教材。

（原载1989年7月25日《人民日报》）

看“高自联”如何利用 绝食学生搞政治讹诈

——部分医务人员谈绝食现场 救护见闻

北京日报记者

首都部分大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请愿期间，“高自联”宣称不与北京市政府发生联系。为了确保绝食学生安全，市红十字会组织医务人员投入救护工作，千方百计保证绝食学生的生命和健康，使得绝食学生没有一人死亡，也没有出现一例严重的合并症。同时，市红十字会有关人员还与“高自联”头头进行接触，做尽快平息事态的各项工作。但是，“高自联”头头却别有用心，置绝食学生的身体健康于不顾，故意拖延对绝食学生的救护，以扩大事态，欺骗舆论和群众。从市红十字会的一些会员讲述的这几件事情，可以看出“高自联”组织这场绝食的一些真相。

“高自联”为取得国际组织干预，竟将
红十字会的救护人员赶出天安门广场

5月13日下午5时，首都部分大学生开始绝食请愿。市政府对此十分关注，当晚9点即派市红十字会的医务人员和

市急救中心的两辆救护车进入广场附近，为绝食学生准备了食盐、白糖和开水，医务人员到广场给学生送水送药，进行巡诊、治疗和接送病号等救护工作。

5月16日，广场上已有600人次晕倒，在现场进行救护工作的22所医院和医学院校师生呼吁，要求市红十字会迅速采取措施，以保证绝食学生的生命安全。与此同时，1200名绝食学生联合签名，对市红十字会及各医院帮助他们的医务人员表示最高的敬意。下午5时，广场上的学生还打出横幅，要求与市红十字会负责人对话。晚7时，“高自联”常委熊炜等人市红十字会负责人会面了。

熊炜等人并未具体提出如何对绝食学生进行救护，而是拿出一份写给国际红十字会、中国红十字会、北京红十字会的呼吁书，声称按照国际惯例，绝食72小时以上，国际红十字会可以干预。并明确表示要与国际红十字会进行联系。这一要求被当场拒绝了。实际上，国际上根本没有这种惯例。市红十字会的负责人说：“你们不是爱国吗？中国人能干的事为什么要请洋人来干呢？我们北京红十字会有62万会员，完全有能力担负起对绝食学生的监护和医疗工作。”经过市红十字会的反复做工作，“高自联”才与市红十字会达成协议，从17日凌晨1时起，由市红十字会全部接管对绝食学生的监护、抢救、治疗工作。

这时，熊炜等人又提出要与中国红十字总会负责人见面。在总会，熊炜等人又一再提出要国际组织干预的问题。这次他们改口说，国际教科文组织有这种规定，国际红十字会应对绝食3天以上者进行检查干预。总会的负责同志告诉他们，世界上只有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但它并没有规定

可以干预哪个国家的绝食活动。总会的负责同志拒绝了“高自联”的这项要求。

从中国红十字总会回到天安门广场已是17日凌晨零点四十分，“高自联”的头头们挑衅地问北京市红十字会的负责人：20分钟后，你们能调救护队伍来吗？

凌晨1时整，市红十字会的80名会员、16辆救护车和两辆大轿车准时到达了广场。

“高自联”的头头们愣了，继而都不露面了。

按照协议，“高自联”应负责打开救护人员进入绝食圈的通道，并将绝食学生分成四组，以利救护人员进行诊断和救护。可是“高自联”根本没有进行一点准备，致使救护人员在广场外等了半个多小时才得以进入广场绝食圈。只见绝食的学生绝大多数已经入睡，密密麻麻躺成一片，救护人员既无法下脚工作，也很难看出谁是睡熟、谁是昏迷、谁的身体虚弱。

救护人员在医学院校师生的协助下，一个个将学生推醒诊断，数百名绝食三天以上的体弱同学被及时地送往各医院。

凌晨4时许，广场上的广播突然响了，“高自联”单方面撕毁了协议，宣布市红十字会不受欢迎，将前来救护的医务人员赶出了广场。

“高自联”以广大绝食学生的生命为政治 筹码，提出苛刻条件企图扩大事态

“高自联”轰赶红十字会医务人员的举动遭到了广大绝食学生的反对。至17日下午，被送往医院抢救的绝食学生已达

1700人次。他们都接受了治疗，在医务人员的劝说下，一些学生开始进食。这些学生反映，“高自联”设立了纠察线，绝食学生难以与外界接触，听到声援的人喊什么口号的都有，已感到性质发生了变化了。他们对市红十字会对他们的监护抢救表示支持和感谢。广场上的一些学生还质问“高自联”：裹走市红十字会后，怎样保证绝食学生的生命安全？此时，“高自联”才向市红十字会表示道歉，又请回了医疗救护人员。

17日下午5时，市红十字会接到市政府的通知，18日将有雷阵雨，要求市红十字会和有关部门帮助解决绝食学生的避雨问题。市红十字会马上与“高自联”和学生绝食指挥部联系，提出用大轿车避雨的方案，但直到深夜12点多，“高自联”的常委郭海峰才出面答复。

郭海峰坚持要求市红十字会给他们提供帐篷，在此之前，“高自联”已提出过这样的要求，以便在广场长期呆下去。市红十字会负责人说，从保证绝食学生健康出发，应该使用大轿车，这样有利清扫和消毒，而帐篷则容易进水和滋生病菌。郭海峰却问：“你们用大轿车，是不是想把学生都拉走？”市红十字会负责人告诉他：“我们一个也不会拉走。但是你们要考虑学生的生命安全。如果让学生淋大雨、或躺在帐篷里的湿地上生了大病，你们负得起责任吗？”郭海峰这才表示要回去商量商量。

一直拖延到18日凌晨两点多，“高自联”才同意用大轿车让绝食学生避雨。他们提出，70辆大轿车要在18日早6点开进广场。

5点50分，市公交总公司克服了种种困难，70辆大轿车驶进广场。

绝食的学生们欢呼着进了大轿车。然而，“高自联”又一次撕毁了协议。协议规定，绝食学生应保护大轿车。但是，开进广场的“大轿车”大都不是被扎了车带，就是被放了气，甚至被损坏了发动机。

幕后确有操纵者 指挥着“高自联”组织的绝食活动

18日清晨5时，党和国家领导人李鹏等到医院去看望了绝食的学生，希望同学们尽快结束绝食，尽快到医院接受治疗。这时，被送进医院的绝食学生已达3504人次，并有32人病情严重，天安门广场随时有爆发大规模流行病的可能。为此，市红十字会通过新闻媒介发出紧急呼吁，迫切呼吁学生们爱惜身体，停止绝食，红十字会愿意对绝食学生进行抢救、监护和治疗。

从18日凌晨起，市红十字会的负责人一次次地找“高自联”和广场绝食团的头头们要求谈判，直到下午，“高自联”的郭海峰、柴玲等人才同意进行对话。他们让市红十字会的负责人跟着他们上了绝食指挥车，断断续续地在广场和前门一带转悠了4个小时，郭海峰、柴玲等人又吃又喝又对着喇叭念“绝食宣言”，根本不屑于谈绝食学生的救护问题。最后，“高自联”的头头封从德让红十字会的负责人晚上12点再去纪念碑前找他们。

这次谈判从18日晚12时左右一直进行到19日下午。这期间，北京大学的一名学生越过几道纠察线，冲到正在谈判的指挥车上，大声斥责“高自联”的头头们把绝食的学生们的生命当儿戏。市红十字会的负责人最后严厉表示：“如果你们继续

阻止我们对绝食学生进行监护，仍然坚持绝食，一旦有学生发生死亡，你们将无法向社会、向学生家长、向广大学生交待！”他坚定地说：“你们把绝食学生交给我们，我们红十字会保证负责他们的生命安全。如果不交，一切后果将由你们负责！”

在场的9名“高自联”头头含糊了。晚8点，9人当中有7人表示同意停止绝食，由市红十字会监护绝食的学生，并准备在协议书上签字。

这时，一个不明身份的人匆匆闯入谈判现场，送来一张纸条。“高自联”的头头们看后立即起身，只说了一句“协议我们不签了，你们过一个小时再听答复吧”，便都匆匆离去了。

一个小时后是晚9点，也就是在党中央国务院召开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之前一小时，“高自联”在天安门广场的高音喇叭上宣布：为了使斗争深入下去，我们将绝食改为静坐。并声称今晚可能发生特殊情况。与此同时，“高自联”组织的一队队大学生赶到了城外各个路口，准备堵截军车了。

以上事实说明，受市政府委托支持的市红十字会在学生绝食期间真心诚意地救护广大学生，他们的行动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大学生的关心和爱护。已绝食的前台组织者“高自联”则利用和欺骗绝食学生，将他们生死存亡置之度外，以卑鄙的手段向政府施加压力，搞了一场政治讹诈。

（原载1989年6月27日《北京日报》）

请看“北京高校自治联合会”的真面目

严 实

“高自联”的全称是“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在这次北京发生的学潮、动乱以至反革命暴乱整个过程中，“高自联”始终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由于斗争的复杂性，许多善良的人们并不很了解“高自联”的真实面目，现在，随着反革命暴乱被平息，随着少数人和各种势力制造、操纵和利用学潮的真相被逐渐揭露，“高自联”的反革命真面目也正在逐渐暴露于世人面前。

一、“高自联”产生的背景和组织体系

自去年上半年以来，一些高校中就有些人开始进行了有组织的活动，他们在学生中大肆宣扬各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观点。至去年底开始，这些人又开始制造舆论，要利用今年五四运动七十周年、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和建国四十周年时机大干一场。到今年二、三月份，他们更加活跃，不断组织各种沙龙、研讨会、搞征集签名，声言要在五四掀起一场民主运动，其纲领就是在政治上实行多党制、在经济上搞产权私有化。4月15日，胡耀邦同志去世，他们认为这是一个煽动群众情绪的极好机会，便把原计划在五四的行动提前进

行。

自去年五月开始，有人就组织了“民主沙龙”。每周活动一次，邀请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头面人物如方励之等人宣扬他们的思想。今年4月19日，由王丹主持，在北大“民主沙龙”第16次会议上成立了“北大团结学生会筹委会”，来领导他们所谓的学生运动。这个“筹委会”由七人组成：丁小平、王丹、杨涛、杨丹涛、熊焱、封从德、常劲。“高自联”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随着学潮发展为动乱，他们自认为向党和政府进攻的时机已成熟，基于过去学潮失败的教训，他们迫不及待地要成立自己的组织系统。4月20日，由丁小平主持，召集各校300余名学生开会，宣布成立“北京高校学生联合会”，直接组织了4月22日数万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的清愿活动。4月23日，21个学校的“代表”在圆明园开会，成立“高自联”前身“北京高校临时委员会”，即北京高校临时学联，选举政法大学周勇军为第一任主席，成员有王丹、吾尔开希、马少芳、臧凯等。4月28日，“临时学联”在政法大学开会，撤销周勇军的主席职务，由吾尔开希接任。同时，“临时学联”改名为“北京高校自治联合会”，“高自联”由此正式成立。

“高自联”成立以后，有两个比较明显的特点：一是人员变化快，但骨干分子一直没有变；二是名称变化多，衍生组织多。如5月2日成立“对话代表团”，5月13日成立“绝食团”，5月22日成立“天安门广场临时指挥部”，5月26日又改称“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之所以有这些特点，主要原因一是所谓的“斗争需要”。其实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更好地掩护自己。但其骨干王丹、吾尔开希、柴玲、封从德、郭海峰等一

直活跃在各个组织之中；二是“高自联”内部经常意见分歧，为争权夺利而发生内讧，也使得其组织不断分化。

二、“高自联”的真实面目

“高自联”从开始酝酿到成立，以至所有的活动，它的纲领是十分明确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推翻共产党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彻底取消四项基本原则。其口号和具体目标根据形势发展不断调整。在动乱开始，他们就拼命攻击党和政府及国家领导人，提出要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和消除精神污染运动，并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头面人物平反。在动乱中期对话过程中，提出要中央彻底否定4.26社论，承认这是一场爱国民主运动，承认“高自联”为合法组织。动乱后期，他们公开提出打倒邓小平、打倒李鹏，公开鼓动颠覆政府，其最终目的就是王丹5月17日在美国《世界导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所表述的那样，“建立西方化的政治体制”，在经济上实行私有制，在政治上实行多党制。

“高自联”也是策划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直接组织者。从它的成立伊始，就直接参与了制造动乱的活动。它组织了4月22日天安门广场的非法请愿，24日开始组织全市高校罢课，组织了5月4日及其以后的各次游行。特别是趁戈尔巴乔夫访华这一重大国事活动之机，组织了5月13日开始的绝食行动，以广大同学的生命为政治砝码，向党和政府施加压力。5月19日开始，“高自联”通过幕后渠道得知首都将实行戒严的部署后，制造了大批谣言。说部队进京是来镇压学生的。公布了戒严部队的番号和进军路线，煽动学生和市民堵截军车、围攻部队。5月25日，“高自联”开会，制定了两套方案，决

定用最激烈的方式向政府发起进攻，他们派出了5个宣传团到全国各地串联，在全国搞统一的行动。6月2日，他们在纪念碑举办了所谓“战利品”展览，主要是违法抢夺的军用物品。同时在广场的“高自联”广播中教人们如何制造和使用燃烧瓶。他们与“工自联”召开联席会，制定了在全国搞打砸抢烧的方针，并准备成立暗杀团，成为制造暴乱的直接组织者。

“高自联”还是里通外国的卖国组织，是当代的卖国贼汉奸。它一直与外国的反动势力保持密切的联系，直接接受他们的资助。据他们自己估计，要维持广场的活动，每天至少需要10万元，这样庞大的费用只靠街头募捐是不可能收集起来的。他们的一位副总指挥称他们有1000万元经费，其中现金三百万元。国外的资金来自于美国、法国、香港等，香港还有人在北京饭店包下房间，专门向广场随时提供各种费用。“高自联”头头最后潜逃时，每人身上都带着数万以至十几万的经费。“高自联”还通过外国势力给它的40名骨干每人办好了一份护照，准备一旦形势不妙就逃往国外。他们还向西方的新闻工具提供了大量的国家机密和消息，再通过国外舆论来欺骗煽动国内群众。

“高自联”表面高喊民主自由，实际是一个十足的政治流氓团伙。其逻辑就是“谎言重复百遍就是真理”。他们制造了大量的谣言，以此来煽动群众和学生的情绪，以达到操纵动乱的目的。在胡耀邦同志去世后，他们说耀邦是被毒死的，以此挑动学潮。而后，他们又制造了“师大女学生被警车撞死”和“4.20新华门惨案”的谣言，欺骗不明真相的学生，组织了4月21日晚的游行。4月22日又制造了李鹏总理答应接见学生的骗局，加剧了学生与政府的对立情绪。5月13日又以

政府拒绝对话的谎言煽动同学绝食，并说只进行30小时有限绝食，实际上只要学生一进入绝食圈子就不允许再退出，而绝食的组织者却大吃大喝。5月20日后，连续四天在广场制造各种军队要采取镇压行动的谣言，号召群众保卫广场，进一步制造群众与政府的矛盾。6月2日晚，又把一起偶然的交通事故中不幸遇难的三位市民说成是民主战士，是拦军车而死的，并以此为借口，策动了反革命暴乱。6月4日，他们又造谣“军队血洗天安门广场，死亡几千人”，挑动群众与政府对抗。所以，从学潮的产生，以至发展成动乱，最后发生反革命暴乱，都是“高自联”通过谣言来欺骗群众，调动群众情绪，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

从“高自联”的种种表演我们可以看出，“高自联”是经过长期策划成立的，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和目标的反革命组织。他们以制造谣言为煽动群众的主要手段，利用群众的善良愿望，以大学生为载体，积极参与制造了动乱和暴乱，他们的真正面目必将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

（原载1989年7月4日《北京青年报》）

天安门广场啊，我为你哭泣

我是一名外地大学生，来北京已好几天了。到京后，吃住都在天安门广场，我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嘶哑着嗓子给围观群众讲述“路透社消息”，说些连自己都不太相信的传闻

和道理，而是冷静地思考和观察。我深知，一旦人被某种情绪所支配，那么他将失去公正的判别力。现在，我就把这一段时间耳闻目睹的情况向关注我们的海内外同胞作一介绍。

一、大家有一种受骗的感觉

没来北京前，从北京返回的同学告诉我们说，北京市民如何如何支持学生，个体户一甩手便是数十张票额百元的人民币，而且不留名姓；铁路客运部门如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暗中怂恿学生无票上车进京声援；到北京后吃穿如何不用愁，免费供应，真是这样游览北京何乐而不为；这么一件大事不去看看将会留下终生的遗憾和后悔，等等。我们便被说动了心，到了北京。经过一两天的“实践”后，大多数同学都有一种受骗后的感觉，便又打轿回府，返回学校或顺便回了家。原来，情形并不像那些到北京的同学所说的那样。一些从京返回的同学把一时一地的现象当成整体形象了。我们发现：北京市民已不像前些日子那样无私无偿地支援学生了。相反，一些小摊小贩乘机抬高食品的价格，主要是风味小吃和饮料，来抠我们本已羞涩的腰包。北京市旅游团，定价0.35元，有些人竟敢对傻乎乎的我们卖到一元一张。而我们因人生地不熟，只有敢怒而不敢言的份。在北京抬手动脚就得掏钱。乘地铁三角一张票，少一分也不行，索性我们乘上后就环城绕上两圈兜兜风；坐公共汽车，有时为五分钱还得满脸通红地给人家售票员解释上半夭；晚上睡在地下道里，也有一些同学睡在广场上，围裹四周的是破旧的衣服；吃饭只好饱一顿、饥一顿凑合，一天一般两顿饭，顿顿干面包，当然吃不饱了，有时只好唱唱空城计。条件艰苦，可谓

风餐露宿。当然，我们知道来京并不是为了享福，可得有个明确目的呀，然而大多数同学并不知道什么明确目的，只是想来声援一下。结果轰轰烈烈的声援变成了一场既不像声援，又不像旅游的闹剧了。

二、广场上大学生的心态

目前，天安门广场的大学生心态十分复杂。

一部分同学是为了逃避学校功课的负担而来的。长期呆在封闭的四堵墙里，感到苦闷、烦躁、无聊，加上厌学风盛行，因而乘机来京一趟，借以松弛一下神经。然而，未来呢？功课的负担只能往后推移和累积，但不能从根本上取消。将来怎么办？一想起来便十分心焦，陷入矛盾之中。

有一部分同学是来北京游玩的。现在这个时候来北京，花费很少，因为吃的睡的不是太发愁的事，好在我们都年轻，顶一顶也就过去了。有的同学拟定计划某日去某个地方，而且把乘车路线也都规划好，准备把名胜古迹逛个够。这部分同学不愿撤离天安门广场，是因为白天游玩回来后能有个“窝”，把天安门广场作为“根据地”。原因很简单，现在大家都在广场上吃呀睡的，因为是非常时期，谁也不寒碜谁。如果以后再有机会来北京，作为一个重面子的小知识分子，谁还好意思在广场上这么着？

另有一部分同学是来北京满足心愿的。因为谁也不知道一生中能遇到几次这样的机会，觉得错过这么一次机会十分可惜，说不定会后悔一辈子。而匆忙之中踏上赴京列车，反正甭管它酸甜苦辣，留个心中的纪念而已。

还有一部分同学，一般是各个学校的“代表”或各个组织

的负责人，当然不愿轻易撤离。此外，少数同学是因为平时没有一个发挥才干、显露才华的机会和场所，这次好不容易抓住这么一个表现自我的机会，当然不会轻易放弃。因为在这里没有什么危险，反正军队不是用来对付学生的，党和政府又要坚决保护其爱国热情，因而愈发有恃无恐，胆子变得越来越大，指名道姓地痛骂某些领导人，大有“粪土当年万户侯”之味。

三、天安门广场概览

没有来到北京前，对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心中是十分景仰的，天安门城楼及天安门广场是心中的“圣地”。可现在一看，令人十分失望，说不出心里是个什么滋味。广场上的人和物都变得陌生，面目全非了。

天安门前宽阔的东西长安街，交通秩序远非我们想象得那样井然有序，而是有些凌乱。人们跨越栏杆，在车行道上穿梭，刺耳的刹车声不时响起。一有游行示威活动，交通即被堵塞；一些演讲者在马路边就开始发表演说，一大堆人群围拢来，交通的窘境便立刻显现出来。在博物馆前的马路上，因为旁边有一简易厕所，人们大小便不注意，粪便涌到路边的树坑里甚至马路上。天气一热，粪便气味直冲云天，令人掩鼻而过。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厕所前边，一些小摊小贩摆起了食品摊，卖起了西瓜、冰糕、汽水、羊肉串及蛋卷面包等，而这些摊点前总是围着一群已顾不得卫生的大学生们。现在偌大的一个天安门广场，已变成一个大垃圾场。我遇见不少同学，他们说有的同学已有十来天时间不洗脸，不刷牙、不洗

脚了。是没有这个条件吗？不是。天安门广场周围简易水管无时不在供水，实在是有些同学太懒了。晚上便在那五花八门的帐篷里一钻，在旧衣服堆里头脚相接地躺在一起，脚臭、汗臭、口臭加上一些食物变馊发臭，诸种臭味混杂一起。一些同学喝完饮料后随手把瓶一扔，吃完榨菜后把包装纸扔在脚边，面包屑、菜渣、米饭粒纷纷落在睡的棉絮旧衣上，吃完饭后不是睡觉，便是寻找点刺激来打发日子，起哄者有之，嘻笑打闹者有之，谈情说爱者也不乏其人，还有围在一起打扑克的。到了晚上则扯起嘶哑的喉咙吼上一段南腔北调，渴了则灌上一肚子广场周围的自来水，或者与小摊小贩脸红脖子粗地去斤斤计较，胡搅蛮缠。看，这一切便构成了我们广场上大学生的生活图画。令人气愤的是，人民英雄纪念碑上也涂贴了不少标语口号，垃圾成片。最令人目不忍睹的是广场及其周围的草坪。造价昂贵的草坪如今该是绿茵如碧了，可现在踩得连草根也都不见踪影了。这些情形，想必现在来到北京的人和北京市民都会黯然神伤的。

四、我们应该撤离天安门广场

我经过几天广泛地和同学接触，不少同学认为我们应该撤离天安门广场。理由很多，现在我把这些理由归纳一下：

第一，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没有必要再呆下去了。学潮的前期，我们要求惩治官倒，铲除腐败，这些已引起全国人民和全世界的共鸣和关注，也引起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党和国家领导人已先后表态和会见过学生代表，接下来该是党和政府采取措施实施我们的要求了。可是如果我们一味坚持不撤，势必会分散党和国家采取措施的注意力和集中力。

因此我们适可而止，防止事态扩大，主动撤离，可谓明智之举。否则，我们的高要求得不到落实，也影响了我们的低目标的实现。民主和自由的实施，也有一个过程，决不是一蹴而就的事。这一点我们必须明白。事态发展下去，将会出现我们所无法预料的，不可控制的，同时大家又不愿看到的局面。

第二，我们不宜再打扰北京市民了。北京人民在学潮前期确实给了我们极大的支持。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北京市民也有个承受力问题。尤其是现在学潮的目标和方向已发生转移而且十分波动。不要说北京市民已由理解变为茫然无措了，连我们自己有时也不知所云了。加之我们一些同学在北京的不文明行为，如随地吐痰、乘车逃票、不讲卫生、出口伤人、随意拦车等等，已使北京一些市民产生看法，一些市民对大学生的好感已经变得冷淡。现在送饭送水的北京市民已相当稀少乃至绝迹，正说明了这一点。难道我们非要等引起北京市民的反感和讨厌，把我们赶走不成？可以说，这次学潮给北京市民造成了较大的心理负作用，以后即使再有学潮，他们也不会如此支持我们了。

第三，北京少数市民和北京的少数大学生的行为令人深思。无庸讳言，北京的绝大多数市民是善良而好客的，但也有极少数北京市民的所作所为令人失望。一位同学告诉我，他曾在三个不同的地方遇到同一个北京市民所问的同一个问题，原来这位市民没认出这位同学。看那笑眯眯的样子，吃饭后没事寻大学生开心的样子，真令人生气。有的北京人好奇心特强，外地大学生不撤离广场，他们便在晚饭后凉风习习时来满足一下好奇心，转悠来转悠去，看一看我们大学生

什么都敢喊，谁也能骂，倒也十分开心，把我们当作艺术品一般把玩欣赏，仿佛是在看一场马戏似的。北京的少数大学生把旗子插在广场上，人却不知溜到哪儿去了，天热了回家里或去学校睡觉，天凉了才到广场遛一圈，发表些高论，令我们外地大学生自愧弗如，他们吃得饱，穿得净，可苦熬了我们这些外地大学生。这些人虽然不多，但却伤害了我们的感情，我们外地大学生都有一种被耍弄了的感觉。

第四，这次学潮的组织者素质较差，不足以继续领导我们进行学运。原来的组织者们不知因为什么原因相继退出，后来的这些组织者们素质较差，其所作所为令人作呕。他们故弄玄虚，作神秘状，让人摸不着头脑，每一位都是碰不得、惹不起的“总负责人”、“总头头”，而且组织机构叠出，谁也不服气谁。据了解，广场上至少有四五个较大的平行组织，还有名目繁多的其它组织，令出多门，喇叭之间也互相干扰。他们一方面喊着打倒“官倒”的口号，另一方面却又对同学横眉冷目，恶声恶气。有一位同学，曾亲眼看到有一位组织者开张白条到物资供应站领取大量的面包、鸡蛋、饮料和榨菜，几个人吃不完后便白白扔掉。可与此同时，外地不少大学生却吃不上或吃不饱。我们看到在纪念碑上的组织者大吃大喝，随意丢弃食品饮料。他们应每天公布捐款和捐赠物品的收支情况，让全体同学监督。更有甚者，竟敢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洁白的汉白玉台柱上，搂抱着姑娘嬉笑。这样的组织者如何令我们外地大学生心服？

第五，天安门广场上事态发展已走向与原来愿望相背离的方而，确有少数人在煽风点火。作为受着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不应受到蒙蔽。广场上流短飞长，令人目不暇给，可

经过冷静一想，纯属子虚乌有。没来北京前，到处流传着什么政府断绝天安门广场供水和照明，燃放催泪瓦斯，外交部和上海等不承认现政府，武装直升飞机如何如何镇压学生等等，到北京后方知这一切都是一派胡言。把一些恶毒的想象装上流言的翅膀强加到党和政府头上。当我们明白事情真相后，感到十分气愤。说话办事要做到有理有节，少数人为什么要造谣惑众，扰乱人心？究竟出于什么目的？更有少数人出于片面的理解、偏狭的思维把党和政府说得一无是处，用狂呼乱骂的形式博得围观人群廉价的掌声。我们甚至不明白，党和政府怎么会容忍这种不正常情况继续存在？少数学生已被狂热和无理智的情绪所支配，发展下去，这些同学的神经会崩溃，为什么不把他们送往医院加以治疗？应该着重指出的是，广大学生的爱国热情难能可贵，这是必须予以承认的。但是，确有极少数大学生目的动机并不纯正，我们也十分反感。

第六，各地高校陆续开始复课，耽误下去究竟于己不利，校方认真起来根据校规校纪处分，或者根据非常时期的特殊规定制裁，这可是吃不了要兜着走的。现在学生最怕开除，因为一旦除名便不是学生，成了无业之民，腰杆就不硬了。

综观这些情况，大多数同学已经离京返校，开始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因此我奉劝广场上的大学生们应予撤离，不要让已经超负荷的北京人民认为我们是“赖”在这儿不走。谁愿意闹就让他呆下去吧，我们外地大学生可不要被人当成枪杆使！少数同学想等政府派人来架走自己以便有个台阶下，回去好交代。这种想法是幼稚的。如果引起人们普遍讨厌和

反感，请问那些具有“坚定信念”的同学到那时又该如何收场？我们不必说因我们的行动已给国家、给政府所带来的政治、经济上的损失了。请大学生们——我的同龄人自尊自重自爱，不要再做那些有损于国格、有损于自己的事了。

（原载1989年6月1日《北京日报》）

一个大学生的沉重反思

某学院一名二年级学生

这几天我怕看电视，可又忍不住不能不看。一辆辆军车被烈焰吞食，一群反革命暴徒疯狂地追打解放军战士，特别是看到被残酷杀害在崇文门天桥下和西单的两位解放军烈士的遗骸，我的心像被刀扎，被火烧，精神几乎要完全崩溃了。

“4·27”游行时我曾经担任过纠察队队员。“5·13”开始绝食，我先是活跃在声援团，后两天也进到了绝食队伍中。虽然我自始至终坚持绝不采取暴力对抗，没有投掷过一块砖头石块，可严酷的事实使我不得不承认，我们的热情、行动已被人利用，有意无意地推波助澜，使动乱发展成了反革命暴乱。我们被戴上了“精英”、“先锋”的桂冠，受人欢呼，被吹捧着搅乱了首都。而解放军为了恢复首都的正常秩序，保证首都的安宁，却遭诬陷被许多“好心”的人误解唾骂为镇压学生。他们忍辱负重，怀着好心而不能被人理解的痛苦，在

自己要保护的许许多多人的围观下惨遭杀害，更残忍的是死后还遭残酷地凌辱暴尸街头，还要顶着被人捏造的恶名。从电视上我看到，当初我们热烈鼓掌欢迎引以为荣，要并肩战斗到底的“工自联”的许多人，原来都是社会渣滓，反革命暴徒。我曾经崇拜过、尊为导师的“民主斗士”方励之，原来是个叛国的小丑，他把我们煽动起来，自己却逃进了美国大使馆，在洋人的卵翼下成了民族的败类。我不断痛苦地责问着自己：这一切难道就是我们游行、静坐绝食要实现的目的？是非混淆、黑白颠倒，这一两个月令人眩晕的变化，如同一场噩梦！痛定思痛，认真反思，我悔！我恨！我真想痛哭一场，大声喊出：我们受骗了！我们成了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的工具，成了他们手中的一张牌。这一段时间，社会上对我们学生的行动有各式各样的议论、评价。并据此分析评价眼前发生的事情。如果说过去狂热的感情曾压倒了理智，为了面子我们做出了一些假象，现在面对着惨痛后果，血淋淋的暴行，我们再也无法自欺欺人了！我把自己这段时间的一些日记摘抄出来，目的并不在开脱自己，乞求宽恕。对这一段的行动，我怕今生今世都永难摆脱自谴和懊悔。我坦诚地撕开一些外衣，只求善良的人能真正理解我们，避免某些人还把我们就当枪使。我们不再受骗，更不希望用我们去继续骗人。

我认为自己的帐应该自己去去了结，每个正直的真正的人都会审视自己的过去，总结教训。为此，日记中涉及到的人，我都将姓名改了，特此说明。

1989年3月10日 星期五

听在×大的老乡讲，他们老师在课堂上讲，今天中国的改革已走进了死胡同。现在官倒盛行、贪污腐化成风。中国

是病入膏肓无可救药。an老师说，有人讲现在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许多人家都有了彩电、冰箱，这都是改革开放带来的。这是愚昧的胡说，僵化的余毒。我们得益于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现代化可不是哪一个人，哪一个党能决定的。

听说这位老师从研究生院毕业后，原本是分到国家计委工作，他不去，说他的主张在那儿没人听，所以宁肯来吃粉笔末教我们，把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

听了老乡的话，我更打不起精神读书了。到处都是官倒、贪污腐化，这书读起来有什么劲。他们老师都是研究生毕业了还没用，我们就更别提了。好歹跨进了大学门，混吧。

1989年3月29日 星期三

老iu真能侃，弗洛依德、萨特、尼采他都能侃一气。现在就这时髦。上午党史课，我溜号了。时到今日才采取行动，算是对得起他了，看老师讲得那么累，干巴巴的，有什么劲呀。

1989年4月20日 星期四

在老iu带领下，我们班今天有人去新华门，听说打起来了。我没去，因为小ou说要呼打倒共产党的口号，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到时把你们抓起来一个也跑不掉。没有共产党，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谁有资格、有能力来领导？

1989年4月27日 星期四

人民日报昨天的社论在学校炸锅了。老iu讲政府要拿我们开刀，不把架在脖子上这把刀推掉，学生们都没好果吃。ii老师也非常同情学生，说没想到上面会这么不通情理。

今天上街游行，老iu布置一定要把队伍组织好，搞非暴力请愿游行，要把“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的口号喊

得响响的，让他们看看我们学生是不是在搞动乱。大家都同意他的话。

我参加纠察队，负责维持游行秩序。我们高呼“惩治官倒、清除腐败”的口号，队伍井然有序。在××路口碰上了武警公安设置的警戒线，我们一冲就冲破了，许多围观的群众向我们热烈鼓掌表示支持。我们冲破了武警的阻拦，他们也没说什么就退了。我原来担心他们会拿北京的游行法压我们，引起冲突，幸亏没有。不过老iu说：“发生冲突也不怕，就让他们打，让他们抓，我们决不还手。要用血来唤起群众。其实政府不敢把我们大学生怎么样，一镇压学生就得玩完。我还真盼他来镇压哩。”

ii老师讲哀兵必祥。

1989年4月28日 星期五

我们一下成了引人注目的中心。到处都在赞扬我们，说我们的行动唤醒了广大群众，我们是民主先锋，不管政府怎么说，我们的行动在中国历史上都占了光辉的一页。我的心中仿佛一下升起了一种神圣的使命感。老un和我同房，平日学习吊儿郎当，一托(考托福)、二麻(打麻将)、三旋(跳舞)、四游(游山逛水)，除一托和他没缘，其余样样鬼精老辣，每天夜晚的卧谈，就他聊得下流庸俗，吹女人俨然是个老鬼。现在他也积极起来了，对外联络，传递消息跑得挺欢。斗争把人净化了。

1989年5月5日 星期五

与袁木、何东昌的对话是我们这些日子议论的中心。中午碰到ii老师，他让我们赶紧找赵紫阳在亚行年会上的讲话看看，他说要用心研究，既然中国不会发生动乱，怎么还能

给学生运动硬扣上动乱的帽子？

赵紫阳到底是为了安抚老外还是支持我们？老iu说是支持我们，连声说：有戏！

1989年5月9日 星期二

今晚在大饭堂集会，准备选两名参加对话的代表。研究生老ou上台发表讲演，逐一批驳了袁木在4月29日对话会上的讲话，不少人为他鼓掌。他讲，两个袁木和何东昌加一起也赶不上他的学识。对这样的政府根本就不应抱什么希望……我觉得他太狂了，虽然不喜欢他，也不得不承认他挺有煽动之才。

听说×大已经在发起去天安门广场搞绝食，经他一鼓动，大伙顿时热血沸腾，也要去天安门。

1989年5月13日 星期六

我们在下午开进了天安门广场，在纪念碑前的旗杆升起了我们的校旗，一面黑底黄字写着“绝食”的大旗也挂出来了。出发前有人担心后天戈尔巴乔夫就要来了，这时到天安门怕不好。老iu讥讽讲这话的傻冒，一点都不懂政治。选的就是这日子，在这种时候才能逼他们（政府）当回事，答应我们的要求。我幸亏没说话，要不也成傻冒了。

在广场老iu布置除少部分签名绝食的，其余的人都尽可能在广场分开活动，向群众宣传，说明我们的要求，要讲清楚，我们怀着一片爱国之心，要求打倒官倒，惩治腐败，可政府却给我们扣上动乱的帽子，他们对对话毫无诚意，逼得我们出来绝食请愿。千万别说出格的话，人群中有些便衣，要让他们什么把柄也抓不到。

宣传成功，群众都向着我们。

1989年5月17日 星期三

来广场静坐绝食的已达两千多人。今天是绝食的第五天，许多人集队乘车前来支持我们，广场被挤得水泄不通。昨天在学校里不少人还是浑浑噩噩自甘平庸的一代，今天一下子都成了民主的先锋、斗士，成为全市、全国注目的中心。广播站的高音喇叭不停地播放着声援我们的消息，大家感到浑身上下热血沸腾，虽然难熬，无论如何也要咬牙挺下去，冲着后面这么多强大的支持声援，我们决不能退！

今天又有几起老外来拍照拍电视，老un特起劲，大有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的味道。他说，冲开一个口子，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前进，取得更大的胜利。他那点水我太明戏了，下来我问他，你都胡说八道什么呀，他神秘地反问我：你懂什么，不懂去问问头头。

我注意到，这些日子他是常去纪念碑东南角，“高自联”的指挥部就设在那儿。

1989年5月18日 星期四

我开始宣布绝食。

下午下了场阵雨，绝食的同学们都安全地上了市里调来的大客车。这几天虽然没死一个人，救护车来来往往的呼叫声，叫得人挺揪心的，不少同学都烦躁不安。

中午李鹏在人大大会堂会见了王丹、吾尔开希等绝食代表，他提出为了人道主义，为了同学们宝贵的生命，要尽快结束绝食，到医院接受治疗。他肯定了我们的爱国热情。我觉得他的话是合情理的。可老iu说，李鹏在搞缓兵计，不能上当！要保持住对政府的压力，只要坚持绝食七天以上，政府就得垮台。“工自联”和一些干部、百姓也挺关心地跑来叮嘱

我们要顶住。现在全国、全世界都在看着我们，要软下来，往后退就太掉份儿了。我刚绝食一天，更不好说什么。群体效应把大家绑在了一起，所谓自由，在我们这儿也是奢谈啊。

下面到底还要达到什么目的，大家都挺模糊。

1989年5月19日 星期五

今天一早赵紫阳、李鹏来广场看望绝食的同学。他们上了前面那辆大客车。

看来党和政府是急眼了，再这么下去他们怎么收场？

这一阵外面一直在传赵紫阳支持我们，从他今天那诚恳的态度看，是不会错了。老iu回来说，赵紫阳吞吞吐吐，肯定有难处，他和李鹏不一样。我们在广场坚持住，赵紫阳也许没事，现在一撤出广场，他马上就垮。说得还真悬了。

1989年5月20日 星期六

广场上传的事多如牛毛，有的一看就是假的，广播里说邓颖超准备要宣布脱党，连这么荒唐的事它也敢播，也不怕自己倒自己的牌子。虽然如此，看不清前途的我们，也只能靠这些来支撑维持精神了。

原来是我们在搞运动，我们主宰一切，现在却是身不由己，被运动卷着走，骑虎难下，不知该怎么办。

听说解放军要进城镇压学生，广场又乱了。下午不少人分别去各个路口、小巷作宣传，呼吁老百姓来广场支援，和我们并肩战斗。

形势紧张，一触即发。

1989年5月30日 星期二

失去了目标，失去了控制，我们的心比现在的广场还要乱。我和老u老un几个侃大山，每个人都说说自己当前最盼

的是什么。老un讲得最绝，他盼防暴警察来，一人一个把我们强行架出天安门广场。大家一听都同意，老u补充道，当然还要半推半就反抗一下。为壮行色，被架走时，一定要振臂高呼一声：中国共产党万岁！

香港捐来的几顶旅游帐篷搭在广场东北，挺醒目的。这些天我们的精神意志就靠这些声援支撑着。昨晚树起来的“民主女神”又使同学们振作起来。

老u来布置，要誓死保卫“民主女神”像。他说有人讲违法，什么法？争民主争自由就是最大的法。树起女神像，一可以为我们这场伟大的运动树个象征，扩大影响，第二又给李鹏出了个大难题，他容忍不动吧，政府丢面子，威信更加扫地。拆除吧，只能使用暴力，只要他们敢挑起冲突，我们就能摆脱这种不死不活的局面，就主动了。

1989年6月1日 星期四

不少人已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回校洗个澡，吃饭睡上一觉，过一两天再到广场露个面。反正挺着就是了。我回学校洗完澡见到an老师，我告他这么下去同学们非拖垮不可。他说，没问题，政府更怕拖，要垮李鹏政府得先垮。在打倒官倒、惩治腐败上就得一针见血，连这都做不到，中国还能有救？我怀疑地问：难道把官倒惩治了，中国的问题就都解决了？他说，当然不行，我从来就没有把这当核心，但这个口号群众容易理解、容易接受。“4·27”游行要不喊这个口号，能得到那么多人支持吗？要攻进堡垒就得找突破口，这是斗争艺术。

躺在床上想着an的话，心里有点犯嘀咕。他们说政治是肮脏的，我在广场上空的臭气中已经闻到它的气息。我怕……

1989年6月3日 星期六

广播站广播，昨晚部队进了城，压死了几个冒死堵车的市民。现在是北京危急，广场危急，让大家迅速回天安门广场。

从豁口进城，到处都在议论部队强行进城的事，人心惶惶，在西单长安大戏院前面，一辆大客车顶篷上放着从部队手上缴来的冲锋枪、钢盔、军服等，一幅横幅上写着：看，这就是李鹏政府送给北京市人民的礼物！有个人在讲演，他说，部队一进城，我们就缴他的械，这辆车就是他们的下场……群众中马上响起了掌声。

进到广场，这里又变得人群拥挤了，头头们说，广播喇叭讲，下面的人自己传，都是在进北京的主要路口地段堵截解放军的消息。“工自联”的敢死队出发了，他们要去把各种车辆集中横堵路口，阻挡部队进城到天安门。虎坊桥那边传来消息，部队和公安都被群众打跑了，还收缴了武器……到处都发生了冲突，好像烧了一些军车。西边一群人压了过来，是在追打防暴警察。警察退进大会堂。人群开始向大会堂冲击。北京全乱了！

1989年6月4日 星期日

凌晨，我们被部队赶出了天安门广场。当头头征求大家意见是撤离还是坚持守在广场时，我和绝大多数人一起高喊：“撤离！”我们互相搀扶着，举着旗，活像一群残兵败将似的集队离开了广场。有人激动地哭了，我回头看了看人去场空的纪念碑四周，一片狼藉，活像个垃圾场。我们在这儿战斗过（如果能这么说的话），曾经在这里热血沸腾，可现在对这里我已没有半点留恋之情，大概是人走空了的关系，我忽

然看清这儿是那么脏，那么乱，酸甜苦辣说不清是什么滋味。有人说我们打了败仗，有人说这叫和平撤离，管它算什么，我看撤下来就好。

今天这个结局挺他妈的好。

闷头大睡，什么也不想听也不想说。

下午“高自联”来通知，头头让大家赶紧离校，部队马上就要进驻学校了，最好是到外地投亲靠友。我匆匆捡了几本书，好汉不吃眼前亏，走。

1989年6月7日 星期三

呆在家里，妈说什么也不让我出去。这两天外面不断传来有人被打死的消息，老太太就更怕了。

下午小i来看我，他原是我中学的同学，现在副食店干活儿。他说我命真大，还能从天安门跑出来。我听了挺奇怪，一问，原来是昨晚香港电台播了一封一个清华女大学生的信，说是部队血洗了天安门广场，大多数同学都被机枪扫射打死了，有的还被坦克活活压死。播音员念着这封信，有时声泪俱下，泣不成声，听的人都感动了。真能胡编！也不知道是从哪儿钻出来这么个小狐狸。前一阵我就看出了，有的主儿根本没在广场绝食，可他要侃起广场来比我们还激动，还要热血沸腾。我对小i讲：扯淡、胡编。照她说的我早就该当“烈士”了。他们胡说八道，也别急赶着把我们这些从广场撤下来的当鬼往阴间打发嘛。

看来不管是生还是死，是坚持还是撤离，我们都是被人作文章的材料。窝囊、丧气！

1989年6月9日 星期五

今天偷偷跑回学校看了一眼，真是冷冷清清一片凄凉。

一打听，部队压根就没进学校，又上了一次小当。

在门口碰到买菜回来的ü老师，他让我去他家吃饭。我谈到这几天从电视、从外面听到的许多消息，特别是清华大学那个女同学的信，自己有种上当受骗的感觉，我们以前了解到的东西有许多都有水分。我没说完，ü突然发起火来，激动地指着我说，你别和我谈这些，我是搞天文的，我习惯从宏观、从总体来把握问题，对这些枝末小节不感兴趣。你也不应该为这些具体的小事所蒙蔽，看不到事情的本质。我想不到他会突然狂躁到这种程度。在一两个月前有同学提出我们要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要有个正确的出发点来看待生活中出现的问题，ü老师还说看问题不能从空的东西出发，要看具体的，看看官倒腐败，压制民主，已经把中国弄成什么样子。怎么今天却来了个180°大转向，要宏观不要具体了。

我默默起身离开了他家，心情异常沉重。我走出他的单元楼，回头看了一下房门心里说：Farewell! Let us take separate ways. (再见吧，我们各自走各自的路。)

(原载1989年6月29日《北京日报》)

高自联“教育”了我们 我们会成熟起来

李 南

最近，报刊上连续登载了许多文章，揭露极少数人制造

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真相。我这里要说的是我思想转变的历程。在“高自联”内我并没有什么关键职务，但在思想上我可以算个中坚分子。但是事实教育了我。请人民相信，在事实面前，大学生是会提高认识的。

一，4月26日以前，我在校园内从未听到“高自联”布置反腐败的问题。4月27日游行口号一下子变了。我当时虽然也觉奇怪，但内心是有倾向性的，希望这是真的，所以并不在意，只觉得痛快。27日以后，慢慢觉得不对劲了。首先，看到我校吾尔开希进出校门专车接送，还有两名女同学给他当秘书随侍左右，觉得很不耐烦。随后，又听同学说吾尔开希因从新疆倒卖皮货和匕首赔款7000余元，有关部门正在追查。开始我还将信将疑，当问到吾的秘书时，她诡秘地告诉我，事情是有的，但要警惕“官方”做文章。对此我十分反感。反腐败的人，首先应该清廉。一个“小倒爷”这么热衷于反腐败似乎不合逻辑。再随后，又看到吾尔开希经常出入大饭店，即使是5月13日他参加绝食后，5月15日我还看到他在某处饱餐一顿。这样的人，怎么会不为私利而真诚带领我们“斗争”呢？“高自联”另一个负责财政的头头携款逃跑，对我震动更大。5月25日，广场上“斗争”处于很困难的境地，外地来京学生吃不上可口的饭菜，北京市民早已失去往昔捐款的热情，正当我们为如何坚持下去发愁时，突然传来一个消息：“高自联”财政部长携万元巨款溜走了。这个消息虽几经封锁，但还是传出来了。因为，要物色一位同学接替工作。同学们太气愤了。就在这件事发生前后，又发生了柴玲被“绑架”事件。某日，广场总指挥柴玲突然不见了。我们猜测一定是被“官方”抓走了。正当摩拳擦掌要大干一场之际，忽

然传来消息：柴玲回来了。大家莫名其妙，领导讳莫如深。几经打听，才知道是起了内哄，一些人怀疑柴玲在钱财上手脚不干净，对她实行隔离审查。不管怎样，相互猜忌，争权夺利，真是糟透了。还有4月的一天，我到北大去看大小字报，恰逢王丹发表广播讲话。因有张小字报说他滥用群众捐款，他正声嘶力竭地辩白。但听了一段，不禁疑心更起。他说，对他的攻击、诬蔑他是不怕的，他已在香格里拉饭店举行记者招待会作了声明。一介书生，何来款项租下如此房间召开开会呢？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如果是一人一辜偶然发生也就罢了。但这类事情屡见不鲜，比比皆是，则让人实在心寒。看到到处张贴的让群众捐钱、捐烟、捐饮料的广告，看着“高自联”领导人大吃大嚼的挥霍，我自然得出了一个结论：靠这帮人领导反不了腐败。

二，6月5日下午，在北师大门口发生了一件事，使我思想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时一群人包括“高自联”的人和一般同学，正围在一起讨论4日凌晨发生的事。一个人钻进来说，你们讲的都不对，我看见了，我从那儿逃出来的，解放军没有用枪打人。话音未落，他就被打了几拳，随后就是劈头盖脸的毒打，直打得血流满面，人打他的时候只听他喊，但听不清内容。当他满脸是血挣脱出来的时候，才闹明白，他是想说，解放军是用枪刺挑人了。周围的人才恍然大悟。今天看来显然是谣言。但我却十分不理解，打人的人中有个同学平时非常爱说：“我也许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却要用生命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此时，他打人的狠毒劲，丝毫没有履行这句话的意思。我气愤地用照相机照下了他们打人时的尊容，让这帧照片作为永久的历史，告诉未来的学弟、学

妹，“大民主”是个什么东西吧。这件事又使我联想起许多事。例如：我们学校离北京科技大学不很远，4月底5月初，我到科大还看到一件事。一天晚上，有几百名学生在一个姓刘的人带领下，围学生会，要夺权。我以为既然是争取民主的一场斗争，我们就要用民主的方法。没想到看到的却是另一种场景：许多人手持棍棒，几位学生会干部被围在里面。带头的人每隔二三十分钟敲一下学生会办公室的门，威胁着让交出办公室，交出印章。

我的女朋友在中国人民大学念书，今年4月底中国人民大学罢课时，她本不想参加某些人组织的罢课，但有人设置纠察线不让老师、同学进教室。还有的同学进了教室又被推出来。她曾对我说，没想到民主运动就是这个样子。至于在校园内攻击、诬蔑人身的大字报、小字报就更多了。我开始看时，觉得学生干部不参加民主运动该骂。后来，渐渐觉得民主应该和法制结合起来，骂人总是错的。一天夜里，我看到我校自治会的一个小头头给团委书记和学生会主席贴大字报。我实在看不下去，就劝他说：别贴了，全是人身攻击。美国竞选总统时都不许这样干。但他说，你别管，共产党不是反对全盘西化吗？我这样做叫枪打出头鸟，看他们谁敢阻拦我们。我说，你这样做，已经触犯了刑律，将来迫你诽谤他人罪怎么办？他说，为了争取民主，怕他们什么法律。我觉得太悲哀了。这样的素质，争什么民主？事后我做了一篇追记，把这个人当时的言行及他贴的大字报的照片全部保留下来，我只想证明，我没有参与诽谤他人。

三，有一天，我到人民英雄纪念碑下，见一些人在赶写文章，一问是北方工业大学的同学，据说他们学校有十几位同学

负责广场的宣传工作。一位男同学，个子不高，瘦瘦的，正在写一封工人群众来信。我问：你这是干什么？他冲我笑笑说：我是群众的代言人。我说：你们不是骂报纸上有的来信是编的吗？到底有没有证据？回答说：可能有，我没看见。从此，我对“高自联”的宣传完全失去了信任。什么27军和38军打起来了，什么外交部独立了，什么上海市不承认“伪中央”了。真是让人哭笑不得。如果说句公道话，其实“高自联”的头头有时也被原本是自己编的谣言，欺骗了自己。例如，5月22日，广场广播了一个消息说，晚上有空降兵来。这本是无稽之谈，但我就近观察，有的“高自联”的头头很紧张。人民大学有个姓肖的同学，自称是乡镇企业报的特约记者、消息灵通人士，在广场上很活跃。很多人都认识他，“高自联”的头头王丹等人跟他也是关系密切。有一天，他当着众人的面说鞍钢五万人罢工声援我们，武钢也有近万名工人声援、罢工，还讲了细节。过了一会儿，他到另一处又传播这个消息，却说消息来源是听我说的。我就站在他的背后，他没注意到我。我为了“顾全大局”，也没当时驳斥他。但我觉得这帮人实在靠不住。

四，我是在周五晚上圆明园沙龙活动时认识刘刚的。他曾说，我暴露了，不能轻易露面，只宜在下面活动，像政法大学的周勇军，北师大的柴玲都适合出头露面。据我了解，似乎“高自联”内部也是不同势力矛盾很大。有时为一件小事打得不可开交。一天，听刘刚说某某太不像话了。原来，“高自联”开会时，因意见不合，竟拳脚相见，打得不亦乐乎。通过刘刚我了解了一些情况：一是国外势力插手很厉害。某潘女士，住在北京饭店，给广场以大量财力支持。据说，她是

香港来的，有台湾的背景。二是美国来的，专门重点给宣传广播设备，像北大广播站就是他们武装起来的。还有其他渠道，如“工自联”的广播器材就是某公司资助的。不听还好，越听胆越虚。这些势力和我们同学想的相差千里。我总算明白了，学生运动没有纯自发的，也没有不被政治势力利用的。我也总算下了决心，及早撤身，激流勇退。

我的认识也许离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差得很远，但这是从实践中得出来的。“高自联”坏头头鼓吹的“求民主、反腐败”是很虚伪的。他们骨子里是为个人谋出路，做梦都想成为风云人物，搞的是无政府主义、洋奴主义。现在我的很多同学都开始认真冷静地反思了。不能排除有的人可能一条道走到黑。但是，大多数同学的思想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请相信我们吧，我们会成熟起来的！

（原载1989年8月11日《人民日报》）

平暴“备忘录”

——兼答“戒严部队不入城是否会发生反革命暴乱”等疑问

解 犀 施 路

1 写在开篇的结论

从4月中旬的学潮到反革命暴乱基本平息，整个过程差不多经历了两个月的时间。这惊心动魄的两个月，事态的发

晨起伏跌宕，许许多多的人经历了感情上的春夏秋冬和灵魂上血与火的洗礼。人民解放军在这场特殊而严峻的政治斗争中“考试合格”，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年轻的共和国又一次将捍卫主权、粉碎颠覆的伟大胜利载入史册。

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邓小平同志的这个论断，高瞻远瞩，精辟地阐明了这场斗争的必然性。

如同观察一座山脉，必须站到山巅之上才能看清它的走向；认识复杂的历史事件，也应尽量站到时代所能给予的高度，才能洞悉它产生和发展的必然趋势。

暴乱平息至今，不少人有时还作种种设想，如：北京不戒严或戒严部队不入城，是否会发生反革命暴乱？有人甚至还提出“北京戒严在前，动乱在后，军队进城在前、暴乱在后”这种倒因为果的责难，等等。善良的人们，或是一时难以接受如此严酷的事实，或是作为旁观者不了解事态的全部真相，产生一些疑问是可以理解的；也有一些人陷得比较深，思想感情一时转不过弯来，想找出某些理由，或平衡自己矛盾的心理，或为自己的过失辩护，这尚在情理之中。看来，我们要获得正确的共识，很需要超越自身的局限，抛弃个人的恩怨，站到维护国家利益与安全的高度，拓展观察整个事态演变的视野，以得出对这场斗争必然性的明智判断。至于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提出种种责难来混淆视听，事实将作出严正的驳斥。

2 从杜勒斯的预言到“美国之音”的谣言

对50年代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要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的预言，现在20多岁的年青人是陌生的。进入80年代后，和平与发展逐渐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多年的和平生活，使许多人对这种“和平演变”的危险丧失了警觉。事实上，近十年来，国际资本主义的反动势力认为，利用社会主义国家的暂时困难和改革开放，是实行“不战而胜”、“和平演变”战略的最佳时机，因而加紧进行政治、思想上的渗透和从内部的颠覆。

他们以“民主、自由、人权”为旗号，兜售资本主义的议会制和多党制。他们利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的曲折，大肆宣传“共产主义已经死亡”，提出要鼓励“社会主义国家的自由化趋势”，支持“一切削弱共产党领导的工潮、学潮和民族纠纷”，对“持不同政见者”进行政治庇护，大力扶植“反对派”。

他们利用我国扩大开放的时机，通过各种传播媒介，宣扬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念和腐朽没落的生活方式，以求在思想文化观念上实行“软着陆”，腐蚀共产主义的精神支柱。

而“美国之音”在近一个时期内的反华表演达到了利令智昏的程度。又是延长对华广播时间，又是增加播放频率，大肆造谣惑众，煽风点火，把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企图和希望破灭后气急败坏的嘴脸暴露无遗。可以说，没有“美国之音”等国际反动势力喉舌的鼓噪和支持，这场动乱和反革命暴乱是不会发展到如此严重地步的；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

义国家的推波助澜，是事态急剧恶化的重要外部原因。

3 从“军事反攻”到“政治登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年来，台湾国民党当局一直梦想反攻大陆。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军事反攻”势已难成，他们不顾各界爱国人士要求祖国统一的呼声，逐步将策略转向所谓的“政治登陆”，搞“柔性攻势”，从未放弃有计划、有组织的心战策反活动。

近一个时期，他们配合国际上利用所谓“民主自由运动”掀起的反华浪潮，以及大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加快了“政治登陆”的步伐。特别是去年以来，台、港反动势力大肆鼓吹要“使大陆早日民主化与自由化”，把攻击的矛头直接指向老一辈革命家，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宣扬所谓的“台湾经验”，企图影响大陆使其向有利于“自由化”的方向发展。

4、5月份，国民党中常会、“行政院”多次召开会议讨论大陆学潮，提出“要更积极、更主动地支持大陆的民主运动”。国民党的宣传机器也开足马力，进行声势浩大的造谣、诬陷和煽动。

在这场闹剧中，“国安会”某要人发起了“送爱心到天安门”的活动，带头捐款10万新台币，并由“经济部”投资处设立“支援大陆民主运动基金”。一些台、港以及美、英等不明身份的人，携带巨款潜入北京，为“高自联”、“工自联”提供资助，让这些非法组织收买暴徒，去烧军车、抢夺武器、绑架残害军人。

而台湾“大陆工作指导小组”则认为，目前是进行“政治

登陆”千载难逢的机会，派遣大量特务到大陆进行活动，直接插手动乱和暴乱。台特机关指令在各地的特务，“这次共产党真要垮台了”，要“配合区内形势，秘密策动学潮”。

台、港反动势力以及“中国民主联盟”等在国内外的非法政治组织，与极少数长期顽固坚持自由化立场的人、向非法组织提供党和国家核心机密的人，早就建立了一种微妙的联系。当形势不利时，他们的呼应或明或暗，有如鬼火高低明灭；当形势有利时，他们就明目张胆地勾结在一起，狼狈为奸。在这次学潮、动乱和暴乱中，他们就配合得相当默契。这是许多善良的人们所想象不到的。

4 从“北京之春”到“北京暴乱”

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始于“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不久。发展至今，差不多有三次高潮。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始终是斗争的焦点。

第一次是1979年的所谓“北京之春”运动。那时候，“高自联”的头头们还只是10岁左右的娃娃。当时党正领导人民进行拨乱反正。一些人借解放思想，打着“民主、人权”的幌子，利用党在“文革”中的挫折，利用林彪、“四人帮”时期遗留下来的一些社会问题，同台、港以及国外政治势力相勾结，采用“文革”中“大民主”的方式，鼓动闹事，鼓吹“万恶之源是无产阶级专政”，“要坚决彻底批判中国共产党”。他们认为中国现在不是搞四个现代化的问题，而是应该搞资本主义式的社会改革。为了防止正要展开的改革开放大业偏离正确方向，邓小平同志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击退了这股逆流。

第二次出现在1986年底。与上次不同的是，经历了八五、八六年两次学潮，搞自由化的人推出了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等头面人物，明确地提出了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口号，主张“全盘西化”，把资本主义制度搬到中国来。由于鼓动自由化思潮的是一些名人。在青年学生中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和煽动性，党组织坚决把这几个头面人物开除出党。邓小平同志又一次郑重地告诫全党，在改革开放中要加强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这一次可谓是登峰造极。极少数人早在去年年底就开始了酝酿和策划。他们提出，要接受历次“民主运动”的教训，“一定要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地进行”，“要广泛获得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要发动社会各界形成对政府的集团压力”，“要干到底，决不能半途而废”。

——他们通过所谓的“民主沙龙”、“自由论坛”以及各式各样的报告会、研讨会，高校内外的大、小字报和演讲，港台报刊，大造思想舆论。根本的口号仍然是两个：打倒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并形成了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一套比较系统的理论观点，比如：“社会主义是个病，私有化、民营化是唯一出路”；“共产党领导是民主政治的障碍”；“从结社自由到新的政党领导，民主具有世界共同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经死亡”，“要彻底否定毛泽东思想”；“改革的目标是走向如美国、西欧、日本这些公认的发达社会”，等等。他们四处兜售的这些政治主张，许多都是赤裸裸的表白，也有一些是打着改革理论探索的旗号以售其奸。不难看出，他们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完全西方庸俗化的资产阶级

共和国。

——他们从前两次“失败”中得出一个教训：单靠“北京之春”运动中那样几个“西单墙分子”、“二次高潮”中那样几个头面人物出面去鼓噪学生，成不了大气候，也容易为群众识破。这一次，方励之等长期顽固坚持自由化立场的人、同海外国外敌对势力相勾结的人、向非法组织提供党和国家核心机密的人，沆瀣一气，纠合在一起，组成所谓“运动中坚”，其中一些人，已是自由化运动的“三朝元老”，可谓老谋深算。他们组织策划于幕后，而极其阴险地把学生推到前台，甚至不惜把学生作为人质，煽动群众同党和政府的对立情绪。

——他们密授学潮的头头：“先要搞臭团委、学生会，这样政府就没帮手了”；“如果各地高校都成立联合组织，一下子就可以把全国学联替代了。在共产党体制下建立第一个自发的学生联合组织，将对整个中国的政局有很大影响。折腾起来，一下子就是百万大军”。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想通过这次活动建立反对党，长期进行斗争。4月26日，“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即“高自联”）正式成立。起初叫“团结学生会”，想搞成同波兰团结工会一样，后觉得这个名字把建立反对党的意图暴露得太明显，又改成了“高自联”。此后，北京和全国各地相继出现了一大批非法组织。

——4月21日，正是动乱初步形成的时候，北大、人大贴出一张题为《原来是个阴谋》的揭露材料，署名“北大一醒者”。其中说：“一位行动的中坚人物说，新华门前最来情绪的就是拱起警察的火，只要警察一动手，就有借口把事情扩大”。“原来行动早有安排。第一步借悼念胡耀邦，顺便提出政治要求。李（淑娟）老师说，要把为胡平反放在第一位，这

样政府就不好说什么了。第二条要求也别提为自由化受挫的人平反，那样太脱离群众，也易引起误会，为方(励之)老师平反要藏在背后。再有，群众恨腐败，就用这一点攻他们。第二步，到新华门静坐，必要时往里挤，只要警察敢管，就是打人，这样才能唤起同学的同情心，特别是女同学。第三步，要求参加追悼会，很多人有这种心理，这样事情就更大了，还能推向全国。”这位醒悟的学生一开头就说：“我昨天经历了一段痛苦的思索，还是以我的良心为重，依据事实把真相告诉大家，为了我们别再做阴谋家的牺牲品”。可惜，当时这样的“醒者”太少了！从揭露的大量事实看，从学潮到动乱，直至暴乱的猝发，无不是在阴谋家的精心导演之下。他们就是以这样阴险的手段，把反动的政治纲领付诸行动的。从以上可以看出，他们这一次是横下一条心，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

5 “旗帜鲜明”与“旗帜不鲜明”

领导中国人民翻身解放和创立改革开放大业的老一辈革命家，对人民共和国被颠覆的危险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时刻维护着人民共和国的主权。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上郑重宣告：“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对附庸于国际反动潮流的国内自由化思潮，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始终旗帜鲜明地坚决抵制，防止酿成政治动乱。

早在十年前，邓小平同志就提醒全党，决不能低估那些搞政治阴谋的人，那些所谓“民主自由派”，那些无政府主义分子和极端个人主义分子等等，“尽管这几种人的性质不同，

但是在一定的情况下，他们完全可以纠合在一起，成为一股破坏势力，可以造成不小的动乱和损失。这种情况去年就发生过，今后还可能发生。”近几年，他反复告诫全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仅现在要讲，而且要长期讲，整个现代化过程都存在一个反对自由化的问题。对如何防止自由化思潮的泛滥和由此产生的恶果，他反复强调，“领导要旗帜鲜明，群众才能擦亮眼睛”，“凡是闹得起来的地方，都是因为那里的领导态度不坚决，旗帜不鲜明”。

但是，许多年来，在我们党内，这些重要的思想和方针没有能够始终得到很好贯彻；一些领导人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旗帜不鲜明，没有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一贯到底。1986年学生闹事，就是反对自由化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有重大失误。这次风波的产生，也是由于赵紫阳同志担任总书记以后，没有把反对自由化的斗争始终如一地贯彻下去，消极地对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怂恿助长了自由化思潮的泛滥，酿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当资本主义世界渡过战后危机，重新获得科学技术和生产的迅速发展时，一些人感到意外而产生困惑；同时，社会主义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曲折，使自身的优越性未能充分发挥出来，影响到它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改革开放给社会主义带来新的生机，经过“十年内乱”，深感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人民群众对发展和改革的愿望比任何时候都更为强烈。对此，如果领导者的头脑不清醒，在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加速改革开放的同时，不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放松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不仅社会生产力发展不起

来，而且会导致党的凝聚力的削弱，造成社会动荡，这就难免犯历史性的错误，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

6 如果……

纵观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场风波的产生，就不会感到奇怪了。它是国际资本主义的反动势力长期对我国进行渗透和颠覆，是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长期泛滥并与国际反华潮流相勾联，是我们党内一些人与自由化思潮产生共鸣、党的某些领导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一贯的必然结果。这决不是一件孤立的、偶发性事件。绝不是善良人所想象的“通过对话、双方让步、给台阶就可以解决的”，更不是“政府措施不当逼出来的”，而是大小气候遥相呼应、蓄意已久、迟早必然要发生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当人们对一个历史事件发生的必然性还缺乏深刻认识的时候，往往会提出多种假设。暴乱平息后，许多人围绕事态的演变和结局，在反思时头脑里就难免出现了许多“如果”。

任何一个复杂的历史事件，都包含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因素。必然性的因素决定了事物的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而偶然性因素则通过事物发展具体进程表现其必然性。

如果胡耀邦同志不是在4月15日逝世，那么风波也会在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法国大革命200周年等时机被挑起。

如果在学生绝食时政府以对话的方式答应他们的政治条件，否定“4·26”社论，承认他们的非法组织，他们也不会善罢甘休，也仍然会以其他借口继续制造事端，扩大事态；也仍然会在非法组织合法化后，进而建立反对党，进行长期斗

争。

如果5月20日不采取对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措施，6月3日戒严部队不强行入城，他们还是要继续使动乱和暴乱升级，进而扩大到全国，逼迫政府下台，或以所谓“攻打巴士底狱”的方式推翻社会主义共和国。

同样，如果6月2日晚，中央电视台借用了10个月的武警部队的吉普车不是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他们也会寻找别的借口发动反革命暴乱。这种卑劣的伎俩，在60多天里，人们领教得还少吗？

这类偶然性的“如果”是很多的。无论怎样“如果”，都无法摆脱必然性的制约。

从这场风波的起因看，有这样一种必然性的“如果”，那就是：如果党和政府再作退让，不果断地动用国家机器强制恢复秩序，那么我们就将要付出更高的代价，十年改革的巨大成果就要毁于一旦，人民共和国就可能被葬送。

7 炼狱中的军魂

“委屈是比死更难受的刑罚。……这是何等残酷的精神折磨呀！如果没有一颗爱人民的心灵，无论如何也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因此，我可以这样说，伟大的中国军人啊，你们在这一点上创造了整个人类的奇迹。”——《辽宁日报》一记者

本来，人民日报发表4·26社论到“五·四”前，事态有所缓和。赵紫阳同志的“五·四”讲话，是动乱升级的转折点。北京越来越陷入严重的无政府状态。北京的动乱不断向全国蔓延。在北京治安系统力量不足、行政手段解决问题无效的情况下，在面临全国大乱的危急时刻，迅速稳定首都的局势已

成为稳定全国的关键。

党和政府迫不得已，决定按照宪法的规定由国务院下令对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戒严令还未公布，极少数掌握党和国家核心机密的人就向非法组织通风报信。动乱的组织者马上改绝食为静坐，大肆散布政治谣言，组织收买歹徒，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到处设置路障，拦堵军车，加剧了动乱。由此可见，所谓“戒严在前、动乱在后”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

处理如此阵线不清、矛盾交织的复杂情况，要最大限度地避免冲突和流血，就要有足够的威慑力量。威慑力量越大，冲突和流血的可能性就越少。而在不明真相的群众一时难以醒悟、几十天动乱所鼓噪起的盲目激情一时难以平静的情况下，为了逐步争取群众、避免误伤好人，就必须最大限度地保持克制和忍让。

从5月20日起，各路戒严部队大都在北京郊区受阻。有的被围堵三五天，有的长达一周。在这些日子里，官兵们只能站在车上，吃不上饭，喝不上水，睡不成觉。部队食品难以供应，饮水难以补充。有的小商小贩乘机抬高物价，卖给战士一瓶汽水要十元钱，一根冰棍要7角钱。有的战士上厕所后面还有几个学生跟着。官兵们饿了、渴了、困了，口鼻流血，腹泻发烧，甚至晕倒了……许多善良的市民流泪了，他们转变了态度，主动送水送饭，附近的地方单位也赶制了大批食品送上军车。

少数流氓、地痞混杂在人群中，用种种不堪入耳的下流语言辱骂战士。有的人用电喇叭对着战士的耳朵狂叫，有的动手动脚侮辱战士的人格，还有一些不三不四的女人在官兵面前做下流动作，还有人甚至站在立交桥上向战士头上撒

尿、吐痰……我们的年轻战士血气方刚，难容人格侮辱。但他们为了戒严大局的需要，忍辱负重。许多战士为了控制自己激愤的情绪，在挎包上、胳膊上写下了一个个醒目的“忍”字。

早在戒严第一天，殴打官兵、破坏军车的暴行就开始了。5月20日晚，某师在公主坟附近进驻集合点时就被歹徒打伤军官7名、战士12名。戒严第二天，在丰台一带，某师被打伤官兵达116人，重伤29人，一人生命垂危。这段时间，许多指挥员含着眼泪命令战士：骂不还口，打不还手。有一个小战士，在歹徒用石块追打他时，捡起石头准备回打，被干部当场制止，他转过脸委屈地哭了……一支戒严部队驻地前贴着这样一副对联：

驱日寇打蒋匪抗美怨越老子我何坚不摧
卫首都爱人民荷枪挨打子弟兵一拳不还
横批是：以血醒民

正是在这几天，有的报刊还报道北京有“良好的秩序”。正是在这种“良好的秩序”下，北京被荒诞离奇的政治谣言所笼罩，从院校到街头，“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歹徒和“造反派”们用尽“文革”中“火烧”、“油煎”等等恶毒语言肆无忌惮地咒骂党、国家和军队的领导人，想打倒谁就打倒谁；昔日雄伟壮丽的天安门广场被糟踏成了“破烂市粥棚”，新华门前昼夜喧嚣，失去了仪门之威……“共和国卫士”们心里在流血！

戒严部队十多天没有入城，决不是没有能力。如果是单纯的军事行动，哪有突不破的障碍？就是因为站在我们面前的大多是不明真相的群众，好人和坏人一时难以分清。党中

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充分考虑到这一点，要求部队暂不入城，向北京市民宣传戒严的必要性和我军宗旨，像往常一样尽力多为群众做好事。

世界上哪有这样的军队！只有我们的军队——人民的子弟兵才能这样做。那些至今还认为暴乱是戒严部队引起的人，在这丹心如血的军魂面前，心灵难道不应得一些净化吗？

8 箭在弦上

戒严部队克制忍让的态度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使极少数搞阴谋的人感到万分恐慌。他们害怕拖延的时间越长，失去的群众越多，罪恶阴谋终难得逞。因此他们加紧策划发动反革命暴乱。基本策略是寻机挑起群众与戒严部队的冲突，制造流血事件。他们说，只要天安门广场一流血，全国就会大乱，政府就要垮台。

他们为成功和失败作了准备。为成功拟定了新政府的组成人员名单，列出了要镇压的干部。如失败，他们就分散隐蔽、逃亡国外，并为发动反革命暴乱进行了三个方面的准备：

舆论准备。他们张贴、散发煽动武装暴乱的大小字报和传单，叫嚣“要拿起武器，推翻政府”，“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旗帜鲜明地反对共产党和他的政府”，“团结包括台湾国民党在内的各种力量进行斗争。”组织策划者之一的刘晓波6月2日说，“期望赵紫阳复出，我们就必须在人民中组织武装部队。”

组织准备。“高自联”、“工自联”许下高价收买了一大批暴徒，组成各种“敢死队”、“义勇军”、“黑豹突击队”，要用软禁、绑架党和国家领导人、攻打巴士底狱的方式”夺取政

权。他们许诺每个参加设路障、堵军车的人每天都可以得到30元的报酬，烧一辆军车给3000元，抓住或打死一个军人也给几千元。

暴乱武器、物资的准备。他们开始非法采购武器，秘密储备枪枝弹药及成桶的汽油等暴乱工具，自制了大批燃烧瓶、狼牙棒、匕首等凶器，并抢劫了大批钢钎、木棒，以供大规模的打砸抢烧杀之用。

五六月之交，一场革命与反革命的必然较量，已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6月2日晚，中央电视台借用武警部队的一辆吉普车发生一起交通事故。极少数人借机大造谣言，说戒严部队开道车故意轧死学生，鼓动不明真相的人抢夺尸体、抬棺大游行，点燃了暴乱之火。

当时，部分戒严部队为避免与群众的冲突，正继续采取分散多路方式，着军复装或便装陆续进入重要警戒位置。从6月2日晚开始，进城指战员遭到了暴徒的疯狂袭击，至3日下午，反革命暴乱已发展到很严重的程度。在这期间，疯狂的暴徒见军车就砸、就烧，见军人就打，并抢夺武器弹药；一些暴徒开始冲击人民大会堂、中宣部、广播电影电视部、中南海等国家要害部门。他们见暴乱已经发起，又进一步策划利用第二天是星期日的时机，发动更大规模的打砸抢冲烧杀，造成群众暴动的态势。

在反革命暴乱已经发生的万分紧急时刻，原定戒严方案不得被迫改变。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果断作出决定，命令在首都周围的戒严部队，立即平息反革命暴乱。下午6时半，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发出《紧急通

告》，要求“全体市民要提高警惕，从现在起，请你们不要上街去，不要到天安门广场去，……以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这个《通告》，通过电视台、电台和戒严部队广播车进行了反复广播，尔后，各戒严部队分十几路向市区开进。

事实很清楚，戒严部队进城是在反革命暴乱已经发生之后采取的果断行动，决不是什么“进城在前，暴乱在后。”

9 慷慨赴死以血醒民

“如果能以血醒民，我愿把血流干；如果能以命醒民，我愿慷慨赴死。”这就是戒严部队官兵的誓言。

此时，他们面对的已经是手持凶器、丧心病狂的暴徒，是一场生死考验。既要打击反革命暴徒的嚣张气焰，又要保护不明真相的群众；既要清理天安门广场这个“动乱源”，又要保证不与被煽动和胁迫在广场上成千上万的学生发生冲突。他们面临的是这样一场特殊的斗争。

他们怀着捍卫宪法尊严、捍卫神圣的人民共和国、捍卫庄严的首都的坚定信念出发了。尽管戒严前后，极少数搞阴谋的人对军队进行了大量的策反活动，又是向各地驻军单位致信致电，邮寄反动宣传品，又是组织“宣传队”向被堵截的戒严部队昼夜不停地蛊惑演讲，恶毒地煽动军队“站过来”或“保持中立”，但统统都失败了。连他们的所谓“精英人物”们也不得不承认，“军队是攻不破的堡垒”。在第一线做蛊惑宣传的人，称被围困的戒严部队是“军官顽固不化，士兵一言不发”。我们士兵，没有满嘴“平等、自由、博爱”的华丽词藻，他们总是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捍卫着人民的民主，用自己的牺牲去换取人民和平自由的劳动生活，用抢险救灾、舍

生忘死的壮举去表达对人民的爱。他们有的是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人民共和国的赤子丹心。

部队刚刚出发，就遭到了暴徒的疯狂袭击。“高自联”、“工自联”已经在通向天安门的一些主要路段的高层建筑上设点，组织暴徒设置重重路障，并串大街走小巷煽动市民出来围观、起哄。暴徒们混在人群中，投掷燃烧瓶、石块和钢钎，对下车护卫的官兵用砍刀、狼牙棒、匕首等凶器疯狂施暴，还有一些暴徒躲在高层建筑上或树丛中，用猎枪、小口径步枪和土制火枪向部队射击。一辆辆军车被砸、被烧，一个个官兵被杀伤、倒下，一些伤员在送往医院的途中仍遭暴徒的残害，一些官兵被绑架，一些武器被抢劫……

入夜，部队前进仍很困难，伤员大量增多，许多是受了枪伤。一名参谋被暴徒用枪打伤了膝盖，一名连长胳膊被子弹打穿……而暴徒越来越猖獗，他们不仅开枪射击，还冲上前去用钢钎往驾驶室里戳，抬起水泥墩往车上砸，甚至用火枪伸进车窗里打。此时，部队仍以高度的克制，没有鸣枪。有一个团在被暴徒杀伤50多人的情况下，30多名战士围着团长政委，有的还跪了下来请求说，“这帮家伙太残忍了，快下命令还击吧！”团长政委含着眼泪把战士一个个扶起来，“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现在好人坏人混在一起，宁可我们自己流血！”一个叫余爱民的战士因无法自卫还击被暴徒打瞎了右眼，他说，我不怪起哄的群众，我愿用自己的牺牲换来群众的觉醒！

可是，在这之后，暴徒们视部队的克制忍让为软弱可欺，更加肆无忌惮地摧残、杀害部队官兵，反革命暴乱愈演愈烈。为了坚决平息反革命暴乱，避免更大的损失，一些

戒严部队在伤亡严重、忍无可忍、让无可让、一切警告均无效的情况下，迫不得已奉命对空鸣枪开道。尔后，对少数不顾对空鸣枪警告、仍然残杀军人的暴徒，部队不得不予以反击。有人说，是戒严部队鸣枪在前，暴徒行凶在后，铁的事实难道可以任意篡改吗！

在此期间，由于围观的人多，有的被各种车辆拥挤，有的被人群冲撞，而造成伤亡；还有的被持枪暴徒打伤打死；也有一些被流弹误伤误亡。尽管一些人不听《紧急通告》的要求，执意上街围观，但被误伤误亡，仍是令人十分痛惜的。

4日凌晨一时半，部队开始进入天安门广场。经反复三个多小时的广播，劝告留在广场的人尽快离开。5时半，广场任务完成，在广场静坐的学生、包括最后被强制离开的，没有死一个人。至此，北京发生的反革命暴乱被一举粉碎。

在平息反革命暴乱中，戒严部队从将军到士兵几千人负伤，几十名官兵牺牲。凶恶残暴的反革命分子是那样地屠杀我们的子弟兵，活活打死还不够，还要浇上汽油焚尸，还要暴尸街头，还要剖腹掏肠！他们把对党对人民对人民共和国的极端仇恨发泄在烈士身上。“共和国卫士”们，他们有的手里也有武器，但为了避免误伤群众，放弃了开枪自卫的正当权利。他们正是以如此壮烈的牺牲表达了战士对人民的爱、对敌人的恨；实现了自己的誓言：用年轻的生命和热血唤醒千万人。

我们的子弟兵，对妨碍了部队打击暴徒的围观群众，没有抱怨。他们对抢救了自己的群众感激不尽。18岁的战士陈志强被暴徒打成重伤，昏迷醒来后艰难地写下了一份遗书：

“父母：

这是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中国书店的叔叔、伯伯、婶婶、大娘、大姐拚命相救。如果我不行了，请不要悲伤，多保重，儿为国捐躯，为民献身，死而无憾。只有一个条件，求你们无论怎样也要感谢这些恩人……”

那些在战士惨遭杀害后，还要把“打死老太太，女大学生”的污水泼在他们身上的人，在烈士的英灵面前，你们的灵魂难道不发抖吗？

10 思索过去告诉未来—— “共和国卫士”的血不会白流

——作为立国之本的四项基本原则，要深深植根于人民的心中，必须始终如一地把它作为政治思想的主题来进行灌输和教育。历史证明，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能够把全民族的思想意志和行动统一起来、凝聚起来，除了四项基本原则以外，别无任何选择。在过去几年，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未能一贯到底，造成了人心涣散。这种教训应当认真吸取。当然，政治思想教育要能更加深入人心，锻铸也更为统一、强大的精神支柱，必须抛弃简单生硬和形而上学的东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出新的经验和做法。

——这次动乱这么多人被极少数阴谋分子煽动起来，既出乎意料，又不难理解。社会稳定从来就不是经济发展的自然伴随物。相反，经济发展始终赶不上人们的期望值。在充满了困难和曲折的改革开放过程中，群众最大的满足就是党能一如既往地与人民同甘共苦。于是，以权谋私、知法犯法等腐败行为往往就成了人们最敏感、最厌恶的问题。一些党员干部、特别是极少数领导干部中存在的严重腐败现象，使

人们对党和政府产生了一种不信任感。如果党和政府不能及时匡正自身，人们的“不满足情绪”就会通过各种机会渲泄出来，触发社会的不稳定。这也是这次风波中很多人被裹挟进去的一个重要原因。对这一点，党是清醒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已明确提出要拿出惩治腐败的实际行动来，办几件使党心民心为之振奋的事情。每个党员、每位干部对清除腐败都不能停留在口头上，这决不仅仅是保证个人或子女不犯错误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大事。

——一个长治久安的社会，总是建立在健全的法制基础之上的。当今的中国，民主与法制建设必须相辅相成，但在法制体系尚不完备、有法不依现象还普遍存在的现实情况下，加强法制建设显得尤为重要。这样来认识问题决不是给民主自由加上“紧箍咒”，恰恰相反，是为了更有效地保证各级干部置于人民群众的有效监督之下，以保证公民在不损害国家和他人利益的范围内享有更广泛的民主自由。我们要避免类似“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灾难，要避免这次悲剧的重演，就必须用加强法制的方法来调节和制约社会生活，必须在全民中确立国家安全和稳定至上的观念。这是固本之举，是这次风波之后真正深邃的启示。

——理论上的含混不清必然带来思想行动上的混乱。近几年，一些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借谈改革把许多理论是非搞颠倒了，而且流毒甚广，而我们在理论上也缺乏有力的抵制和廓清。因此，在一些带根本性的重大理论上，必须把全党的认识统一起来。譬如：在探索体制模式和运行机制时，绝不能忽视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经济改革重视发展多种所有制成分，绝不能忽视上千个国营大中型企业是我国现

代化生产的基本力量和核心部分；在重视发挥企业家或经营者的作用时，绝不能忽视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笼统地片面地宣传“商品经济观念”，会造成精神文明建设和政治思想工作的削弱，等等。我们的理论工作者，任重道远啊！

——民族精神的失落，在一些卷入动乱中的青年人的身上表现得极为突出。近几年，对外开放所挟裹进来的落后腐朽的东西，再加上长期以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够一贯，有一些青年中滋长了一种对外盲目崇拜，对己妄自菲薄的情绪。这种情绪使得某些青年人把国家的前途和希望寄托在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上，而不是把祖国的命运和前途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是很危险的。当今世界的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挑战，不单是来自新的技术革命，也是民族精神的挑战。一味地崇洋媚外，结果只能仰人鼻息。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弘扬民族精神，社会主义中国才能发展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现代化的世界强国。每一个有志振兴中华的青年都应在这个问题上作出无愧于时代的选择。

总之，大家都来思索过去，展望未来，“共和国卫士”的血就不会白流，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充满着胜利的希望。

（原载1989年7月26日《人民日报》）

第四编

海外浊浪

在西方某些反共、反社会主义者的眼中，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正是他们策动这些国家“和平演变”的千载难逢的机遇。



“美国之音”的真面目

4月中旬以来，“美国之音”对北京发生的学潮、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作了大量歪曲事实的报道。它几乎使出了浑身的劲，对中国政府进行造谣诬蔑，挑唆和煽动人们起来闹事。“美国之音”在这一段时间中可以说给中国人民上了很好的一课。它完全剥掉了所谓“客观”、“准确”的外衣，暴露出了它不折不扣的“造谣公司”的真面目。

这里，有必要向读者介绍一下“美国之音”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机构。

“美国之音”开办于1942年2月，是美国国务院的美国新闻总署下属五大部门中最大的一个部门。它的台长由美国总统直接任命，几乎所有重要部门的第一把手都由美国外交官担任。它的经费全部由美国政府拨给，据透露，1986年它的经费为1.6亿美元。作为美国政府唯一的全球性国际广播电台，它每天以44种语言、100多部发射机，通过设在亚、非、欧各地的转播站作对外广播，广播时间每周达1200小时。

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把电台广播宣传作为向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行政治、思想渗透的重要手段。国际新闻工作者协会机关刊物《民主记者》刊登的古列维奇的文章透露，美国国会的一份文件指出：“电台广播是足以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唯一手段。”这篇文章还谈到，有一家西方报

纸认为，“安装新的发射机和设备对东方进行广播，这要比设置导弹更为重要。”

八十年代初，西方报界曾披露当时任“美国之音”副台长的尼古拉德斯1981年9月21日所写的一段话：“我们应当破坏苏联及其卫星国的稳定，促进它们的人民和政府之间产生摩擦，……我们要尽量在共产主义集团各国领导人之间打入楔子，使他们相互不满和互相猜疑。我们应当煽起民族主义的火焰，鼓励铁幕后宗教感情的复萌。”这真是“美国之音”最好的自供。事实也正是这样。

“美国之音”从它建立时起，就开始了旷日持久的反共宣传。整个五十年代，“美国之音”以其赤裸裸的反共宣传而声名狼藉，被全世界正直的人看成是“美国政府颠覆共产党的工具，搞暴乱的指挥部”。

为了改变自己的形象，“美国之音”于七十年代后期开始改变手法，更多地使用“新闻性”、“事实性”的方法，来进行宣传。经美国国会批准的1976年7月生效的“美国之音”章程》宣称，“直接对世界人民广播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美国之音”的新闻必须“准确、客观、并力求全面”。但这个章程同时毫不掩饰地说：“‘美国之音’代表整个美国”，“对美国的各项政策，‘美国之音’应该作确切明了的介绍”。“美国之音”的一些负责人在向访问者介绍情况时，也曾毫不含糊地声言它的评论必须“代表美国政府的立场和观点”。为此，“美国之音”设有一个政府委派的政策研究室，专门负责宣传报道的政策指导。可见，“美国之音”的宣传是完全按照美国利益和美国官方的意志办事的，他们的所谓“客观、公正”，只不过是骗人的幌子。

“美国之音”从1944年夏季开始播出中文节目。它设有一个庞大的中文部，专门负责对华广播。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美国之音”中文节目就一直是美国政府对我国进行“心理战”的工具。中美建交以后，他们改变了手法，并且投听众之所好，举办了诸如音乐节目、教英语节目和大量介绍美国的专题节目，以吸引听众。但是，他们丝毫没有放弃向中国听众进行蛊惑的目的，即“让听众接受我们的观点”。他们大力支持反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一小撮所谓持不同政见者。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大肆造谣、歪曲，进行煽动。1986年的学潮中，“美国之音”的表现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而在这次始于4月中旬的北京学潮一动乱一反革命暴乱的整个过程中，“美国之音”扮演的造谣惑众、煽动闹事的极不光彩的角色，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

目前，“美国之音”的反华宣传不但没有收敛，还越来越卖力。对“美国之音”的举动，我们不能不进一步提高警惕。揭露“美国之音”的造谣诬蔑，应该经常化。

（原载1989年6月21日《经济参考》）

“美国之音”是什么机构

冯 铭 编译

“美国之音”是美国政府的对外广播机构，是美国资产阶级的官方电台。该电台成立于1942年2月24日。第二次世界

大战期间，“美国之音”隶属于美国“战时情报局”。1945年“战时情报局”撤销以后，“美国之音”被美国国务院国际宣传署接管。1953年8月1日，“美国新闻署”成立，改由该署领导。1978年4月1日，“美国之音”又隶属于由“美国新闻署”和“国务院教育和文化事务司”合并而成的美国“国际交流署”。1982年，“国际交流署”又改名为“美国新闻署”。在数十年的时间里，“美国新闻署”最有影响的活动之一，就是“美国之音”的对外广播。

“美国之音”的总部设在华盛顿，在国外的慕尼黑、曼谷、蒙罗维亚、开罗等地设有节目制作中心。它在国外的转播台分设于亚、非、欧三大洲“具有战略意义”的地点。目前，“美国之音”已成为遍布全世界的无线电广播网络。由总部统一编发的各种外语节目，通过国外转播台，全天24小时以40种语言、100多部发射机作对外广播，每周达840多小时。“美国之音”中文部在每天9小时的播音时间里，打着所谓“客观”、“公正”的幌子，以资产阶级观点和立场，每小时整点报告国际时事，然后介绍与重大新闻有关的背景材料，并发表“评论”。

“美国之音”在宣传上受国务院“对外政策指导”。它打着“促进美国人民和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使外国人尽可能多地了解美国及其政策”的旗号，实是要“在全球范围的心理战中”，帮助美国政府推行其对外政策，“对付共产主义的宣传”、“传递自由世界的信息”。1977年卡特上台后，曾称“美国之音”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关键性因素”。

（原载1989年6月15日《文汇报》）

“美国之音”宣传手法剖析

李 伦

在我国最近发生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一段时间里，“美国之音”开足马力，加班加点地对华广播，有时甚至赤膊上阵，挥起指挥棒，鼓动举行“全球华人大游行”。真是够辛苦的。

有的人曾经以为，“美国之音”是“客观”、“公正”的，这一回总算认识它了，原来它是一家官办造谣公司。如今，一切都已真相大白了，谣言都已不攻自破，受蒙骗的人们纷纷怒斥“美国之音”造谣手段之卑劣，大呼受骗上当。那么，“美国之音”为什么能够迷惑世人呢？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它的造谣手法，或许对今后不再受骗上当会从中吸取到一点应有的教训。

纵观最近这段时间里“美国之音”关于中国问题的报道，其造谣手段可谓用心良苦，五花八门。

一是对消息来源故意含混其词。“美国之音”常常在一段“惊人”的消息之前冠以“一些中国人说”、“学生们说”、“据说”、“据报道”、“据信”、“北京城盛传”等笼而统之的字眼，以模糊消息的具体来源，然后带出一连串的谣言，使人在似是而非中信以为真。美国官办的宣传机器似乎忘记了最初等的新闻常识，即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公然编撰谎

言愚弄听众，其胡编的水平比新闻学院的劣等生还要低下。这奇怪吗，不奇怪。因为造谣机器生产的产品只能是谣言。

二是借某些知名人士之口造谣。例如5月23日的“美国之音”借刘宾雁之口说“现在有100多个将领联名反对这种错误决定(即戒严)，有很多省份和一些军师都明确表示，他们不承认李鹏政权，甚至称其为伪政权”。这是借某些人的知名度来提高消息的可信度。刘宾雁身在美国，怎么知道一百多位将领反对戒严，很多省份和军师反对党中央？哪一百多位？哪些省？哪些部队？说不出，新闻学常识又不及格。

三是貌似公正传播谣言。不少报道以“据未经证实的消息说”作引言，一些消息则正反二种看法皆引。

例如6月6日的“美国之音”报道说，北京城盛传上层领导和权力斗争可能导致忠于不同政治领导的部队在街头交火。据一位密切注视中国军队事务的外交官说，“发生这种战斗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也不可能完全排除”云云。一句进，一句出，虽然貌似公正，强调客观报道，但谣言却由此传播而出。

四是先大肆渲染、张扬某种谣言，而一旦事实公开，证明原先所说纯属谣言时，又隔天再蜻蜓点水，一笔带过地予以纠正。看来似乎很公正，实际上开始的谣言已收到蛊惑人心的效果。

细细剖析，还可例举不少，仅以上几条，已足足使我们看到“美国之音”造谣者的卑劣手段和险恶用心。作为美国政府的新闻喉舌，“美国之音”是不可能做到什么“客观”和“公正”的，无论是明目张胆地造谣，还是花样翻新的蒙骗，都是由这个造谣机器的性质和它的政治需要所决定的。通过对

“美国之音”这些造谣手法的领教，我们在以后的接受西方国家的新闻媒介时，不是应该想想它的可靠性吗。

（原载1989年6月15日《文汇报》）

评“美国之音”的辩解

靳 仁

在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宣布“美国之音”驻京记者艾伦·裴新限期离开中国之后，“美国之音”不仅没有丝毫悔改之意，反而辩解说：它的报道是“最准确、最公正”的，至多不过是“犯过一些诚实的错误”。这真是欲盖弥彰，越抹越黑！

“美国之音”的报道“最准确、最公正”吗？不，事实恰恰相反。6月12日，《北京日报》评论员文章以大量事实无可辩驳地指出了“美国之音”一系列耸人听闻的报道都是歪曲事实的谣言，“美国之音”拿不出一条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说明自己的报道属实，所谓“最准确”岂不是天方夜谭？那些在北京的反革命暴乱中搞打、砸、抢、烧、杀的人明明是一群暴徒，“美国之音”却把他们封为“民主斗士”。6月6日晚在上海明明是少数暴徒故意堵塞铁路，致使161次列车虽已紧急刹车，但由于惯性滑动造成6人死亡，“美国之音”却歪曲说“开火车的人是接到了上级的命令，所以不愿挡路群众死活”。北京市人民政府、戒严部队指挥部6月8日通告中分明说的是非

法组织“高自联”和“工自联”的头头必须立即到所在地区公安机关投案自首，“美国之音”却造谣说中国政府要“任何一个参加示威的人都去自首”。首都钢铁公司和西安的棉纺厂分明一直在坚持正常生产，“美国之音”却胡说那里发生了全面罢工。凡此种种，有什么“公正”可言？有的只是不顾起码的新闻道德的颠倒黑白、偷梁换柱，是包藏祸心的挑唆和煽动！“美国之音”在声明中所说的“在广播前都核实过它的消息，以确保情况属实”，纯系以谣言掩盖谣言的弥天大谎。裴新所声称的“我们没有别的用心，我们不从事制造谣言”，则正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在谣言一个个被戳穿后，“美国之音”也不得不承认报道中有“错误”，但又由裴新出面抵赖说：“在过去几周的报道中”，“美国之音”犯的只是“一些诚实的错误”。厚颜无耻，竟至于此！上面的事实已充分表明，“美国之音”对真相的歪曲根本不是什么“诚实的错误”、好心的疏忽，而完全是出于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去千方百计制造谣言、煽风点火。如果真是犯的“诚实的错误”，那末当事情真相一旦弄清，就应当立即诚实地向全世界舆论道歉，向中国人民道歉，以正视听。然而，“美国之音”不但一点不道歉，并且继续造谣，甚至变本加厉。比如，关于6月4日凌晨天安门广场清场的报道，“美国之音”先是造谣说“至少有1400人”“在人民解放军血洗天安门的大屠杀中遇难”，当中国的新闻报道用大量实况录像和许多目击者的谈话不容置疑地说明清场过程中没有死一个人之后，“美国之音”仍睁着眼睛说瞎话，硬说中国军队在广场进行了“血腥屠杀”。6月13日，“美国之音”又援引美国国务院一位女发言人的话，说什么“全世界的人都看到了那里发生

的事情，就是很多和平示威者在广场被军队屠杀”。到6月15日，“美国之音”的台长理查德·卡尔森则更进而造谣说“天安门广场死了3000人”！与此同时，“美国之音”还从其他方面不断制造种种新的谣言。此时此景，“美国之音”居然还要大言不惭地以“诚实”自诩、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

更有甚者，“美国之音”不但不就造谣之事向中国人民赔礼道歉，而且反过来在6月15日的广播中诬蔑、攻击中国政府驱逐其记者出境是“想粉饰太平，假装什么也没有发生”。真可谓猪八戒打败仗——倒打一耙。中国的神圣主权是不容侵犯的。既然“美国之音”的记者无视中国的法规，公然违犯戒严令，并卑鄙地制造谣言煽动暴乱，中国政府理所当然地要维护法令的尊严，代表人民行使国家主权，勒令他限期离境。这是最起码的国际常识。“美国之音”想在这里作文章只能是徒劳的，至于说掩盖事实真相、蒙蔽世界舆论的，确实有，但不是中国政府，而恰恰是“美国之音”自己。发生在北京的明明是一场反革命暴乱，几百辆车辆被烧毁，几千名戒严部队、武警指战员和公安干警被打伤住院，许多被暴徒杀死的解放军官兵暴尸街头，惨不忍睹，“美国之音”却对此只字不提、避而不播，到底谁假装什么也没有发生，到底谁掩盖在北京发生的事实真相，不是一清二楚吗？方励之夫妇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阴谋颠覆社会主义制度，非法组织“高自联”和“工自联”的头头策划并发动政治动乱乃至反革命暴乱，猖狂煽动用武力推翻依法组成的中国政府，事实俱在，铁证如山，但“美国之音”对此却一律加以掩盖，并把他们美化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与和平请愿者，到底谁在蒙骗世界舆论，不也是明明白白吗？“美国之音”这种贼喊捉贼

的表演，实在太拙劣了。

中国有句古话：“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造谣是“美国之音”的本性，要它停止造谣是很困难的。今后，它还会制造什么新的谣言，我们将拭目以待。但是，有一点我们要正告“美国之音”：只要它不停止对中国的造谣，我们就绝不停止对它的揭露！

（原载1989年6月18日《光明日报》）

怪哉！美国人不宜听“美国之音”

庄汉隆

假如你向我国的一位中学生提问：“‘美国之音’是哪一个国家的广播电台？”他一定会不假思索地回答：“美国的呗！”但是，如果你问一位来自美国本土的美国人：“你觉得‘美国之音’的内容如何？”他却只能摇摇头对你说：“I DON'T KNOW！（我不知道！）”

也许你会觉得奇怪，怎么美国人不了解“美国之音”呢？其实，这是真情。

“美国之音”自从创办至今，已有47年的历史了，而且它是美国国务院的美国新闻总署属下的五大部门之中最大的一个部门。40多年来，它以44种语言，通过设在亚、非、欧各地的转播站，每周向全球广播达1200个小时。借用一句时髦

的话，“美国之音”真可谓是“历史悠久，名扬全球”的了。然而，怪有意思的是，这样重要的一架宣传机器，美国政府却只准用于“对外”，而“对内”呢？对不起，美国政府要它“免开尊口”。美国有关方面解释说，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干涉美国的内政，以保证“美国之音”的“客观、公正”。据最近国外报刊透露，美国政府还为此于1948年颁布了一项名为“斯密特——蒙得塔”的法律。该项法律规定，“美国之音”编播的任何一条新闻或情报信息，仅适应于国外听众。虽然广播稿原件保存在华盛顿，但禁止向美国人传播。

美国人不能听“美国之音”，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以前，人们总以为，美国实行的是两党制，为了避免“驴”、“象”攻讦，避免由于政党的在朝在野的变换而引起宣传上的混乱，所以“美国之音”只播国际消息，不涉及国内政治，似乎也有些道理，现在看到上述报道，而且竟然“有法可依”，于是不免纳闷起来了。

“美国之音”一贯标榜“客观、公正”。它在1942年2月24日首播的开场白中，便开宗明义地说：“消息有好有坏……可我们得实话实说。”既然如此“忠于事实”，为什么美国人却不适宜收听，更不准传播呢？没有别的解释，这就是因为“美国之音”既不“客观”，也不“公正”。它以颠覆社会主义为己任，不惜采用一切造谣、诬蔑的手段，如高尔基所说的那样，“能够巧妙地把苍蝇吹成大象的规模”，拼凑支离破碎、荒谬绝伦的谎言，以欺骗世界上千千万万不明真相的听众。在最近北京发生动乱以至反革命暴乱的过程中，“美国之音”的所作所为，便是最好的注脚！

但是，谎言腿短，做贼心虚。“美国之音”既要靠造谣过

日子，又害怕美国人民起来揭穿它的老底，因此，它只好来个“愚民政策”，不叫美国人收听，省得絮絮烦烦，对它有太多的埋怨。光从这一点人们也不难看出，“美国之音”真是个见不得人的东西！

（原载1989年7月8日《解放军报》）

美国新闻媒介如此报道北京动乱

（美 国） 翁绍裘

美国新闻媒介一向以享有高度新闻自由而自炫，并且在报道新闻方面一直标榜其正确水平，可是就此次对北京动乱前前后后的报道来看，我认为表现得最为差劲。由于我正在撰写《美国新闻事业史话》一书，我的感觉是这一次美国新闻媒介的表现，将成为美国新闻史上一个污点。

这一次大批美国新闻工作者到北京去，本来是为了报道戈尔巴乔夫访华动态，但却碰上了学生游行示威事件，于是他们便呆在那里反映情况。接着又因学潮造成动乱，按照他们的说法是“欣逢其盛”，当然不愿错过“千载良机”，留着不走。他们把天安门广场上的纷乱情况向美国传播，除了现场的摄影镜头外，其余的报道则几乎完全是耳朵里所听到的谣言，再予以加油添醋，用直觉和主观的看法当做“分析情况”，有的记者还像预言家一般发出“预言”，于是便成为早年北京

大学校园外小菜馆那道名菜“回锅肉片瘦加三样 免辣子加豆腐干大大少”。

一点不错，美国新闻自由是包括可以报道谣言这一“特色”的，这一“特色”也是增加报纸销路的无上法宝，但在报道时仍须说明“消息来源”。比如最近刚刚上台的美国国会参议院议长覃姆氏·佛尔里(THOMAS FOLEY)，便被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公关主任马克·古律丁(MARKGOODIN)称为“衣柜里的开明派”，这还算不了什么，最糟的是他还散播“佛尔里是一个同性恋者”的谣言，结果在“众怒难犯”的情况下丢了差使。可见美国式的新闻自由，并没有包涵散播谣言的自由。

奇怪得很，美国新闻媒介这次在报道北京动乱情况时，对谣言却特别有兴趣，其中最大的谣言是“邓死、杨走、李伤”，几家大电视台，包括CNN、CBS和NBS的驻北京记者均不约而同地把从天安门广场上听到的谣言传播到美国来，于是报纸便如拾至宝般在首页发表，有的还用大字标题予以渲染。最荒谬的是华人社会一些存心不良之輩随即配合行动，利用谣言制造本地的谣言，举例说，我便接到一些听到本地谣言的朋友打电话问道：“听说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下半旗，有没有这件事？”我随即打电话询问代总领事高道周，他的答复是“绝无其事！”

谣言这东西是像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可是滚到了山下，仍是要一碰便粉身碎骨的。现在已经真相大白，关于“邓死、杨走”的谣言，是香港报纸以“本报据北京可靠消息”散播得最为起劲的，所谓“可靠消息”，也是在天安门广场上用耳朵听来的。“可靠消息”然后又从香港传回天安门广场，美国记者便越洋传至海外。关于“李鹏被行刺，腿部中了子弹

受伤”的谣言，则是一个姓黄的中国留学生从纽约回到北京时散播出来的。他在北京只待了一个星期，便匆匆飞回美国，公开在CNN电视上亮相，不仅承认了散播谣言，而且笑逐颜开、喜形于色，自以为是生平得意杰作。当电台节目主持人询问他为什么要制造谣言时，他竟然这样恬不知耻地答道：“那是仿效中共的宣传技术的！”像这样以造谣为荣的丑态出现在全国电视屏幕上，稍有良知的中国人，相信都会由于他丑化中国人的形象而感到痛心疾首的。我个人的感觉是当时如果这浑小子站在我面前说这些话时，我一定会刮他一下巴掌以消心头的愤恨不可。因为这种人的心态，已和政治信仰相去千万里，而是品质糟得透顶，暴露了“汉人学得胡儿语，犹向城头骂汉人”的无耻丑态。

这一次美国新闻媒介散播谣言还出现一个“史无前例”的“特色”，那便是“越洋的回响”，有人把从天安门广场上传来的谣言，很快地传回北京和上海去，当然也配上美国和香港的游行示威镜头助长声势，于是便有一些美国新闻媒介沾沾自喜，认为是“收获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换句话说，是收获了“煽风浇油”的效果吧。这种唯恐天下不乱的心态，哪里是平素标榜报道新闻要着重确实原则，并且把“确实”这名词叫了三遍的新闻记者应有的表现！

除了上述“邓死、杨走、李伤”的谣言以外，还有一项“触目惊心”的谣言，那便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分裂为两派，其中一派不服从中央的指挥，内战一触即发……”在美国记者的报道下，中国已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天下大乱之势已是无可避免的了。一直到天安门广场恢复原来面目、部队进行调防时，他们仍在散播谣言，说什么“那是为了要保护首都建设

和文物，于是转移阵地，把内战战场移到北京城外去……”云云。

由于现在真相大白，散播谣言兼“预言家”的美国新闻媒介碰了一鼻子灰，于是灰溜溜地摆出另一种姿态了。摆在我面前的6月13日的《旧金山观察家报》首页大号标题是“中国搜索学生”，内页有一篇由国际编辑罗素写的专栏文章，题为《中国目睹者的传闻受到质疑》。文章内容大意是说香港《文汇报》于6月5日发表了自称为在天安门广场中国人民革命英雄纪念碑前“目睹和生还”的二十岁清华大学学生的口述，他说他于6月3日夜间至4日早晨7时20分，在那里所看到的“实况”，他的话是这样的：“我亲眼看到军队开枪射击坐在广场上的学生。”由于美国新闻界认为香港《文汇报》是一家有声誉的报纸，因此《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旧金山观察家报》和中文《世界日报》均根据该报报道而发表上述传闻，但是现在却发现上述传闻有可疑之处，理由如下：

一、香港《文汇报》报道那个学生说历史博物馆屋顶上装置机关枪，《纽约时报》记者克里斯多夫(KRISTOF)的报道则说看不到这样的证据。

二、香港《文汇报》报道那个学生说军队冲向围绕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的学生，并将他们殴打，克里斯多夫则否认其事。

三、那个“目睹者和生还”的学生说学生被军队的车辆围困在广场内无法逃脱，但是其他新闻媒介的报道则说学生撤离广场根本没有问题，克里斯多夫所采访的人，都说当时军车并没有将人民英雄纪念碑包围起来，至于当军队最后开进广场时，广场上人数的多少，也是一个争论的问题。

不管罗素写那篇文章的动机如何，总是值得一读的，因为那像“万绿丛中一点红”一般，开始有人说一两句公道话了，真相还会继续大白特白的，或许还会有本着良知的新闻工作者说公道话的，然而对于那些造谣的人却是不容宽恕的，至于一向被视为爱国的香港《文汇报》，这一次的表现却是令人感觉到痛心疾首的。

6月14日于旧金山

(原载1989年6月30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美国之音”的表演与 “和平演变”策略

吴 戈

“美国之音”为什么对这次发生在北京的动乱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暴乱，会狂热地加以支持呢？只要我们稍稍回顾一下历史就会知道，这是美国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的又一恶劣表演，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中反共人士对中国推行“和平演变”策略的旧梦重温。

马克思主义早就告诉人们，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作为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对立物，一经问世，就预示着整个资本主义必然衰落，预示着它最终要被社会主义制度所取代。这是由现代社会的内在矛盾和规律所决定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因此，

任何一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巩固、完善和发展，都使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受到冲击和威胁。虽然，各国人民依照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来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完全是自己国家主权范围内的正义事业。但是，国际资产阶级中的反共人士，总是企图交替地运用武力颠覆与“和平演变”的两手策略，来扼杀和消灭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且不说“十月革命”胜利之后，西方十四国的反动武装干涉曾企图把刚刚出世的苏维埃俄国扼杀在“红色的摇篮”里；且不说三十九年前，美国进行侵朝战争、派第七舰队进占台湾海峡，并运用贸易禁运，经济封锁，以及其后成百次地、挑衅地侵犯我领海领空等手段，企图用武力颠覆社会主义中国。在这里，我们要回顾的是，当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依靠勤劳的双手，依靠艰苦奋斗，使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华大地上站稳了脚跟，社会主义事业获得了稳固的基础，中国的国际威望大大提高的情况下，甚至在双方努力下于1972年中美两国建交之后，美国的一些反共人士仍然念念不忘对中国推行“和平演变”策略，幻想在将来的某一天实现其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目标。

奉行“和平演变”的策略，是美国朝野的反共人士在武力干涉失败后，或在社会历史条件变得使武力干涉成为一种不现实的选择时所作的一种策略转换。从四十年前的艾奇逊到五十年代的杜勒斯，再到今日美国反共势力的若干作为，就体现了这种策略转换的历史轨迹。

美国前国务卿艾奇逊，是制订对华“和平演变”策略的始作俑者。1949年年中，中国人民反对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的那场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已

成定局，不可逆转。在军事干涉失败后，在这年8月发表《美国与中国关系》即“白皮书”的前夕，艾奇逊在7月20日致杜鲁门总统的一封信中，制订和提出了鼓励支持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妄图使中国“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的斗争策略。他在信中说：“我们仍旧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局面不论可能是怎样悲惨，无论中国庞大人口中的一个主要部分，可能残酷地处于为一外国帝国主义利益而效力的一个政党的剥削之下，中国悠久文明和民主个人主义终将再起来，中国终将推翻外来的羁绊。我认为我们应当鼓励在中国的一切发展，这些发展在现在或将来都是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而工作。”显然，艾氏在这里说的“帝国主义”，指的是苏联；而“一个政党”，指的是中国共产党。艾氏这些充满诬蔑言词的主旨，是提出了一种“鼓励”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从内部搞“和平演变”，以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搞垮人民政权为目标的策略。由于在当时及其后的一段时间里，美国对华奉行的主要是公开敌视的态度和军事侵略及军事威胁政策，因而搞“和平演变”还不是他们占主导地位的策略思想。

真正把“和平演变”开始视为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斗争的主要策略，是杜勒斯时代的产物。从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中，社会主义制度继苏联之后，先后在中国和其他一些人民民主主义国家中牢固地建立起来，并且开始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而在这期间，美国的侵朝战争也以失败而告终。显然，再试图主要用武力来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是行不通的、也是极不得人心的愚蠢行为。于是，他们不得不实行策略转变，即把“和平演变”作为对付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的策略原则。五十年代中，当时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我国实行“百花齐

放，百家争鸣”方针后的一次国策声明中，就公开宣称，美国的政策是要促进苏联、东欧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自由化（即自由主义化或资本主义化），并寄希望于这些国家的第三代人和第四代人。所谓“促进”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自由化”，就是要策动和配合这些国家内部的残余的资本主义势力，搞“和平演变”，使社会主义社会逐渐演变成资本主义社会。因此一举，“杜勒斯”这个名字，也就成为搞“和平演变”的代名词。不过，在六十和七十年代，由于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主要推行的是“战争边缘政策”和“冷战”政策，由此造成的逐渐升级的军备竞赛，以及东西方紧张的国际形势，使得他们“和平演变”的策略原则，无法充分施展。

进入八十年代后，在美国朝野的一些反共人士看来，是他们搞“和平演变”的极好时机。因为自二次大战迄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这段和平环境中，现代科学技术有了迅猛的发展，社会经济力量有了迅速的膨胀，社会和阶级矛盾得到了局部的调整和缓和，因而资本主义世界在经济和科技上积累起了相对的优势。与此同时，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由于种种复杂原因，在社会和经济问题上，遭受到了程度不同的挫折。社会主义事业在取得到了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在前进中发生了一些新的问题和困难。其中一个普遍性的原因，是僵化、过时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呈现出种种弊端，从而妨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充分发挥，阻滞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较快提高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充分发展。所以，从七十年代末开始，中国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都先后开始进行全面的社会主义的体制改革。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这些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而在西方某些反共、反社会主义者的眼中，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正是他们策动这些国家“和平演变”的千载难逢的机遇。而这期间，东西方开始走向缓和的趋势，也为他们在不断扩大的东西方交往中贯彻这种策略原则，提供了方便条件。

对美国一些反共人士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我们要警惕他们的两手：

其中一手，是他们使用经济援助和技术转让作为手段，想引诱社会主义国家上当，或者借以施加压力，促使它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搞“和平演变”。凡是不愿意搞“和平演变”的国家，他们就不提供“实质性的援助”，或者先给点援助，然后用“逼债”等经济手段，来迫使你就范。关于这一点，作为中华民族败类的方励之，是深谙外国主子心意的。他曾向华尔街的老板们献计说，在中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上，外国要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抽回在中国的投资。而作为这一前提，是在短期内既要给予刺激，又不要激化到使中国完全实行自力更生的程度，并在短期内通过外国在中国的投资，在达到“中国对外国投资有更大的依赖性”时，即“在国际社会和中国的关系上经济因素越来越重要的时候，那就容易……”了。至于“容易什么”，方先生欲言又止。其实是不言而喻的，他就是想借助西方的经济压力，来达到他们梦寐以求的，在中国搞“和平演变”亦即实现“全盘西化”的目标。当然，在中国与外国的经济关系上，我们决不能因噎废食，在平等互利和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前提下，我们仍应扩大对外经济交往，仍应尽可能多一些地引进外资和加强技术合作。但同时，对蓄意玩弄“和平演变”阴谋的人们，我们则应保持必要的警觉。

至于我们要警惕人家的另一手，那就是他们运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即以美国式的自由、民主和人权观念作为精神武器，向社会主义国家浸润、渗透，并用以策动和支持我们国内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极少数人，从内部瓦解社会主义制度。

马克思主义者历来认为，以抽象的自由、民主和人权作为旗帜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中，曾发挥过积极作用。但它在本质上，是资产阶级雇佣劳动制度、资产阶级利益在观念上的反映。它作为在该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取得了社会的名义，并被赋予了抽象的普遍性的形式，因而它是一元的，是为资本主义经济基础服务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和权利观念，已经改造和扬弃了资产阶级思想意识中的消极成分，两者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别。在这里，社会主义民主意识和制度，代表的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意志，是与社会主义经济结构相适应的政治和观念的上层建筑。因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应该发展社会主义的民主、自由和权利观念；如果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要求实现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自由和人权，必然会瓦解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然而，资产阶级的一些思想家和追随者，为了让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争得某种合法地位，并用以作为搞“和平演变”的思想工具，却硬要说它是“多元化的”。故而，西方反共人士所希望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政治多元化的改革”，只不过是他们搞“和平演变”的隐蔽的说法。对此，连“高自联”的头目王丹，也是心领神会的。王丹曾对北大的一位同学说：他们闹事的“最低目标”，是争取承认“高自联”合法，

为方励之平反，民间办报；而他们的“最高目标”，则是贾“建立多元政体，实现精英政治”。

因此应该说，国内外一些人想在中国搞“和平演变”与中国人民反对“和平演变”的斗争，不仅是国际范围内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也是中国社会本身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的一种表现。因为在国内，搞“和平演变”，也有一层薄弱的社会基础。在中国社会内，包括知识界，甚至在共产党内，仍然存在着极少数羡慕资本主义制度的人。如果说，当年的“民主个人主义者”只是一些对美国存有幻想，对共产党尚有误解的中间分子的话，那么，今日中国的一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则是拜倒在西方文明脚下，狂热地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反动分子。如方励之、王丹、刘晓波之流，他们不仅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狂热分子，而且也是中华民族的败类。他们奴性十足，崇洋媚外，与国外反共势力心心相印，内外勾结，配合默契，在中国制造动乱和暴乱，企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制度，颠覆人民共和国，建立依附于西方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励之之流，是美国反共人士妄图在中国搞“和平演变”的应声虫。

也正因如此，“美国之音”对于这次发生在北京的动乱和暴乱的煽动和支持，才达到了利令智昏、忘乎所以的程度。人们记得，今年春季美国总统访华时，美国驻华使馆所导演的方励之的“赴宴风波”，显然是对方励之正在酝酿在中国闹事的一种露骨的支持。在这次发生动乱和暴乱过程中，“美国之音”大肆煽风点火，拨弄是非，唯恐中国不乱；美国驻华使馆又以暴乱分子的保护神自居，为反革命暴乱的策者和操纵者、我公安部门通缉的人犯方励之夫妇提供“庇

护”，6月5日，美国政府又对中国平息暴乱进行“指责”，表示“极大的遗憾”，并且，宣布中止中美政府间的军售和商业性的武器出口，中断中美两国军事领导人的互访活动。美国政府及其宣传机构的这些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进一步暴露了他们支持在中国搞“和平演变”的野心。这是中国人民所不能容允的。

应该指出，自1972年中美建交以来，两国关系有了一定的发展。中美双方只要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两国关系，就具有良好和稳定的发展前景。我们奉劝美国政府和朝野人士，应以中美关系的大局为重，不要干涉中国的内政，也不要妄想在中国搞“和平演变”。目前，发生在中国首都的反革命暴乱已经平息。动乱暴乱的策划者们，以失败而告终。我们奉劝人们不应用近视的眼光来看待中国。中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不会改变的，坚持改革开放也是不会改变的。中国将继续执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并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一切国家的关系。中国决不干涉别国的内政，也决不允许任何外国干涉中国的内政。企图在中国搞“和平演变”也罢，这一图谋失败之后搞什么“制裁”也罢，到头来吃亏的只能是他们自己。历史的辩证法，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原载1989年7月9日《人民日报》）

美国的反华浪潮 是怎样掀起的？

(美 国) 翁绍棠

《战国策》里有“三人成虎”的故事，大意是这样的：庞葱要陪魏太子到赵国邯郸去做质子，临出门前对魏王说：“现在有一个人来报，街上出现了老虎，大王相信么？”魏王说：“不相信。”庞葱说：“有两个人来报街上出现了老虎，大王相信吗？”魏王说：“我有点儿怀疑了。”庞葱说：“有三个人来报呢？”魏王说：“我相信了！”庞葱说道：“街上没有老虎，那是自明之理，可是一而再、再而三都是那么说，就象真有老虎了。现在邯郸距离大梁（魏国首都），比上街要远得多，而谈论我的又不止三人，希望大王能够明察才好哩！”魏王说：“我自己会鉴别的。”于是庞葱辞魏王走了。诽谤他的话马上传到魏王那里。后来太子不作人质，回到本国，庞葱跟着回国，魏王果然不再召见他。

“三人成虎”的故事说明，即使有“谣言止于智者”的告诫，但在大量谣言蜂拥而来之时，要能透过假象明辨是非，的确是容易的。世间的“智者”毕竟是少数，在“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这三类人中，“先知先觉”者最少，而“不知不觉”者最多。这一次北京发生因学潮而引起的动乱，以后又变成为暴乱，美国新闻媒介的表现以及美国朝野人士

的反应，恰好是“三人成虎”故事的又一例证。一直到现在，暴乱已经平息，中国政府正在局势稳定后处理善后事宜，但是谣言依然越洋而来，并且在美国国内掀起了一股反华浪潮。极右派的国会议员几乎每天都在摇旗呐喊，借反共之词，行反华之实。笔者居美四十多年，认为美国目前所出现的反华浪潮，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前后出现的三次反华浪潮中最狂暴的一次。前两次，第一次是五十年代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倡导“对华围堵政策”之时，其狠毒的动机是要把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初生婴儿扼杀于摇篮之中；随后一次是出现于六十年代美国发动侵略越南战争之时，气焰嚣张，妄想占领越南之后，乘机踏入中国领土。

此时此地，美国朝野人士中，具有远见和明辨是非的智者还是大有人在的，他们也看到稳若泰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动乱和暴乱爆发之后“我自岿然不动”的形象，更看到中国人民绝不屈服于国际上任何压力的坚强意志。最重要的是，他们还看到今天的新中国，已不是四十年前初生的婴儿，也不是“十年浩劫”中的中国。今天的中国是身强力壮、已届“不惑之年”的中国，以今天的国力，决不是世界上任何幸灾乐祸、心存不轨之辈敢于乘虚覬覦或染指的。我向朋友们说，如果这次天安门广场所发生的动乱和暴乱，发生于清末或民国初年，火烧圆明园和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的事件早就重演了。因此，笔者最欣赏邓小平所说的“我看他们没有这个本领”这句名言，也最喜爱郭兰英所唱《我的祖国》那首歌的两句歌词：“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它的有猎枪。”

从动乱开始到现在，笔者经常扭开电视机注视美国记者由北京传播回来的镜头和“报道”，也密切注视各大报纸的反

应。我发觉他们的态度既主观又固执，对谣言极感兴趣，并且兴致勃勃地大耍“数字游戏”。他们每天都在天安门广场上拍摄学生的活动情况，示威人数越增加，他们越喜形于色，当他们报道人数已超过“百万”之时，简直是高兴极了。戒严令颁布后，部队虽开抵首都郊区，但对学生仍持宽大容忍态度，只派少数徒手军队乘公共汽车至广场维持秩序，却遭遇到学生的围困和凌辱。美国记者的“分析”却是“部队已分裂为两派，内战已在酝酿中，部队不敢开进广场，学生已获胜利，并且已获得工人群众和其他各界人士的支持……”美国有的记者还把动乱称为“一场空前的革命”。事实是美国记者留在天安门广场，已经违犯了中国政府的戒严令，而他们采访的方式是以耳代目，将谣言如拾至宝般传回美国。

暴乱发生后，美国记者在广场所拍摄的镜头，集中在救护车运送受伤者至医院抢救，以及车辆被纵火焚烧的情况。这些录象中，突然出现解放军战士被剥光制服、吊死在公共汽车上然后纵火焚烧的镜头。但是这个触目惊心的场面，只象昙花一现般出现了一次，以后便被抹掉，无影无踪了。美国电视上每隔一小时或半小时的新闻报道，总是重复映出运送受伤者和在医院中拍摄的伤亡者的镜头。美国记者在报道时还说：“军队把坦克车开进广场围困学生，用机关枪扫射他们，死亡者数以千计，军队把尸体送走，秘密焚毁，消尸灭迹……”第二天更有“最少死了二万人”的谣言在美国传播，还说“军队已开至大学区和市区镇压，到处可闻枪声，北京已成为一座恐怖城市……”

事实是美国记者在暴乱发生后所拍摄的录象，根本没有一个镜头是反映“军队用机关枪扫射学生”的，连军队开枪的

镜头也没有一个。而且美国记者在暴乱发生后不久便纷纷躲进北京饭店或其他饭店去，那个把解放军辱骂得体无完肤的CNN电视台驻北京办事处主任迈克·陈诺便是躲在北京饭店高楼内用耳朵“采访新闻”的。他的得意杰作是把北京街头的枪声播回美国，“证实”解放军“屠杀和平示威学生”，而该电视台的新闻主讲人到现在还把政府逮捕及判处死刑的暴徒，美其名为“拥护民主示威的受害者”。这是什么鬼话！那三个在上海殴打保安人员和纵火焚毁火车的暴徒，和在北京杀害解放军指战员、武警官兵，砸毁、焚烧公用车、军车，抢夺枪支弹药和抢劫商店的八个暴徒，被依法判处死刑，是罪有应得的，竟被恭维为“受害者”。新闻记者应有的良知，简直是荡然无存！

令人愤慨的还不止此，当我们看到天安门广场恢复昔日庄严壮观的镜头而感到欣喜时，当我们看到勤劳的同胞在洗刷修整中国人民革命英雄纪念碑的镜头而感激之情油然而生时，CNN和其他的电视台广播员竟然这样说：“为民主运动而牺牲的斗士的鲜血是洗刷不掉的。”还象预言家那样发出“预言”：广场上现在看来是安宁的，但那只是枪杆子形成的一时的安宁，谁敢保证不会再度出现大动荡？……”当我们看到系带红领巾的少先队孩子们在广场上向牺牲性命的战士们献花圈致敬的场面时，美国广播员却热讽冷嘲地说：“死于枪弹下的学生们却受不到这样的礼遇！”这一切的表态，说明美国新闻媒介到现在还在煽风浇油，妄想动乱死灰复燃。

当前美国出现的反华浪潮表面上矛头所指是中国政府，实际上是污损中国的形象，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对在美国的华侨和华裔的地位也是不利的。但我认为，这只是暂时的

情况，只要中国坚持不容许外国干涉内政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继续执行既定的对内对外国策，相信随着动乱和暴乱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后，明辨是非的人是会越来越的。美国朝野人士顾全十年来培育起来的中美关系的正确主流，终会压倒目前一哄而起的反华浪潮。

6月15日于旧金山

（原载1989年7月3日《经济参考》）

白宫的青睐

黎 里

方励之先生带着老婆李淑娴偷偷摸摸地跑到美国大使馆乞求“保护”去了。6月6日，白宫发言人菲茨沃特对此作了直言不讳的供认。6月10日，北京市检察部门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批准逮捕方励之、李淑娴，公安机关为此向全国发出了通缉令。事情还在发展中……

美国使馆为什么甘犯中国老百姓的众怒，甘冒违反中国法律、损伤两国关系的风险，甘担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的罪责，给这些中国人民唾弃的败类以庇护呢？或者说，白宫的大人先生们，为什么要对方励之者流另加青眼呢？

就方先生一伙来说，事情很明白。他们的仓惶投奔，是基于煞费苦心煽起的反革命暴乱失败，自感前景暗淡，便再也

顾不得脸皮，公开扑向了主子的怀抱。于是，原形毕露了，最后的一层“爱国”的遮盖布被自己撕了个粉碎，赤条条地袒露出卖国的隐私来！

就白宫的先生们来说，事情也很明白。方励之等辈，在白宫眼里，是各自的“祖国鼓吹自由的人士”，是他们搞和平演变、颠覆人民政权的“希望的信徒”，是按他们的模式建造的“一个民主新时代的先驱”。总而言之，统而言之，是他们朝思暮想的、珍爱备至的、亲手播下的“改变共产党政权的种子”就是了。

这些引号里引出的话，决非笔者杜撰，它们出自美国国务卿舒尔茨之口，时期是1983年10月，地点在美国国务院召开的“共产党国家民主化”问题的会议上。据舒尔茨先生讲，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来自共产党国家的政治家”——“在你们的祖国鼓吹自由的人士”。

方励之先生是否恭逢并置身这个盛会，不得而知，不敢妄拟。但是，心有灵犀一点通，方先生自觉地迫不及待地挤进了这个行列，以民主的先驱自居，跟着白宫的指挥棒转，卖命地贩卖从西方世界逡来的种种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货色，却是千真万确、人所共见的事实。比如，1985年以来，方先生就曾在许多场合一再说：“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现在我们要寻求新的真理。”“我觉得从社会主义体系来看，是失败的。”“应当全方位开放或者叫全盘西化。”“全盘西化包括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文化、政治、经济、意识形态、道德所有全部的东西……包括我们的政治体制、所有制。”甚至说，中国共产党“现在是黑的”，“我正式提出改变党。”他鼓吹知识分子要“成为一个独立的力

量”，“一个主导的力量”……如此等等。瞧，一方在远隔重洋的白宫召唤，一方在中国的土地上呼应；一方指手划脚地拨弄，一方不遗余力地蠕动；一君一奴、一主一仆配合得何等和谐、协调、默契！这就无怪乎一方走投无路地叫喊“保护”之时，一方便不顾一切地施以庇护了。

其实，这一切并不自今日始。早在差不多40年前，在新中国成立的前夕，美国国务院便于1948年8月发表了题为《美国与中国关系》的白皮书，以及国务卿艾奇逊给美国总统杜鲁门的信件，定下了基调。艾奇逊先生说：“……中国悠久的文明和她的民主个人主义终于会再显身手，中国终于会摆脱外国的羁绊。”他声称：“对于中国目前和将来一切朝着这个目标的发展。我认为都应当得到我们的鼓励。”到了50年代，国务卿杜勒斯先生在我国实行“双百”方针后的一次国策声明中，重申美国的政策是要促进苏联东欧国家自由化（应读作资本主义化），中国是否能实现西方所要求的自由化，还要观察。

不难看出，从40年代末到80年代末，从可爱的艾奇逊到杜勒斯又到舒尔茨国务卿先生，完全是一脉相承，同气相求。他们妄想借助“内部势力”——民主个人主义者搞垮人民政权的企图及势力，一天也没有停止过。他们的阶级觉悟高得很，阶级意识强得很哩！

在评美国白皮书及艾奇逊信件的文章中，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向往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主张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自由主义分子、旧民主主义分子，即民主个人主义者，是艾奇逊们在中国的“一层薄薄的基础”。而艾奇逊们公开“鼓励”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摆脱所谓“我国的羁绊”，则

是“要推翻马克思列宁主义，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这些话在今天看来，具有何等鲜明的现实性和无可争辩的真理性啊！

白宫为什么偏爱方励之先生者流，的确值得我们沉思！

（原载1989年第7期《学习与研究》）

里根先生的尴尬

凌 阵

卸任的美国总统里根先生关心起中国的学潮来了。

据路透社报道：6月16日，里根先生在巴黎接受美国电视台记者采访时，明白无误地表示支持闹学潮的中国学生。他不无遗憾地感到“学生们在推进他们所从事的事业方面可能走得太远，太快了些”。但又喜形于色地宣布这是对“铁杆共产党人发出警告”，并且信心十足地预言：“有朝一日，他们（共产党人）会在一种不同的革命中在街头面对人民的反抗”。

里根先生心里那点隐私，从这短短几句话里，也可窥见端倪。原来，他对北京学潮的支持，是基于企望在中国出现“一种不同的革命”——针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所谓“革命”；而这种“革命”，裹入其中的不仅仅是学生，还应该包含着大批各色人等、各类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不满的社会

力量，即里根先生眼里的“人民”；这种“革命”的方式，则是“在街头”搞“反抗”——是否包括“暴乱”，里根先生没有明说，似乎也不便明说。唯一让这位卸任总统先生感到遗憾的，是学生们“走得太远、太快了些”，时机尚未成熟，“革命”终于夭折，变作一枕黄粱幻梦。

我们这么说，决不是断章取义，曲解了里根先生的本意。要证明这一点，只消举出他担任总统期间，1983年10月由舒尔茨国务卿主持、美国国务院召开的关于“共产党国家民主化”会议就够了。在这个会上，确定了“支持共产党国家民主势力的出现”、“帮助他们进行争取自由的斗争”，以求播下“改变共产党政权的种子”，最终实现“共产党政权和共产党社会向自由方向发展的可能性”的方针，并制定了一系列相应的措施。其中，光是加强电台广播（在舒尔茨等眼中，美国的电台广播早就“成了共产党国家的替代性自由新闻”），就耗资10亿美元！前有“呼”，后有“应”，我们实在没法子不把这两桩相距五六年的事勾联起来。

里根先生支持学生的态度是明白无误的了。但他同时就陷入了尴尬处境。人们没有忘记，二十年前，1969年加州大学学生发起示威的时候，正是担任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的里根先生，亲自命令国民警卫队加以镇压的。当记者指出这明显的矛盾的时候，里根辩解说：因为示威的是左翼学生，警方告知共产党在其间起了作用。

然而，这丝毫帮不了里根先生的忙，如果说，一切学潮都应该支持，他为什么动用军事力量呢？如果他动用军事力量的理由成立，他也就无权对中国政府平息反革命暴乱说三道四，指手划脚。两者必居其一，折衷是没有的，更何况，

我们平息的是一场反革命暴乱，是针对一批搞打、砸、抢、烧、杀的暴徒，以及他们的指使者、敌视人民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极少数坏人。这和里根当年的镇压学运，有着本质的区别，完全不能同日而语，又有什么不应该予以平息呢？如果说，只有“左翼学生”、“共产党在其间起了作用”的“示威”，才能动用军队“镇压”，而发生在中国的，则是由美国人精心培育的“民主萌芽”于其中制造和操纵的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的“暴乱”，所以就决不应该动用军队予以平息的话，那就只能证明里根先生的反动本性，而决不能证明他偏爱什么“民主”和“人权”。

总而言之，里根先生出于其阶级本性：对内镇压人民群众、对外支持反人民势力，便无可避免地要陷入无法自拔的逻辑混乱。他的尴尬正是他的悲剧所在！

怎么办？如果要替里根先生出点主意的话，我看，得用着中国老百姓的一句俗话了：闭上你的嘴，没人把你当哑巴卖了！

（原载1989年6月29日《北京晚报》）

北京、纽约安全说

郎 雨

最近，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煞有介事地发表了一通议论，宣布了一项决策：美驻华官方人员的家属可获准返回北京，

但由于安全状况方面的原因，一般公民仍不宜去北京。

安全，仍旧是白宫手里的王牌和棍子。

今年春夏之交发生在北京地区的这场反革命暴乱，被平息已达三个月，中国的局势早已稳定，首都的社会秩序早已恢复，这是有眼睛的人都可以看见的。今年7月中旬，北京开了个国际旅游研讨会，来自二十九个国家和地区的四百四十三位人士参加了会议。美国朝代国际旅游公司副总裁弗兰克·马祖祺就表示，“我感到晚上在北京散步要比在北美的许多大城市安全得多。”

我们还可以提醒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先生读一读美国出版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那里记载着，在美国，1980年比1960年，被谋杀者增长一倍半，强奸案增长二倍，抢劫案增加四倍。全国平均每二秒钟发生一起严重犯罪案件，其中谋杀每二十三分钟一起，强奸每六分钟一起，抢劫每五十八秒一起，严重人身伤害每四十八秒一起……美联社今年7月30日还发表了一项调查报告，评定最不安全城市，纽约市被列为“恐怖指数”的榜首，其后是迈阿密、洛杉矶和华盛顿。美国司法部也把华盛顿州列为犯罪率最高的八大州之一，纽约则为美国大城市犯罪率之首。

纽约、华盛顿和北京之间，什么地方更安全些，这不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事吗？如果说北京的“安全”情况“不宜旅游”，纽约、华盛顿又该怎么办呢？

顺便说一句：就像“美国之音”不能蒙蔽世界舆论一样，白宫的指挥棒也无法控制一切。北京消息：4至8月外国驻京商社新增七十七户，超过历史最高峰的最后一年。其中，不仅有日本、联邦德国、法国、英国、澳大利亚、瑞士、丹

麦、芬兰等国的商社，还包括美国的商社在内。不知白宫的决策者们对此有何感想？

我们的大门是打开着的。

封锁中国的年代早已成了过去的历史。当今的世界，谁也没有本领再重演这一幕历史的旧剧了。

（原载1989年9月8日《北京晚报》）

第五编

佐证《河殇》

从某种意义上讲，整个动乱就是该片作者要搞的“新纪元”的一次大曝光和“精英”们互相利用、互相支持所必然酿成的恶果。



《河殤》宣扬了什么？

易家言

《人民日报》编者按：去年下半年，电视系列专题片《河殤》曾两度与观众见面，在海内外名噪一时，用《河殤》总撰稿人之一苏晓康的话说，是“大大地出了风头”。但在众多的喝彩声中，也有不少同志提出不同意见，有的愤然质问：《河殤》到底要宣扬什么？此文写作并定稿于1988年10月。现依照作者意愿，一字不易，在这里首次发表。

此文作者称，笔名著为“易家言”，取的是“一家之言”的谐音。本来，对一部作品有不同意见，任何人都有权利参与争鸣。可是，“易家言”的这篇文章成文后，赵紫阳同志明确表态：不要发表。而他却把《河殤》的录相带送给外宾，说值得一看。这符合百家争鸣的方针吗？不错，我们主张党在坚持对文艺事业的政治原则、政治方向的领导的前提下，对具体文艺作品和学术问题要少干预、少介入。但是，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赵紫阳同志所说的对文艺作品“少干预、少介入”的含义和政治倾向，同党的主张是根本不同的。他实际上是要让主张在文艺领域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广大同志“少干预、少介入”，让主张在文艺领域坚持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少数人多干预、多介入。否则既然说是要“少干预、少介

入”，为什么又干预别人的文章，不让发表呢？

“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是文艺工作的方向。我们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认真学习贯彻十三届四中全会和邓小平同志重要讲话精神，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更好地坚持“二为”方向，使文艺事业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更大的功能。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我们党的一贯方针。今后，我们仍然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这一方针，促进文艺的繁荣，促进理论的发展，以利于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

电视系列片《河殇》的播出，在广大观众和思想理论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和热烈争论。对一种延续了五千年的悠久历史文明进行“总体的反思”，是一项艰巨、困难的历史工程，对此产生不同的看法，是很自然的，围绕这个问题开展深入讨论，更是完全必要。作者们表现了出于对改变中国的落后状况的关切和焦虑；可是，由于缺乏足够的理论上、知识上的准备，缺乏严肃和郑重的态度，电视片中有许多基本论点和判断是不准确的、甚至是有害的。

下面，就《河殇》说几点意见：

1、《河殇》实际上唱的是一曲整个中华民族的葬歌。它不仅宣告了所谓“黄河文明”（即中华文化）的夭折和衰亡，而且是对一个伟大民族及其悠久文化传统的全盘否定。

作者断言：

“亚细亚的太阳阴落了”；

“单靠这片黄土和这条黄河……已经孕育不了新的文化”；

“崭新的文明，它不可能再从黄河里流淌出来”；

“这片土黄色的大地不能教给我们什么是真正的科学精神”；

“肆虐的黄河不能教给我们什么是真正的民主意识”；

“命运就给中国人安排了这样一种生存空间”。

这是典型的民族虚无主义和悲观主义，是典型的历史宿命论。

2、《河殇》不是用唯物史观、用生产方式的变革以及各种社会因素的变化观点来解释中国历史，而是用唯心史观，用地理环境决定论、用中国人天生愚劣等观点来解释中国历史。作者认为历史是由“文明的性质决定的”，而“文明的性质”是由地理环境决定的。《河殇》说：中国人“不像欧洲民族那样生活在地中海周围，也不像美国人那样住在两个大洋之间”，中国人“眷恋大陆，始终不能超越土地的限制走向大海”，这就决定了“中国的历史命运”，也决定了这种“内陆文明”、“黄色文明”的落后、封闭和保守。他们得出结论：“黄河文明”是一种“失败的文明”。

3、《河殇》对黄河、长城这些中华民族的象征，不加任何分析地进行了嘲讽、挖苦和否定。甚至把“黄水”、“黄土”、“黄豆”、“黄米”以至“黄皮肢”，都当作了中国文化落后无望的标记，这对于十亿人民，包括居住在港澳台和世界各地的数千万“炎黄子孙”来说，这极大的侮辱。它已经引起不少海外侨胞的强烈反感和批评。

4、中华民族具有强大的凝聚力，所以尽管历史上内有军阀混战割据，外有列强侵略瓜分，但经过不断斗争，总是保持着统一的辽阔的国土。《河殇》作者却对中国历史上争取祖国统一的一切努力，采取怀疑甚至嘲讽的态度。他们认为

同中世纪西欧、日本、印度那样“众国林立”、“分疆裂土”的局面相对应，“唯独在东方的中国，有一块辽阔而统一的大版图”、是一种落后的“板结”，这种“大一统的幽灵似乎还在中国的大地上游荡”，是应该否定的东西。这种否定中华民族统一，鼓吹在中国版图上“众国林立”、“分疆裂土”的观点，是不利于祖国的统一，不符合亿万炎黄子孙的意愿的。

5、《河殤》没有把中国历史上劳动人民反对压迫、剥削，抵抗外侮、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同历史上军阀混战那样的动乱加以区别，相反，把历史上包括奴隶、农民起义、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斗争，都笼统地说成“并不像有些理论说的那样，具有什么革命意义”，而是“表现出惊人的破坏力和残酷性”，“一次又一次把生产力的积累无情地摧毁掉”的恶性活动。可另一方面，又说“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国人那样奉行着一种独特的、听天由命的生命哲学。”

《河殤》说：文化大革命“那场动乱的爆发，为什么离解放前的动乱只隔了短短的十几年？这是否意味着古代那种周期性的社会振荡还在继续？”在这里，显然把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都和“文化大革命”相提并论，列入所谓“七、八年又来一次”的“周期性社会振荡”之中而加以否定。电视片对鸦片战争以来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英勇斗争不置一词，对林则徐、魏源、邓世昌等加以贬抑、嘲讽，也充分说明了他们对我国历史上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不应有的态度。

这样，《河殤》就根本歪曲了中国的历史，特别是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史和现代史。在阐述中国近、现代历史时，它根本不提对改变中国历史命运进行过卓越思考和实践的伟大

革命家、思想家孙中山、鲁迅等，是并非偶然的。

6、《河殇》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推翻“三座大山”的人民革命，对改变了世界力量对比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对我国消灭剥削制度、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不给予任何历史地位。唯一提到的建国以来的历史事件，就是“颠狂的大跃进”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共产党和她的领袖毛泽东，多次作为反面的、被嘲讽的对象而出现。作者哀叹中国在近、现代失去了选择“资本主义”的机会。它实际上宣告了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用马克思主义观察中国社会、选择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达到社会主义这条道路的历史实践是彻底失败的。这是对中国历史的最大歪曲。

《河殇》不仅否定了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的必要性，而且否定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必要性。它借普列汉诺夫之口，证明列宁领导夺取政权“过早”了，“超越”了“必要的发展阶段”，“使经济遭到最惨重的失败”。

《河殇》断言：“马克思早已预言的资本主义丧钟，迟迟没有敲响”。意思是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空想。然而包括十月革命、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在一系列国家的建立，难道不是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过程的生动表现吗？正如资本主义制度不可能在一切国家同时出现一样，社会主义制度也不可能在一切实体同时建立的。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实践和历史进程所起的伟大指导作用，根本不在《河殇》的视野之内。在对中国所进行的“文化反思”和“历史变革”中，仿佛马克思主义不再有任何用处，实际上被扔到需要根本改变的落后的“传统观念”之内了。

7、另一方面，《河殇》对于西方文明，或欧洲文明、蓝

色文明，即资本主义文明，则极力加以歌颂和美化：“资本主义转动着工业革命和自由贸易这两个轮子，开始了伟大的飞跃，开始了科学与民主的双重历史大合唱”。可是，一百多年来老牌帝国主义在自由贸易的幌子下，对中国侵略、掠夺、践踏、残杀的血腥罪恶历史却只字未提，被完全掩盖和抹掉了。

《河殇》宣扬了“欧洲中心论”，肯定了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全盘”西化，走“蓝色文明”即资本主义文明的道路，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电视片把这种“蓝色文明”称之为“新曙光”，认为“救文明之衰微”，唯一道路就是“打开国门，对外开放”，“迎接”这种“科学和民主的新曙光”，并且认为这是不应加以拒绝的“唯一选择”。这种“选择”就是改变我们文明的“颜色”。作者们所理解的改革，实际上就是用“西方文明”即所谓“蓝色文明”取代所谓“黄色文明”，用“蔚蓝色的海洋文明在干涸的黄土地上浇下一片霖雨”。和这种宣传相呼应，报上竟然出现一种论调，认为外国人在中国的“租界”不是“罪恶的渊藪”而是“文明的先驱”。

8、尽管《河殇》有许多主张、呼唤改革和开放的语言，但它的主张和呼唤与党中央、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改革开放的方针并不是一回事，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改革目标是背道而驰的。无论是改革还是开放，都不意味着实行“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的道路。早在1979年，邓小平同志就指出：“现在有一些人散布所谓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言论。一定要驳倒这种言论。”对今天来说，这种告诫并未过时。

9、《河殇》的作者们断言：“中国知识分子始终依附于

政治权力”，“没能形成独立的社会群体，并缺乏独立的人格意识”。难道成千成万先进的知识分子，不是自觉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同广大劳动人民的结合中，共同进行了伟大的革命和建设，发挥了他们的才智和力量了吗？难道近、现代史上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先驱者们竟连“独立的人格意识”都没有吗？与此同时，他们还宣称：“一部《河殇》不仅证明一个具有独立学术意识的精英文化群体已经形成，而且展示了他们对民族命运独立思考的成果”。他们还把自己奉为中国摆脱了历史“局限”的“整个文化精英层”的代表，宣称《河殇》“寄托了整个文化精英层对民族命运的关注”，向中国人“提供了一种新的世界观”。他们实际上把自己看成了中国进行社会改革的“不依附政治权力”的独立的领导力量。

10、《河殇》学风不正十分严重。它根本不讲事物的内在联系，只是任意找来某些现象或字句，形而上学地拼凑在一起，进行马克思反对过的“肤浅的历史对比”。事实也不核实，引文也不核实，甚至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也采取了任意曲解的态度。例如它说五四运动以后“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文化思想，在中国广泛传播”。这种说法完全否定了“西方”是一个政治概念，否定了“西方文化思想”的资产阶级性质，否定了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文化思想”根本不同的性质，并且将马克思主义降低到只是“西方文化思想”一部分的附庸地位。又如它在讲到1840年鸦片战争问题的时候，先说中国闭关自守的状态被英国打破了，然后引证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的话：“历史的发展，好象是首先要麻醉这个国家的人民，然后才有可能把他们从历来的麻木状态中唤醒似的”。《河殇》这样做，是期求借马克思的话来证明

英国进行鸦片战争有功，然而马克思这篇文章既不是1840年写的，也不是论鸦片战争的，而是1853年写的，是赞美太平天国革命的。他明确地指出，这次革命大爆发，是英国的大炮以及用大炮推销鸦片“推动”起来的。马克思是谴责英国侵略的，与《河殇》美化这种侵略没有丝毫相同之点。

还有，例如德国是经济发达的国家，但她的文明就难以用“海洋文明”来概括；而许多经济落后的海洋国家，她们的文明又是什么文明呢？又如：张衡当过14年“太史令”，作者却想当然地只让他当了“几天”；祖冲之、宋应星都长期在官场生活，作者却武断地说他们是“一生布衣”；诸葛亮隐居躬耕过的“卧龙岗”，在电视片中竟成了他“长眠”之地；这种情况，在整个电视片中，不一而足。他们把《河殇》这种东拼西凑、东拉西扯、破绽百出的“大杂烩”说成是中国思想界的“突破”和“最高成就”，把《河殇》的出现，说成是一场“新的启蒙运动”，这种自吹自擂，不能不叫人齿冷。

上面是就《河殇》涉及到的一些主要问题的几点看法，没有来得及展开来谈。这些问题无疑是重要的，值得讨论的。不同的观点，应当得到充分的反映。希望能充分掌握、占有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多方面的深入探讨。

（原载1989年7月17日《人民日报》）

赵紫阳同志的介入说和《河殇》 的“新纪元”

新 仁

赵紫阳同志担任总书记期间在文艺上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说法：“我有个基本的主张，根据多年的经验教训就是少管，少介入，既不要轻易表扬什么，支持什么，也不要轻易批评什么。”“什么这个作品怎么样，那个作品怎么样，根本不管这个事。”他还特别声明：“凡是让我审查的影片我都不看，我也不会发表什么意见。”但是，对《河殇》这个作品，他不仅介入了，而且三番几次地介入，管得很具体，与他的那个宣言成了具有讽刺意味的鲜明对照。

请看事实：

去年夏，《河殇》在中央电视台一播出，赵紫阳同志扶植的一批“文化精英”立即带头在报刊上刮起一股吹捧风，一些清醒的学者则写文章对《河殇》宣扬的历史观政治观提出尖锐批评。就在这时，赵紫阳同志对《河殇》不仅表示赞赏，还让有关单位复制五百套录相带，广为发送。对赵紫阳的这种支持，有的报纸在为《河殇》迅速重播而写的文章中作了特意的暗示。

不久，一位友好国家的总理来华访问，赵紫阳同志特别

送给他一套《河殇》的片子，并推荐说：值得一看。

9月末，王震同志在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上批评了《河殇》，并要求中央重视这件事。这时，赵紫阳同志却支吾其词，回避问题的实质，搪塞几句就匆匆宣布散会。

10月，一个《关于处理〈河殇〉问题的几点意见》的报告提出，要“发表适量的评论文章，对《河殇》散布的片面的、错误的观点加以澄清”。对这一报告，赵紫阳同志表面上并未表示异议。可是当易家言同志的批评文章《〈河殇〉宣扬了什么？》写出之后，赵紫阳却明确表示：不要发表。他硬是利用职权压制对《河殇》的批评，为《河殇》思想的畅行无阻提供保护。

短短几个月之内，赵紫阳同志对《河殇》表现出来的关心是非同寻常的，介入的次数之多、程度之深是令人惊讶的。人们不禁要问：赵紫阳为什么要如此卖力地支持《河殇》？《河殇》里究竟有什么东西使他这样着迷？

对《河殇》所宣扬的那一套荒谬东西，易家言的文章和其他文章已谈了不少，我们这里只着重指出一点：《河殇》的要害是所谓“新纪元”，赵紫阳同志最欣赏的也正是这个“新纪元”。

《河殇》在论述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发展中向人们推出了两个新纪元：1649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一个新纪元，1987年赵紫阳当了总书记又是一个新纪元。两个“新纪元”一线相穿，都是为赵紫阳和他的现实政治需要制造舆论的。

其一，《河殇》讲“新纪元”，是用来突出赵紫阳、大树特树赵紫阳的“新”权威的。

《河殇》在总体反思的旗号下，一笔抹煞中华民族五千年

的文明史，抹煞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史，抹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贬低十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就，唯独突出赵紫阳当总书记的这一段。在《河殇》里，巴黎公社不是新纪元，十月革命不是新纪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是“周期性的社会振荡”和“动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只有“颠狂的大跃进”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直到1985年仍然是“人家的长进比我们快得多”，只有到1987年赵紫阳当了总书记，才揭开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纪元”。

诚然，《河殇》也不得不提到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但却只是说在“这一天”，历史“终于把中国也推进了”改革大潮，紧接着又说“我们正好站在十字路口”。显然，《河殇》作者的意思是在说，当时的中国只是刚“打开封闭的篱墙”，领导者尚未自觉地作出新的历史选择。作者还特别提示说：“无论是列宁还是普列汉诺夫，无论是斯大林还是布哈林，也无论是毛泽东和他的许多战友们（引者按：这无疑包括邓小平等健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没有找到开辟新纪元的“神秘的看不见的经济规律”，只有赵紫阳才找到了这个规律。恰在这时，屏幕上立即出现了赵紫阳的特写镜头，响起了他的讲话声，话音未落，屏幕上再次推出“新纪元”三个大字！作者这样歪曲历史，把赵紫阳之前的中国历史抹成一片空白，调动各种手段突出赵紫阳，就是要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赵紫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旗手，只有他才能给中国带来希望。这不是在大树特树赵紫阳的“新”权威、为赵紫阳独揽大权制造舆论又是什么？

其二，《河殇》讲“新纪元”，给赵紫阳同志搞他的“新秩序”制造了理论依据和舆论气氛。

《河殇》断言，中国之所以长期落后，根本原因是自古以来一直受着一种“封闭、保守”的“黄色文明”的支配。作者进而抹煞新中国与旧中国的根本差别、社会主义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根本差别，把直到八十年代初期的中国描绘成仍然是由“黄色文明”笼罩的“板结”的黄土地，并强调说这种“黄色文明”已“不能教给我们，什么是真正的科学精神”，“什么是真正的民主意识”，走下去只能是“自杀”。与此同时，他们极力美化“蓝色文明”即资本主义文明，说是“资本主义转动着工业革命和自由贸易这两个轮子，开始了伟大的飞跃，开始了科学与民主的双重历史大合唱”，揭开了人类历史的第一个“新纪元”。他们还说，由于“蓝色文明”代表科学与民主，资本主义直到今天仍在“不断调整和更新”。因此，结论很清楚：只有用“蔚蓝色的海洋文明在干涸的黄土地上浇下一片霖雨”，中国才能“获得生机”，跨入“新纪元”。换言之，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走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才是唯一有希望的选择。《河殇》的这一套推导，正好从时髦的“大文化理论”的高度上给赵紫阳搞“新秩序”的现实政治需要以巧妙的支持。

赵紫阳同志担任党的总书记后，并不积极执行中央的方针和决策，而是热衷于顺应所谓“国际进步潮流”去建立他所主张的“新秩序”。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新秩序”呢？在政治上，就是削弱以至取消思想政治工作和政工队伍，淡化党的领导以至“改造”党，把真正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总方针的力量打下去，把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歪曲改革开

放总方针的力量扶植起来；就是不讲马克思主义的指，不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宣扬初级阶段腐败难免论。在经济上，去年9月，陪同西方“极端自由派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会见赵紫阳的一位香港大学教授曾指出，“弗的学说与赵的观念没有什么不同”。赵紫阳自己在一次内部讲话中也直接肯定了“以夷制华”的说法，并且说，不要怕人家说“丧权辱国”。一句话说到底，他要搞的“新秩序”是以西方现代资本主义那一套秩序为主要参照系的“新秩序”。当然，赵紫阳同志知道要在中国建立这种“新秩序”，不仅需要香港报刊讲的“独裁改革”的权力，还必须要有舆论的支持。恰恰是在这一点上，《河殇》的“新纪元”理论帮了他的忙：既然只有“蓝色文明”才能救中国，他那套以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秩序为主要参照系的“新秩序”不正是识时务之举吗？搞“以夷制华”不也就名正言顺了吗？况且，《河殇》是声画结合的电视片，又在黄金时间播出，在制造舆论上有着特殊的效应，其观众覆盖面之大更是一般文艺作品和理论文章所不能相比的，它所制造的舆论气氛不恰是赵紫阳搞“新秩序”所求之不得的吗？

《河殇》的作者利用“新纪元”吹捧赵紫阳，为赵紫阳搞他的“新秩序”制造舆论，赵紫阳同志则利用手中的权力支持《河殇》的传播，压制对《河殇》批评。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基于利益交换关系的互相支持，或者说是利益交换关系把赵紫阳和苏晓康等人紧紧地联在了一起。然而，这种互相支持也反过来说明赵紫阳要搞的“新秩序”不是也不可能是我国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所应有的新秩序。

活生生的事实还说明，孤立地大讲“少管，少介入”只是

一种障眼法，所谓对具体作品“根本不管”更是虚伪的。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和执政党对文艺都不可能完全不加干预，对具体的作品都不可能“根本不管”，区别只在于干预的范围、标准不同，介入的方式、途径不同。事情的关键不在于管得多和少，而在于按什么原则和方向去管。赵紫阳同志口头上讲要“少管、少介入”，对具体作品“根本不管”，实际上做起来则是只许我介入，不许你介入，只许按照纵容、鼓励、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需要去管，不许按照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要求去管。换言之，他大讲“少管，少介入”是用来束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同志的手脚，而让搞自由化的人在文艺领域为所欲为。对赵紫阳讲“少管，少介入”的真实意图，苏晓康们是心领神会的。去年10月，苏晓康在他写的《龙年的悲怆——关于〈河殇〉的札记》中，破口大骂王震等同志对《河殇》的正确批评，胡说什么“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并由此大加发挥地指责说“‘不干涉文学艺术问题’的政策，每每到紧要处便会化为泡影”。他的逻辑显而易见：赵紫阳如此具体地支持《河殇》，把易家言的文章打入冷宫，都不算干涉；只有象王震同志那样批评《河殇》，才算干涉。苏晓康与赵紫阳上下呼应，一唱一和，用他们的行动为所谓“少管，少介入”和对具体作品“根本不管”作了透底的注脚。

最后应当指出，正是因为有了赵紫阳的支持，苏晓康们在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方面越来越肆无忌惮，直到把坚持自由化立场变为策划、煽动动乱的政治行动。今年2月，苏晓康积极参与33人联名上书人大常委和中共中央，要求实行大赦，释放所谓“政治犯”，他和极少数策划者这样做实际上已是在为动乱作准备。到动乱开始后，《河殇》的作者和顾问中

有好几位迫不及待地出来登台表演，苏晓康本人更理所当然地成了煽动和策划动乱的头面人物之一。4月28日，联名发出煽动新闻界支持动乱的致中共上海市委公开信的30人中，有他；5月14日，率先发表逼迫政府要承认整个学潮是“爱国民主运动”、承认非法学生组织为“合法组织”的《我们对今天局势的紧急呼吁》的12人中，有他；5月16日，公开发表否定“4·26社论”、再次要求承认非法学生组织的“合法性”的《5·16声明》的首批签名者中，有他；5月20日，发出叫嚷“绝不向八十年代中国的末代皇帝称臣”的《我们知识界的誓言》的10人中，又有他；国务院发布戒严令之后，与严家其一起发出要求人大常委召开紧急会议“解决当前面临的严重问题”的电报的几个人中，还有他。与此同时，他又是紧张地参与密室策划，又是声嘶力竭地在天安门广场发表煽动演说，又是参与发起成立非法组织“首都知识界联合会”，又是带头参加支持绝食和反对戒严的非法游行，为动乱的不断升级立下了汗马功劳，他那反动的政治野心也随之暴露无遗。从某种意义上讲，整个动乱就是苏晓康们要搞的“新纪元”的一次大曝光，也是赵紫阳为推行他的“新秩序”而和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精英”们互相利用、互相支持所必然酿成的一个恶果。其中，有许多东西是值得人们深思的。

（原载1989年8月14日《光明日报》）

《河殇》与新闻“中立”

陈志昂

1988年,有几个自诩为“中国当代思想界精英”的人,炮制了一部电视系列片《河殇》。这部六集系列片,一方面集中体现了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们的反动政治观点,一方面也集中暴露了新闻界、传播界某些人的错误倾向。《河殇》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可由下列公式来表示:封闭的地理环境 → 狭隘保守的民族性格 → 落后的经济类型,唯一的出路是全盘西化,实行资本主义。

《河殇》第六集,临近结尾的地方,有这样一段妙文:

1986年底至1987年初,突然爆发的全国性的学潮,使上上下下都紧张了一阵。也许现在评价这场学潮还为时过早。然而,在平复学潮的过程中所创立的政治领导同学生直接对话的形式,却正好达到了参与学潮的绝大部分大学生的目的:即政治与决策的透明度。

我们也看到……中国的大众传播媒介,第一次处在较为中立的立场,担当了上层决策者与人民群众之间相互对话的媒介。

这段文字的问题很多,例如:如何评价1986年底至1987年初的学潮?对这个问题,党和政府早已明确指出,这次学

潮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结果，并随即发动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但《河殇》显然不同意这一正确的论断，所以它说“评价这场学潮还为时过早”，暗示它另有见解，实际上就是要肯定学生的闹事。

关于大众传播媒介的那几句话里，至少包含了这样两个观点：1.在我国，“上层决策者”与人民群众是两个对立的社会力量；2.传播媒介应当是中立的，就是说它既不站在党和政府一边，也不站在人民一边，而要不偏不倚地站在两者之间。这些观点是极其荒谬，极其虚伪的。

首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是中国人民的忠实代表，它们与人民之间血肉相连，根本不是互相对立的关系。虽然党和政府经常注意保护人民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而人民中的个人和个别集团则往往只关心自己的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但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终究还是人民的利益，而且是根本的利益。因此，党和政府与人民之间是没有根本利害冲突的。《河殇》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就在于它企图把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分裂开来，在它们之间划上一道鸿沟。在新闻界，关于新闻的党性与人民性，一直存在着两种互相对立的观点，一种是党性与人民性统一的观点，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党性与人民性是水火不相容的，站在党性的立场就意味着脱离人民。《河殇》所表露的，实际上是后一种观点的变种。

说它是变种，就是说它还有点特别的地方。主张“人民性”的人，虽然反对站在党性立场，但却主张站在“人民”一边，并非不偏不倚；而《河殇》却以“中立的立场”相标榜，蒙上一层超然的面纱。但它在这幅面纱下掩盖着的，同样是分裂党与人民的险恶用心，同样是反对无产阶级党性的错误立

场。实际上，在严峻的现实斗争中，超然的中立是根本不存在的，你不是站在这一边就是站在那一边。不过，既然党和政府与人民紧密联结在一起，那么，你不站在党和政府与人民这一边，就只有站到与之对立的一边去了，而这也正是《河殇》的实际立场。我们伟大的祖国，在它的眼里是“一片萎缩了的土地”，社会主义制度，在它看来是一种“衰朽的社会机制”，党和政府，被说成是“特权阶层”，而中国人民，则是一群“逆来顺受的顺民和铤而走险的狂徒”，他们奉行“知足长乐、随遇而安、不冒风险、好死不如赖活等等处世之道”，但是“有时还会爆发出令人难以置信的热昏病”。而西方的资本主义文明，包括帝国主义的海盗行径和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却被吹捧得比天还高，这明明是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立场上，放肆地污蔑党和社会主义，污蔑中国人民，哪里有一点点“中立的立场”？《河殇》所标榜的“中立”，实际上是伪装起来的资产阶级党性。

在不久前的社会动乱期间，《河殇》的编导得意洋洋地对日本广播协会的记者宣称：“《河殇》为学潮作了先导。”这真是不打自招。的确，《河殇》就是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知识界败类为他们制造动乱、颠覆社会主义制度作舆论准备的一个重要步骤。而这一步骤，也确实起到了他们所预期的破坏作用：毒害了相当一部分青年，搅乱了他们的思想，在他们心头播下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火种。在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这位编导还大言不惭地宣称：“《河殇》的影响还刚刚开始。”的确，在后来动乱日益升级，终于演成一场反革命暴乱的过程中，我们都看到了《河殇》的深刻影响。而且，《河殇》的炮制者如苏晓康等人一个个都从幕后走出，登

台表演，或发宣言，或作演讲，或出谋划策，或发号施令。他们的现身说法，最有力地证明了《河殇》与动乱及反革命暴乱之间的关系。我们不应忘记那个严家其，他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河殇》的炮制，但与那些炮制者是一丘之貉，臭味相投。所以他曾针对一位国家领导人对《河殇》的批评，发表了一篇粗鲁无礼的谈话，给《河殇》的炮制者们撑腰打气，说什么“国家是大家的，不是哪一个人的”。现在看来，这句话倒也说得不错，的确，国家不是严家其、金观涛、苏晓康等个人的，而是中国人民的！现在严家其不是公然投靠西方大国，在垄断资本的卵翼下，隔着大西洋向我们遥遥狂吠吗？

《河殇》绝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我们说过，一方面它是知识界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的反动政治观点的集中体现，一方面它又是新闻传播界某些人的错误倾向的集中暴露。这种错误倾向，在两个月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中，暴露得更加突出了。有些人不是公然要“旗帜鲜明地反对‘4·26’社论”，却对赵紫阳同志的“5·4”讲话大肆渲染吗？不是有人说动乱期间“社会秩序好转，交通事故下降”，企图达到否定戒严令的目的吗？不是有人硬是把一些别有用心和不明真相的人堵截军车，致使戒严部队受阻无法前进的僵持场面，美化为“军民一家，鱼水相亲”的情景吗？不是有人为暴乱分子服丧致哀，恹恹惶惶，如丧考妣吗？凡此种种，完全暴露了他们所标榜的“中立性”之虚伪。

某些人所鼓吹的“人民性”，同样是一个虚伪的概念。在动乱期间，新闻单位有些人声言：在这关键的时刻，我们要站在人民一边，他们俨然成了人民利益的代言人。但认真分析可知，他们所谓“站在人民一边”，实际上是背弃人民，站

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一边，是要把党和人民的喉舌，变成反动的宣传工具，这当然是党和人民绝对不能允许的。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中明确指出：“新闻、舆论阵地必须坚持正确的思想政治方向。党的新闻报刊、国家的广播电视和有关出版物，是党和人民的喉舌，必须在党的领导之下，无条件地宣传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我们并不反对新闻的人民性，但是我们认为，无产阶级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因为党和人民是一致的。党性是人民性的集中表现和最高体现。只有站在党性的立场，才能最大限度地站在人民的立场，才能深刻洞察事实的真相，作出客观的、公正的、全面的报道。

《新报》的“新闻中立”论，以及过去一段时间里，新闻舆论阵地出现的一些混乱现象，表明资产阶级新闻思想对一部分人的毒害很深。不少人误以为只有西方新闻媒介的报道才是客观的，这是一种极端无知的表现。其实西方的新闻理论根本不承认有什么客观性。美国人威廉·梅茨说：“与生活有关的一切都会影响我们做出抉择，没有人可以做到完全客观。”（见《怎样写新闻》一书）法国人贝尔纳·瓦耶纳说：“要做到客观性是很困难的，也是自相矛盾的。”（见《当代新闻学》一书）日本人和田洋一也认为：“客观报道本来就是一个矛盾的表现，实际上是不曾存在过的。”（见《新闻学概论》一书）资产阶级常常以诋毁的口气谈到“共产党宣传”，其实他们的新闻报道才是彻头彻尾的“宣传”。以臭名昭著的“美国之音”为例，这家电台隶属于美国新闻署，按前总统尼克松的说法，是“官方政策的发言人”，前总统里根要求“美国之音”“就美国制度对共产主义的优越性向全世界宣传”。至于美国中央情报局

前局长、现任总馆布什利用“美国之音”造谣惑众，在我国煽动暴乱，妄图颠覆我国政府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丑恶表演，更是触目惊心，足以打破人们对西方新闻报道的种种幻想，使人们进而认识到：只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新闻，才能做到党性与客观性的统一，宣传与真实性的统一。我们不害怕讲出事实，因为我们掌握着真理。

（原载1989年8月5日《北京日报》）

《河殇》三问

张永经

电视系列片《河殇》去年两度播出后，确实引起了热烈的争论。疑之者有之，批评者有之，赞扬的更是不少。值得注意的是，它的作者们也在各种座谈会上发言或是以答记者问的方式著文，自吹自擂，把《河殇》捧上了天。今天，让我们回头来看看当时的某些吹捧，特别是评论一下他们的“老王卖瓜”，还是很有意义的。

是“促使人们反思图强”吗？

《河殇》吹捧者们的一个理由就是说它是一部“促使人们反思图强”的作品。他们写道：“《河殇》以前所未有的高度和气魄，十分精辟的本质分析，回溯了我们民族历史的长河。”

用它的作者之一王鲁湘的话说：“《河殇》力图从世界文明史纵向横向的比较上来反省民族的命运，从而给中国提供一种新的世界观。”口气真是够大的了。

当然，如果他们真的能做到这样，那也是中国人民的福气。可惜，我们在《河殇》中看到的最突出印象是，它把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地理、经济、文化以及列祖列宗和现代儿女，都埋怨得无以复加，都骂得一无是处。

曾经抚育了无数中华儿女、孕育了优秀的中国文化的黄河，被说成是地理位置不佳，“已经孕育不了新的文化”。这片土黄色的大陆和肆虐的黄河“不能教给我们什么是真正的科学精神和民主意识”。片名《河殇》，殇，短命夭亡也。作者断言，黄河文明是“失败的文明”，黄河文明，即中华文化，已经夭亡了。

长城，历来是我们民族的象征和骄傲。我们的国歌上也写着激动人心的诗句：“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可是，《河殇》的作者却采取了非唯物史观的态度，对两千多年前的秦始皇加以冷嘲热讽，并断言长城“无法代表强大、进取和荣光。它只代表了封闭、保守、无能的防御和怯懦”。他们甚至责问：“啊，长城，我们为什么还要讴歌你呢？”

关于中国的历史和人民，毛泽东同志早在1939年就写道：“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可是在《河殇》的作者看来，中国的全部历史，包括奴隶、农民革命以及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等，都不“具有什么革命意义”，相反却表现

了“惊人的破坏力和残酷性”。中国没有值得骄傲的历史可言，中国的民族性格只是“阉割世故、听天由命，逆来顺受”以及愚昧、落后、麻木、保守、安贫……等等。这些民族劣根性一直延续到今。

尤其不能容忍的是，《河殇》一笔抹煞或严重歪曲了中国人民百多年来的斗争历史。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二万五千里长征和八年抗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以及四十年来所取得的成就……这些改变了中国人民命运的历史性大事，完全没有进入作者的视野。在洋洋洒洒数万言中，连一两句话也没有提到。相反，新中国成立以来被显著提到的历史只有“颠狂的大跃进年代”和“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仅仅是作者的疏忽，还是根据他们“新的世界观”来审视历史的结果呢？

《河殇》的第五集题名《忧患》，他们也自诩要唤醒中国人民的忧患意识、危机意识。有人甚至说它“体现了最深沉的爱国主义”。把我们亿万儿女生于斯、长于斯、育我、养我、教我的祖国母亲的古往今来描写得漆黑一团，把中华民族贬低到如此低劣、愚昧的民族，把中国人民的真正的爱国主义感情和民族自尊心剥夺得干干净净，读完《河殇》，只能得出中国应该“解散，解体”，“再当300年殖民地”的联想，这是什么样的爱国主义？这又能引起什么样的忧患意识呢？

是“促进中国的思想启蒙”吗？

另一位《河殇》作者苏晓康在一次答记者问中说，《河殇》“是用西方传进来的电视，促进中国的思想启蒙”。他甚至大言不惭地宣称，通过它“能够让中国人民觉醒起来，真正找到

中国的出路。”

按照作者的直言，伟大的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来正确的方针政策，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及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等等，都算不上是思想启蒙。中国人民百多年来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党的十三大论述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以及邓小平提出的到本世纪末和下世纪中叶的战略目标和战略部署等等，也都不是中国的出路。只有《河殇》的作者，在研究和汲取了思想文化界的最新成果之后，才担当了这样的重任，取得了“惊人的突破”。

其实，稍微读读《河殇》，就能发现作者的“突破”，一点也不不是什么新鲜货色。他们鼓吹的“启蒙”和“道路”，也就是他们无限向往的“蔚蓝色”即资本主义文明。中国必须走“全盘西化”的道路，这就是《河殇》的要害和实质。

《河殇》用了大量的篇章和最美好的字句，赞美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地理、人种及其文化。它赞叹“欧洲民族那样生活在地中海周围”、“美国人那样住在两个大洋之间”，从而给他们带来了“蔚蓝色的海洋文明”。它叙述了从“古希腊雅典的民主思想”到“英国贸易促进了自由思想的普及”的历史，从而惊叹着“资本主义转动着工业革命和自由贸易这两个轮子，开始了伟大的飞跃，开始了科学与民主的双重历史大合唱。”因此《河殇》断言：“千年孤独之后的黄河，终于看到了，并且最终要汇入蔚蓝色的大海。”资本主义是何等的美妙啊！至于说资本原始积累的血腥历史，资本主义在自由贸易的幌子下对本国、世界以及中国人民的剥削、压迫、侵略、掠夺和残杀，

资本主义的现存危机，在《河殇》里，统统没有了。既然如此，中国为什么不走这样的道路呢？

可惜的是，资本主义的历史和现实并不像《河殇》描写得那样美好，而且这条道路中国人民也并非没有尝试过。中国的衰弱与贫穷是近二三百年才开始，特别是受到帝国主义侵略后才一步步加深的。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无数的仁人志士都在寻求中国富强之路。有的试图在封建王朝内部进行改革，有的试图建立农民革命政权，有的主张学西方走资本主义道路，有的主张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但一切药方都用过了，都没有奏效。在极其艰难的探索中，中国人民才逐渐认识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中国才有光明的希望，六七十年的实践完全证明了这一点。尽管今天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够完善，需要进行改革和调整，尽管我们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有过这样那样、甚至是很大的缺点和错误，但唯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已经是活生生的现实。

如果说，百多年前中国人民尝试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有点进步意义的话，那么，今天再像《河殇》那样的鼓吹，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

是“高品位的电视精品”吗？

有人说：“《河殇》打破了电视文化是俗文化的论断，把电视片开始推进到精英文化的层次”；有人说：“它是在严肃的创作指导思想下产生的较高品位的作品”；王鲁湘还说过：“无论从文化界思想界对电视参与的广度和深度来看，还是节

目所造成的社会反响来看，应该说迄今为止尚无与《河殇》相匹配的。”

所谓高品位的电视精品，所谓精英文化，至少得有一个先决条件，即它的叙述和论证的严肃性和科学精神。如果是属于社会科学范围，起码也不能违背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学风不够端正，引料不够准确，论证相互矛盾，说不出什么新鲜道理，且又把矛头完全指向了四项原则，像《河殇》那样，能称得起“精英文化”吗？

《河殇》的学风十分不正，易家言同志已经在“《河殇》宣扬了什么？”一文中第10条列举了许多事实加以证明。其实在《河殇》华丽玄妙的词句中，找出它的不正学风，实在比比皆是。

再补充一例。《河殇》反复宣扬了黄河文化即黄河文明造成了中国的长期封闭，这就不是事实。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什么根据说明黄河文化具有长期封闭的劣根性。让我们简单地看看历史。春秋战国文化是一个极盛期，当时风格迥异的文化相互开放，相互交融，形成“百家争鸣”局面，这其实就是一个高度开放的文化模式。汉朝张骞的出使西域，唐朝玄奘的西天取经，元朝的足迹曾达到欧洲，明朝的郑和七下西洋；这期间又有多少亚欧人士来到中国传播外来文化！中国实行封闭政策，认真说只是清朝中叶以后的事。清朝的封闭是由于它制度的腐败和列强的侵略。中国解放初期的封闭是迫于帝国主义的封锁禁运和冷战，是不得已的。所以与其说黄河文化造就了中国的封闭，无宁说黄河文化的深处蕴藏着强大的开放动力。因此，当我们党在10年前提出开放的方针，很快就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势

头越来越大。当前的缺点是开放得还不够，还要更加开放，这是用不着《河殇》来呼唤、来教导的。

至于说到《河殇》电视片的编导艺术，也是没有什么可称道的。就在去年作者自我吹捧之际，也有不少人在报刊上说它“东拉西扯，杂七杂八”，“解说词与画面很不协调，内容与形式经常脱节”。一位香港同胞对《河殇》的画像、旁白及配乐作了分析，他指出“片中在呈示西方生活片时，剪辑了西方广告片的片断；而西方文化则以好莱坞电影作代表，又以《走向未来丛书》配合旁白代表中国人民开始觉醒思考，这些意象搭配都是有问题的。”他又说：“《河殇》经常重复‘蔚蓝色的大海’，以此代表西方文明，并以浊黄不清的黄河代表中国文明……抹煞了中国人民的奋斗历史。”可惜我们的电视界没有及时在广大的普通工人、农民中做点调查，看看占中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他们，究竟有多少人看完了《河殇》并且称赞它。

王鲁湘在大谈电视的“全能文化”和“精英文化”功能之后说：“《河殇》寄托了整个文化精英层对民族命运的关注”。社科院马列主义研究所的张显扬说：“《河殇》的意义不仅是在电视上的，而且在整个思想文化史上都应占有一席之地。”他们当然是以“文化精英层”自居的。如此的“文化精英层”创造了如此的“精英文化”《河殇》，这到底是他们的幸运，还是他们的悲哀呢？

（原载1989年7月31日《北京日报》）

评《河殇》对史实的歪曲

章林文

1988年夏天，六集电视片《河殇》播出后，各报刊争登解说词、连篇累牍地报导、发表评论、组织座谈，吹吹打打，掀起了一股“河殇热”。有的学者把这种现象名之曰：“河殇效应”、“河殇现象”。《河殇》的撰稿人说：《河殇》“是电视界与思想界的一次合作，是中国当代思想界精英通过电视这个媒介传播理论信息的一次尝试。”一位学者狂热地赞颂说：“《河殇》对于我，可以说是自我青少年时代接受马克思主义以来所受到的第二次思想大震撼。”然而，令人费解的是，以“著名史学家金观涛”为顾问、由“中国当代思想界精英”创作的这样一部“精英文化”的代表作，却不断出现引用史实的错误或常识性的错误。现仅举几例说明之。

《河殇》第二集“命运”中说：“由郑和率领的这支船队，……它是一次几乎纯而又纯的政治游行，它要施恩于海外清国，以表达中国皇帝对它们名义上的‘最高宗主权’。多么慷慨温和的君子国行为呵。……太平洋邀请来的中国人，竟是所谓‘正其谊而不谋其利’的谦谦君子。”一篇评论《河殇》的文章中竟说：郑和航海的目的和动机，“只有鬼才知道”；同时，他又认为《河殇》作者对郑和航海目的的分析是“创造性的思

想”。

关于郑和航海目的及有关问题，史学界曾多次进行学术讨论，虽然看法不一，但从未有人认为郑和航海只是“一次几乎纯而又纯的政治游行”。有大量的史实说明，郑和航海也是有其经济目的。在郑和航海活动中，经常进行以奢侈品为主的官方贸易活动。从其后果来看，郑和航海活动重新开辟了东南亚的海上商路，加强了同东南亚的贸易往来。通过航海活动，郑和“富埒王侯”，就连有的百姓也在海外贸易活动中而致富。正如严从简所说：“自永乐改元，遣使四出，招徕海番，贡献毕至，奇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库市，贫民承令博买，或多致富，而国用亦饶矣”（《殊域周咨录》卷9《佛郎机传》）。由此可见，把郑和航海活动说成是“正其谊而不谋其利”，是不符合历史史实的。

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也是《河殇》作者大作文章的历史问题。在第六集“蔚蓝色”中，作者说：“甲午海战失败的最直接的原因，竟是由于一个腐败的承包商在许多炮弹里灌了泥沙。”据说，这种论断是来源于电影《甲午风云》。这犹如从《三国演义》来学习三国史一样可笑。作者在第二集“命运”中又说：“无论是丁汝昌还是邓世昌，他们的悲剧性的失败，其实早在戚继光和郑和的时代就已经注定了。”甲午战争失败的结局，是在几百年以前就已经注定了，这真是耸人听闻的历史结论。这一结论在时间上大概还是留有余地了。按照《河殇》作者的逻辑，中国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的。其原因是，大陆的中国是“黄色文明”，缺乏海洋意识，不是“蔚蓝色文明”。这哪里是在谈“命运”，纯粹是在宣扬宿命论！

在《河殇》第二集“命运”中，作者认为，“整个中国古代

史，几乎就是一部游牧人同农耕人争夺生存空间的历史。”这种论断根本不符合中国古代史的实际。第一，作者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去认识中国古代社会，把阶级斗争歪曲为不同部族为了争夺生活空间的冲突。第二，中国古代各民族间的关系，有矛盾、冲突的一面，但还有依赖、融合的一面。假如没有北方各民族间的融合及文化交流，也就不会出现盛唐时期的高度文明。这是众所周知的历史史实。

《河殇》第五集“忧患”，在靠着“超稳定结构”而起家的金观涛的指点下，对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及近代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斗争进行恶意的攻击和诽谤。他们指责说：“周期性的大动乱，总是一次又一次把生产力的积累无情地摧毁掉。”又说：“这种社会结构的崩坏，并不象有些理论说的那样，具有什么革命的意义。”

为了说明中国人的“愚昧”，《河殇》作者在第三集“灵光”中，任意歪曲史实，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事，把我国近代史上第一位睁眼看世界的林则徐，竟说成是“居然也深信英国兵的腿脚是伸不直的”孤陋寡闻者。他们就是这样以咒骂我们的祖先为荣。

《河殇》作者不仅歪曲中国历史，对世界史也进行肆意胡说。

《河殇》第一集“寻梦”中写道：“有人曾经说过，写印度的历史，一直写到距今四百年前可以不提到一个海字。”这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早在公元前三、四千年前，印度就与两河流域经海上进行贸易活动。公元前四世纪建立的强大的孔雀王朝，就设有主管海军的军事长官。公元一世纪后，印度通过阿拉伯海、红海同罗马就有贸易往来。公元十世纪

后，南印度的朱拉帝国十分强大，海外殖民、经商等活动都是很频繁的。这怎么会得出“当欧洲的海盗出现在印度洋的时候，这个文明就在劫难逃了”的结论呢？

至于常识性的错误，限于篇幅，本文就不一一列举了。

“中国当代思想界精英”为什么会出现上述这样一些史实性的错误呢？

这些“精英”大都不肯老老实实地做学问，他们热衷于演讲、出风头，无暇顾及历史研究。可是，这些人为了表现自己学识的渊博，思想的深沉，又不得不“玩”一下历史。由于对历史的无知，他们只好道听途说、东拼西抄，搬弄一些时髦的名词，按照从西方引进来的各种框框一套，出现上述这些史实错误也就不奇怪了。

无知与狂妄常常是联系在一起的。这些以研究中国文化著称的“精英”，尽管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什么都搞不清楚，但却都成为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河殇》的作者不仅无知，而且狂妄。去年，有人曾对《河殇》歪曲史实进行批评。《河殇》的作者却摆出一副教师爷的架式，训斥人家“不仅对这些古代和中世纪的文化关联茫然无知，且对近代文明的基本动力也做了完全错误的描述。”其实，这些人在大谈古今中外以显示其博学时，往往却暴露出他们知识的贫乏和思想的浅薄。就是在这篇反批评的文章中，《河殇》的作者说：“在中国帮助满清专制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常胜军’首领戈登，在苏丹镇压人民起义时，却命丧刀枪。戈登的命运表明，苏丹原始部落比专制统治造成的‘东亚病夫’更有强大的反抗力。”这种不讲事物的内在联系，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地进行“肤浅的历史对比”，以高超的胡说得出惊人的结论，可以说

是“中国当代思想界精英”制造“精英文化”的特点之一。

过去，人们总是从善良的愿望去理解《河殤》，认为它充满了忧患意识，是为了使中国人民振奋起来。即使有些史实错误，人们也并不计较。然而，事情并不这么简单。

一位电视界人士在论述《河殤》产生的体制环境时一再讲：“千万不要以为《河殤》是中国电视制度的必然产物。”他还说：“在专制型社会”，“精英文化的社会文化前驱作用和对社会文化发展的引导作用大大退化，……甚至退化为狭隘专断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不难看出，这些人就是想以“精英文化”脱离“二为”方针，不做党的宣传工具。金观涛在去年的一次《河殤》座谈会上说：“在知识分子圈子形成了某些‘思想’，然后再影响到大众中间去。人民需要思想。”由此可见，《河殤》作者不惜歪曲史实，以达到宣扬他们的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全盘西化“思想”的目的。一篇评论《河殤》的文章曾就《河殤》对史实的歪曲做了如下辩解：“出于主题需要而对某些历史史料的‘剪裁’。”剪裁是假，歪曲是真。这位以“救世主”自居的金观涛，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在今年北京动乱期间的表演，难道还不令人深思吗？

（原载1989年8月9日《光明日报》）

反思传统文化必须实事求是

——评《河殇》对历史的歪曲

张国祚

编者按：

本文原载吉林大学内部刊物《研究生时代》1988年第4—5期。它批评了《河殇》违实背理、以偏概全的恶劣学风及其宣扬民族虚无主义的错误观点，是一篇摆事实、讲道理、有说服力的好文章。原文较长，本报转载时作了节选，题目是编者加的。

电视政论片《河殇》是“文化热”中涌起的一股激流。它以综合的艺术表现手法而引人注目，它以超然的批判态度面对传统文化而造成较大的反响。

但是，究竟应该怎样反思中国古代文明？究竟应该怎样批判传统文化？《河殇》中的回答是值得商榷的。有鉴于此，本文愿就上述问题以及《河殇》中的若干观点一坦己见。

《河殇》反思了“龙的崇拜”。我们的祖先是崇拜龙神，但是，哪个民族不曾经历过图腾崇拜呢？不管学者们对崇拜龙的历史原因作出怎样的分析和猜测，绝大多数中国人早已不供奉龙神。那形形色色、千姿百态的龙绘、龙雕、龙灯、龙

舞和龙舟等早已变成纯艺术的客体，而不再是顶礼膜拜的对象。因此，把“龙的崇拜”当作反思对象而大加嘲讽，如果不是无的放矢，便是缺乏现实感。

《河殇》认为：在中国文化中有某种宽容恶势力的成分，(1)“中国民族性格中，有圆滑世故、听天由命、逆来顺受的致命弱点；”(2)并认为这种“古老文化心态”根源于对龙的“敬畏和戏弄”。(3)这种观点至少是片面的。难道鲁迅所主张应当缓行的“愤厄泼赖”不见于西方文明，而惟中国文化所独有？难道无数中华英烈“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铮铮铁骨不能代表中华民族的性格，惟有那些“致命弱点”才是中国民族性格的本质？说某些中国人有这种弱点，那完全正确，然而哪个民族中没有软骨头？说这种弱点是中国民族性格的“致命”处，过去讲不通，今天更讲不通，因为“疾恶如仇”、“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早已成为中国人人所推崇的美德。毛泽东在赞扬“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时指出：“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4)《河殇》为什么要置“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于不顾，无视以鲁迅为代表的“全民族的大多数”的“最可宝贵的性格”，而偏偏要把少数人的“致命弱点”冠以“中国民族性格”的全称呢？至于硬把那些“成份”和“弱点”与中国人对龙的“复杂感情”联系起来，更是牵强附会、不伦不类了。

《河殇》认为“长城”“是由历史的命运所铸成的一座巨

大的悲剧纪念碑。它无法代表强大、进取和荣光，它只代表着封闭、保守、无能的防御和怯弱的不出击”⁽⁶⁾。认为它是一个“积淀着一种内向防范型文明的深厚思想沉渣的事物”，⁽⁶⁾甚至对修筑过蓬莱水城的民族英雄戚继光也大加责难：“为什么岛国的倭寇可以渡过海洋来打中国，而中国人只能守在海边，竟然连想也没有想过要去那个岛国看看倭寇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当时欧洲已经拥有火器装备的海军四处侵略，而中国还只知道修筑万里长城？并且竟然把长城修到了海边呢？”⁽⁷⁾

不难发现，《河殇》对长城的反思不仅缺乏现实感，而且其历史感也显得很薄弱。长城作为古老的防御工程，不论是为秦皇汉武所修建，还是为万历明朝所成就，在历史上都曾发挥过积极有效的作用，它为古代中华民族以较少的兵力捍卫漫长的边疆，以抵御北方游牧部落的侵袭，维护中原的社会安定，发展黄河中下游的经济文化都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其浩大的工程确实能体现中华民族设想之宏伟和力量之伟大，它使包括欧洲在内的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的城墙相形见绌，不成比例。对此，从西方文明中走来的旅游者——上至国家元首，下至平民百姓——无不表示惊叹，他们每每在登上长城之后才更加体会到中国无比巨大的潜力。虽然没有人说长城代表“进取和荣光”，但与“封闭、保守、无能的防御和怯弱的不出击”的说法也风马牛不相及。稍懂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战争的双方无论是强者还是弱者都离不开防御与进攻的双重手段，而防御与进攻是对立统一的，“固守为攻”和“以攻为守”都体现着这种辩证的转换。从来没有一个真正的军事家会认为修筑长城是为了只守不攻。

稍懂历史的人都知道，长城虽然是以守为主的军事工程，但它从来没有捆住过中国人“出击”的手脚。秦始皇没有因为修筑长城而压抑自己“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并吞八荒”⁽⁸⁾的雄心；汉武帝没有因为修筑长城而取代“征伐四夷，开地广境，北却匈奴，西逐诸羌……出长城外数千里”⁽⁹⁾的远略；唐太宗没有因为修筑长城而放弃平突厥、统西藏、征朝鲜、败日本、服吐蕃、和印度、封南洋的宏图⁽¹⁰⁾；成吉思汗更没有因为修筑长城而锁住自己远征欧洲、降服中东、兵进印度、攻克缅甸、入侵南洋和讨伐日本的滚滚军旅⁽¹¹⁾；岳飞壮志未酬，不能“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¹²⁾“直抵黄龙府”⁽¹³⁾并非为长城所禁锢，而应当归于腐败无能的南宋皇帝对长城的放弃。不论明王朝重修的长城比最早的长城旧址后退多远，它都不表明当时中国人已经变得封闭、保守、退却、懦弱的不出击。事实上，长城只是一种军事工程，并不等同于边界；把长城称作“华夷天堑”⁽¹⁴⁾，那只是后世文人歌颂长城防御北夷南侵的赞誉之词，并非实指长城是“华夷”的边界，尤其不能把长城理解为华人不能超越的“天堑”。《河殇》的作者见到陕西红石峡长城上“华夷天堑”四个字以后自以为已经“明明白白”⁽¹⁵⁾便尖刻地嘲讽道：“我们的祖先永远无法超越土地和农业。他们最奇伟的想象和最大胆的举动，都只能是修长城！”⁽¹⁶⁾我们不禁要问：《河殇》的作者真的已经“明白”得使他们有资本嘲讽自己的祖先了吗？难道对历史的无知反倒能加强对现实的反思？

应该指出的是，《河殇》有关长城的反思是从黄仁宇先生所著的《万历十五年》一书中抄来的，请看该书《自序》中提出的两个问题：“何以岛国日本可以侵犯中国而中国却不能远征

日本？何以当时的西欧已经用火器改进战术而中国还在修筑万里长城？”(17)遗憾的是《河殇》作者在抄袭过程中把“不能远征日本”改成了“竟然连想也没有想过要去那个岛国看看”，把“还在修筑万里长城”改成了“还只知道修筑万里长城”。如果说一字之差，谬以千里，那么“二词之别”当谬以几何？结果把两个本来发人深思的历史课题变成了两个无知的反问。

不可否认，万历年间握有实权的大学士张居正基于朝廷内部矛盾，难于实施主动出兵征讨的战略计划，所以曾指示戚继光：“贼不得入，即为上功。蓟门无事，则足下之事已毕。”(18)这个指示确实出击不提、保守有加。然而当时中国人并非因为修了长城便皆无主动出击之高见。负有防御京畿重任的蓟辽保定总督谭纶就曾“主张和蓄力量，作大规模的主动出击，以彻底消灭蒙古人的攻击力量。”(19)另一位抗倭名将俞大猷明确主张“以有效的战船和火炮歼灭倭寇于海上，根本不让他们有登陆的机会。”(20)并以自己实战经验得出海战原则：“海上之战无他术，大船胜小船，大铳胜小铳，多船胜寡船，多铳胜寡铳而已。”(21)戚继光修筑长城，“归根到底仍当由时的供应制度所迫致。假使没有这种情况，而戚继光有选择的自由，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采取攻势，创造流动性的战术。他在留下的诗文中曾再三表示过这种愿望。”(22)有什么证据能表明戚继光“连想都没想过”主动出击呢？而且当时中国并非“只知道修筑万里长城”，伴随手工业的发展，火器兵工业和战船制造业已具备相当规模和水平，例如：在火器方面有“雷火车”、“全胜车”、“小佛郎机”、“流星炮”、“钢铁神枪”、“三眼品字铁铳”、“飞火炮”、装两尊火炮的双轮战车，重千斤以上的佛郎机大炮、快炮、鸟嘴铳、百出先

锋炮、夹靶铁手枪、天敌手铳、千里铳、毒火飞炮、地雷连炮、地雷炸营自犯炮、万弹地雷炮等；在战船方面，当时已经能制造装有火炮的蜈蚣船和鹰船，福建所造的头号船尖底阔面，中部高四层，下层置土石方，次层充寝室，可容百人，三层为淡水柜、厨房等，四层为平台，头尾高昂，舵楼三层，外设护板，中置大炮，坚实能耐风浪；广东船还用铁木制，能冲毁敌船。(23)戚继光在领导抗倭斗争中虽然没有放弃对传统武器的使用，“但如果认为他不了解火器的功效，那是不符合实际的。他在实战中运用过火器，和将领讲解火器的利弊，并在奏折中提到了火器的重要性。”(24)上面这些“明明白白”的史实可惜被《河殇》作者忽略了，于是才有戚继光“只知道修筑万里长城”那荒谬的解说词。

《河殇》作者一方面认为长城的“庞大和悠久”“把自诩自大和自欺深深地烙在我们民族的心灵上。”(25)另一方面，对精美的中国古代建筑工艺也进行不无挖苦的评点；被西方文明视若人类艺术瑰宝的故宫杰作在《河殇》作者的笔下不过是“玲珑却小气，虽精巧却程式化的摆设。艺术上的小题大作、过份雕琢，预示着民族创造力的衰颓。”(26)简言之，中国文明从大到小，无巨无细都“已经无可挽回地衰落了、崩溃了。”(27)也许只有洛阳龙门石窟中的“举世无双的卢舍那”是个例外，因为“据专家们考证，它的那只鼻子是典型的古希腊雕法。”(28)假如没有这“古希腊雕法”的“异曲同工”，看来中国文明只好打“零”分了。

中国文明中确有一些糟粕，确实应该反思，但是，这种反思既不应该也没有必要在使中国人自豪、使外国人称美的“长城”和“故宫”等远离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古迹上泼撒自轻自

贱的污水。“反思”应该实事求是、尊重历史，切不可为了标新立异而故弄玄虚、哗众取宠。至于由反思“龙的崇拜”推论到应该批判“寻根”思想，更不知对当代中国的和平统一有何裨益。如从实事求是的原则出发，中国文明中需要反思的事物太多了，但绝不是“龙”、“长城”和“故宫”。古代中国先进的文明绝不代表现代中国文明的先进；同样，现代中国文明的落后，也绝不意味着古代中国文明的落后。如果为了反思今日中国之文明而肆意贬损古代中国之文明，那与其说是“最彻底、最深刻的文化反思”⁽²⁹⁾，不如说是“最彻底、最深刻的历史歪曲。”

《河殇》作者标榜自己为“和人民一起思想”的“思想家”，标榜“从人类文明史的宏观角度来透视华夏文明的历史命运”⁽³⁰⁾、“用双肩把忧患的重担挑起来”⁽³¹⁾，以期“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和昌盛的新起点。”⁽³²⁾然而，他们的这种“忧患”只能使人或者永远直不起腰来，或者弃之而逃避。

我们的祖先曾经是人类最卓越的代表；我们的文化曾经是人類最优秀的创造。中国人有充分的理由为我们的祖先和文化而自豪。中国人早已承认近代以来自己的落后，永远不会忘记帝国主义的炮舰和屠刀给我们带来的耻辱和灾难。在改革与开放已经形成大趋势的今天，绝大多数中国人在“思想”什么？是现实，还是历史？是自信，还是自卑？是民族的繁荣昌盛，还是什么别的？真正的思想家应该是求实、稳健、针对时弊而不失自信的忧患与研讨。

注释：

(1) 《河殇》第12页，现代出版社，1988年9月版

- (2)(3)《河殇》第12、13页
- (4)《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658页
- (5)(6)(7)《河殇》第35页、第4页、第84页
- (8)贾谊《过秦论》
- (9)《后汉书》《西羌传》
- (10)参见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第402—419页
- (11)《简明中国通史》第567—569页
- (12)岳飞：《满江红》
- (13)《宋史纪事本末》《岳飞恢复中原》
- (14)(15)(16)《河殇》第36页
- (17)(美)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页
- (18)《张居正书牍》第五卷第19页
- (19)(20)《万历十五年》第190页、第178页
- (21)《正气堂集》第8卷第13页
- (22)《皇明经世文编》第347卷第19页，转引《万历十五年》第191页
- (23)参见《简明中国通史》第653、654页
- (24)《万历十五年》第178页
- (25)(26)(27)(28)《河殇》第35页、第54页、第5页、第4页
- (29)参见纽约《中报》8月25日社论：《黄河文明的挽歌唱出了中国的希望》
- (30)(31)(32)《河殇》第425页、第5页、第38页、第92页
- (原载1989年9月11日《光明日报》)

从《河殇》论大陆西化派

郭 仲

近几年来，中国大陆知识界掀起了一股对历史发展反思的热潮，最为异军突起的是一群以唯心论史观批判中国历史发展及思考中国未来走向的西化派，《河殇》的作者群可以说是典型，因其以电视节目制作来进行反思而轰动一时。本文虽针对《河殇》原著进行批判，其中主要论点也可视为对大陆一般西化派的总批判。

(一)有关中国近代史发展轨迹的问题

中国曾经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当中国在本世纪初脱离了数千年封建王朝的支配时，世界已经处在资本帝国主义宰割下的状态中。中国社会无法在足够的、自力的资本积累条件下由资本主义来顺利接替封建经济体制。中国的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强势干扰压榨下无力获取正常发展的机会。传统土地资本难于顺利转化成现代工商资本，唯有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特异性格。

一个先进的农业文明，不至于对后进的另一农业社会产生经济的抑制作用。但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其生产力达到一定水平后，对后进地区的资本主义是铁定发生强力的压迫和抑制作用。这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自发膨胀性和侵

他性的特质所致。因此《河殇》文中多处强调中国的内陆农业文明妨碍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萌芽和成长，并不完全正确。以农立国的封建王朝刻意维持一种鄙视工商业活动的政策和文化理念是常见的现象。即使在欧洲，在中世纪封建时期也莫不如此。教会法甚至以收受利息为罪恶。但中世纪文化，轻视工商业，并没有真正抑制了欧洲的前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的进行。经济是具有自力发展的机制的。最后还是克服了传统文化的束缚而逐渐茁壮。即使是十三、十四世纪意大利半岛上的商业城邦，虽然在海外贸易和远地商业方面盛极一时，但其银行作业还是偷钻教会法的间隙，饱受一般民众的诅咒而成长起来。

中国农业文明因其成熟的程序性和稳定性，当它变成历史包袱时，阻碍作用也比欧陆封建更大。这虽然也是事实，但中国文明也有其相对合理主义的一面（曾使近世欧洲启蒙时代的知识人倾倒），且少有持续性的宗教狂热的压抑。中国封建阶级的闭塞性也不如欧洲血统主义的严密。相比之下宁可说是半开放性的阶级制度。所以中国资本主义未发达的理由，与其说是为传统文化观念所累，不如说是起步稍晚而遇到了帝国主义世纪。像日本，其传统中的中国因素是主要成分，封建锁国的历史又无异于中国，只因起步于前世纪70年代，彼时欧洲列强尚未进入经济的帝国主义阶段，维新后的日本趁着宝贵的三十年时间急速地资本主义化了。

（二）对资本主义发展史的认识问题

《河殇》主题急欲突破封建传统意识形态，对资本主义的高生产力高效率表现出欣羡，有意无意美化理想化了资本主义，全篇不曾出现资本主义批判的文字。有人说《河殇》创作

的目的在于封建意识批判而不是资本主义批判。然而，突破旧传统的束缚“走向海洋”后，这个海洋目前无疑是资本主义占优势的商品经济的大海，则资本主义批判也应该是全篇结构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否则，被我们视为可成为中国经济现代化契机的资本主义“积极要素”，将会与其“消极要素”紧密结合在一起，不分优劣地流进中国。只向往资本主义光明的一面而无视其黑暗的一面，是盲动兼被动，恐怕将使改革的未来充满新的危机。

具体而言，不能因强调传统之短而对资本主义表示无条件的崇尚。不要忘记资本主义的发达史同时也是资本主义残酷史。他的发达是在残酷的营运上面构筑出来的。它的“残酷”，不止于是伦理的罪，同时也是科学的恶。虽然一时积累了财富，但也建立了一种破坏未来的系统。

古老沉滞的农业文明，不能一味羡慕资本主义的高生产力、高效率，而一厢情愿、企图透过学习而赶上。后进的资本主义永远赶不上先进资本主义。这就是资本主义的铁则。除非采取另一种体制，建立主动的平行互利关系，这样才能取其长而不蒙其害。文中所谓：“中国要走向世界，也要让世界走进中国”。交流当然是双向的，但强势资本主义国家惯于挟其实力地位，进行名为公平、实际不公平的交换。所谓的“世界商品经济的大海”，看似能提供一些处方来医治低效率计划经济的诸种宿疾，但我们也不要忘记，商品经济的合理基础在于等价原则，和供需关系的自动调整。然而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万般商品的等价原则植基于劳资间的不等价交换。而供需关系在独占资本的政治性运作下，那一双灵敏的“看不见的手”早已萎化，此时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体系能带

给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补足条件”，除了部分剩余资本与二手技术外，就是私利动机的重新肯定。

当然，即使如此，学习与交流的意义还是相当大的。毕竟西欧资本主义在不同于中国的历史条件下，有过他们的辉煌的实践成果，构成了世界文明中的一股主流。中国虽在走自己的路但绝不可能是孤独的路。资本主义的成就已经是世界文明中的公产，有些是必需的传承因素。只是中国要有正确的接纳办法，积极但理智地去面向“大海”。

(三)对中国式社会主义的认识问题

中国以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走上社会主义的路，是否错误的历史选择呢？《河殇》全篇不曾出现正面肯定的措词。它只强调改革的内容是科学与民主的“导入”，且这种新的价值原则是经由资产阶级革命成功而确立的。似乎表示中国没有发展资本主义所以缺少科学与民主，社会主义的中国因而也缺少科学与民主。虽然《河殇》高唱科学与民主，却对民主与科学不曾做出应有的诠释，不能不说是一种轻率。其实，科学与民主不是具有固定内容的价值实体，而是不断进步的过程。如果用抽象意义来表达，科学是实事求是，民主是尊重群体中的每一位成员。至于它的具体内容，是同时具有阶段性中的“突破性”和“限制性”的。当资产阶级欲突破封建体制的桎梏时，的确是以科学与民主做为对抗中世纪的神权与王权的精神势力和阶梯式的身份制度的。但如此的“突破性”却在革命胜利掌握了政权之日，变成了新的“限制性”了。为了确保其生产关系中和统治关系中的优越地位，科学在资产阶级手中分裂为“自然科学”的“唯物论”和“人文科学”的“唯心论”。而民主也只止于“形式民主”而不及

于“实质民主”。甚至以形式民主来掩盖实质的不民主，以政治的民主外衣来保护经济的不民主实态。

中国之所以不曾选择资本主义的路，并非纯主观的意识所决定，而是有其客观必然的理由。如果资本主义的路的确“走得通”，任何力量都阻止不了它。像中国这样的落后社会，生产力水平低，在群体生存的急迫需要下如想摆脱任人宰割的困境，唯有把有限的社会资源——包括人力、物力所构成的生产力，从旧生产关系的羁绊下解放，统筹集中加以重点式的运用，用到突破长期困境、促动社会命脉最直接的方面去。生产要素的集中利用是社会力的凝结与发挥的基础，是经济发展和政治巩固的前提条件。在资本主义体制下，资本家通过剥削机制累积和集中资本，那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凭据。然而在落后社会，资本主义已失去了发展潜能，资本积累因外在帝国主义的啜吸而停滞。中国如欲摆脱困境，唯有在社会化的所有制下做计划性集中运用，实现资本主义所有制下无法完成的划时代任务。《河殇》中似乎太强调农业文明与传统心理的惰性，把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阶段也因部分心理旧态未能从国家生活中清除，而将其列入旧文化阶段的范畴中，忽视了发生在政经结构中的革命性变革。

其实，中国的广大工农群众的阶级自觉，在革命过程中曾经呈现出极其显著的变化。由“听天由命”的消极心态到“自我解放”的强烈欲求，汇聚而成为一波又一波的巨大群众运动的热源，而党只是运动的组织者。虽然党的领导几次发生了误导，然而制度的根本性格和大方向总是在社会主义原则下——被策定建立。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经济结构到社会主义经济结构，社会基础的巨变既已实现，即使还拖着封建文

化的某些残渣，也不应该混淆社会本质的历史评估。但《河殇》的作者群却从文化挂帅的、近乎观念论的立场，视文化批判为社会批判的唯一内容。这就是《河殇》矮化了唯物史观的进步观。

不可否认，中国的社会主义至今还停留在它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应有内涵在文化领域中还没有完全占取优势。在改革阶段中显见的问题之一，是公有制下干部的官僚特权主义和群众的自私投机主义。前此几个阶段中，党的领导发生了错误，政策性、技术性错误都有。

真正严重的是，公有制下的个人主义能以公有制为其庇护和掩盖，从内部日渐腐蚀公有制。个人主义其实是几千年旧时代的残留意识，此时在公有制下取得了新的表现形态而已，却宛如公有制的必然产物。相比之下，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下的个人主义，因为没有这一层庇护，唯有在个人责任下追求个人利益，讲究效率，发挥潜力，追求最大效果，且能建立一定范围的社会协作和安全保障。这些都是私有制下个人主义经济行为的长处。这些长处难免使一部分不满公有制下的官僚主义和计划经济下的低效率的知识分子，对其油然而生憧憬心理。

于是有人提倡修改公有制、回复某种私有制，甚至主张全面接受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政经制度。但这些当代的“西化论”者昧于如下的几点事实：（一）公有制下仍然滋长个人主义，除了旧时代残留意识外，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尚未达到在个人消费生活方面充分落实公有制的优越性的地步。但建国40年以来，公有制确在原本落后贫穷的中国建立起民族近代史上空前强大的自卫力，实现了相当规

模的重工业基础和基本建设，十亿人口的生存权的基本保障……等。这些无疑都是新生产关系下的现实成果。只是因为生产力的起点太低，这种成就的代价全得由人民消费生活中的牺牲来承担。但如无公有制下的社会资源的高度集中，这些成果是绝无可能经由资本主义营运路线得到的。（二）诚然，改革前的计划经济也累积了如下的缺陷：（1）中央计划机关在计划中难于全面涵盖国民经济中的所有部门的实况；（2）计划经济在管理上被委之于行政干部之手，易于酿成官僚化弊端并无法保持应有的机动性；（3）人为计划总是无法完全克服主观片面性；（4）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要之间常有失衡状态。以上这些缺陷，主要属于技术方面的多。但再加上来自政策偏差所造成的生产三部门——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比例失衡，亦是国民生活的消费水平不易随着生产力的提升而提高的原因。不过无论如何，厚植生产的基本架构，才是提高未来消费水平的保障。中国社会主义的产业结构既已建成，纵然在一定范围内还可以配置辅助性生产力，在个体消费和产业方面以满足人民的日常需求，且因而有限调整所有制方式，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主导性，确是未来唯一发展基础，是不容置疑的。

至于“西化论”者所向往的世界资本主义文化，也确已走进了它的衰退期。独占阶段的资本主义已无可避免地呈现出种种征候。《河殇》文中大力强调的“科学”与“民主”的“资本主义价值原则”，早已显出空洞化和虚伪化的症状。独占资本主义已丧失了自由竞争时期的自发的合理主义，形成了类似于封建专制的另一种封闭系统。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原有的优点，如在竞争原理下劳动生产性的提高和产品的成本品质

流通方面的效率化等，虽也可以使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有所借镜，但它的终究是“私利”而非“共利”的损益计算立场，和由此而来的生产无政府，确已使其走上了破坏未来的不归路。一切人性价值都被侏儒化，甚至动物化。人生的目的是什么？生产和效率的终极目的在哪里？人间还有理想的存在余地否？这些似乎都成为没有答案的感喟。在资本增值的最高原则统辖之下，一切都变成了灰色的量化世界。

那么，社会主义的文化内涵又是什么，那是人与人冲突性的扬弃。非强制性的，自然化了的，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自由发展的文化。资本也好，生产也好，都是真正的为了人，而不是人为了资本、为了生产。这样的社会主义文化才是真正蔚蓝色的，充满希望、机会、幸福的、万流汇聚的大海。

只是通往“蔚蓝”的路不是平坦的。数千年封建、半封建半殖民地形态的沉重包袱，的确是改革的重大障碍。但中国人并没有找错了路。只是路上的崎岖艰难，一时超过了预想。为了不停向前走，该丢弃的不应留恋，该珍惜的也要坚持贯彻，取舍去就之间，同时顾及原则与手段。社会主义的、已行扬弃了阶级局限性的科学与民主，是未来崭新文化的两大支柱，却唯有在社会主义的政经制度的稳步发展中逐渐具形和成长，而不是在以个人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学习运动中所能获得。就这一点而言，《河殇》的启发力不能不说是严重的不足。

一种制度，只要是多数人企求进步的社会理性的结果，经过了社会实践的验证，将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存在。那是超越个人主观评价的规范力量，具有正作用，却也必兼有副作

用。因为实践的历史局限和社会构成的一定复杂性所产生的问题,是任何时代的制度结构都将难免的。若在中发展副作用克制了正作用,那是“异变”的时刻。若正作用一直克服着副作用,那是正常的扬弃过程。能兼顾两方面的辩证互动,才是批评的要旨。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公有生产手段的利弊,在特定的历史社会条件下可能有多面表象,但其本质意义是确定的。由动物本能的原基形态到社会理性的发展形态,小阶段中或有曲折浮沉,大阶段是不可逆行的。否则,做为宇宙存在的一支的人类社会,它的进步观也就无由谈起了。

(此文原载于1989年7月出版的台湾《远望》杂志总第21期,本报略有删节)

(原载1989年9月1日《人民日报》)

《河殇》唯心主义历史观剖析

——首都部分史学工作者批判《河殇》纪要

(东月 刘军 整理)

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史学理论》、《中国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和《世界历史》等五家杂志编辑部,在北京邀请部分史学工作者对《河殇》进行了专题批判。与会

者指出,《河殇》这部“电视政论片”是披着“学术文化片”的外衣,通过所谓“对民族历史、文明、命运的全面思考”,“呼唤全民族忧患意识”,来宣扬他们反动的政治主张的。这是《河殇》得以欺骗、蛊惑人心的地方,也是《河殇》的编导者们最为得意之处。因此,要消除《河殇》恶劣的社会影响,除了必须从政治上继续对《河殇》进行深入的揭露和批判外,还必须剥下它的学术理论外衣,彻底暴露其伪科学的本质。鉴于这种认识,与会学者从《河殇》的理论来源、历史观、方法论和学风等方面作了初步的剖析。

一、《河殇》的思想理论来源

《河殇》的一位支持者曾说,如果硬是给《河殇》一个类型定名,我倒觉得它应该叫“学术文化片”。“为什么说它是学术文化片?因为就其整体的性质来说是学术性的,虽然它不是理论著作,但却有它的理论模式、有它的学术见解、更具有理性的思辨的特征。”《河殇》具有什么“理论模式”和“学术见解”呢?总撰稿人苏晓康列举了十三种。其中有: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点,黑格尔关于自然地理是历史的基础的观点,汤因比关于文明自身机制的观点,乔·韦尔斯在《世界史纲》中关于中国历史的论述,弗朗西斯·培根关于中国四大发明的论述,黄仁宇关于中国古代没有典型的私有制的论证,普列汉诺夫关于商品经济阶段不可超越的思想,金观涛的“超稳定结构说”等。在此之后,他作了一段概括:“这里面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有作为马克思主义来源的西方文化精髓,有当代西方著名学者和海外中国研究学者的思想,有当代中国学者研究成果,无论是大师正宗,还是新人新论,我们都视为一家之言,融汇杂糅在一起,熔铸成我们所要

呼喊的一个时代强音”。这段话可以视为《河殇》编导者们立论的指导思想，而他所阐述的指导思想恰恰是极其错误的。

首先，所谓“无论大师正宗，还是新人新论，我们都视为一家之言，融汇杂糅在一起”。这在表面上看来似乎既平等，又公允，实际上却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把“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贬为一家之言，甚至连“一家之言”也未予承认。通观《河殇》，可以清楚地看到，编导者们在前后六集中大谈历史发展、文明嬗变，却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等一系列重大科学原理只字未提。更有甚者，连人类社会由无阶级的原始社会步入阶级社会，阶级社会又有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等基本原埋都被一笔抹煞。即使在片中偶而提到几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不是曲解，便是嘲弄。譬如，把马克思和恩格斯“著名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观点”武断地曲解为仅仅是“同水有关系”。又譬如，嘲笑马克思说他“早已预言的资本主义丧钟，迟迟没有敲响”；嘲笑列宁没有能够回答普列汉诺夫的“挑战”。由此可见，《河殇》的倾向非常明显，那就是他们依仗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要传播的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而主要是西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

再回过头来看看《河殇》是怎样对待西方学者和其他外国学者的思想理论的。《河殇》引述了许多西方学者的观点，诸如前面提到的黑格尔、汤因比、韦尔斯、培根等，还提到了普列汉诺夫。按照常理，要引用某一种思想，首先对它要有正确的理解，然后才能谈到正确运用。可是《河殇》的编导者们却不是这样做。譬如，《河殇》解说词第一集《寻梦》里有一段话：“环境越困难，刺激文明生长的积极力量就越强烈，

这是西方史学界的一个著名观点。”这个观点指的是汤因比的“挑战与应战”说。可是汤因比原意并不是说环境越困难，就越容易引起应战。因为过于恶劣的环境超过当时人类的适应能力，不仅会使人类无法应战，而且可能把人类压垮。因此，汤因比认为，文明产生于一种既不太好、又不太坏的适度环境。尤其是在古代世界，由于人们改造自然能力较弱，海洋还是难于制服的困难环境。这种对于强大的挑战环境不可能成为人类成功应战的地方，还不足以创造出先进的“蔚蓝色文明”。可是《河殇》的编导者们却随心所欲地改铸汤因比的观点，并牵强附会地将与“持续不断的航海生活”并无密切联系的苏美尔文明、乃至希腊文明的兴起都同海洋联系起来，以此来否定“黄肤色的民族”在黄水、黄土上创造的“黄色文明”。

又譬如，《河殇》把原本不属于普列汉诺夫的“经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能不能跳越商品经济发展阶段而获得成功”的思想强加到普列汉诺夫头上，说这是他划出的巨大问号。其实，普列汉诺夫只是在十月革命前认为俄国无产阶级占人口总数比重很小，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因而反对十月革命，但他从未考虑也根本没有可能考虑过社会主义国家的商品经济发展问题，因为他于1918年5月便逝世了。《河殇》这样做，不仅是出于无知，更重要的是为了贬低列宁，嘲笑列宁无法回答普列汉诺夫的挑战，然而，历史事实恰恰与此相反，敏锐地提出在资本主义相对不发达的俄国如何利用商品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的正是列宁。也就是说，这个巨大的问号是列宁划出来的。

再譬如，《河殇》关于黄河决定中华民族历史和命运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基本上是沿袭了黑格尔《历史哲学》中有关

《历史的地理基础》一章中的内容。黑格尔从欧洲中心论的立场出发，大谈地理环境的差别及其决定性作用，硬说中国自古没有同海发生密切关系，没有分享海洋所赋予的进步文明，从而养成了闭关自守的落后习性。这种不符历史实际的思想观点，连西方一些学者都不赞同。联邦德国学者弗兰克就曾指出，黑格尔对中国历史和文明所采取的傲慢与蔑视的态度，是十九世纪欧洲人的殖民扩张主义在精神生活领域的典型表现。而《河殇》的编导者们却对黑格尔哲学的精华，即那恢宏而深刻的有关历史过程的辩证思想视而不见，偏偏看中了黑格尔思想中的这点糟粕，作为《河殇》的理论基石之一。

还有，《河殇》关于文明兴衰、“黄色文明”没有生命力的陈腐观点，是直接来自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汤因比把被称作“文明”的文化形态整体作为历史研究的单位，声称世界上存在过21种“文明”（后又增至26种），其中多数业已死亡，有的正在衰朽，只有西方基督教文明是“唯一仅存的、尚未明显解体的文明”，保持着“创造性活力”。且不说汤因比精心构筑的这个庞大的历史哲学体系是何等主观随意，如今在西方已经没有多大影响，这里单说汤因比对中国文明的错误看法。的确，他在《历史研究》中，是把中国古代文明归入已经死亡的“文明”之列。可是后来他放弃了这个观点。他在1974年发表的《展望二十一世纪》一书中，不再把中国文明视作封闭的文明，而认为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已培育出一种值得称赞的“世界精神”。他甚至预言，由于中国具有优秀的历史遗产，在未来不可避免的人类统一过程中，中国将发挥主导作用。然而，《河殇》至今仍在拚命维护汤因比早已抛弃的旧观点。倘若汤因比地下有知，一定要向《河殇》的编导者提

出抗议的。

西方思想中这些支离破碎的理论观点，似乎还不足以表达《河殇》的主题。于是，编导者们又搬出据说是其顾问、所谓“著名史学家”金观涛独创的“超稳定结构”理论，作为主要的理论支柱。可是，这也不是什么独创，也是从西方学者那里贩运来的。只要把《河殇》中的关于“这个神秘的超稳定结构”的论述和意大利学者翁贝托·梅洛蒂在《马克思与第三世界》中的一些观点稍加对照，就可以发现，两者不仅在思想上一脉相承，甚至在文字表述上也惊人的相似。

这里应该指出，对于西方的思想理论，我们并不是简单地一概排斥和否定。对于其中一切合理的成分，对于真正的西方文化精髓，我们是应该吸取的。马克思主义诞生和发展的历史一再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像《河殇》那样不分青红皂白，统统“视为一家之旨，融汇杂糅在一起”是绝对错误的。

二、《河殇》的历史观和方法论

与会者认为，《河殇》并无完整、系统的历史观。它所反映的历史观念非常庞杂，是唯心史观和庸俗唯物史观的混合物。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

关于历史发展的基础，《河殇》宣扬了一种宿命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即所谓“地理环境对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华文化形成了一种隔绝机制”，铸就了一种内向的、求稳定的、闭关自守的文化类型，从而注定这种文化必定要衰落的观点；以及所谓在地中海兴盛起来的欧洲海洋文明，从一开始就具有开拓、进取和扩张的特性，从而注定它要在现实和未来中取得优胜地位的观点。

这种宿命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是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的，也同历史事实不相符合。世界上不同文明的兴衰，用地理环境濒临海洋或深处内陆为因是无法解释的。譬如，古代希腊大陆的南部、中部和北部，为数众多的城邦航海业并不发达，斯巴达尤为典型。但是，却创造了举世闻名的希腊文明，而且它与“现代西方工业文明”之间的漫长时间里，航海业亦不甚发达，或者说也是与海无缘。至于西欧一些国家的殖民扩张和商业活动，既有深刻的经济和社会原因，也由于有人类长期积累的科学知识和相应的物质保证，绝不是因为它们仅仅濒临海洋所致。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发生、发展和演变，是全人类经济、政治、文化相互作用的结果，是—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历史上从来不存在由地理环境决定的永恒的“蓝色文明”。

关于历史发展的形式，《河殇》宣扬的是形而上学的“超稳定结构”的历史循环论，声称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实中，存在着“主宰”一切的“神秘的超稳定结构”，至今，“衰朽的社会机制”仍无力“去冲破那周而复始的历史循环”。

其实，“超稳定结构”这个概念本身并不神秘，它最初是艾什比在其所著《控制论》一书的“导论”中提到的一个非主要概念。它原是在进行“大脑设计”中描述被用来模拟那些结构复杂而又能自动保持稳定的一种“内稳定器”的特性。《河殇》编者辗转相抄，将这种对于人的大脑设计和智能机器模拟过程中一种尚待证明的假设，当作已经得到确认的科学真理；把这种只能适用于具体的特殊的研究领域的概念，当作有广泛意义的规律；把这种属于自然科学和技术领域的知识，毫无限制地推衍到社会历史领域和现实生活中。

把“超稳定结构”概念引进社会历史领域是否恰当，大有

研究的余地。因为“超稳定结构”的前提是自稳性结构，但社会是否有这个结构还需要进行科学论证。这是由于社会活动是由众多具有不同意向的人的活动所构成，历史的必然又常常是以偶然来表现的。历史有相似之处，但不会重复。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不可能是一个自稳性机制，因而也就不可能存在“超稳定结构”。而《河殇》的编导者们却度信这种“超稳定结构”论，并借此鼓吹历史循环论。这种历史观使得他们无视近代以来、甚至建国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似乎中国只有向资本主义发展才是变化，才能冲出社会“超稳定结构”的“怪圈”。

关于历史发展的阶段，《河殇》坚持一种包括庸俗生产力论在内的机械唯物主义论点。编导者们尽管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格格不入，但是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有时却也打出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如援引普列汉诺夫与列宁的争论就是一个例子。

《河殇》强调，普列汉诺夫“坚持马克思关于历史不能跳越其必要发展阶段的思想，不主张过早夺取政权。”这实际上在当时是反对列宁发动十月革命。普列汉诺夫对俄国社会形势的错误分析早已为历史的实践所证明。他之所以错误，是因为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字句，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俄国的实际结合起来；更不能像列宁那样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分析俄国的实际，看到俄国虽然是一个中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是正因为如此，俄国国内各种矛盾才特别尖锐，再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有利形势，使俄国成为帝国主义链条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具备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同时，俄国革命的主观条件（如无产

阶级及其新型革命政党、工农联盟)也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客观条件的不足。

十月革命的胜利，雄辩地证明了列宁是一个富于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曾经是杰出马克思主义者的普列汉诺夫，在十月革命问题上不过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本本主义者，或者如列宁所说的一个“时代落伍者”。而《河殇》的编导者们却借助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的僵化认识，在历史发展阶段上宣扬了庸俗的生产力论和机械唯物论。

关于历史发展的动力，《河殇》宣扬的是外力推动论。《河殇》根本否认中华民族及其文明具备推动历史前进的内在动力，认为在“西方工业文明”的挑战下，古老的中国文明已经无可挽回地衰落和崩溃了，再也无法产生一种文化的更新机制，只有像黄河汇入大海那样，让“蔚蓝色文明”的风细雨滋润干涸、板结的黄土地。对中国“黄色文明”，并对中华民族和文化如此缺乏乃至丧失起码自信心的心态，是当前社会上一种非理性思潮的典型反映。这种思潮一般表现为，对社会文明不愿付出艰苦努力，却要急于享受人类文明成果的狂躁情绪，从不考虑向社会贡献些什么，而是一味地凭主观需要向社会索取，一旦不能得到满足，就怨天尤人，崇洋媚外。

三、河殇的学风

与会者一致指出：任何著作的理论、观点和方法都与作者的学风有关，都是这种或那种学风的外在表现。《河殇》所反映的是一种狂躁、浅薄、华而不实的学风。它突出地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以青年的代言人和民族的启蒙者自居，恣意地“诘问”历史，蛮横地指斥现实，好像唯有《河殇》的编导者们是当

今大智大睿和最清醒的人。这无疑是一种情绪狂躁和知识浅薄的自然流露，是缺乏正确历史观指导的具体表现。每一代人都有权利去研究历史、说明历史，并从对于历史的认识中取得教益，但他们永远无权去拷问历史、鞭答历史，因为从来只有人们受到历史的审判，而不是人们去审判历史。

《河殇》的所谓忧患意识，或者说它作为民族“启蒙者”的“文化哲学意识”，就是公然指责中国文明的存在“恰恰是整个古老世界的最后挣扎”，中华民族已经成了“一个在心理上再也输不起的民族”，“这或许正是那黄色文明的沉重之处和浅薄之处”！他们不加分析地鼓噪中国的出路是走向蔚蓝色的文明，“中国的希望在于世界”。这些谬论说明，《河殇》编导者们狂傲无知、信口开河的学风，已经到了何等惊人的程度。

(二)否定前贤，鄙薄今人，无视马列，唯我独尊。《河殇》为了构造其“精英思想”，竟胆大妄为，放肆地对待历史事实、革命运动和科学理论，从而把他们的“主体”随意性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他们嘲笑孔子、郑和、戚继光，也嘲笑林则徐、魏源、陈天华。更有甚者，他们还嘲笑马克思、列宁。至于对毛泽东的嘲笑，那就更多了。他们对待民族英雄、爱国志士和革命领袖的这种狂妄、轻浮态度，也是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态度。

(三)随意取材，妄加评说，炫耀知识，华而不实。《河殇》貌似学识渊博，旁征博引，从自然说到社会，从上古神话说到当代历史，从中国说到外国，举凡经济、政治、民族、军事、科学、技术、文化等以及与此有关的一些历史人物，多有涉及。表面看来，真是洋洋洒洒，气势恢宏，加之语出惊人，不乏“哲理”，果真收到了一时的“轰动”效应。但若稍加

推敲，就不难发现，《河殇》对史实材料的随意撷取和对历史评论的武断蛮横，既暴露了编导者们的浅薄无知，又反映了编导者们的哗众取宠。

（原载1989年10月23日《人民日报》）